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李慎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 李慎明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8

ISBN 7 - 80149 - 341 - 9

I. 战... II. 李... III. ①军事理论 - 文集②社会主义 - 理论研究 - 文集 IV. ①E0 - 53②D091.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645 号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著 者：李慎明

责任编辑：马 援 魏 军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6.75

字 数：398 千字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341 - 9/D · 048

定价：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李慎明同志简历

1949 年 10 月生于河南温县。先后在乌鲁木齐军区某师政治部任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社任记者，后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研究和爱好范围较为广泛。发表作品和专著近百万字，并数次获得全国性奖励。近年重点关注国际战略问题和党建理论问题研究。

自 序

稍细心的读者可能已注意到：本书的封面上，既有该集子的总的和集子第一编《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名字，也有南怀瑾先生题写的该集子的第二编《小圃集》。

道清事情的原委，还是先从 20 多年前听到的这么个故事叙叨起吧。

一个大报的编辑部主任，一个既有灵气也有些名气的年轻女诗人。花前月下谈的时候，双方既是开玩笑，但也不乏认真，为他们爱情将来的结晶取名字。6 年间，翻遍辞书，搜尽枯肠，苦思冥想，组合万千，待到孩子出世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他们击案叹息：“枉还被称之为文人。6 年时间，毛泽东能打两个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了。”孩子出生了，总得先有个称呼吧。这时，编辑部主任已当报社总编辑。总编辑姓宋。那时候，生育还没有计划，两人商定先叫“宋老大”；来日方长，上学时再正式“命名”不晚。就这样“宋老大”、“宋老大”地叫着。日月如梭。一眨眼，又一个 6 年过去了。上小学报名前，一对文人真急了，几乎彻夜未眠。翌日清晨，女的突然灵机一动：“干脆就叫‘宋老大’算了，一来我们大家都已叫顺口，二来是大俗之中有大雅，宋朝著名诗人中还有一个叫范成大呢！”后来，大家也都觉着这个孩子叫“宋老大”蛮好。

说实话，我为自己这个集子起名字也一样颇费踌躇。

我这个人经历也算丰富，上学后当兵，当兵后主要是爬格子，新闻干事，报社记者都干过。后来当秘书，再后来干行政管理，业余都要爬格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工作性质本身就更逼你非爬格子不可。于是乎便有了现在这个集子。

看这个集子的目录，便会发现，内容较杂：既有国际与军事战略、哲学社会科学的散论，又有党建、经济问题研究和文艺评论、新闻札记，还有报告文学和散文。面对这么庞杂的内容，给集子安个“眼睛”确实犯难。孩子出生后可以暂时没有名字，但集子出版不起名字却不行。就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我的陋室里，挂着怀瑾南老 1994 年给我书写的宋朝朱敦儒的《西江月》，首句便是“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无意中，抬头朝此一望，噢，有了，这个集子就叫《小圃集》吧。在自己耕耘数十年的小园圃里，开放着论文、札记、评论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式别样的小花。《小圃集》，倒也名符其实。

事情往往有反复。

第二天，帮助整理集子的马援说：“这个集子从字数和份量上讲，主要是第一编：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这其中，你刚定稿的《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部分便有 7 万多字，单这一篇就可出个小集子了。《小圃集》没有囊括最主要篇幅和最重要内容。”我一想，说得也是：从题材和内容上看，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讲得是大一些的问题，像是关东大汉击铁板，高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小圃集》从字面上看，有似江南女子抱琵琶，低吟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

最后，与几位同志商定，集子总名字和第一编就叫《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集子第二编叫《小圃集》。

对这个集子，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从时间跨度上，最早的文章《列宁勤奋学习精神的现实

意义》写于1973年（未作改动），最后的一篇是与自序同时完成的《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二、作者的写作经历中，新闻作品比重更大一些，但那些基本是过眼烟云，未收入此中。收入此集的绝大部分，已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过，也有个别没有发表过或是内部的调研报告，经整理后，一并收入。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本集子内容虽庞杂，但作者认为，同一信念却贯穿全书始终。

三、集子的第一编10多万字大部分写作于到社科院工作后的一年多。即将过去的20世纪，尽管我们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经历了无尽的灾难和曲折，却也有着无比的壮丽和辉煌。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们同样有着无比灿烂的前程，但也有不少让人忧思之处。集子的第一编，主要反映了作者在新旧千年、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刻，对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些思考。作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个课题，同时又是远远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已严重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有可能极不平静。我国若能像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样，始终恰当应对，我国则完全有可能继续赢得和平与发展的的大好局面，成为全球烽烟四起中的“世外桃源”；否则，也有可能面临举国迎敌的极其严重的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始终不倒，将极大地有助于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21世纪中叶前后，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内极可能又是一次无比崭新和无比辉煌的复兴。

四、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此集子中的一些篇章里，我讲了一些可能别人尚未讲过的观点，

旨在从学术上创新，但也可能是谬误，敬祈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多批评指正。

五、报告文学部分，全部写的是我在他身边工作整整 10 余年的我所十分崇敬、十分思念的王震同志。了解王震同志的人，都十分敬重他。但无庸讳言，有的人误解了他。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 12 集电视连续剧《红旗漫卷西风》。这个连续剧主要是反映王震同志在和平解放新疆中的贡献。应该说，该片反映了王震同志的不怕牺牲，大智大勇，勇挑重担和平易近人的品德和精神。但据我所知，王震同志本人比此片所表现出的更具风采。尽管如此，听说电影界一位老人看了后，对王震同志由误解转为十分的敬重。集我在王震同志身边工作 10 多年敬重和认识之凝炼，主要有四点：一是他把马列读到了自己的骨子里，他是真懂马列之将军。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口，他的言行往往是正确的。二是他对人民、对祖国无限忠诚，他勇于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是他一辈子艰苦奋斗，勇于开拓，从不保守，敢于创新。四是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为人直率，坦诚。对王震同志感兴趣或不大了解的人，笔者很希望他们能读一读《王震将军》一文。此文主要是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王震将军》传记片撰写的解说词。纪录片上书的是作者的笔名：肖黎。片子播放 6 年了，最近我才得知，此片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 94 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

怀瑾南老欣然为这个集子的第二编《小圃集》题名，在此特致以深深的感谢之忱。出版社的同志和马援同志为这个集子的整理出版尽了很多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2000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编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3
21 世纪初的我国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109
全球化与第三世界	122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的改良	147
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	151
党的绝对领导是新时期我军质量建设的灵魂	159
论“四快一慢”战术的实效性问题	187

第二编 小 圃 集

第一部分 哲学社会科学散论	197
新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	197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有关问题的思考	212
积极发展新时期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220
试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素质培养	224
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229
国内市场的保护开放和振兴壮大	239
中西部地区要充分注意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255
澳门回归后的经济政治前景展望	260
列宁新经济政策浅析	268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272
第二部分 党建研究	278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278
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	295
共产党员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	306
落实、落实、再落实	314
列宁勤奋学习精神的现实意义	319
第三部分 文艺评论与新闻札记	325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325
评一部反映廖承志早期革命生涯的电视剧	337
应当建立和研究新闻心理学	342
脚 + 脑 = 新闻	353
边塞无处不飞“花”	360
科技开发的宣传报道工作	366
第四部分 报告文学	371
王震将军	371
在金色的瑞京	403
将军和士兵	419
将军和故里	437
战争风云中将军的侠骨柔肠	461
第五部分 散文	500
清明时节思井冈	500
雪山恋歌	505
边陲的笑声	512
难忘幸会情悠悠	515
她从井冈来	519

第一编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

——兼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 战争、和平观

在我们即将庆贺每隔悠悠千年才能遇到的——又一个新年，又一个新的世纪，又一个新的千年同时莅临的时刻，一个令人震惊、令人愤慨的事件深深地烙印在中国 12 亿人民的脑海里：1999 年 5 月 8 日凌晨 5 点 45 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 5 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 3 人惨死、20 多人受伤、馆舍严重破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把战争强加到南斯拉夫和中国人民头上，这是世纪之交的警示，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152 年前，全面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凝结完整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诞生和问世。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曾几度风雷激荡、蓬勃兴起，又几度荜路蓝缕、步履蹒跚。长期以来，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面临着强大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的扼杀、经济上的封锁，而且随时面临着它们军事上的严重挑衅，甚至是铁与血、火与剑的战争干涉。

被推为百代论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圣的孙子在 2500 余年前曾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① 战

^① 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第 115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

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到人类文明和命运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关系到人类社会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可不察。

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走入低潮，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生存环境遇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迈入这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有关论述，回顾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剖析当代战争与和平的现状成因，展望未来战争与和平的趋势前景，对于我们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立足于打赢战争、保卫和平，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快发展，壮大自己，以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的挑战，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特点和根源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硕大的地球负载人类在渺渺太空旋转的有史记载的数千年里，世界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爆发过无数次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99年，世界上大约总共发生过14600次战争。战争，既是人类各个阶级社会诞生的助产士，又是各个阶级社会灭亡的掘墓者。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同样与战争结伴而行。从这种意义上讲，一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用武力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和干涉的战争史。

1871年3月11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巴

黎公社政权诞生后，国际反动派视巴黎公社为“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要求扑灭巴黎革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一再呈请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帮助法国梯也尔流亡政府镇压巴黎革命。俾斯麦不仅立即释放 10 万法军俘虏，扩充梯也尔军队，并从北部、东部加紧封锁，使公社军队处于两军夹攻之间，而且还允许梯也尔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东北面攻进巴黎。结果，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政权仅存短短 72 天，便以失败而告终。

1917 年 11 月 7 日，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响，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是酷爱和平的，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第二天就颁布了和平法令，但是协约国拒绝了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把它恨到了极点”。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 1917 年 11 月 10 日，德国首相艾伯特便打电话给陆军总部，商谈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问题。同一天，兴登堡元帅专电要求军官和士兵采取一切措施，以“制止恐怖的布尔什维主义蔓延”。^① 1918 年 2 月 18 日，德国帝国主义大规模进攻苏维埃。1918 年 11 月底，俄罗斯的原盟国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协约国也纠集 12 个师约 13 万兵力与自卫军主力一起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图谋遭到失败后，1919 年春，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一些仆从国家组成新的干涉军，连同国内的几股白匪军共 130 多万兵力，又一次联合进攻苏维埃政权。它们先后发动 5 次大规模联合进攻，其中 1919 年夏季的第四次进攻，使苏维埃几度处于极度危急之中。这次进攻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给予反动的自卫军邓尼金的军援名目繁多，其中，英国给予 25 万支枪、200 门大炮和 30 辆坦克，美国给予 10 万支步枪、300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 1 卷，第 13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多万发子弹、20 万枚炮弹。在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坚决地击退了 14 个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胜利地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 11 月 6 日，意大利也加入了该协定。这一协定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面对希特勒称霸全球的野心，英法统治集团拒绝苏联的集体安全主张，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尤为积极。1938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英、法、意、德四国在德国慕尼黑达成协议，并签署《英德宣言》，这实质上是“祸水东引”，鼓动德国进攻苏联。苏联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最终未能避免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1941 年 6 月 22 日清晨，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 190 个师的兵力，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妄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 3 个月内征服苏联。截止 1941 年 11 月，德军便深入苏联腹地 350 ~ 1200 公里，占领苏联领土 150 多万平方公里。到同年 12 月 1 日，苏军损失 700 多万人以上，坦克 2.4 万辆，飞机 1.6 万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无比英勇地抗击着德国法西斯。长达 3 年零 1 个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歼敌 50 余万的莫斯科保卫战，迫使德国转入防御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粉碎德国所谓 1943 年“夏季攻势”的库尔斯克会战和乘胜追击受伤野兽、最终攻克柏林的大捷，都记载着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的辉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也纷纷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敢对日益强大的苏联贸然行动，却把既惊恐又仇恨的目光盯向满目疮痍亟待恢复的新中国。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 月 27 日，美国便假借联合国

之名，成立由美、英、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泰国等 23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全力干预朝鲜战争。与此同时，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迅即开赴台湾海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此后，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扫射轰炸东北边境城镇与村庄，杀伤和平居民，美侵朝海军驱逐舰在公海炮击中国商船。10 月 8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10 月 19 日正式赴朝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美国投入陆军的 1/3、海军的 1/2、空军 1/5 的兵力，美飞机最多时达 2400 余架，在 22 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的战场上，其兵力密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其空军轰炸密度和某些战役的炮兵火力密度也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当时中国既无制空权，也无制海权，年钢产量仅有 61 万吨，而美国年钢产量多达 8700 万吨，是中国的 1250 多倍。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正气干云，与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历时两年零九个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典型表现，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大规模局部战争。整个战争耗时最长，从 1961 年美向南越派遣“特种使命部队”始，直到 1975 年美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权垮台为止，先后持续近 14 年。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侵略逐渐升级，除使用大规模的陆军外，还采用大量航空兵进行大规模密集突击、炮兵射击和舰队封锁以及使用化学武器等手段，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经济潜力遭到很大破坏。美国先后有 250 万人参战，1968 年同时参战的美军官兵多达 549000 人。战争也使美国付出了死亡 57000 人、伤 154000 人、花费近 3500 亿美元的高昂代价。

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易旗更加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也是一种战争，它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热战的最低级状态。冷战与热战都是相对而言。尽管各自的手段、特征、在时空中表现的形式各有所不同，但其性质和目的，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冷战同样可以甚至可以更好地达到热战的目的。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在咨文中，它宣布了世界必须在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之间选择的非此即彼的原则，宣布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式斗争的开始，美国政策进入了打着反苏反共旗帜进行全球扩张干涉的“冷战”阶段。从此，美苏之间的冷战、争霸持续40余年。美国通过包括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热战，企图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和影响，以确保“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实现。苏联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后来实力的增强和党的领导集团的一系列错误，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随着向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逐渐演进，在“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下，走向在全球范围内与美争霸的道路。美苏之间长期的军备扩张、恶性的军备竞赛，在全球范围内的角逐，不仅给中小国家，而且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

帝国主义列强、资本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既有着一般战争的共性和规律，也有着特殊战争的个性和特点。其具体特征表现为：

（一）阶级性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所要达成的战略目的，不仅有着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利益，特别是明确的阶级目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是为了争权，二是为了夺利，争权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夺利。但这种争

权夺利，勿需触动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1918年2月18日，德国帝国主义进攻苏维埃共和国，2月21日，列宁即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揭露：“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①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列宁坚定地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支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守卫，直到其他国家的革命酝酿成熟，其他部队前来支援。”^②这也充分体现了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在世界范围内所需要的明确的阶级目标和坚强统一的阶级意志。英帝国之所以加入14个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社会主义苏维埃的行列，当时任英国大臣的丘吉尔道出了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声，即他自己很希望能活到在俄国推翻苏维埃政权并建立“文明政府”的那一天。^③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里也直言不讳地说，他毕生的目的意义就在于消灭布尔什维主义。^④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不仅是为了侵占苏联的国土，掠夺苏联的资源，而且是为了消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法西斯德国对苏战争同对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正因如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几乎贯穿于德国进攻苏联计划的全部战略战役文件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5月19日的特别命令即“巴巴罗萨”方案的附件中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民的死敌，这是一种破坏

① 《列宁军事文集》，第426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9页。

③ 1962年6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

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性的世界观，德国必须与其代表者进行斗争。”^① 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引起西方极大恐慌。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月的1949年12月30日，美总统杜鲁门便批准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建议。此后，美国又决定，除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之外，尽快建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包围。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赋予一场地区性冲突以世界意义，并据此显示美国的反应的，只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美发动这两场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而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打掉远东这座“共产主义的桥头堡”。

（二）残酷性

既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的战争有着鲜明阶级性的坚定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必需具备毫不妥协的坚强意志，有着不怕任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战争具有空前的残酷性。巴黎公社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对逃亡凡尔赛的梯也尔和潜伏在巴黎的反动分子以“仁慈”相待，没有实行坚决地镇压。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却下令“要迅速地、无情地、残酷地镇压……毫无留情、决不饶恕”。屠杀革命者延续了整整一个月。巴黎街头，鲜血成河。审判也持续了好几年。共3万多公社人惨遭涂毒，加上监禁、流放、驱逐的共达10万人之多。二战期间德国陆军参谋长的日记证实，在1941年3月30日德军领导成员的会议上，法西斯国家头目总结说：“我们说的消灭……在东方，残酷就是对未来的仁慈。”纳粹集团要求无情地加以消灭的不仅是苏军官兵，而且还有一般的苏联公民。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认为，对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5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苏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他们指望通过这场战争从肉体上消灭大多数苏联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者。1941年6月6日，他们还发布了《对待政治委员的命令》，要求枪决苏军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①德国法西斯给予苏联的破坏也是极其惨重的。德国侵略军占领破坏了苏联1710座城镇，7万个村庄，毁坏了苏联31853家工矿企业，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万公里铁路和4100个火车站，使苏联2000万人死于战争，直接经济损失达25690亿卢布，占国民财富的近半。朝鲜战争中，美军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和早在1925年就签订生效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条约，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多种手段，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不仅对朝鲜北部7个道、44个郡，而且对中国东北投掷细菌弹，广泛展开了细菌战，使中国军民沾染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朝鲜战争的第一年，由于美军的节节失利，杜鲁门政府不仅多次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杀气腾腾地4次采取了使用核武器的行动，一连4次造成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越南战争中，美国又不顾两次联大决议的谴责，投掷凝固汽油弹和“闭锁轰炸”（指从空中对驻有或仅被怀疑驻有解放武装力量的村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美国还首次进行大规模化学战，消灭解放武装力量所需的粮食来源和帮助其隐蔽及发动伏击的植被。1962年间，被化学药物摧毁的植被为5681英亩，1963年激增为24947英亩，1964年增至为93860英亩。这场战争中，美军抛下了750万吨炸弹（比二战时落到所有国家炸弹总和的两倍还多），使1/3越南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9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人变为残疾，300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万人丧生，^①给越南人民造成十分严重的灾难。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依仗绝对优势的高新科技和军事技术，以“零死亡”的代价，酿成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的灾难，造成南联盟 2000 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 多名军民留下终身残疾，近 100 万人流离失所，200 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000 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还使用了集束炸弹、贫铀炸弹等国际法明文禁止使用的武器，对南人民及其邻国人民造成长期性的放射疾病。^②北约还大量轰炸各项民用设施，包括公路、桥梁、炼油厂、汽车厂、药厂、铁路线、民用机场、医院、电视发射塔和数百公顷的森林，使南联盟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使欧洲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联盟性

战争同私有制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当然是你死我活的，也经常是剑拔弩张、兵戎相见，这已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在相同的私有制基础之上产生的争霸的矛盾，因而不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调和余地便愈来愈大。因此，当它们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根本矛盾时，不管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的对立多么激烈，但它们都往往可以在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所有制基础上达成一定的谅解，并暂时缓和其内部矛盾，并结成广泛的军事同盟，以集中精力和矛头，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1949 年 4 月 4 日，美、加、英、法、比、荷等 12 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

① 《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 12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② 《1999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0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

式。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战后在遏制共产主义的统一口号下，反对与对抗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的形成。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往往以联合军的面目出现。武装扼杀巴黎公社，使俾斯麦和梯也尔化敌为友；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使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纠集到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专门拨出财政，扶植德国军事力量很快复活以对付苏维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集团大搞绥靖政策，妄图“祸水东引”，挑动苏德战争；以后美英联军拖延两年之久为抢夺反法西斯胜利果实后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朝鲜战争中，为对付社会主义的中国又使 23 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走到一起。世纪之交，以美国为首的 13 个国家携手对南联盟这样一个弱小国家狂轰滥炸长达 78 天之久，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正如它们所宣称的，南斯拉夫是“欧洲最后一座红色堡垒”，“米洛舍维奇政权仍然是共产主义政权”。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同样是实利主义和投机主义者。为了眼前的生死攸关的切身利益，它们有时也会牺牲伙伴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的妥协。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声明支持苏联抗德时说，他并不放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念，但是反对德国法西斯更为重要。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当时发表声明：“对美来说，共产主义独裁制度……同纳粹独裁制度的原则和主义一样，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美国人民目前的问题是，希特勒正在拼死努力征服世界。因而凡是有利于加速法西斯德国失败的力量，不论来自何方，都有利于美国的国防与安全”。^①但是这种妥协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它们的联盟则是带有长久的全局性。

（四）必然性

^① 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引言，第 5～6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考虑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时，总是把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和侵略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总是信奉实力和枪炮，践踏正义和真理。一部资产阶级的发迹史便是一部火与剑的掠夺史。垄断资本家寇道夫 1927 年在德国工业大资本家中间散发的希特勒秘密备忘录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决定最后胜负的是“放在天平上衡量其轻重的剑的力量”。^① 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外交孤立和打击政策；在经济关系中设置歧视性障碍，实行经济、科技封锁，把国际贸易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等各种渠道，进行恫吓，思想渗透；在社会主义内部培植敌对势力，妄图取而代之；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挑起军事冲突，甚至不惜以战争和核武器相威胁。特别是在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前，它们往往把武装干涉和侵略放在其他各种手段之首。它们对巴黎公社的扼杀，对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和对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武装挑衅，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它们的信条是：悬殊的暴力，可以攫取任何财富，占领任何土地，摧毁任何政权。通过一刀一枪的较量，只有当帝国主义承认无法用武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后，才不得不与社会主义进入相对的和平共处，从而也就把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计划放在突出甚至首要的位置。但是，它们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打算过放弃战争这一阶级斗争和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最高形式，丝毫也没有放弃武装干涉和侵略这一手段。在两种社会制度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其他手段不足以显示足够的效用，它们必然用战争相加。就是它们在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包括“和平演变”等各种手段企图搞垮它们的同时，也总有武装暴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 1 卷，第 11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力威胁相伴随。1996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帮助台湾”法案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恫吓中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海军，谁也不要忘了这一点。”^①

为什么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总是把或是想把战争强加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

首先因为社会主义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标志着国际资产阶级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和人民的压迫、剥削、奴役的结束。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的统治逐渐变成国际性的力量。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大树是靠吮吸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养分”而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奋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和完善政治制度，发展文化事业，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且还斩断了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掠夺式的不平等贸易、资本输出等手段伸向本国掠夺的根系，建立与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交往和平等的贸易及技术合作，有力地打击着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旧秩序。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国际资产阶级的掠夺在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最强有力的障碍。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于是它们便要用战争暴力搬掉社会主义制度，为其继续掠夺开辟道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德国法西斯入侵前夕的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7.15倍，而同期的美国仅增长34%，英国增长69%，法国增长31%。资本主义世界还危机迭起。历史证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

^① 陈锋主编：《中美较量》，扉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纪元，而且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力空前增强，这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建立。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时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的独立。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覆倾，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步入低潮。但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却重新焕发着无比蓬勃的生命力和无限昂扬的生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新鲜经验为世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瞩目，对如何全面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社会主义的示范效应最终将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生存。

再次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帝国主义称霸和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各项权益，并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尽心竭力，使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霸权行径处处得到制约，这就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最后，也是从根本上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社

社会主义国家的仇视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私有制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社会主义国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产物。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持续几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活生生的实践上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永恒性，而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其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面临着许多初生的困难，但她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和载体，以历史已有的其他社会制度所不可比拟的本质上的巨大优越性，显现出极其旺盛的活力和生机，预示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和未来，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生存从根本上造成威胁。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项异常艰辛、曲折而又十分漫长的伟大事业，但是资本主义的挽歌毕竟开始低徊，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毕竟已被撞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此当然惊恐万状，它们也必然处心积虑企图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战争以把历史的车轮倒拖。

二、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社会主义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

战争与和平，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审慎对待、正确处理的关系自身安危的重大战略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诞生，加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敌视、封锁和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十分不利，往往有时则十分险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便愈加需

要处理好这一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一再告诉我们，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一方面出现重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则必然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归于失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处理上，社会主义有过悲惨、痛苦和深刻、沉重的教训。

社会主义理论一进入实践，便遇到能否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生死考验。巴黎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少数派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完全无视距巴黎仅仅 17 公里的凡尔赛逃亡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杀气腾腾的敌意，沉醉在虚幻的和平之中，竭力否决了杜瓦尔、爱德等几个中央委员的“先结束革命，然后再选举公社”、立即追击到凡尔赛的正确主张，从而使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不休的公社选举之中。结果使邪恶的侏儒梯也尔联合俾斯麦，纠集大批军队向巴黎公社反攻得逞。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辉煌的胜利。但战争初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间的判断上，在战略决策和战争实践的指导上，有着重大的失误。应该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是十分警惕的。即使在 1939 年 8 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有效期为 10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还仍意识到，苏德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斯大林太希望保持和平了，哪怕几年也好，他认为这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他对法国战败投降后德军进攻方向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德军接着要进攻的是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因此，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相信，在 1943 年或 1942 年以前，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斯大林和苏政府推迟了自己的备战时刻表，甚至害怕过早地备战会刺激

德国，引火烧身，以至于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包括本国情报机关获得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均持怀疑态度。应该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于战争是有认真准备的。很可惜，由于在战略决策和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判断上的失误，湮灭了或根本上削弱了这些物质准备在战争爆发后应起的实际效能。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之间宽约1500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全线的“闪电式”进攻。开战后的第一天，苏军各边境军区共损失飞机1200余架。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储备的武警装备和军需物质，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少有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其亡之忽，令人震惊。究其原因，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到处扩张，狂热军备，与美争霸，大量消耗国力不能不算其中一条。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本意是要作为战后国际和平与大国合作的体制的。但美国自恃实力超群，要担负“领导世界的责任”，即侵略和控制广大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奴役和支配之下。每年军费开支迅速增长4~5倍。为了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西方国家还结成了以美国为首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军事同盟。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支援，苏联也加大了军费或其他开支。但随着战后实力和地位的提高，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特别是开始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演进之后，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野心迅速膨胀。苏联霸权主义者不仅到处与美争霸，而且借口“革命输出”，1968年出兵占领捷克，1969年入侵中国珍宝岛，派大批军队入侵阿富汗。为了在任何需要实现意愿的地方实现霸权主义的意愿，苏联当局不断增加军费拨款，军费由1965年的326亿卢布提高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15年间增长3.75倍，国民生产总

值虽不及美国的 70%，但军费与美不相伯仲，占全苏财政支出的 1/3。这样苏联共有军队 400 多万，超过美国两倍；核弹头由原占美国的 1/3 发展到美国的 1.5 倍；海、陆、空由原来的防御体系变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1970 ~ 1979 年间，苏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474 亿美元，经济援助 116 亿美元，还在国外建立 40 多个军事基地。苏联军费占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15% 增至 1981 年的 21%，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占财政支出的 85%。长期的军备扩张和恶性军备竞赛，使农业、轻工业投入减少，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较快的提高，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人民群众十分不满。苏联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却硬要与美争夺军事优势，争夺霸权地位，这就为日后的解体打下了“伏笔”。

苏联的解体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由过度军备带来的尽耗国力不能不是缘由之一。

从巴黎公社失败、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损失和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和侵略估计、准备不足，或是不顾国力、反弹过度，或是穷兵黩武，用武力输出革命，甚至搞霸权扩张，都会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也有着许多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有力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正常的经济建设，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和领土完整的光辉范例。

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得整个俄国民穷财尽，农村大批土地荒芜，前线士兵士气低落。如果继续战争，无异于葬送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认为：“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话题。”^①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 10

^① 《列宁军事文选》，第 414 页，战士出版社，1981。

月26日，全俄苏维埃向各交战国发出呼吁，停止世界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英、法、美等协约国拒绝和谈，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同意单独媾和，但提出的和约条件相当苛刻。列宁既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方案，又反对布哈林“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战争”的方案，主张立即签订和约。但列宁的主张不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接受。当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时，身为外交人民委员和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擅自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和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决定全面复员军队。在德军向苏维埃发动全面进攻前后，列宁仍不放弃签订和约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连续几次召开紧急会议，列宁顶着签订和约是“自杀行为”、“出卖民族利益”、“德国帝国主义走狗”等指责，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艰辛的工作，1918年2月24日凌晨3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终于通过同意缔结和约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数以万计的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喘息”时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行革命妥协策略，实现相对和平的范例，从而为做好应付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在努力争取相对和平的同时，列宁坚决主张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德军向苏维埃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列宁即向全国军民发出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号召全国军民“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庞大的军队”。^①列宁还反对所谓“最革命的战争”的一切空谈，主张“对国防力量和战备采取严肃的态度”，对战争“进行

^① 《列宁军事文选》，第426页，战士出版社，1981。

长期的，认真的准备”。^① 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他斗争。必须善于同他斗争”。^② 在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同时叛乱的危急时刻，正是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把党、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一切活动转入战时轨道，动员现有的全部人力物力用于国防需要，并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大规模武装工人，并把义务兵役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迅速组织一支集中的、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团结起来的、训练有素的、装备精良的红军队伍。1918 年 10 月，红军已达 80 余万。1919 年又迅速增至 150 万人，到年末，红军总数达 400 多万。列宁关于必须严肃地对待国防和战备，认真地进行战争的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苏维埃军民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巩固了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也赢得了 1920 年初一个新的和平喘息时机。

社会主义中国自建国后到毛泽东 1976 年去世，一个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相对落后的大国，先后面临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经济大国军队入侵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精心谋划，既能敢于迎敌，打赢战争，又能充分准备，遏制战争，逐步为我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朝鲜党和政府，多次恳请中国出兵支援。当时美军具有现代化的装备，不仅陆军地面机动和火力都很强，而且海空军占绝对优势。而我军仅有一点重型火炮，不少还用骡马牵引，打仗主要靠步枪和手榴弹。而且中国新区的土

^① 《列宁军事文选》，第 430 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② 《列宁军事文选》，第 431 页，战士出版社，1981。

改刚刚开始，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和衰微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台湾和西藏问题还未解决。刚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较量，而且还要冒着全面战争和核战争的风险。毛泽东一连度过了3个不眠之夜，接着又数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发报给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若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是不利的。”^①毛泽东横下一条心，打了以后再建设。朝鲜对美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风，打出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风，打出了建国至今中国边境的相对安全和平。

中国不认苏联霸权主义的账。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②邓小平所说的相当于苏联导弹的1/3共30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这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苏联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这些轰炸

① 陈锋主编：《中美较量》上册，第2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页。

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①此外，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②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警惕。1969年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的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9月底，美国在明确拒绝苏联关于美苏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主张的同时，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企图秘密通报中方。^③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毛泽东对这一系列威胁毫不畏惧。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便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④1965年，毛泽东又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珍宝岛事件后，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要准备打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准备打常规战，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不仅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精神上的打仗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从各项实际工作上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指示，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装备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1964年10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

① 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② 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③ 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④ 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第4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功，1968 年装备部队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 6”则可携带百万吨级的核弹。从 1969 年开始到 1970 年，部署在我国东北、西北射程可达到西伯利亚城的中程导弹已达 50 枚；我国的陆基导弹隐蔽、分散，有较强的机动性，即使先受到攻击后，仍有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陆基和空基核突击能力对苏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极大的威慑。到 1964 年 11 月，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能自己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泽东、党中央十分重视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1964 年 6 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不及。^①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到 1968 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60 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1969 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到 70 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也已初具规模，从而建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969 年中国的军费比 1968 年猛增了 34%，1970 年和 1971 年又继续递增 15% 和 16%。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原因，“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② 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 30 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

① 陈继安主编：《毛泽东军事新论》，第 458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② 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第 25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①

毛泽东认定，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并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即考虑收缩战线，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战略意义。为了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坚实的基石，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就明确指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②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即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③此后，毛泽东又数次催促、关注4个老帅的研究。如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4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对陈毅等人的工作表示了关注，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④4位元帅不负重望，从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帅们座谈了数十次，给中央呈送了数次关于国际、国防问题的报告。他们判定，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应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的外交调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创，中国倡议建立的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无疑都对遏制苏联对华战争起到了极其重

① 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录》，第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页。

③ 吴旭君：《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④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页。

要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战备是假想，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强大的企图入侵之敌，因此，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严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战备是被迫进行的。笔者对后一种说法完全赞同。当然，在如此巨大的诸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正是因为中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积极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才有效地遏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稳固和经济建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六、七十年代的十分必要的战备工作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外交战线上一系列重要成绩的取得，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已发生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级分析与国家利益分析相结合、政治矛盾分析与经济矛盾分析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入研究国际形势的特点，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崭新论断，并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1985年，邓小平在作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

判断以后指出，我们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只看苏、美双方力量的僵持还不够，还要看我们自己的政策。他再次要求把争取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依此，中国在 80 年代初开始对外交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由“一条线”政策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主要因为，后来苏联的逐步衰落和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进一步演化，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加上美国对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敌视，原来的“一条线”的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邓小平适时提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既十分重视同邻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也力图同与中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分歧甚至争端的国家友好协商解决分歧或争端，使相互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努力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侵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从而使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贯彻邓小平关于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指示，努力发展同各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合作。邓小平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友好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促使一些与中国有分歧或争端的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外交政策。自 80 年代初起，我国同与我有领土争议或其他纠纷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关系，逐步消除了紧张气氛，双方经济、科技、文化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特别是成功地运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使香港、澳门实现顺利回归。这就为缓和和消除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世界

和平开辟了新的途径。到 80 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环境已显著好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时期内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中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已基本消除。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这十分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顺利进行。

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成功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创造条件，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准备战争，最终打赢战争；只有不怕战争，敢于斗争，赢得战争，才可能赢得和平，赢得发展。由此才能遏制更大规模的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重温沉痛的教训，给我们以更多的警醒和启迪。

重享成功的喜悦，更加坚定我们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沉痛的教训，都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何等的重要。回顾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更加有助于我们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来剖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三、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

这里所说的和平主要是指与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不同的，各国国家联盟之间运用武装暴力手段进行全球对抗的世界大战相区别的状态，是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隙。

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的完全崭新的论断。此后，毛泽东又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论断。

1946 年 4 月，毛泽东就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

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上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①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说：“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②

1950年6月，毛泽东再次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③

1959年10月，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4页。

③ 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矛盾，都很难解决。”^①

只是到 60 年代以后，中苏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之后，毛泽东才逐渐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战略方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主要是指中苏之间的战争，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战。

直到 70 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看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纷纷著书撰文，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1969 年，毛泽东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说的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内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经常提及的“毛泽东断言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笔者曾认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至今仍未看到有确切的出处来说明毛泽东有此所言。而恰恰相反，如前所引，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论述却比比皆是。

1997 年 3 月，施密特撰文说：“1975 年 10 月，我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③按照施密特的回忆和辞句的组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施密特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毛泽东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说毛泽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85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② 1969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

③ 1997 年 3 月 2 日《环球时报》。

东坚持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既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特别是施密特 22 年后的回忆也与中国外交部当时的原始记录根本不符。1975 年 10 月 30 日下午，毛泽东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陪见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翻译是唐闻生、徐维勤，记录为王海容。会见中，施密特问：“毛主席能否告诉我，苏中美关系的形势将来会怎样？”毛泽东说：“也要打仗。不能永远 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毛泽东还对施密特说：“你是康德的学生。我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就学黑格尔。”笔者理解，毛泽东是在含蓄地告诉施密特：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永远和平共处靠不住。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仅仅是战争，其中包括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但主要是讲局部、有限战争的必然性，却并未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国外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可能是误读了毛泽东。

与此相反，拼命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目的是讹诈、恐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解放运动，讹诈、恐吓社会主义各国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的侵略战争。

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思想。

1980 年 1 月，邓小平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的，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①

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又说：“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仍然在增长。”^②

1987 年 7 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4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

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①

江泽民也多次论述了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思想。他说：“从国际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交替过程中，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仍然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②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思想，是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并不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战争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科学地阐明了战争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马克思明确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③ 阶级社会的战争，“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④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根源的思想，并更加明确地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⑤ 从而揭示了发生战争的物质原因。列宁继续从战争的根源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即帝国主义作了详尽的理论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银行资本已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国外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61～2062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420～421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⑤ 《列宁军事文集》，第622页，战士出版社，1981。

地球上的财富已集中在个别国家手中，这几个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再要瓜分土地，再要扩大财富，就只有牺牲别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这只有诉诸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列宁由此断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是指帝国主义是现实战争的根源，但是，现实战争的根源，并不等于现实战争。战争从根源转化为现实战争，是有条件的，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列宁指出：“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和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①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是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是这样。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制度矛盾的对抗是绝对的，但这种绝对的矛盾对抗可能采用两种形式。不仅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到非采取外部对抗形式不能解决时，和平斗争形式便转变为非和平斗争形式，其互相关系也就由原先的和平状态转化为战争状态。而当它们之间的经济、政治利害冲突还没有尖锐到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时候，就是所谓“和平”时期，其矛盾对抗采用的是和平斗争形式。这是战后 50 余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发展、集聚，几次走到冲突和对抗的边缘，甚至爆发了局部战争，却无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理论依据。

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争取的战略判断，不仅包含着对现代战争根源的深刻观察，而且包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38 页。

含着对帝国主义矛盾斗争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矛盾斗争两种形式相互交替、转化的特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的高瞻远瞩，是对战后各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制度之间矛盾斗争的变化、格局、态势和未来趋势的一种判定，因而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中国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争取的战略判断，不仅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符合战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客观实际。

先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部的矛盾对抗由和平斗争形式向非和平斗争形式转化的制约因素：第一，战后生产国际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国际化的持续发展，使美、日、欧盟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大大加深了。第二，在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各国参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今后仍将不断加强。第三，日本、欧盟各国经济上虽然正在调整并正在重新崛起，但美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西方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种经济、政治、军事上“一超多强”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第四，遭受过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和日本各国，和平运动力量不断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不断深入民众之心。

再看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对其体系之内的矛盾对抗由和平斗争形式向非和平斗争形式转化的全球性的制约因素：第一，苏联对美国、欧盟、日本所构成的严重军事威胁，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外部为西方各国缓和内部矛盾，协调对外政策、联合抗苏或抗俄提供着一种向心力。第二，第三世界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南北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对新殖民主义构成沉重打击，使西方各国能够在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上联合一致，以确保共同的战略利益。第三，当代世界两

大经济体系的斗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

正因为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外部强大的制约因素的存在，决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抗仍以和平斗争形式存在和发展。

苏联解体之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① 苏联解体之后，环顾当今世界，有能力、有资格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怕只有美国。

古代基督教的最大代表、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奥古斯丁对和平曾作过精彩的议论：“任何人都不会通过建立和平来进行战争。甚至那些故意破坏自己所享有的和平的人也并不憎恨和平，他们只是希望把它变成一种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和平。因而，他们并不希望不要和平，而只是希望有一个更合自己心意的和平。”^② 战争的式样是多种多样的，和平的式样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全球来看，从本质和一定意义上而言，当今世界和平的式样更多地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尝过大发战争横财的甜头，也吃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苦头。美国人的仗是越打越精了。他们有着巨大的进行全球战略研究的军费拨款，有着庞大的相关研究机构。二战后直到越南战争，可以说美国对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像条动不动就张牙舞爪、挥拳动足的鲁莽汉子。越南战争后，他们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努力动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② 《西方思想宝库》，第109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立符合美国经济、政治利益的相对和平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新秩序。两霸对峙，苏联解体，美国独自傲视全球，正在加快推进“三个转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威震、独霸全球，从而建立更加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心愿的和平秩序。

第一个转变是从冷战到没有硝烟战争的另一种冷战的转变。1989年11月，苏联解体的前夕，邓小平就十分敏锐地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①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和入侵，不但没有摧毁社会主义的苏联，反而使苏联更加强大。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代办、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更加明确提出必须用“和平的方法”，“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②这种和平演变的效力究竟如何？对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以武力方式还是以和平演变方式为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众说纷纭，鹰、鸽两派交替领骚。但最终“文”为主，“文”武兼备的主张“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派占了上风。从1989年入夏后到1991年9月，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波、匈、民德、保、捷、罗政治局势急剧动荡，先后易旗，偌大的苏联顷刻解体，令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惊异不已。剧变瓦解之速，恐怕连惟一预测到此灾难后果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也没料到。俄罗斯著名学者科索拉波夫甚至认为：“现在世界的划分证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过了，克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② 《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第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扩大了的对抗’，这种对抗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其他企图的区别在于，在运用某些手段方面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力图粉碎对方的军队，占领或瓜分它的领土，压制抵抗的意志。1989~1991年华沙条约和苏联的解体具有战争的所有这些特征。希特勒肢解苏联的计划实际上完全实现了，不过不只是对一个德国有利，而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有利。现在出现了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危险。在这次大战中俄罗斯有可能成为重新瓜分的主要客体和军事行动的场所。这一战争的策源地已经在南斯拉夫、车臣、俄罗斯和其他相邻共和国领土上的内战地区出现了。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最迫切的意义，用欧亚主义、文明论方法和某些俄罗斯爱国主义者的激情都不能代替它。”^① 规模不大的越南战争，美国竟花费几千亿美元尚碰得头破血流，区区几百亿美元就使华约集团和苏联解体，其他成员国易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欢欣若狂，对所剩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更是踌躇满志。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更是上心，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进行“西化”、“分化”。比如，美国中央情报机关每年拨出3000多万美元专款用来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政见者。美国还把控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引诱和牵制中国脱离共产主义的王牌。按照他们的规划，勿需动枪动炮，201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即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经济自1991年第二季度以来，至今持续增长已10年，这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最长增长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用“和平演变”等手法，搞垮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垮了与

^① 《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63~64页。

其对峙的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经济、政治、科技与军事集团。美国在资金、技术、商品、原材料市场、人才智力资源诸方面所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和平演变”成功的“红利”是无可估量的。所谓的美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重视高新科技投入，率先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信息经济时代；金融业实现制度革新，金融市场在全世界最具活力；冷战结束后，美共节省军费一万亿美元；将开拓国际市场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等等，均是美经济连续 10 年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重要原因都是在搞垮苏联东欧这个根本原因，也可以称之为母原因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子原因。没有搞垮苏联东欧这一大前提，其他子原因可以说是无从谈起。如 1996 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销售额高达 602 亿美元，超过该国其他任何行业。这一统计数据表明，自从 1991 年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各地的新市场向美国开放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 94%，这还不包括每年由于盗版而造成的不计其数的损失。^① 因此，可以想见，美国今后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行军事威胁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运用“和平演变”的手法。

第二个转变是从赤裸裸地用剑与火的直接豪夺向利用资本和高科技产品输出等手段的巧取转变。从根本上说，战争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抢占别国领土，掠夺对方财富。这些目的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年代，主要靠暴力手段来实现；而现在则靠历年的资本输出及借贷的赢利，靠正在兴起的成本低、所用原材料少、利润极其丰厚的高科技产品占领市场就可得到。资本输出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重利盘剥的重要手段。资本大规模输往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原因就是那里的发展程度低、工资低、原材料价格低，而利润率高。美国每提供 1 美元输出，就可获得 4 美元

^① 《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1998 年 10 月 25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以上的出口效率。其产品又可以占领资本被输入国的市场，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殖民地式的经济关系”。使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掉入债务的陷阱，一方面加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依附性。发达国家通过输出资本，还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各种特权，以各种方式干涉其内政，最终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导向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轨道。西方强国还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投资高新科技的研究和开发，使其高新科技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达到 50%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比 10 年前翻了一倍。未来的增长会更快。1996 年国际网络技术销售额达 50 亿美元，2000 年总产值可望超过 1 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也创近 30 年来最低，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已取代传统的周期性产业，根据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美国企业 1997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 1/3 以上用于信息处理和与之有关的设备。从 1991 年到 1997 年的增长总额中有近 2/3 同计算机有关。^① 在过去的 4 年中，27%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高技术企业和部门。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后劲也最坚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科技水平必然进一步拉大。首先，高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使现代工业产品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性相对减少，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落后，资金、人才缺乏，而高技术的开发研制却需要高度的组织和大量的投入，这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新技术革命的外围；第三，发达国家在新

^① 《问题和答案：美国为什么如此繁荣》，1997 年 3 月 17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科技革命带动下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广泛发展，发达国家又将传统产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和耗费资源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对高技术产业和关键技术严格控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利用资本输出和高新科技等手段重利盘剥，使发展中国家年损失 5 万亿美元，并使其债务不断加重。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债务总额从 70 年代初的不到 1000 亿美元，上升为 1998 年的 19220 亿美元；近几年，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在以 2000 ~ 2800 亿美元的速度偿还债务，但是债务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国家很多。1998 年拉美地区的债务总额高达 7374 亿美元；非洲地区债务总额以 23% 的年增长率递增，目前已达 3500 亿美元，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不含南非）的 93%，年出口总额的 327%。1999 年非洲人均年收入只有 221 亿美元，而其中的 230 亿美元却要用于偿还外债，占其外汇收入的 30.9%。^① 发达资本主义在克隆羊的同时，也在大量“克隆”自己源源不断的财富和第三世界的贫穷。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能用动听的“支援”手段巧取，何必明火执仗去硬夺？

第三个转变是从直接出兵去干涉侵略向在发展中国家寻找代理人进行战争转变。侵略战争，名声不好；现代战争，费用极高。因此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者总是假别人之手去火中取栗，总是想方设法避免在本国领土点燃狼烟。美苏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军援、经援，在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与其建立军事合作和同盟关系，到处插手各国内部事务和国际关系，必要时则发动代理人的战争。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不发

^① 《债务严重制约着非洲》，新华社内罗毕 1999 年 12 月 5 日电。

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① 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次大战后发生的大约 400 次的军事等危机中，美、苏直接操纵或介入的分别约占 300 次和 280 次。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局部战争，与 20 世纪前半期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一是美苏之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没有爆发过直接战争，但东欧和原苏联地区冲突不断。如前南斯拉夫的内战，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境内的车臣等内部冲突连绵不绝。二是西欧、北美无战争，战争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集中在亚、非、拉美地区。特别是非洲局势动荡不已，有 10 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30 多个国家政局不稳，许多国家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陷入战乱，目前在撒哈拉以南 42 个国家中有将近 1/3 在进行战争，武装冲突数量与 1989 年或 1979 年相比大体相当。西方强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干涉非洲事务和培植亲西方势力，向非洲提供军火，非洲因此背上了总债务中 1/3 左右的军火债。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的确有其内因，不能说都是别人挑起来的，然而，个别霸权主义大国，出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或事前或事后，或早或迟，或直接或间接地要担任黄雀或渔翁的角色。战后的全球各个角落的 180 余次的各种局部战争的背后，往往都能看到过去的美苏现在的美俄的身影。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发动的世界大战，实质上已被他们长期地分散地“转化”为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或内部进行的连绵不断的“小战争”所代替，给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 2000 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 5000 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死于各种局部大小战争的总人数却已达 7000 余万。这 7000 余万人中，绝大部分是第三世界的普通人民。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全球战略调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19 页。

整，克林顿政府 1994 年 7 月正式推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该战略特别强调美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必须以“预防性外交”为主，并实施多边主义的武力干预，其中均包含了寻找代理人进行战争，以确保美全球战略利益实现的实质。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军火利润。自 80 年代中期至今，仅中东地区进口武器装备每年耗资就达 1000 亿美元。从 1994 年到 1998 年，美国的军火销售总额高达 957 亿美元，而 1999 年美国的军火利润至少比 1998 年增加 20%，^① 其总额比名列第 2 位到第 15 位的军火出口国（俄、法、英、德、中、荷、意等）的销售总和还多^②。

我们还应看到，引起战争的力量和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制止战争的力量和动因同样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制止战争、维护或平衡和平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第三世界仍然是国际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尽管广大第三世界愈加贫穷的总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第三世界各国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协调一致行动的凝聚力已经下降，同时也失去了两霸争强时的回旋余地和空间，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第三世界是冷战后西方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经过认真反思，已开始认识到多党政治和自由经济并非灵丹妙药，也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第三世界国家决不甘心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摆布，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斗争。从长远看，随着第三世界国家

① 《美国军火工业调整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新华社华盛顿 1999 年 5 月 31 日电。

② 《美国是世界军火超级市场》，1999 年 10 月 18 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

的重新崛起，必然重新成为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多极化趋势在调整中仍有望继续发展。首先看俄国。由于美国坚持北约东扩，进一步向高加索、中亚等地区渗透，并赤裸裸入侵南联盟，把矛头直接指向俄罗斯，加上俄国按美“药方”进行的改革的失败，使俄对美敌意增强。俄美战略冲突必将进一步加剧。再看欧美。欧盟虽与美国在总体上以合作为主，但谋求独立于美的意识明显增强。法国领导人公开批评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德国也多次宣称赞同多极化；连一贯追随美国的英国也主张建立欧洲的独立防务。最后看日本。尽管美日有军事同盟关系，且有加强之势，但在很多问题上双方互不信任，在经贸等领域的矛盾和磨擦不断。在中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原则，态度灵活，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必能为制止战争、争取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对付国际恐怖势力、贩毒集团及环境保护诸方面都需要各国的合作。如此等等。

我们已经跨入 21 世纪的门槛。展望 21 世纪初的国际形势，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有很多制止战争、争取和平的有利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

四、当今时代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思想，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1975 年 10 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时，比耶迪奇说，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所有的人都在为防备这种可能而加紧自己方面的准备工作，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它发生。毛泽东回答，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堵死另一条路。邓小平在强调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同时，一直强调要

看到战争的危险性。如果认为邓小平只是强调和平，强调埋头经济建设，不讲战争危险，就如同认为毛泽东只是强调战备，不讲和平，不讲经济建设一样，二者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也都是片面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强调和平因素增长的同时，邓小平也总是强调要看到战争的危险性。1981年4月30日，他在会见赛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指出：“国际事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晓得哪一天会出现一个疯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一些小问题而爆发起来的。尽管我们要争取和平，但对战争始终保持警惕。”^①进入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了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新形势。1984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但是，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②此后，邓小平虽然多次强调“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③“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④但也都同时强调，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不无惋惜地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⑤1992年年初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也十分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提醒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

①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3页，八一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④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11页，八一出版社，1993。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治”，“维护世界和平”。^①

冷战结束之后，很多善良的人们热切盼望“让世界充满爱”，“快步走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事实的发展与善良的愿望恰恰相反，美国一跟踪记录战区研究机构认为：1999年“在世界上193个国家中，1/3的国家陷入战乱，几乎是冷战时期水平的两倍”。“1999年发生65起冲突”，“1995年创记录为71起”，“与此相对照，冷战结束尾声时年平均为35起”。^②冷战以后，战争的危险之所以依然存在，主要因为：

第一，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列宁讲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邓小平讲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列宁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的思想是对列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霸权主义是一种对外政策，它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当然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搞霸权主义，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的反映和要求。但由于各种缘由，在具体的内外政策上也会犯错误。有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时对别国实施霸道，这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是一种霸权行为，是其对外政策的扭曲，尚不能称为霸权主义。然而，当这样的国家对外政策演变为霸权主义时，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对内政策的蜕变，从而促使其走上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背离的道路。事实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改变，也正是经历了由这种对内对外错误政策的相互作用，由渐变到部分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面质变的过程。这一问题不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② 《世界上1/3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联社华盛顿1999年12月29日英文电。

本文所论述的重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她决不能也决不会搞霸权主义，搞霸权主义的就一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1980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如果将来有一日中国要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应该联合起来，把它打倒。如果要称霸，中国本身也就改变了名称，不能叫社会主义，而只能叫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搞霸权主义的就一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强权政治与干涉主义。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曾对强权政治作了如下诠释，即认为：“战争和准备战争是各国间典型的正常行为；作战有愈合和再生的作用；当战斗爆发的时候，‘胜利就是一切’。即使肆意蹂躏，如果它可以导致迅速胜利，一般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①爱·麦·伯恩斯接着引用了美国冯·毛奇陆军元帅的虔诚信念：“战争是上帝敕定的世界秩序中的固有成份。”^②德皇威廉二世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士兵训诫：“要使用你们的武器，让一千年后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藐视德国人。”^③约翰·罗斯金宣称，他发现所有的伟大国家都“是从战争中得到滋养，在和平中虚度岁月；从战争中受到教育，在和平中受到欺骗；从战争中受到锻炼，在和平中遭到背叛。”^④强权政治代表性的警言多如牛毛。在这里，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毫无踪影。在这里，赤裸裸的实力、武力即真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一代接一代，什么时候也没有断了香火。

① 【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8页，商务印书馆，1983。

② 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8页。

③ 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8~469页。

④ 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9页。

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惨败，直到 1983 年，美国对外仍不敢轻易言武。但到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大规模扩充军备，不断对外使用武力。冷战结束之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所抬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急于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真空，更是无所顾忌。克林顿总统明确强调军事力量是维护美“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手段，对美“战略取得成功至关重要”。^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插手世界及地区事务，动辄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制裁，恣意侵犯别国主权，甚至公开推行新的军事干涉主义。美国国外驻军在欧洲仍保持 10.9 万人，在亚洲保持 10 万人，在中东保持 2 万人，并正在世界主要战略地区建立浮动武器库。美国空、海军还实行全球到达战略的作战方针，频频对外用兵。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的 1946 年到 1989 年，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约 125 次，年均 2.8 次；而冷战结束后的 1990 年至 1999 年 6 月，美国则对外动用军事力量高达 46 次，年均 5.4 次，出兵的频率远远高于两极格局时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经济本质就是掠夺。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1/20 多，但却消耗着世界 1/4 的资源和能源。地缘政治之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说：“我们这个地球太小，它只能为一个国家真正提供足够的空间。”^②1994 年 3 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辞世前不久写的《超越和平》中说：“漫长的和平时期往往是发展缓慢的时期”，“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大多是战争时期的总统。我们生产力的急剧提高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发

① 武桂馥主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第 139 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

② 〔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 475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展都发生在战争时期。”^① 不难听出这位美国前总统对战争的真诚怀念和虔诚的颂扬。

列宁曾明确指出：“战争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在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方面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与和平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形式。”^② 当今世界，是国际金融资本逐渐形成垄断的时代。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必须获取巨额的金融垄断利润。巨额的金融垄断利润，必然孳生出企图统治全球的野心勃勃的霸权主义。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遥遥领先，特别是高科技武器使美军在对弱小国家作战中，可以少死人甚至零死亡，这便使美国发动战争的门槛降低，使美国动武倾向有所发展。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政府即推出“克林顿主义”。这一“主义”的提出表明：一是美国重大安全利益的范围扩大到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二是美国可以用战争行动解决所谓“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三是落实“克林顿主义”可以不受国家主权和联合国的限制。这说明，美国的军事战略更具侵略性、进攻性和危险性。外电还纷纷报导美国白宫已制订面向 21 世纪的全球战略，为其在一系列所谓麻烦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依据。就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克林顿还特意撰文：“美国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准备承担在任何地方作战的责任。”^③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仅要维护现有的这种极不平等的经济、消费秩序，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谁要稍有反抗，在用其他方式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即用低强度战争的方式来达到

① [美] 理查德·M 尼克松：《超越和平》，第 4～5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②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44 页。

③ 《全球安全面临的挑战》，1999 年 12 月 22 日英国《简氏防务周刊》。

自己的目的。这是美国已经和将来经常大量采用的手段。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垄断资本在追逐超额利润时的不择手段的扩张性。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存在，就必然决定其根本的经济利益矛盾竞争的最终不可调和性。因此，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这就必然存在战争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而且还总是企图通过战争摆脱垄断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资本主义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持续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2600多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也只有1700多亿美元）。这次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了46.2%，居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冠；大批企业破产，美国有140000家以上，德国为60000家；国际贸易急剧萎缩，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比1929年缩小了2/3，其中德国下降了76%，美国为70%，成千上万工人失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美国采用“罗斯福新政”，清理、整顿银行，防止挤兑风潮；停止金币流通，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贬值；兴建“公共工程”，调节劳资关系；对7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控制，“消灭”农产品过剩；除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等。“罗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约35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这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数十亿美元。但是“新政”中得到好处的是大垄断资本，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新政”未能消除美国的经济危机。德国在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更换了四届政府，最后捧出希特勒，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则大肆进行侵略扩张，以寻

求摆脱经济危机之路。希特勒的下场众人皆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且成为最大的战争暴发户，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除两面大做军火生意直接赚钱外，还凭借“租借法案”，扩大军火销路，为其过剩的农产品打开市场。美国的出口在战时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两倍；其工业生产，在战争高潮的 1943 ~ 1944 年期间，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有一半以上被掌握在美国一国手中，当时的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 1/3，并把世界黄金储备的 3/4 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库之中。^①

已经到来的 21 世纪将是高新技术大发展、知识创新大发展和全球经济大发展的世纪，但是这种大发展只是掩盖而绝没有改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调节而绝没有消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迟而决不可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惩罚。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 1986 年 6 月间说过：“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不容我们对未来十分乐观。关于危及民主和平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仍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多年来困扰南方和北方的大规模失业同样是一枚定时炸弹。”^②

应该看到，当今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基本的还是东西、南北两大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南北问题。从这两大问题中，又派生出其它一些问题。

首先，南北之间、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1999 年 6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

① 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第 227、250、279、284、286 页，北京出版社，1984。

② 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第 82 页，时事出版社，1987。

署署长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曾撰文指出：“在过去的15年中，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减少，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又把大约1.5亿人推入贫困之中。”^①现在，世界上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已达13亿人，有人甚至估计达20亿人。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说：“从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是原来的50倍。”但是，这些巨大收获的分配却十分不均。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别从1960年的30:1、1991年的61:1扩大到1997年的82:1。^②世界上前3名巨富的财产，居然超过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③在当今美国，财富的两极分化也是史无前例的。占人口总数1%的巨富者拥有财富比92%的人口拥有的财富还要多。美国45%的人还不如计算机企业家比尔·盖茨一个人拥有的财富。^④有人说，尽管全球范围内贫富悬殊仍在扩大，但是最贫穷者生活水平相应也有很大提高。事实绝不是这样，这种说法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便是有意的粉饰。1998年9月30日，德国《商报》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目前非洲的人均收入仍然比1980年的水平低25%。”“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经济政策，非洲国家重新达到70年代中期的收入水平可能需要约40年时间。”^⑤1999年8月号的美新署的《经济展望杂志》也说：“到90年代中期，非洲的实际人均收入比1965年的水平下降14.6%，多数非洲黑人的境况比独立时还差。”就

① 《穷人的境况》，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5~6月号。

② 《人文发展报告》，路透社联合国1999年7月12日英文电。

③ 《另一个世界》，1999年7月1日阿根廷《号角报》。

④ 《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第20页。

⑤ 《尽管有国际援助非洲的贫困化仍在加剧》，1998年9月30日德国《商报》。

是在当今世界最富有的美国的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也在绝对贫困化。“从 1969 年至 1997 年，即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迅速增加的时期，从 25 岁到 34 岁的白人男性中学毕业生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中等收入下降了将近 30%”，“1997 年他们的收入低于众所周知的、工资过低的欠熟练黑人工人在大约 30 年前的收入”。^① 1997 和 1998 年，“人口中最贫困层的 10% 的人群的实际收入比 1979 至 1996 年工资较高时期下降了 18%”。^②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近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在 20 世纪初，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还比较有人情味。那时垄断企业被分割，是限制的对象。今天共产主义的挑战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真正的丑陋面貌也就暴露出来了。”^③ 欧洲一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年纷纷较大幅度削减公共福利就是例证之一。有压迫、有剥削、有两极分化就必然有反抗、有斗争、有革命；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化，就必然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严重下降、市场严重萎缩和最终的经济危机。当经济全球化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肆意扩张，使全球各种矛盾特别是最主要的矛盾双方无法共生存之时，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到来。

其次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潜伏的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如前所述，应当看到，美国经济仍有很大的潜力，近几年可能仍是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一是美国股市已有严重的泡沫成份。1983 年道·琼斯指数只有 1000 多点，当时 19% 的美国人持有股票。1992 年 1 月达 2000 点，10 年间才增翻一倍。但从 1992 年后直线攀升，1998 年 6 月间达到 1.1 万

① 《使强劲经济受损害的五问题》，1999 年 1 月 4 日美国《纽约时报》。

② 《美国：在繁荣的光环笼罩下贫富差距拉大》，1999 年 11 月 16 日日本《世界周报》。

③ 《2020 年构想》，2000 年 1 月 10 日日本《每日新闻》。

点，6年间上涨了5.5倍。持有股票的家庭占48.2%。到1999年的中期，其股市价格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80%，而1929年美国金融大危机的前夕，其股市价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美联储多次提高储蓄利息，想挤压股市价格的泡沫成份，但收效不大。更多人持股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但是，若股市崩溃，则会使更多人受害，会使社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动荡。二是1994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有3000多亿美元。三是美国有6万亿美元的内外债。1997年，美国的国债已达到5.4万亿美元，1997年财政年度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高达2450亿美元。1985年，美国结束长达70年国际净债权国历史，成为国际净债务国。1998年，美国国际净债务为1.5万多亿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务国。^①四是美元具有国际货币的性质，有2/3近3000亿美元在境外流通，若遇金融货币危机，人们将会纷纷抛售美元。五是近几年美国消费者掀起借贷消费热潮，美国家庭现在的全部债务几乎占全部可供支配的年收入的98%，而80年代只占80%。私人部门储蓄率下跌，1999年第二季度储蓄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5%。六是企业受益下降。美500强企业1998年效益下降1.8%，而飞机制造、农业设备、石油化工、军工部门则下降了30%左右。公司借债用于回购股票和兼并收购数字十分庞大。金融机构的债务由1989年的2.4万亿上升到1999年的7万亿美元。七是财政预算盈余水份大。美国1998年财政盈余500亿美元，但实际是运用了145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部门的资金。这笔钱本应用于美国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在退休以后的作养老保险金用的，却被美政府用来冲销其1998年的财政赤字。八是到2010年前后，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美国人将陆续退休，他们将成

^① 《美国为何负债累累却经济强盛》，2000年5月11日《青年参考》。

为较庞大纯消费群体，而其养老基金被政府挪用能否归还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基于此，能不能说，美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内，必然会遇到严重的问题呢？2000年4月的第二周，美国三大股指全面重创：代表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分别暴跌25.3%、10.5%和7.25%。其中纳指数是成立29年来最惨淡的一周。如此大的跌幅意味着美国股市投资者在这周损失超过2万亿美元，美国人均损失7000美元。^①美国股市几次剧烈动荡，这正是美国潜伏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具体表现。美国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近30%。目前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②美国经济出了大的问题，也必将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带来严重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相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在世界性范围内的某些便于转嫁危机的地区引发战争，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当然，那时想通过战争以摆脱经济危机者有之；想通过战争去填补其他大国衰落后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真空者有之；同样，想通过正义战争去维护民族权益和争取民族独立者也有之。

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正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经历种种劫难依然在曲折中继续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继续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永恒性，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无时不想摧毁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本质是要和平的。共产党人绝不是西方所说的“好战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便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

① 《华尔街股市暴跌探因》，2000年4月17日《经济日报》。

② 《美国向世界“透支”》，200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头上执行和平政策。”^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共和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再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经过几年包括战争相加的生与死的较量，社会主义苏维埃逐步站稳了脚跟，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与苏维埃国家“共处”。但这种共处一直是不稳定的。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帝国主义，列宁又同时认为由暂时的相对均势状态而形成的和平共处极不稳固，很难持久，因而和平共处原则只能是一种策略步骤。“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②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戒备帝国主义的入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政府在1954年适时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帝国主义者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威胁。1989年6月，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③ 1989年9月，邓小平又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④ 按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构想，1999年，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战而胜”。按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构想，“到下个世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7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

纪”，“共产主义大失败”，“支配21世纪的将是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剧变前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确有席卷全球之势，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但是，按照西方强国开出的“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加上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贫富悬殊的进一步加剧，近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和幻想日益动摇和破灭，并促使更多的人回归马克思。特别是几个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顶着苏联东欧的剧变浪潮的冲击，不但巍然挺立，而且进一步发展壮大，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还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有的已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这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当年所没有料到的。近几年，有“见识”的西方政治家又在重新忧虑共产主义的卷土重来。

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和中国依然被认为是其称霸世界的最大的障碍。1999年的空袭南联盟的战争，其实质是冲着俄罗斯的。这主要因为：美国担心俄罗斯度过难关，重新壮大；更担心叶利钦改革彻底失败，俄罗斯重新踏上社会主义之路。苏联解体后，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连续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发展潜力更大。中国还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有能力有资格推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敢于仗义执言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解决众多的国际争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使美国把中国视为实现其独霸全球战略、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张到全世界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我们愿意实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和平共处，也正主要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做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要和利用中国的大国地位，因而与我们有协调合作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会十分清醒地看到，西

方国家与中国协调合作是有限的。因而我们不会自我麻痹，更不会屈从于西方国家的压力，接受无限协调合作而有损于中国发展与稳定的苛刻条件和无限要价。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

1991年6月，在谈到海湾战争问题时，江泽民同志强调：从整个国际形势来讲，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无时不想摧毁我们。江泽民同志的话意味深长。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本质上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它们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因此他们在本质上从来就认为“美国和中国永远不可能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②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内部在摧毁社会主义中国的手段上不少人主张以遏制，即封锁、制裁、恐吓甚至必要的干涉为主，有人主张以接触，即“和平演变”为主，有人主张采取“接触+遏制”、“接触而不抱幻想”的政策。具体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手段有分歧，且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但是在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原则和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不会改变的。美国总统大选前，其候选人往往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决不仅仅是其竞选需要，而且更是他们敌视中国本质的显现。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十分清楚中国不仅现在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伦敦战略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杰拉尔德·西格尔的话来说：中国“确实被高估了”。中国在经济上“对世界，特别是对亚洲以外的世界来说无关紧要”；“中国在军事上是个二流国家”，“它远没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② 《中国的愤怒不仅限于大使馆被炸事件》，1999年5月17日美国《今日美国报》。

同美国较量的能力”。^① 基于以上 3 点，我们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竟敢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什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并加强对台军售与军事合作，企图向台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通过所谓的智囊机构宣称，若台宣布独立，美可能卷入两岸军事冲突？为什么美国竟与日本签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和美日联合研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巩固美日战略同盟，试图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核心，建立美日韩“亚太战略联盟”这样一个“小北约”？为什么美国与澳大利亚重订同盟条约，使美军重返菲律宾，获得使用新加坡军事基地的许可，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军事演习从不间断，并不断挑唆一些国家在中国南海制造事端？为什么美国在印度洋拼命填补前苏联留下的真空，试图建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以瓦解所谓“俄—中—印轴心”的假想反美联盟？为什么美国对中亚一些国家和蒙古加紧进行军事渗透，并纷纷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加大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1997 年 5 月 26 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重视亚洲，旨在建立“中国包围圈”。这也充分说明美国无论是接触派还是遏制派，其根本目的是共同的，即是想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想把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强国特别是美国的附庸。冷战结束后，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首先在美、日等国家的新闻媒介中出现，而后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究其目的，一是掩盖它们自己争夺区域和世界霸权的图谋；二是制造借口，妄图用武力“遏制”中国的发展，进而“遏制”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的存在和复兴。

第三，军备竞赛再度复兴。战后，美、苏两国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军备竞赛，使美苏的军事扩张都极大地超过了必要的程度。

^① 《中国重要吗？》，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 年 9、10 月号。

美苏争霸，带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增加军费开支。1949 年世界军费总额约为 2000 亿美元，到 1988 年已多达 10800 亿美元，世界军费平均每小时开支 1 亿多美元。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增加特别是美苏的军备竞赛直接导致了許多局部战争的发生和加剧，而且孕育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苏联和华约解体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军费一度曾有所减少，但随着世界新格局的显现，特别是 1999 年北约侵南战争的爆发，促使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防开支。目前世界上出现了新一轮加速发展军备的新动向。美军虽减裁了一些常规部队数量，淘汰了一些陈旧的武器，从 1991 到 1995 年，美军费平均递减率为 5.7%。但提高军备质量的势头却在加强。美军增加了海、空军力量，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限额内，尽可能地保留了生存能力较强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继续更新更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并在加速现代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方面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为有效对付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威胁，美国防部专门制订一项为期 15 年、投资 500 亿美元的“导弹防御体系”预算案。近几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和扩充军事人员的预算又呈逐年增多的趋势。1999 年美国的实际军费开支为 2879 亿美元，相当于欧盟、俄罗斯以及中国军费总和的 1.5 倍。1999 年 10 月美国总统批准 2000 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额为 2888 亿美元，比 1999 财年增加 120 多亿美元，实际开支将达到 3000 美元。^① 今年 2 月 7 日，克林顿在向国会提交的 2001 年度国防预算中，又将国防开支增加了 165 亿美元，达到 3054 亿美元，恢复到“冷战”时期水平。另外，克林顿还批准今后 6 年国防预算总额增加 1120 亿美元。其 2000 年度的预算即包含着 1982 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军饷增长；“人员优先”计

^① 《1999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0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

划在要求增加的 1120 亿美元预算中占 365 亿美元。^①

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 75% 的部队、50% 的武器装备、80% 的战略核力量、70% 的军工企业。尽管俄经济十分困难，但其在裁减数量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拨出军费，以建立一支与俄罗斯大国地位相称的职业化、现代化的军队。1999 年 10 月，俄新军事学说出台，特别强调“保持核大国的地位”，重提俄武装力量必须保持在“够用的水平上”，以“遏制对俄联邦及其盟国的侵略”。叶利钦二度出任总统后，明确要求将军费开支的最高限额控制在占 GDP 的 3.5% 以内，北约入侵南联盟后，俄有关部门建议 2000 年度军费上限提高到占 GDP 的 5.5% 以上。

欧盟各国军费开支也纷纷回升。日本军事力量猛增。它屡屡突破宪法的规定，不断提高军费比例，1995 年日本军费近 500 亿美元，军事开支占世界第二位，海军力量居亚洲第一，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日本 1996 年至 2000 年军费预算将高达 2500 亿美元，其 2000 年的防务预算将比 1999 年增加 1.6%，日本实际上已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在 1999~2000 财年，东盟国家的防务开支总额增至 200 亿美元，比冷战时期增加了 4~5 倍。1999 年韩国增至 170 亿美元。2000 年 2 月 29 日印度财政部长宣布，印度下个财政年度（2000~2001）的国防开支预算为约合 136.2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比上个财政年度增加了 28.2%。这是印度有史以来军费增加最多的一年。台湾年军费已达 120 亿美元，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又增添“补充预算”。据 2000 年 3 月 1 日《解放军报》报导，1979 年至 1999 年，台湾当局仅从美国采购的武器装备就达 250 多亿美元。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一些国

① 《1999~2000 年度军事力量对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部分），新华社伦敦 1999 年 10 月 26 日英文电。

家的军备费用也在纷纷增加。

第四，核化生武器威慑力量加强。自从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实验室问世以来，美国用于核武器的总开支已达 5.5 万亿美元。从 1946 年至 1996 年，美国用于核武器的开支占军费总开支的 29%，几乎占政府全部开支的 11%，美国人平均每人承担了 21646 美元。^① 美俄核裁军谈判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各国并没有因此停止核武器现代化的步伐。美国不顾违反国际禁止核试验条约精神和多方抗议反对，于 1997 年 7 月 2 日进行一次代号为“反弹”的“亚临界”地下核试验，截止 1999 年 11 月 9 日，美国曾进行 8 次这样的核试验，以完成耗资总值为 400 亿美元的“不具爆炸弹头”的核试验计划。即使如此，美参议院于 1999 年 10 月 13 日通过投票，也拒绝批准克林顿政府签署的、已有全世界 154 个成员国参加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各核大国特别是美俄都把陆基洲际导弹核武器系统的重点，放在发展机动导弹，以增强其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积极发展隐形战略轰炸机、巡航导弹，增强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不断改进和完善现有的战略武器系统，以使其更安全、可靠和精度更高；积极发展新一代小型核武器，主要有中子弹、冲击波弹、感生辐射弹、钻地弹等。其中中子弹在爆炸时产生大量高能中子辐射为杀伤因素的低当量小型氢弹，可以有效杀伤敌方战斗人员，特别是集群坦克和装甲车中的有生力量，对附近的建筑及其他设施破坏作用很小，美、法、俄已先后研制成功。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核化生武器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据估计，在最近 10 年中，可能有 20 ~ 30 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目

^① 《美国进行亚临界核试验的战略意图》，新华社华盛顿 1999 年 11 月 12 日电。

前已有 30 个国家拥有化学武器，10 个国家有能力部署生物武器。随着掌握核、化、生武器国家的增多，常规局部战争的核、化、生阴影就更加明显。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各有核国家又不敢也不准备轻易使用，但是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始终是现代常规战争中有关国家的威慑手段。美国这样一个核大国，始终不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1962 年 10 月 22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针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一事曾在电视里发表重要演说中说：“我们不会过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决不畏缩。”海湾战争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对多国部队进行化学武器威慑。美国前副总统警告说：假若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英国首相梅杰也发出了相同的核威胁。在普京任俄罗斯代总统批准的《俄联邦安全会议 1999 年 10 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构想》中明确指出：“在必须对付武装侵略时，在解决危机局势的所有其他措施已经用尽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动用俄罗斯现有的各种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① 世界上现有核武器的爆炸总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 60 万倍，全球俄、美、法、中、英五大核强国共拥有核弹头 3.6 万枚，约有 2.2 万枚还处于运行状态。仅美俄两国掌握的全世界核武器库中 95% 以上的核武器都有毁灭对方 40~60 次的能力，并可以把地球毁灭 10 次。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使企图成为正式核大国的印度受到鼓舞，也将使更多处在核门槛的国家仿效印度。另外，美国在冷战时期至少在 23 个国家贮存过 12000 件核武器。^② 又有谁能说，美国现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没

① 1999 年 12 月 3 日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

② 1999 年 12 月 14 日《中国经济时报》。

有贮存核武器呢？美国的 NMD 和 TMD 研制计划，将打破世界战略力量的旧有的平衡，进一步刺激战略核武器、导弹武器及太空武器的竞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将对世界和平的新的严峻挑战。

第五，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暴露激化。两极格局解体后，因美苏争霸而压抑、掩盖的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原有的制衡因素的消失，日益明显暴露。如一些新诞生的民族国家按照民族归属提出重新划分疆界要求，目的是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地理和政治版图，有的则变成用武力修改疆界的实际行动，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宗教矛盾也更加公开和尖锐，一方面是宗教与非宗教矛盾，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甚至发动圣战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宗教内部派别因对教义解释不同引起纷争。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派别和权力斗争加剧。一些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争端突出。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十分稳固，且主导着各种超国家的国际组织，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而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在不断分裂出新的国家。1990 至 1998 年，全世界每年有 3.1 个国家出现。美国原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未上台之前，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曾说：“如果我们摸索不出一些不同民族能在一个国家和睦相处的办法来……那么，未来世界将会有五千余个国家，而不是现在的一百多个国家。”^① 这些新国家的出现，是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激化的结果，也是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断衰弱的重要标志。不断弱化的国家非但解决不了旧有的问题和矛盾，而且会使新的问题和矛盾也接连涌来。新老问题和矛盾的交织，不

^① 〔美〕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的战争》，第 285 页，新华出版社，1996。

仅酝酿着纷争，甚至酝酿着战争。

综合以上 5 点，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人类有很多制止战争、争取和平的有利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是国际关系中也潜伏着许多新老动荡的因素，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整个世界也有可能极不平静。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整个国际形势紧密相连。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积弱积贫，屡受侵略，内乱丛生，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周边安全环境存在着诸多不稳定、不安定、不确定因素，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首要的是企图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活动猖獗，“藏独”、“东突独”特别是“台独”势力膨胀，活动空间增大，气焰日渐嚣张，出现一些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危险动向，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其次，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仍存在着较大面积的陆海疆域争端，那些在非法侵占行动中获取既得利益的国家正谋求使其侵占行为固定化、合法化，有的还加紧对中国海洋资源的掠夺，同时还纷纷扩军备战，力图使双边性质的争端“国际化”，以在其背后的超级大国支持下，形成联手对中国的局面，使维持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斗争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再次，邻近中国的一些地区性热点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周边的某些强邻未来政治、军事走向尚有不少未知数。第四，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综合国力逐渐在增强，加上我们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便使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又从心里十分惧怕和仇视。正因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是在欧洲腹地，而是在亚洲，在中国周边的朝鲜和越南，不惜耗费其国力，直接出兵，打了两场较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我们应该看到，

中国周边环境有着十分有利的一面，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我无举国迎敌大规模全面反侵略战争之虞，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周边在某些方向上面临着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且目前这种可能性正呈增大的趋势。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

美国颇具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夫妇的一部重要著作，即《未来的战争》。该书扉页上引用了托洛茨基这样一句话：“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① 该夫妇在书中甚至预言：“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未来战争和反战争都在其中进行的竞技场，即 21 世纪的全球体系。”^②

白云苍狗，今是昨非。当人们迫切盼望和平与发展的时候，是否还应记住：当今世界，战争仍然是困扰着人类社会，同时也是困扰着社会主义的梦魇？

五、关于几个问题的刍议

（一）关于时代和时代主题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过“时代”这一概念，并用“时代”一词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苏联十月革命前，列宁则明确判定，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现已发表的著述中，邓小平对于当今“时代”定义没有另外的直接的表述，但纵观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他对时代的性质，内涵和发展方向等均有深刻的论述。如何正确认识列宁和邓小平关于时代的思想，如何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我国理论和学术界众说纷纭。综合这些相关的论

①〔美〕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的战争》，扉页，新华出版社，1996。

②〔美〕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的战争》，第 294 页，新华出版社，1996。

点，有如下几点值得探讨和商榷：

①对列宁关于时代的思想，不应局限和拘泥于一、两个定义，应全面把握。列宁关于时代的基本思想，笔者赞成如下表述，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由此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②依据列宁的思想，这一过渡时代是长期的，其进程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列宁曾明确指出：“每个时代都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①对苏联东欧的剧变，对当今社会主义的低潮，完全可以作如是理解。封建社会延绵了几千年，资本主义尚有数百年。因此，在过渡时代的时间问题上，在困难估计的程度上，宁肯估计得长些、重些，不要估计短了、轻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曾有过“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等提法，现在看来，这样的提法是对时代发展进程估计过于乐观的表现。

③邓小平在其论述中多次强调：现在总的形势还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道路是曲折的。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②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时代的思想与列宁、毛泽东关于时代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上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

②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第37页，学习出版社，2000。

④列宁有段著名的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① 依据列宁关于时代的思想，我们是否可以作如下判断：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其时间常常以数十年为单位。由此可以判断：是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并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而不是相反。

⑤当今世界处于什么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有没有现实性？对这类重大问题很值得探讨。陈云在 1989 年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② 1999 年 12 月 8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刊登一篇题为《列宁和全球化》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列宁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未过时”，“尽管列宁建立的帝国已经解体，他的革命已无人相信，但他可能笑到最后”。这篇文章提出的看法值得思考。有些学者认为，现在依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因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给帝国主义所归纳的 5

①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143 页，第 2 版。

②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70 页。

时，帝国主义时代将逐渐并最终让位于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⑦近些年，有的同志提出了“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否同样值得商榷呢？如前所述：时代和时代主题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二者所特有的内涵和特指的范畴都是特定的。时代是母系统，时代主题则是子系统。各个特定的时代中都有特定的时代主题。一般来说，特定的时代主题往往从属于特定的时代。作为子系统的时代的主题不能随意顶替作为母系统的时代。比如，在帝国主义时代中的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的主题，就不能顶替帝国主义时代，而叫做“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任务和目标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指明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有可能争取到的甚至是有可能利用的时代主要特点的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们说，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邓小平都称之问题。当然，他无疑也赞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提法，但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不应混淆的，也是不能随意顶替的。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资本主义兴起后，仅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此10年，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还是叫别的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呢？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

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战争结束了，也就是说流血的政治结束了，但是不流血的政治仍在继续。有时则往往是下一场流血的政治即战争准备的开始。这一准备的时间进程往往是较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较为漫长的，但是战争的根源仍在，甚至有所激化。战争与相对的和平，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特别在当今世界，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温馨的相对和平的时期是常态，而残酷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将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十分巨大的灾难。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仅仅对南联盟轰炸了 78 天，但却使南联盟的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并使其一下子沦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因此，在对待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在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上，我们必须既要清醒，又要坚定。否则，有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⑧列宁当时所处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后来，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苏联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松动，特别是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因此，党的十三大至十五大的报告中，都写入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思想。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一个有利时机，力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好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这充分表现了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果敢的政治魄力。苏联东欧剧变后，邓小平又十分敏锐地指出：“我

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①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②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同时也是跨入 21 世纪后我们所竭力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两大问题也有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时代”不是凝固不变的，处于“大时代”之中的时代主题更不是凝固不变的。究竟时代的主题会不会转换，若要转换向何方向，向何种内容转换，很值得研究。

⑨不同的集团、阶级和国家有着人类所共有的共同利益，但其根本的经济政治利益却往往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不同的集团、阶级和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往往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所倡导、所主导的和平与发展往往从根本上危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应该紧密团结起来，推动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高扬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并促进时代的不断进步。

（二）关于核战争问题

有人认为，在全球核冲突中，既没有失败者，也没有胜利者，世界的全部文明包括人类自身将会在冲突中全部毁灭。因此，核战争永远也不会爆发。自从 1945 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之后直到今天的 55 年间，世界上各个核武器拥有国没有在战场上第二次使用过核武器。应当承认，相互间的威慑增大是没有爆发核战争的根本缘由之一。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其间各核武器拥有国的核武器都处在高度戒备的临战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3 页。

来，已经出现了千钧一发的朝鲜核危机、莫边府核危机、金门马祖危机、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东核危机、中苏冲突中的核危机等等。还有一些核危机的秘闻尚未解密。若是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或出其他意外情况，这柄达摩克里斯核剑完全有可能降临人间。这是其一。

第二，联邦德国的未来学家魏茨泽克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超级大国在发展可以有限使用的核武器。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战术上是可信的。有限核战争是可以设想和可以策划的。正因为如此，存在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这种战争的现实危险性；核禁令一旦被打破，那就没有人知道，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结束。”^① 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战争疯子，当常规战争威胁到有核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时，不排除他们有首先使用战术核导弹的可能性。

第三，只要存在着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和国家，核武器非但不会全面销毁，而且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会增多。核国家越是增多，无核国家得到外界核技术帮助的可能性就愈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那么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尤其是核拥有者的双方都可能觉得一场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企图先发制人，以避免灭顶之灾首先降临自己头上之时，核战争便就有可能越过“核边缘政策”而成为现实。美国不放弃率先使用核武器并保留进行核报复性反击的权力，当然首先是为了核讹诈，但决不仅仅是为了核讹诈。西方舆论曾惊呼：“核战争在今后 50 年爆发的可能性相当大。”^② 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 1999 年 5 月 27 日的一个评论中也说：“在这个十年当中，世界从未像现在这

① 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第 78 页，时事出版社，1987。

② 《回避现实看世界》，1998 年 12 月 19 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样接近于核战争的边缘。”^①

第四，在“核边缘政策”状态时，由于对抗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平时加在核武器上的保险装置都将被打开，如果双方或一方，因巨大的心理压力等因素，带来计算、操作上的失误，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核爆炸。

第五，计算机等非人失误也可能引发核战争。1979年11月，北美防空司令部联合指挥中心模拟敌方核进攻数据突然误入“实战”预警网，10架美国战略轰炸机从本土和加拿大紧急升空，幸好在轰炸行动实施前几分钟被阻止。否则，有可能酿成核大战。1983年，苏联的核警报系统也曾发出美国已发射一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的错误警报，而这一错误警报同样险些引发一场核战争。^②

第六，一般说来，现在遏制核战争的国际机制还是健全的，但是对目前没有加入相应国际条约而又在研制和试验核武器的国家，在其进行安全试验、生产、保管和使用等诸方面也还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即使一些科技十分发达的核大国，有时也会因可能发生的各种疏漏而使人们遭受核伤害。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人们至今记忆犹新。2000年1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导了“世界上第一人权国家”美国60万名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工厂的工人惨遭核伤害的凄惨内幕。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普及，还会出现核武器生产的“个体户”和“小作坊”，加上核武器走私的可能性的出现，核武器一旦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就不能完全排除像日本东京地铁里出现沙林毒气一

① 《英国鼓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1999年6月4日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周刊。

② 《历史上的“核战事故”》，1999年4月24日《深圳商报》。

样排除核爆炸的可能。因此，我们乃至全人类对核战争决不能掉以轻心，并应下大力量去制止。2000年2月9日，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下届总统的首要责任》。他认为，下届总统的首要责任是：“只要技术上可行，一个覆盖全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应当尽快部署。”为什么？他担心，近些年可能爆发核战争。

（三）关于世界大战问题

对于新的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永远，再也不会爆发；另一种是，还会爆发，甚至不止一次，直到阶级和国家被消灭后世界实现大同。如前所述，从目前来看，在可以预见的近些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充足条件。因此，在可能预见的未来，我们决没有必要也绝对不容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的决心，倾全部国力去准备进行参与世界大战。否则则正如堂吉诃德去大战风车一样幼稚、可笑、可悲。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均已有过精辟论述。他们共同认为，一是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二是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直至制止和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当今世界，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三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平，但对世界大战始终保持警惕，也要有精神准备；如果有人一定要发动，我们也不怕。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这些看法，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战争观上的具体精辟的运用。他们在论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同时，从来没有说，世界大战从此永远也不会爆发。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中，今天晴空万里，也可能明天晴转多云，后天是乌云密布，大后天是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决不能用僵化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思维和眼光去看待随时随地在发展变化着的事物。

有人说，现在世界正走向多极化，遏制世界大战的力量在日

益壮大，新的世界大战从此不会爆发。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向何处去？全球关注。要和平，要发展，无疑是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强烈的共同愿望。尽管美国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诸方面遥遥领先，但是，世界各极都在谋求自身的发展壮大。因此，世界究竟是朝多极化还是单极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科技甚至军事斗争的焦点。美国若能建成单极，它便会更加为所欲为，这必然进一步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抗。若世界在几十年内能够形成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相当的几极或几个集团，在一定条件下，这对战争是有力的制约。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多极化也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过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在世界形成数个实力大体相当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集团情况下爆发的。苏联和华约的解体，已使世界力量严重失衡。美国为所欲为，日本军国主义等势力也在复活，俄罗斯、印度等都可能崛起或重新崛起的那一天。世界战争的对手也正在孕育之中。

有人说战争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使世界各国人民坚决反对新的世界战争。这无疑也是制止世界大战的有利条件之一。但是数不清的局部战争的惨痛教训并没有制止继续进行着的数不清的局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并没有制止更大创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谁能仅凭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仅凭各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就能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呢？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将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广大人民有时是无能为力的。

有人说，经济发展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全球化走向，使世界战争的发生越来越困难。1911年，英国著名记者安吉尔所著的《伟大的幻想》一书曾预言，欧洲永远也不会有战争了，因为战

争在经济上不合算。毕竟，德国是英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伦敦的劳埃德公司甚至为德国的商船队提供了保险。但时隔 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 年 8 月 4 日，英国不得不对野心勃勃的德国宣战。在战争攫取的实际利益要远远大于经济互相依存的利益时，霸权主义便有可能毫不留情地施之以战争。

有人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统治者攫取全世界首先是广大第三世界的巨大财富后，采取了许多调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措施，这些国家虽然一直存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但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激化和爆发革命的程度，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一直没有出现；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并把其作为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得比较好，这些国家在贸易、技术、金融诸方面虽时有磨擦，但矛盾并不很尖锐，帝国主义战争也一直未再发生。这些的确是事实。正因如此，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现在，甚至未来数十年内，新的世界大战没有也极有可能不会爆发。但是，我们是否也应看到，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西方强国国内的公共福利在普遍减少，种族矛盾、劳资矛盾有逐渐增多之势。1999 年 6 月 19 日，正当西方七大工业国和俄罗斯首脑在德国科隆举行第二天高峰会议之时，英、美、德 3 国城市同时出现较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的示威集会。至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协调问题，也在变化和演进之中。但是，可以这样断言，随着高新技术和垄断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和规律将会更加凸现。加上苏联东欧和华约这一共同敌人的解体，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逐步有所激化。

还有人说，信息战将主导 21 世纪的战争形态，这便为人类解决经济、政治矛盾找到了新的途径，成为遏制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军事革命的巨大变

化，未来战争的形态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超视距远程打击、非线性攻击和瘫痪战、信息战、精确战、非致命作战等一系列完全崭新的作战样式和战法都会接踵出现。但是，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战法的改变丝毫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性质和目的，更不可能消除战争的根源和起源。

历史没有终结，阶级和国家的最终消亡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对于新的世界大战，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我们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在坚决反对、努力制止的同时，对其有可能爆发要有所警惕，而决不能认为，它仅仅是一具早已寿终正寝且永远也不可能复活的僵尸了。

（四）关于美国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

毛泽东曾多次论述过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问题。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①对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活的铁的老虎”，笔者想，持疑义的可能没有；对毛泽东紧接着又说：“它们会吃人的，”可能有人会有其他说法；对毛泽东所说的：“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是不是有人会问，当今世界，独占霸主地位、傲视全球的美国还是纸老虎吗？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不是过时了？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5～456页。

这实质上涉及到我们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战术思想要不要改变甚至易位的问题。

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倚仗其无可匹敌举世无双的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实力，其活的铁的真老虎、会吃人的一面表现得更加充分。美国 1991 年发动大规模的海湾战争，1999 年又纠集北约对南联盟实行历时 78 天的狂轰滥炸，甚至在从本土出动战略轰炸机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得知我死伤 20 多人后，一方面仅仅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另一方面，依然霸气十足，竟说是“误炸”，连“震惊”的字眼也吝啬使用。这说明，美国不仅仅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同时又是一只极其野蛮和极端无赖的老虎。

当今世界，美国还是不是纸老虎？邓小平在其文选第 3 卷中多次侧面论述到这一问题。1989 年 11 月，面对北京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制裁，邓小平说：“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①

事实更能说服人。北京 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举措，并联合西方各强国严厉制裁中国。但我坚持原则，充分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其被迫不得不撤消一个个制裁措施。1991 年 11 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贝克不得不亲率美国国务院一批高级官员访华，使两国关系基本恢复正常。1996 年 3、4 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演习，美军竟出动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东海海面，共两万余人，作战飞机 160 架，各型舰船 17 艘，对我进行军事威胁。我某海军基地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5 ~ 346 页。

的潜艇稍有动作，美航母战斗群则立即后撤 100 多海里，脱离与我接触。从国际上说，美国军事干涉和制裁封锁失败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1992 年 12 月，美国假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名义派出 28000 余名军人前往非洲之角索马里对一个弱小、贫困的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但未想到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其直升飞机被击落，18 名美军士兵当场死亡。克林顿总统即下令向索增派美军，但仍无济于事，不得不于 1993 年全部撤出所谓的维和部队。不仅如此，美国在波黑、海地、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中，都接连受阻。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的纸老虎原形在英雄的古巴人民面前显现得更加充分。1960 年美国开始对人口仅有 1000 余万，面积仅有 11 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古巴开始封锁，以迫使古巴屈服。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又接连通过两项法案进一步加紧对古封锁。连食品、药品、能源等一律不许进口。美国公民未经特批私自到古巴旅游和消费，将遭到书面警告和罚款处分。美国对古巴封锁 40 年，给古巴造成 600 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推翻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对卡斯特罗组织实施过 637 次暗杀计划。但是卡斯特罗依然健在，古巴仍巍然屹立。古巴经济正在明显好转，政治稳定，民心安定。美孤立古巴未果，反而自陷孤立。

当今的美国，已经攀到自己的顶峰。在今后数十年内，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与其匹敌。但是强大是相比较而言的。苏联东欧剧变前，美国领导的是西方世界。之后，美国明确宣布必须领导全世界。与世界任何各国相比，美国无疑是活的铁的真老虎。但它要领导全世界，无疑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它必须继续弱化俄罗斯；必须调整与盟国的关系，防止它们同床生异梦；必须力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各地区安全结构；必须有选择地干预地区冲突；必须防止核、化、生武器的扩散；必须继续遏制中国的强大和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如此等等。世界警察这个角色决不是好

当的。仅从美国所谓有选择地干预地区性冲突来说，海湾战争以前，美国曾运用各种手段，动员 100 多个国家参与对一个偌小的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41 个国家参加了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部署，36 个国家 80 余万人员直接或间接参战。再从物质消耗指标来看，海湾战争分别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马岛战争提高了 20 倍、10 倍、7.5 倍、4.2 倍和 3.5 倍。战争所花费的 610 多亿美元中，其绝大部分由其盟国承担。美国承认：“各国同意拿出总额近 540 亿美元的资金帮助美国支付战争开支。这样做分担了美国的战争负担，减轻了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①“如不实行责任分担，美国就将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或赤字支出来支付这些费用。这将会增大美国的财政困难。”^②单靠美国，很难打赢甚至进行一场局部战争。美国入侵南联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为入侵南联盟，美国纠集北约 19 个成员国，派出 1000 多架飞机，出动 32000 万架次，并动用 50 多颗卫星为空袭服务，投下 2.1 万吨炸弹，其当量相当于美国当年在广岛所投原子弹的 4 倍，除使用集束炸弹、贫铀炸弹外，还使用了电磁脉冲炸弹、石墨炸弹等破坏力极强的新式武器。^③但持续两个多月的轰炸之后，西方的军事计划制订者惊奇地发现，南斯拉夫的大量军事设备完好无损。南斯拉夫这个在将近 10 年的内战以及经济封锁中衰弱了的小国不仅经受住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肆意轰炸，而且使这个军事联盟在狂轰滥炸之后不敢发动地面进攻。^④战争结束后，美国从 28 个国家调集部署了 3.8 万名所谓的维和人

① 《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上册，第 11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② 《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中册，第 478 页。

③ 《1999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0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

④ 《科索沃的惨痛教训》，2000 年 3 月 30 日英国《外事报道》周刊。

员，但至今科索沃境内仍冲突不断，甚至还有可能重起战端。这都说明，美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与它要达到的独霸全球的战略需求比，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已经变成了纸老虎。美国纸老虎的本质又表现在内囊的逐渐空虚，其极大的金融泡沫成份已显而易见，内外债和贸易逆差都在急剧增大，贫富悬殊也在急剧增大，种族矛盾仍在激化，暴力犯罪、吸毒贩毒、AIDS病、家庭解体、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有增无减，其内部各种矛盾正逐渐显现。美国主要是依靠其世界性的金融霸权维持其经济生命的。如果其独霸全球的战略目的一旦破碎，其国内各种矛盾便会接连触发。我们说当今的美国仍然是纸老虎，不仅是从本质上看，而且还是从长远上看，从战略全局上看。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都没有好下场，都没有脱离纸老虎的命运。如曾经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大帝国、16世纪的法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希特勒专制下的德国等也都曾气势汹汹，扩张无度，最后却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今的美国，已见种种衰败之迹象。全球反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暴风雨来临之日，必将是美国显现纸老虎原形之时。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者必将战胜邪恶者。在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永远称霸全球的今天，在认清美国“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的同时，要认清它同时又是纸老虎的另一面本质，这对于我们树立既善于斗争，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对于在涉及我们国家根本权益时，坚决维护我们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不怕打的形象，对于我们牢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必将最后取得胜利的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五）关于完整准确、积极全面地贯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的问题

1989年9月，邓小平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3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①此后邓小平在谈话中又先后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和“有所作为”的思想。苏联东欧剧变前后，邓小平面对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几次谈话中，逐渐提出并完善了上述关于正确处理国际局势的战略策略方针。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恢宏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深谋远虑，充分说明了邓小平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策略家。这一方针，既有着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着策略的灵活性。这种策略的灵活性是以坚定的原则性为前提作基础的，而坚定的原则性有时则需要策略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一方针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内在的统一整体，应当紧密结合当今正在变化着的世界格局的新演进，完整准确、积极全面地去深刻理解和认真贯彻，而不能把它们人为地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我们应当认识，冷静观察是正确认识世界格局的前提条件，稳住阵脚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是正确处理国际问题的基础，沉着应付是实事求是找到解决国际新问题的新办法、在国际上争取主动的关键，韬光养晦是量力而行避免力不胜任的策略，决不当头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不谋求特权和特殊地位的本质体现，有所作为才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根本目的。现在看来，对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持疑义的不多。而对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与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和贯彻是否有两种偏颇的现象：有的同志不顾我国的国力和各国自己的特点，受西方舆论界关于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的影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总希望中国扛起反对霸权、反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攻势的大旗，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全面对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叫“有所作为”。也有人认为，对国际上的所有事务要完全不管不问，要集中全部精力，完全埋头国内的事情，集中全部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这才叫有所作为。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

二次世界大战后，如雨后春笋，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本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才能使社会主义在本国焕发蓬勃的生机。但是苏联却要强行充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大搞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并走上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最终易旗变质、分崩离析。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中国有很高的威望，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们历来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是互相尊重的平等的一员，决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的解放、发展和富强，从根本上说，只能靠本国人民自己。因此，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任何国家，都不应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否则，就必然会重蹈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覆辙。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在于各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把经济和社会发展搞好。另外，中国也决没有全面对抗的实力，并十分需要排除不必要的压力。邓小平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谆谆告诫我们“决不当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提出“决不当头”的同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

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①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要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在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党际关系，包括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政党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党的关系，坚持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声援。我们在决不输出革命的前提下，应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我们还应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点。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关系是我们与西方强国相比所独具的战略上的优势。我们应十分重视进一步加强与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继续一如既往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友谊和支持都是相互的。我们在国际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当我国受到霸权主义干涉时，深受霸权主义之害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也一定会声援和支持我们。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是看能否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有新的加强与发展。要有所作为，还要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原则下，正确处理与西方各个强国和世界上各个大国的关系。西方强国决非铁板一块，它们在意识形态上都敌视中国，然而在战略上又都有求于我们。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西方强国之间的矛盾，利用世界上各个大国不同的战略利益，不断拓宽我国对外关系的回旋余地，趋利避害，在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中纵横捭阖，站稳脚跟，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有所作为的姿态，才能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才有利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中国真正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六）关于正确处理好维护国家权益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问题

国家的权益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其中包括国家的疆土、边境领土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不被分裂。要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只要不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只要不发生国家大片疆土被分裂的情况，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建设搞好了，综合国力增强了，我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不断提高，我们才能更加有力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权益不受外敌侵犯。

但是，目前我们维护国家权益，特别是维持边疆安全与稳定的任务也十分繁重。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首要的是台湾问题。今年3月18日，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陈水扁当选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台湾当局在一两个别有用心的强国支持下，下一步如何动作我们将拭目以待。台湾问题与南沙、钓鱼岛等有很大不同，决不可能“搁置争议”；这个问题，在近几年极有可能是既绕不开又无法推迟解决的严峻问题。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时间表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前台湾当局鼓吹“两国论”阴魂不散、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海峡两岸是否必有一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如果近些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势头一直保持良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相当快，而美国经济和台湾经济出现大的萧条，那么台海一战有可能避免，海峡两岸也有可能逐步走向和平统一。但是，美国经济至少近几年看来还是发展的趋势，美国经济不遇大的麻烦，一般地说，台湾经济也不会遇到大的麻烦。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支持下，如果我们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工作遇到问题，台湾当局宣布独立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台湾当局宣布独立，军事打击就不可避免。而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从现在起就必须扎扎实实做好必要的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到真正下决心要打时再做准备就来不及了。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到下决心打击时还可能打不赢，要打又打不赢也会触发国内各种矛盾，并且导致我边疆地区和周边环境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新疆、西藏、内蒙、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地区，甚至西南和中俄边境地区都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说台湾问题决不仅仅事关国家能否实现最终统一，而且更是事关国家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的全局性战略问题。

有人说，美国在侵南战争中，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插手台湾问题是企图将中国拉入军备竞赛的战略阴谋。我们当然决不能上这个当。那种认为目前已是大战当前，战备高于一切，必须倾其国力进行战备，从而需要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但是，进行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各项军事斗争准备显然是必须的，那种认为如果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就是被美国拖入军备竞争漩涡，从而否定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观点，在理论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才能彻底遏制战争，争取和平。用通俗的话讲，我们的底牌是：你台湾当局假若胆敢宣布独立，大陆则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立即用强大武力阻止台独，并顺势用武力解放台湾。这个底牌不仅要公开昭示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要昭示台湾当局和美国、日本等，勿谓言之不预。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即刻开始扎扎实实地作好解放台湾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并把这些必要准备的资金、技术和各项物质保障等诸条件列入正在拟制的“十五”规划之中。这决不是一句吓唬台湾当局和美国的空话，也不是牵制美国的策略口号。现在是信息社

会，真正的底牌无密可保。如果我们的真正底牌是不打和吓唬，那么台湾便有可能在条件成熟时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台海之战就不可避免。要让对手明白武力解放台湾不仅是一种威慑，而且是真正可以做到的。我如果真正做好了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台湾当局就决不敢轻举妄动。

六、关于我们对策的几点思考

综以上五部分所述，有助于我们更加认清马克思主义在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重要的基本观点。我们将更加明确：面向 21 世纪的当今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平局面的存在与发展，完全凭借我们尽心竭力去争取。

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中国坚持得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极大。既然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这一问题对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并取得成功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社会革命的显著不同之点。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在相对的和平时期，国家要发展，社会要前进，经济建设则始终是国家各项建设的基础、大局和首要任务。而国防建设决不能过多地占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对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关注比较多，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政策和策

略是党的生命”理解得还不甚深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的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我们党的生命所在，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所在。在人类没有到达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和平，往往是力量均衡或制衡的态势。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最主要的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则是直接体现自然力、科技力等诸要素的经济力。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中、美、法诸国与德、意、日3国对比，人力具有4倍优势，钢铁具有3倍优势，石油的优势更大。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分说明强大的物质基础对于战争的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是战争中，正义一方因军事和经济实力过份悬殊往往失败于邪恶一方的根本原因所在。恩格斯明确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 列宁也说过：“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② 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防建设才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防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才可能逐步强大和得到改善。敌人才不敢轻易对我言武，也才可能为经济建设创造和维护一个相对和平态势的国际环境。因此，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我们既不能置若罔闻，只讲和平与发展，也决不能过分夸大威胁的严重性，反应过度，只讲战争，把国家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从而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不发生举国迎敌的局面，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页。

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有了雄厚的物质资料基础，在战争爆发之时，才可能坚决地打赢战争，从而进一步赢得新的和平局面。

（二）抓紧组织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无疑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大局。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精心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相对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制定一个符合当今世界格局的国际战略。一个主权国家有了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那么，便较为容易地“分娩”出国际战略的各个正确的分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及国际地区战略、军事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战略等。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冷战格局结束后，世界格局有没有发生变化？对这一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同志认为，世界冷战格局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甚至如前所说，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笔者认为，这类学术观点很值得商榷。我们先来看看邓小平是如何论述的。从1984年5月到1992年春，邓小平先后12次公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七国对社会主义中国气势汹汹的制裁，邓小平9月19日会见日本朋友伊东正义时说：一个新问题，我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过去我们总是讲列强，这是不是又是列强主宰的形式。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存在了好几年了。11月13日，他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又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美苏实现了对话，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又冒出了一个七国首脑会议，代替了美苏争夺。七国首脑会议是否超越了联合国的作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是正常的吗？我们应当分外注意，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新

的政治格局”的判定。所谓的“新的政治格局”就是“新的世界格局”，而且，这一判断还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之前。10多年过去了，当回顾这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我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当年的历史眼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笔者认为，10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华约的解体，即明显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并竟敢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有可能极不平静。

由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了美国在其全球战略重点的改变。毫无疑问，在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把欧洲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企图通过欧、日联盟，并积极寻找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日经济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美在亚洲的战略意义也愈加突出。从经济上讲，1995年，美国对亚洲的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其进出口总额的41.2%和31.4%。^①另外，美国已把防止核、生、化武器的扩散列为其优先关注的重点，印巴核试验和朝鲜导弹试射也已引起美国高度关注。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出访印度等南亚3国，正是其调整战略重点的具体体现。随着俄罗斯的衰落，其重新崛起尚需较长时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特别是我国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作用，使美国在近年来，越来越在整体上把欧亚大陆视为全球战略的重点，甚至把中国视为今后最主要的潜在的敌人。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我

① 王涌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第194～1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假若确能判定世界格局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若能判定美国在其全球的战略重点已经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就应统一组织多方面的专门力量，根据变化着的世界格局，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适时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有了正确的国际战略，就能恰当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即使 21 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极不平静，甚至在世界上极端重要的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一定是世界大战），我国也完全可能躲过这些劫难，继续赢得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全球烽烟四起中的“世外桃源”。这就如同美国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局部冲突中，美国虽是参战国，但其本土上从来没有飞进和落下异国的一粒子弹和一颗炸弹。假若掉以轻心，则不排除我国有可能面对周边狼烟四起的较为严峻的局面。

（三）事情的关键在于做好我们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

1989 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前，邓小平就无比坚定地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① 1989 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又说：“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② 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1 页。

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才能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中国内部乱了，随意立党结社，新闻出版放任自流，各种错误政治思潮招摇过市，非法示威游行接连不断，甚至如邓小平所说：“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内战的局面……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①如果中国内部乱了，那么可以断言，我国的周边战乱则必起无疑。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乃至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世人公认的巨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随着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一些地方出现了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下岗待业人员过多、农民负担过重、分配严重不公、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社会现象；一些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任务还比较繁重，有的金融部门的呆坏账比例过大；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阵地不时发现各种政治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一些人中还产生了“信念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并会继续给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加入 WTO 之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将面临着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面对机遇，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抓住不放，大胆改革，奋勇前进；面临挑战，我们也一定会大智大勇，胸有成竹，审慎缜密，趋利避害。“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中华民族这句朴素而又普通的谚语，有着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只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只要我们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始终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0 ~ 361 页。

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我们就能任凭国际风浪起，不仅我们国家不会面临举国迎敌的严峻局面，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形势的稳定。

（四）必须充分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对于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不少名流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说：“对于胜利，盾可能与剑或矛一样重要”。^① 华盛顿在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作好战争准备是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手段。”^②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对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十分重视。1965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作战计划和改变帽徽、领章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77年，邓小平说：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③ 1993年初，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战略上必须深谋远虑。既要力争避免与超级大国发生对抗，又必须对其保持警惕，不能存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军事上要不动声色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应变准备。江泽民这一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实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决不直接等于现实的军事实力。只有打赢战争的军事实力，才能有力地扼住战争的喉咙。1999年5月间，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回答记者关于“北约空袭科索沃是否会成为未来介入中国等其他国家事务的先例”的提问时坦率承认，美国不敢循南模式袭击中国，因为“中国具有核吓阻力量”，以军事介入中国事务风险太大，顾虑遭到核报复。这又一

① 《西方思想宝库》，第107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西方思想宝库》，第107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③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事建设》，第31~3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次反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在当时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五、六十年代下决心搞出的两弹一星，将是中华民族避免遭受战争之苦的强大盾牌，并使中华民族泽惠数代。否则便可能任人宰割。

1997年7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该报外信部长观堂义宪的文章中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3，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傲视全球。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被英国超过，20年后被美国超过，此后20年又被德国、俄罗斯和法国超过。即将没落的帝国无计可施，国土任凭西方诸国蹂躏。”笔者手中没有确切的资料来核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当时英、美诸国确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清政府没有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远征军”一共配了16艘有大炮的兵船，4艘轮船及一些运输船，全部海陆军人数不过区区5000余人。战争后期不过有39艘兵船，除少量炮兵外，步兵才10000余人，且分驻在香港、厦门、定海、镇海、南京等地。清政府鸦片战争的惨败充分说明，单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国家，就像仅有脑满肠肥的皮囊，而无强健无比的筋骨的巨人一样，其外表倒也凛人唬人，实则是毫无防御能力和不堪一击的。被人击倒之后则会任人宰割，脑满肠肥的皮囊则慢慢会虚空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坚持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建设对国防建设需要的兼顾，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立足当前，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坚持贯彻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增强确保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祖国疆土被分裂、边境领土被侵占、海洋权益受侵犯等各种复杂情况。着眼未来，就是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考虑国家安全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历来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努力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必然把我国视为眼中钉。我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必须全面考虑国际安全环境和整个国际战争形势的需要，既要保持当前适当的实力，又要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准备的基点，则根据国力的可能，必须立足于应付复杂因素的局面。一是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准备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同强敌作战；三是准备与联盟对手作战；四是准备几个方向同时出事。准备得越充分，制胜能力越强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便越小。如果对战争的危险失去警觉而放弃必要的准备，则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降临得便越早。世界上近几年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是衡量战斗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落到实处，除了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军外，还应用高科技知识武装全军，适应形势需要，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对未来战争式样的研究，千方百计把发展武器装备搞上去，科学地确立编制体制，改革教育训练，加速人才培养。在发展武器装备时，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走自己的路。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以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但我们随时都应清醒认识，我们国力有限，且是一个大国；世界上几个少数强国一直在对我国进行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新技术的封锁。我们决不可能买进

一个国防现代化，别人更不会恩赐我们一个国防现代化。在国防现代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立更生为主，引进借鉴为辅的正确道路。否则，便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除以上之外，在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方面，是否还应注意：一是必须深刻汲取苏联在冷战期间陷入恶性扩军备战，最终在经济上被拖垮的教训，决不能夸大外患威胁的严重性，从而反应过度，把国家有限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二是必须坚持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也决不能一进行适度的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便过分不适当地担心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拖上军备竞争的“贼船”，从而放弃适度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三是正因有了适度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才遏制住了可能爆发的战争。这也是我们在军事斗争准备方面有益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因为遏制了战争，战争没有爆发，却回过头来指责当初必要适度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战略决策失误。

（五）要坚决维护我国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时语重心长地说：“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势力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真打起来也不怕。”“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① 1987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甚至说过：现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320页。

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谁要想同我们干，首先要下决心打 20 年，包括打原子弹、氢弹。我们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十几亿中国人都打光。剩下百分之一二，还相当于阿富汗现在的人口，我们可以干阿富汗游击队现在干的事。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这个打出来的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辉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帝国主义这个邪恶之鬼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当时，战争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优劣异常悬殊。毛泽东以顶天立地的超人胆略，力排众议，说服战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打得艰苦卓绝，也打得无比辉煌。这一仗，打出我国、我军和中华民族的威势，为在国际上树立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光大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光荣传统。1989 年 6 月，我国平息北京动乱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通过决议，掀起反华逆流，联合制裁我国。此后，东欧、苏联又发生剧变。国际敌对势力踌躇满志，加紧对我施压，妄图迫使我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真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第二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顶住西方压力和“苏东波”冲击，打破了制裁，并且进一步发展壮大，取得了更加引人瞩目的成绩。我们要战胜国际上武装到核牙齿之敌，需要两种本钱，一种是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一种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荣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第一种本钱还不会很殷实、丰厚，但是我们的第二种本钱却有相当好的基础。这种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和威势的本身，对那些妄图染指我国领土和主权的敌人就是一个强大的威慑。我们决不称霸，决不扩张，决不主动惹事，但也决不惧怕强敌高技术条件下的武力威慑，在未来的反

侵略战争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有着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和意志。“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致胜。”这是我们威慑敌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根本可信的途径之一。

（六）正确处理遏制与打赢战争辩证统一的关系

战略指导思想是对军事斗争全局指导规律的总结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而战略指导思想则是主观指导能力的主要体现。武器装备总体技术水平愈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军队，就愈加需要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杰出的军事家可以依据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凭借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在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过程中，贯彻好遏制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必须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不同对手、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既要坚决斗争，又要留有余地，做到软硬兼施，刚柔相济；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显示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要避免把不必要的矛盾引到自己身上。

首先要着眼遏制。遏制战争是平时时期军事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和重要功能，不战而胜，是遏制战略的最终目的。我们要达到遏制的目的，就要以强大的实战能力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形式，示形造势，积极显示我打赢战争的强大实力和坚强意志，使任何敌人都充分认识，与我作战必将付出巨大代价，得不偿失并惨遭失败，从而迫其放弃发动战争的企图。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发展水平的限制等诸多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从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着眼点上讲，从所要争取的最好结果上讲，我们不仅要努力遏制战争的发生，当对

战争的遏制无法奏效时，则要努力创造条件使战争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并坚决打赢。二是审慎使用武力。核心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在使用武力前和使用武力中，要充分运用强大的宣传手段，讲清战争的正义性，对内激发全体人民爱国热忱，全力支援战争；对外争取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同情支持。有利，就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能持重待机决不随意从事；能创造充分条件后再战决不仓促上阵；能小战决不大战；能低烈度决不高强度；能速决决不持久；能一面作战决不多面用兵。有节，就是服从政治、外交大局，打、停、进、撤，完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指挥，一旦达到战略目的，果断迅速收兵。三是奇策多谋善战。要巧妙运筹，多谋善断，利用矛盾，灵活用兵。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我们深入研究敌战略、战术、技术的系统的弱点，认清敌我优劣短长，确立正确战法，选好战机，果敢起战，就能将敌调动起来，扬我之长，击敌之弱。四是力求速战速决。在强敌侵占我疆土的情况下，我不怕打持久战。但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我们须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力量，又使用精兵利器，争取速战速决。速决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制胜的关键之一，我们可把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与战役、战斗上的先机制人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战略上的主动权和战争的突然性，实行前伸作战，连续高强度地击敌要害，尽量缩短作战时间，趋利避害，减少风险。五是多种手段并用。无论是遏制战争还是打赢战争，在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都要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法律等一切积极有效手段加以配合，并辅助以其他各种有效手段。这样军事手段便显得愈加有力、有效。

（七）高度重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信息战。笔者完全赞成在扎扎实实的必

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中，认真加强对信息战的研究和准备。这是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必然。在未来的战争中，“信息战”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演变是“信息战”，或者说和平时期的“信息战”就是和平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信息战”已愈加成为政治、思想、外交、科技、军事等诸方面的独特而又强大的武器。这一武器运用得当，完全可以达到过去只能用强大武力才能达到的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和平演变，就是在和平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带有长远战略目标的信息战。苏联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就是它们成功的例证。在现代人类社会，在信息化的今天，这种没有硝烟的战略信息战，是不流血的政治和战争，并在静悄悄地时时刻刻地在我们身边进行和发生，只是我们认识或仍未认识而已。和平时期的“信息战”与战争中的“信息战”在战争和战略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和平时期的“信息战”与战争中的“信息战”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战争中的“信息战”主要用来摧毁敌人的指挥、控制、通信和预警情报系统，以瓦解敌军的战斗力。而和平时期西方国家采用的“信息战”，则主要用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摇其信念，甚至制造混乱和动乱，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之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和平时期的“信息战”更加重要，特别是在今天，美国等西方强国垄断着世界新闻的 90% 以上，美国的电影产量仅占世界的 6 ~ 7%，但却占世界市场的 50% 以上，电视占世界市场的 75%，对此，我们更加不能掉以轻心，再加上国际因特网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如何应对西方国家和平时期的“信息战”就显得愈加重要。

西方国家的“信息战”要从根本动摇和改变我国广大人民的信念和意志，我们从根本上应对，就应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

“信息战”。人民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克敌制胜的法宝。无论是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还是在现代战争的“信息战”中，或是在和平时期的“信息战”中，都不会过时，只是参与的形式有所改变而已。教育人民群众参与和平时期的“信息战”，就能进一步增加全民族在政治思想上的凝聚力，并能用技术上弱势之力量战胜高新科技占优势之敌。

关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强调得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世界冷战格局刚要结束之时，邓小平也高瞻远瞩并十分庄重地数次提出反“和平演变”的问题。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肯定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① 1989年9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又说：“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② 1988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又强调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③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和军队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无时无刻不想摧毁我们。战争相加无法奏效，它们便以“西化”、“分化”为主。美国政府的当权者虽然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32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断更迭，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如果稍有变化，也仅仅是形式、方式和方法改变，这种改变恰恰是为了使其和平演变战略日臻完善并不断适应变化着的新情况。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的成功极大地鼓舞着他们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其“西化”、“分化”的战略。1997年1月，克林顿在第二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时明确指出：“我仍然相信，从长远看，同中国接触”，“最有可能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像柏林墙最终倒塌一样”。^① 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就对华政策发表讲话，其中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现在必须继续奉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我们就能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促使中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②。美国共和党竞选人小布什虽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但其在竞选中也数次强调，若他执政，促进中国的“自由”将是他的对华政策的重点。^③ 美国政界对中国“西化”、“分化”的战略越来越得到更多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心领神会与喝彩。1997年2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和多伦多《环球邮报》前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声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的方式行事。”^④ 因而要“对付中国”，要“采取相应

① 《克林顿强调与中国接触有利且可能影响中国》，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8日英文电。

② 《克林顿就江泽民访美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全文》，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0月24日英文电。

③ 〔美〕1999年10月25日《国家安全》，《洞察周刊》。

④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6页，新华出版社，1997。

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一个”“守规矩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使中国跟随全球的民主趋势，这样最尖锐的冲突几乎一下子就可以消失。”^① 该书还说：“美国外交的另一项重大的任务是与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中世界主义观念比较强的开明派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中国生活中的这一思潮得势并指引整个中国进入 21 世纪。”^② “长期以来，美国决策人一直寄希望于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这些乐观派最终可能证明是正确的。”^③ 1997 年 4 月 17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更加明白无误地说：“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政策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是，而且必须被认为是颠覆中国政权。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目的昭然若揭，并正在付诸行动。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原理认为，物体的质量越大，对其他质量小的物体的引力就越大。当物体接近光速时，质量很大的物体的引力甚至能使时空发生弯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新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众多先进的传播媒介，运用经济的、教育的、科技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外交的、民族的、宗教的等多种斗争形式，吸引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吸纳入其“运行轨道”。对此，我们既要藐视，处变不惊，又要高度重视，沉着应付。既然西方对我们“西化”、“分化”，我们也应该有一整套的与之针锋相对的战略和策略。笔者赞同，完全没有必要在全民中间，大张旗鼓地去开展不适当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从而动摇我们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但是，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

①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 170 页，新华出版社，1997。

②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 183 页，新华出版社，1997。

干部中，则必须进行反对“西化”、“分化”的教育，与此同时，应开展对西方强国所大肆宣扬的各种霸权主义理论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如它们刻意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为价值观而战论”、“合法的人道主义干预论”、“文明冲突论”、“第三条道路论”、“历史终结论”等这些谬论，既是它们在大打没有硝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争，又是为其适时公然发动野蛮而血腥的战争寻找必要的借口并进行舆论准备。如果我们对此等闲视之，中国便会像邓小平所讲的那样，成为一个乱的社会，甚至国内会起战端，虎视鹰瞵的国际霸权主义还可能乘隙而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置于社会动荡、战乱频扰的国家。这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并反对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我和平演变的阴谋很难得逞。邱吉尔曾说：战争是一种所有其他办法都失效后才使用的手段。但是一旦必要，他就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①这是一切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幻想一旦彻底破灭，可以想见，他们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矛盾对抗的发展，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将会再一次赤裸裸地发动矛头指向中国的战争。

（八）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

毛泽东、周恩来为我们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排除避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间问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唯一可靠的途径。这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完全一

① 【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70页，商务印书馆，1983。

致的，又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和民主的精神。邓小平和江泽民也多次反复地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提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主要是加大全方位外交力度，充分利用世界上各大力量之间的矛盾，维护我国的国家根本利益。

一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头等大事，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旧殖民制度，削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凝聚力、作用力虽有所下降，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变本加厉的盘剥和霸权主义无所顾忌的扩张，随着对西方强制推行的“私有化”和“多党制”带来严重后果的反思，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正在进一步觉醒。当今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依然是经济上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主力军。第三世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必将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并将深刻地改变联合国甚至正在改变世贸组织这一经济上的联合国。世界上 4/5 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其中的一员，同属第三世界，我们的历史命运、根本利益和发展前途是共同的。因此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彼此同情、相互支持；我们的团结与合作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对这一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始终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协调与配合，坚决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共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并努力探讨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双方互利合作的新途径，进一步加

强经贸关系，促进南南合作，争取共同发展。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和发展壮大，将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牵制，将从根本上缓解西方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甚至企图干涉我国内政的压力。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指示要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力争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益有根本对抗和冲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点，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双方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也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只要西方国家不对我言武，不干扰我内政，我则一律尊重、友好相待之。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我们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在坚决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做到斗而不破。革命是不可能输出的，最终埋葬什么制度和实行什么制度，只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对双方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力争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中俄东段边界归属悬而未决，是几十年来双方边界关系不稳定的焦点之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急衰，极需稳定的周边环境，与我国有着共同的内在需求。1997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会见时共同正式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签订了两国边界协定。这无疑是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公正合理地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成功范例。

三是继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为我国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周边安全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十分重要。因此，争取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应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应积极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信任，消除疑虑；对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的大局，争取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只要不损害我国的主权和权益，只要还有时间，我们都力争求同存异，暂时搁置，留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去解决，以防霸权主义从中渔利。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中国强大了，也决不搞扩张，谋求地区霸权。

四是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会议，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和声援，进一步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积极参与各项国际条约的制定，积极呼吁修改不公正、不合理的条约和规则，加大对“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基石的揭露和批判，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图改变《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图谋。

在过去的百多年中，饱经忧患而又渊源绵长的中华民族，既有屡遭外来民族鲸吞蚕食的欺凌、内战频扰的磨难，又有告别灾难深重的大规模战争，巍然屹立、扬眉吐气、和平发展的辉煌。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并正在富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已经站立在雄伟壮丽的 21 世纪的门槛上，让我们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勇于开拓，张开双臂，去迎接和平、稳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明天。*

* 本文定稿于 2000 年 5 月 1 日。

21 世纪初的我国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因此，我国急需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一、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似应考虑选定新的国际战略

准确认识和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是正确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格局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抗和斗争。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敌友关系，作出了“一边倒”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从而不仅夺取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而且顺利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内经济，为我国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恶性膨胀，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这时的世界格局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依托各自控制的军事政治集团对世界霸权进行争夺。特别是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苏联趁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更加咄咄逼人，成为对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

此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联美遏苏的“一条线”与“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指导方针，从而使我摆脱美苏双向战略箝制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有效地遏制了苏联霸权主义对我武力侵犯的企图，缓解了我国安全上的压力。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美苏两极争霸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安全态势的新改善，在考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的同时，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的国际战略，从而为我国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壮大自己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在 80 年代作出的“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①论断的主要依据，一是美苏两霸各方面实力大体相当，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二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邓小平同志作出的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80 年代末以来，世界格局逐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标志主要也是两个：一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和华约的解体，使美苏为核心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和抗争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前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南联盟进行野蛮轰炸，并悍然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警示说明：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失衡，当今世界，甚至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上尚未有任何一极军事政治力量能有效遏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二是广大第三世界愈加贫穷的总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各国间协调一致行动、互相声援、支持的凝聚力仍在下降。因此，第三世界这个对美妄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最有希望最强有力的制衡牵制力仍在下降。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49 页。

面对苏东剧变前后美国霸权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攻势，邓小平同志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世界格局正在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1989年10月26日，他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①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又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的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霸权主义过去是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②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判断：“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③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新的格局”，指的就是新的世界格局。在1992年春那篇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④ 时隔数年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南联盟和野蛮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后的今天，重读邓小平同志这些目光敏锐、判断准确的论断，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晚年预见到了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新走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既然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似应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制定出我们新的国际战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3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二、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有可能极不平静

（一）世界极不平静首先来源于美国急剧膨胀的独霸全球的野心

对依仗其发达的经济、高新科技和军事实力的美国来说，硕大的地球确实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永久地当上这个“村”的“村长”、“村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搞垮苏东和华约后，更是肆无忌惮。它们为了维护极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甚至图谋建立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会采用各种手段直至赤裸裸地诉诸武力。苏东剧变后的近 10 年间，美对外用兵达 46 次之多，年平均用兵 5.4 次，其用兵频率远远高于二战后美苏对峙时期的年均 2.8 次。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集团对和平与发展往往有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可以说，和平与发展，往往是善良者和弱小者的愿望，是强暴者和邪恶者的专利。这次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其极其悬殊的军事实力，按照自己的模式，在南联盟强行确立了所谓的和平，世界上有的国家对此敢怒敢言，有的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不敢怒也不敢言，还有的不愿怒也不愿言，但都无可奈何。这说明，美国为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已有重大的突破。这次在南联盟的得手，美在今后将会更多地采用此模式。当然，英国首相布莱尔曾保证，以后不会再采取此模式。能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资产阶级政客对自己的承诺、签署的条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例证，比比皆是。

（二）通往多极化的道路将是漫长的

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上与美国相比，

都是极为悬殊的。几十年内，无人望其项背。正因为此，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存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改变了其本性，而是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还不具备向美国的世界霸权进行挑战的能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力量才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而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在全球的中兴恐怕要在 21 世纪中期前后。较长时期失衡的世界也是很危险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发生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样较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就是因为此间基本上是美国垄断世界。正因为缺乏有效制衡力量，美国才敢于为所欲为。

（三）南北之间、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将更加凸现

南北之间、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而易见。就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也在增大。为什么？原有苏东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办法做为参照系，发达国家唯恐工人造反，还要搞一些福利政策安抚。苏东剧变后，发达国家的针对穷人的福利正在纷纷缩减。全球范围内市场低迷的根源，是绝大多数国家与极少数国家、绝大多数人与极少数人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必然有反抗，有斗争。备受欺压的世界其它各国决不会都忍气吞声，臣服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内对外用兵的频率也必将进一步增多。

（四）美国的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美国的比较严重的泡沫经济是否已经形成，对这个问题有争议。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但我们也需注意，国际著名投资家、美国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乔治·索罗斯在今年初即说：“美国经济呈现出与 1987 年时的日本完全相同的资产泡沫，这种状况仍在加剧”，“下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在

资产泡沫高潮结束后的美国发生”^①。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今年3月下旬说：尽管美国总体经济状况良好，但世界经济的增长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美国，这会使美国招致危险，“这种危险日益增加”。美国的专家还认为：“全球增长的不平衡模式正在美国经济中形成泡沫。这些泡沫最终会破裂，并且引发衰退。尽管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美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下个世纪出现衰退的危险正在加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告诫国会：“在饱受金融灾难折磨的世界经济中，美国不可能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② 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上述言论，主要是想说明必须重视对美国泡沫经济的研究和应对。假若21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中叶前后，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结伴。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带来世界性的战争（不一定是世界大战）。因为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者，往往会依靠战争去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美国的衰落，还会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带来崛起的机遇。旧有的平衡被打破，争夺新的世界霸权的斗争便会进入白热化，新的维护民族权益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也会风起云涌。

（五）世界上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和激化

两极格局时，原有的一些民族、宗教问题，一些国家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争端等，因美苏争霸而压抑掩盖着。苏东剧变后，非但旧有的矛盾和问题立即或逐步显现，新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酝酿着纷争，甚至酝酿着战争。

① 《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沫”问题——索罗斯就世界金融问题答记者问》，1999年1月22日《日本经济新闻》。

② 里奇·米勒：《美国经济是即将破裂的泡沫》，1999年3月11日美国《今日美国报》。

三、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

我们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有可能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是特指我国领土和主权，在 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有可能面临一定规模的外敌侵犯之虞。这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打世界大战，也不是说我国在三、五年内就会面临一种外敌入侵、举国迎敌的局面。在看到中长期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有可能面临较为严峻局面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今后一段时间内，若不发生难以预料的突变，我国周边安全从总体上判断，仍将会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充分认清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这主要是因为：从国内来看，一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任何强敌都不敢轻易对我动手；二是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从容正确应对。从国际上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尚未最终完成其部署，二是其对我和平演变的幻想尚未最终破灭。

这些年来，我国外交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确立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而为我赢得了—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课题，虽然这两个课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总的看来，仍然是希望大于问题，机遇大于挑战。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次科索沃战争，美国首要的是冲着俄罗斯来的。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几千枚核弹头是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对前苏联“西化”已经成功，但是“西化”、“分化”是手段，“弱化”才是目的。美国肢解了前苏联，但它要在保证核不失散的前提下继续肢解、弱化俄罗斯。一旦肢解、弱化俄罗斯成功，使它几十年甚至认为其永远翻不过身来时，美国便可能会挥师东进，直逼被它们视为“东方的共产主义堡垒”、世

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霸权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的确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人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这句话前半句很对，因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后半句是否分析不够？这个判断需要有前提。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的前提应是，中国必须强大、繁荣和稳定。这里的强大，其中包括军事力量的强大。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而是相反，美国便可能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施压、甚至军事上入侵。

现在，美国两党竞选准备已经开始。西方一些所谓学者已开始预言：小布什有可能执政。大布什执政期间，瓦解了苏联；小布什执政期间，有可能肢解中国。当然，小布什执政有可能有对华友好的一面，但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两党、鹰鸽两派，遏制接触，仅仅是策略不同，有时策略还会互置。但对华的战略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西化、分化，最终是弱化。因此，无论是戈尔还是小布什，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都会妄图肢解中国。对小布什执政的预言，决不能仅姑妄听之。

美国的所谓学者早就为我们设计，大一统的中国早就应分解为几十个州。日本有人鼓吹中国应划分为 12 块分而治之。最近，李登辉又抛出了 7 块论。对此，我们也决不能一笑置之。美国“西化”、“分化”、“弱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早定，美国遏制我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也已大部完成。

21 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我国境内外边界地区至少在 3 个方向上值得我们尤为关注。

一是台湾地区。美国一直在把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经营。美国与日本制定的防卫合作指针，不仅为其在亚太地区军事干预提供有力的后勤援助和强力后盾，而且下一步，它还

可能鼓动日本修改宪法，使日向海外派兵合法化。美国还妄图把台湾直接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近一个时期，美在台问题上的动作进一步加快，提出所谓的《加强台湾安全法》，鼓吹加强台湾的军事能力，进一步加大售台各类先进武器的范围和数量，甚至公然要求建立美台军队直接联系并扩大合作。在美日明里暗里怂恿下，台湾岛内分裂势力活动愈加猖獗。不久前，李登辉公然赤裸裸地把两岸关系定位于“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今年年初，台独势力还正式成立所谓的“台湾国筹备会”，甚至拟定了“2000年台湾独立宣言”。这种猖狂行为，美国是其后台老板。近日，李登辉不顾脸面，即刻改口称“从来没有说过‘两国论’”则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台湾地区也正加紧研制核武器。美国现在当然可以声明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是时候没到。一旦时机成熟，美日完全有可能唆使台湾当局树起独立旗帜，迫我动武。届时，美也完全有可能纠集北约盟国和日本进行武力干预。

二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历来是美国妄图侵略我国的跳板。美国还认为，北朝鲜经济极其困难，政局不稳，并正在研制核武器，担心其经济一旦崩溃，便会铤而走险。因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早就把与朝鲜的战争列为今后需要认真对付的“两场地区性战争”之一。美韩军方正在拟定消灭北朝鲜军队并占领朝鲜的战争计划。美军在多次修改后的“5027作战计划”中拟制，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美可以从本土紧急增援50万军队、5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000余架飞机投入战斗，在90~120天内打败朝鲜，最终瓦解其社会主义制度。战火重新燃到鸭绿江边，无论我如何应对，对我都是很大的牵制和威胁。最近世界上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纷纷撰文，声称“美可能把朝鲜半岛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这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西藏、新疆。1998 年美国会同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正在插手中亚，妄图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西藏、新疆逃往境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正被它们做为“科索沃解放军”来培训。美国非但谴责我新疆、西藏没有人权，而且还精心炮制了一项“西藏是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决议，并从去年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发起支持该决议的运动。前不久，美国先后共有 11 个州市还极其荒谬地通过了该项决议。按照美国所谓的“人权”标准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美国根据其需要，就可以纠集其仆从军入侵我新疆和西藏。

不仅如此，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我国周边，都影影绰绰可见美国战略合围我国的影子。我国与美国远隔重洋，美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周边，对我鹰瞵鹗视，其虎狼之心，早已昭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还是西藏、新疆，美国若现在就想在那里动手，借口都是现成的。这 3 个地区其中一个起了战事，其他两个地区，甚至我国周边都可能不安宁。外患起，往往会民心聚，但在特定条件下却会内乱生。我国多年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有可能会被触发。若如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则会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江泽民同志经常夜不能寐，并反复提醒我们，要忧党、忧国、忧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责任感的表现。

21 世纪初直到前二、三十年，有可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我们从现在起，重视并恰当应对，即使 21 世纪前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极不平静，甚至起世界性战争（不一定是世界大战），我国也完全有可能躲过这场劫难，继续赢得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全球烽烟四起中的“世外桃源”；若掉以轻心，便有可能面临举国迎敌的严峻局面。90 年代

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军委制定的立足于打赢现代化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就是敏锐地观察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果断采取的十分及时完全正确的战略举措。

四、我国应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内较长时期的、全局性的谋略。作为参与国际合作与斗争总的谋划与指导的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必然囊括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一个主权国家有了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那么，作为国际战略的分支，如国家安全战略、外交及国际地区战略、军事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战略的制定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1969 年 2 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珍宝岛前夕，毛泽东同志即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4 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3 月初，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同志又指示 4 位元帅抓紧研究。老师们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从 3 月直至 10 月 18 日，共座谈 23 次，给中央送上了数次报告，特别是 7 月 11 日整理上报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从而较为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周边环境的看法，可能是见仁见智，甚至完全相佐。科索沃事件发生后，种种争论进一步增多，且益趋激烈之势。分歧愈大，愈说明统一组织协调进行深入研究之必要。对形势看法虽有分歧，但大家都共同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政治上、理论上、战略上和策略

上都已十分成熟，且日臻炉火纯青。有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晚年虽一定程度地预见到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但主要由于新格局的变化刚露端倪，它的凸现仍需时日，加上他晚年的精力不济，因此，邓小平同志未能就此详细展开论述，并进而得出十分明晰的结论。因此，对新的世界格局的判定和新的国际战略的选定，大家均殷切寄希望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五、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下，研究制定和实施新的国际战略，应注意处理好以下 5 个关系

①既要看到严峻的挑战，不抱幻想，高度警惕；又要看到诸多挑战背后的各种机遇，充分认识各种有利条件，充分认识西方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善于利用美日、美欧等诸多矛盾，从而纵横捭阖，掌握主动，扬长避短，化害为利。

②既要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必要准备，真正具备遏制和打赢强敌入侵的局部战争的能力；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壮大自己；决不能夸大威胁的严重性，反应过度，把国家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中。

③既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国际关系中继续坚决维护我国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又要努力避免全面对抗；要以两手对两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争取与世界各国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④既要进一步坚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加强与有相同战略利益的国家的沟通和联系，即注重合纵，从侧翼有力牵制和遏制单极，推动和发展多极；又要坚持独立自主不

结盟的方针，正面防御，决不当头，即注意连横，排除我不必要的压力，防止引火烧身。

⑤既要重视新的国际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在国际舞台上施展身手，不断拓展外交生存空间，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好、更长时期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又要十分注意做好国内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和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内乱生，则易外患起，“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工作做好了，任凭国际风浪起，我则稳坐钓鱼船。*

* 本文发表于《求是·内部文稿》，1999 年第 23 期。

全球化与第三世界^①

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联系、交流与合作。这种经济国际化或全球化的趋势，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具有巨大的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

但是，目前西方所主张的全球化，同时又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近 10 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兴趣的骤增，是因为它们在全球重新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信心骤增。西方所要达到的全球化，是对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清算和反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的扩张，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加剧和激化，在更大的历史范畴内，“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桎梏。

近 10 年来，西方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是：①国际地位弱化。②疆域人口扩大化。③国家职能退化。④综合国力衰化。⑤贫富两极分化。⑥生态环境恶化。⑦文化意识西化。

西方全球化的前景是：近些年，其势头仍将会是如日中天，

① 本文为 2000 年 1 月作者在古巴哈瓦那“第二届研究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经济学家国际研讨会”演讲稿。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的旧秩序，而是图谋建立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决不仅仅是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合作与交流，更是社会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趋同与质同。笔者认为，仅有上述字眼、词句或概念，还不尽反映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的多样性，还应增加一个新概念，即相对于西方全球化的东方全球化的概念。东方全球化即是当今第三世界所应主张的全球化，它的本质内涵应是积极适应、参与和利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趋利避害，并逐步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

（二）全球化的现象早已有之。15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本质也早有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实质上同样涉及到了全球化的本质内容。毛泽东在 1935 年也曾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②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这个字眼，但其论述中的“世界性”、“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均涉及到了目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说的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三）近 10 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兴趣的骤增，是因为它们在全球重新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信心骤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6 页。

19 世纪后几十年，随着远洋轮船、铁路、电报和苏伊士运河等的出现，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轰轰烈烈地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幅提高关税，标志着战后世界进入一个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严格限制资本活动的时期。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阻止了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尤其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的五、六十年代以来，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异军崛起，老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旧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甚至发生了逆转。此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苏联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松动，特别是起始于本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使经济全球化势头重新显现并逐步高扬。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发达国家确认了所谓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确认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指日可待。加之以高新技术其中包括交通工具特别是通信工具（如因特网的出现和急剧发展）在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性进步，面对已经和即将得而复失的广大的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新殖民主义者的异常的笃定不疑和激动兴奋的身心是可以想见的。

（四）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毫无疑问，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空前复兴和发展，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头脑里的凭空杜撰，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这种经济全球化既反映了当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作为人类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在一定历史范

畴内，它直接推动了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国际金融和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生产力的显著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将造福于人类，并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着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更是一柄双刃剑。西方所期待和要达到的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对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反向清算和逆向报复，是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进一步侵害和“和平”戕伐。因此，在更大的历史范畴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随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加剧，“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成为新的蓬勃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桎梏和障碍。

二、西方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无疑有正面效应，但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最轰轰烈烈的近 10 年，至少在以下 7 个方面明显导致了具有全球意义的消极影响。

（一）国际地位弱化

近代以来人类苦难的最大承担者，应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而同时出现的第三世界。20 世纪初，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并开始全面建设，先后进入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以多种联合协调的形式积极活跃于世界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少数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逐步有所改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地位不断削弱，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构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生力军。但是，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东的剧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顺利进展，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越来越

越不屑一顾。美国官员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中居然提出，第三世界“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①。一些西方媒体干脆冠以《第三世界完了》^②、《我们废除第三世界》^③等标题，撰文咒骂第三世界是“捣乱国家”、“无赖国家”和“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和“垃圾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绕过联合国赤裸裸入侵南联盟，本质上是对广大第三世界的蔑视。

（二）疆域人口扩大化

苏东剧变前的10年前，世界上约有191个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约为163个左右。由于苏联等国的解体，被称为“转轨国家”从原有的9个变为28个。苏联解体后的1998年的俄罗斯，与解体前相比，GDP下降55%，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下降70%和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90%，外债由1550亿美元增至2250亿美元，居民平均收入下降2/3，人均寿命从1990年的64岁降至1998年的59岁。前不久，法国的一位科学院院士撰文说，俄罗斯近10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连遭失败。目前俄自身地位已变得十分虚弱，“它现在已只能在国内对付分裂主义势力了”。^④被肢解的苏联正在从第一世界沦落入第三世界。东欧绝大部分原社会主义国家也急剧衰落，正在从第二世界沦落入第三世界。这使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210个左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增加到近180个，其中人口增加了4亿，土地面积增加2500多万平方公里。

（三）国家职能退化

国家的根本职能是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是

① 1989年夏季号，《美国国家利益》。

② 1990年7月1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③ 1992年4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

④ 埃莱娜·长雷尔·当科斯：《俄罗斯复兴的代价》，1999年11月12日法国《费加罗报》。

每个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而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为条件、世界市场为基础、国际金融为核心的。199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估计超过 2.5 万亿美元，其中世界 100 家最大跨国公司占 1/3；有 90% 的国家和地区其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当今世界最大的 100 个经济单位中，51 个是企业，只有 49 个国家。国际外汇市场上交易额每天约 2 万亿美元，为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 60 倍。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等各种新势力越来越强大。国际上的很多决定已经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经济的中坚势力发布。因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越来越遭到经济全球化的削弱。在超越国家界限新势力的跨国公司中，美国的公司起着并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起着主导的作用。1999 年，全球前 1000 家最大的公司中，西方占 99%，美国占 494 家，比 1998 年增加了 14 家，前 20 强中，美国就占了 17 家。^① 美国国家和政府的部分职能已由其跨国公司取代。美国政府和其跨国公司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是垄断资本的集中代表。从本质上说，美国跨国公司的壮大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其政府的职能，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包括对其跨国公司的制约也正在进一步得到加强。美国要削弱的和实际上被削弱的是其他国家的政府职能。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最近明确提出要“重新定义国家利益”，说什么美国希望在“分享资源 and 环境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影响远方的政府和组织”。^② 西方政府和各种媒介也连篇累牍地宣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主

① 《全球 1000 家公司》，1999 年 7 月 12 日美国《商业周刊》。

② 1999 年 7 月～8 月号，美国《外交》。

权已弱化”、“主权概念已过时”，要“放弃国家干预”，强调“资本应打破国界自由流动”。美国学者最近撰文说：“由于20世纪也许被称为极权主义世纪，其象征是有刺铁丝网，那么21世纪也许将被称为袖珍国的世纪”，该文的标题即为“跨越袖珍国的边界”。^①这种宣传，已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变为事实。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是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后盾牌。第三世界国家职能的进一步削弱，乃至经济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丧失，必然进一步有利于发达国家恣肆妄为的劫掠。

（四）综合国力衰化

手头没有更权威的综合数据一下子就能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相信有能力统计这一数据的国家或集团对这一统计兴趣也不大。仅从几个侧面加以说明。首先是粮食。最能说明一个国家国力的恐怕最首要的就是人民的温饱。按照1996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公布的数据，在第三世界国家，80年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数为5.9亿，1996年则上升为8.41亿之多。而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世界谷物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1996年国际市场小麦的价格每吨为200美元，玉米每吨150美元，而1998年小麦则降到了不到100美元，玉米为80美元左右，主要谷物都以11年来没有过的低廉价格出售。就在世界谷物产量增加和粮价下跌的形势下，世界上缺粮的国家和地区由1996年的26个增加到1998年的43个，增加60%多。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每一分钟就有12名5岁以下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②其次是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下降。90年代初，非洲每年的经

① 阿诺德·比奇曼，1999年9月23日美国《华盛顿时报》。

② 《世界仍有8亿多人在挨饿》，1999年10月5日日本《读者新闻》。

济增长率为 5%，但现在已经下降到 2.6%。^① 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第三世界 100 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减少，60 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在增加，但其利润却是被外国资本收取，于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无补。例如乌干达，尽管政府声称连续 10 年经济增长达到了 6%，但还是有 2/3 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人均收入刚刚回升到 1970 年的水平。^② 再次是发达国家制造和利用金融危机，使第三世界资产严重缩水，并廉价收购其资源、市场、劳动力和经济成果等。19 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主要靠侵略瓜分市场来创造繁荣，现在已开始注重利用金融及其衍生物这一新的投机方式掠夺更多的财富。1998 年世界经济增幅下滑，但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却上升 30%，外汇交易同贸易额的比率从 80 年代初的 10:1 上升到 60:1。这种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一体化，是造成近几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据保守估计，截止 1998 年 11 月，亚洲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资产“缩水”50% 以上。其中有 7000 多亿美元流入美国。^③ 在非洲，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包括金融、能源、电讯、矿业、交通等部门大多廉价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拉美，从 1990 年到 1996 年，西方跨国公司抢占了 57.3% 的市场销售额。在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 1 万亿美元的企业，被西方以 72 亿美元的价格买走；仅 1996 年一年的经济损失，就比卫国战争多 1.5 倍。^④ 另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高新科

① 《一个更加富裕的世界，但也有更加贫穷的人》，1999 年 5 月 4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② 《穷人的境况：美国必须增加开发援助》，1999 年 5 月～6 月号，美国《外交》。

③ 《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国外理论动态》1999 年第 6 期。

④ 《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国外理论动态》1999 年第 6 期。

技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流失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目前有 3 万名非洲籍博士在非洲以外的世界闯荡。这种潜在的经济损失是无法估算的。

（五）贫富两极分化

先看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两极分化。1998 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 28.86 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约 17% 的 24 个发达国家，则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 79%；而占世界人口 83% 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21%。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占世界人口 20% 的人群中，却消费着全世界 86% 的商品、45% 的肉和鱼、74% 的电话线路和 84% 的纸张。^① 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 5%，却拥有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计算机和世界上 26% 的因特网使用者。当美国 25% 的家庭能上因特网时，而上过因特网的俄罗斯人还不到 3%，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使用者还不到 1%。发达国家公司股票的票面价值从 1998 年 10 月到 1999 年 4 月半年多的时间里，便上涨了近 7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轻而易举地超过了第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万亿美元的总额。^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透露：“世界上 20% 最贫困人口今天只可怜地占有世界收入的 1.1%，而 1991 年所占比例为 1.4%，1960 年为 2.3%。”目前，世界前 10 位巨富的资产已达 1330 亿美元，相当于所有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 1.5 倍。^③ 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 2.2 万多亿美元，其中 2/3 是长期国债，平均每人欠西方约 420 美元。发达国家也曾扯起减免债务的旗帜，但为最穷国家债务减免计划提供的 50 亿到 70 亿美元——大致是美国公民每年买运动鞋所花

① 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路透社联合国 1998 年 9 月 9 日英文电。

② 《一个更加富裕的世界，但也有更加贫穷的人》，1999 年 5 月 4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③ 《发展无国界》，1998 年 12 月 1 日阿根廷《民族报》。

的钱——只占最可能获得债务减免的国家中 1/5 国家债务额的 5%。^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十分惊人。就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历年最低的美国，最底层的 40% 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区区 0.2%，从 1983 年到 1995 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 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 1% 的最富有的家庭的财富却增加了 17%，占美国总财富的近 40%。^②这就是说，在最富有的美国，也结出了全球化的恶果。在非洲，在拉美（除古巴外），在东欧中亚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且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 1994 年第 7 期公布，世界上拥有亿万美元以上的巨富中，1987 年拉美只有 6 名，但短短六、七年后，便剧增为 42 名。而拉美的贫困人口却从 60 年代的 9000 万增到 90 年代的 1.9 亿，全地区人均收入下降到 70 年代初的水平。随着西方全球化的进程，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成风，一些权势阶层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成为第三世界中暴富起来的新贵。在全球范围内，巨富数目与贫困数目联袂上升。

（六）生态环境恶化

1998 年 9 月 9 日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宣布：“一名今年在美国、法国或英国出生的婴儿在一生中的消费、浪费和造成的污染将超过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 50 名婴儿。”“由于燃烧矿物燃料所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美国每年为 21 公吨，而在中国每年只有 3 公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发展不仅依赖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资源、廉价市场、廉价商品和廉价劳动力，而且还依赖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国家还把污染环境

① 《穷人双倍负担第三世界债务》，1997 年 11 月 5 日美国《洛杉矶时报》。

② 《使强劲经济受损的 5 个问题》，1999 年 1 月 4 日美国《纽约时报》。

的第二产业大量迁徙到第三世界国家。90 年代造纸所耗木材为 50 年代的两倍，而美国、日本、欧洲纸制品消费占世界的 $2/3$ ，所用木材几乎全部来自第三世界。世界森林 $2/3$ 被毁，并正以每年 1600 万公顷（约为一个英国或半个德国）的面积遭受消亡。这便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急剧恶化。第三世界占全世界每年死于空气污染 270 万人中的 90%，另每年还有 2500 万人因农药中毒，500 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相当多的城市的幼儿都患对大脑有破坏作用的铅浓缩症。^①

（七）文化意识西化

西方所说的全球化，本来就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任何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这在科学技术惊人发展，特别是由美国主宰的信息技术进步的时代更是如此。文化和意识形态必须有载体，如报刊、书籍、电脑软件、电影、电视台和互联网等，而这些载体是需要巨额投资的。美国有对外进行思想文化宣传的强大国家机器，特别是高功率、高覆盖率的广播、卫星电视使世界缩小，数亿人在同一时间享受同一个重要新闻信息，并产生交流和互动。这种时空上的同时性和同位性，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干扰任何一个民族的舆论和情绪，甚至破坏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在因特网上占支配地位的当然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另外，当今世界各地的娱乐界充斥着美国制造的

^①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第 302～303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产品，流行文化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行业，1996 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 602 亿美元，超过该国其它任何行业。美国一位社会学家称：“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中最近的一次行动。它代替了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徒推行的拉丁语以及（共产党政府推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①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在其他的国家，都已被引起关注和严重不安。作为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它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普遍制造对美国的迷恋、膜拜和奴性，从而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第三世界被剥夺的决不仅仅是资源、市场、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坚强而美好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西方全球化的前景

（一）近些年，西方全球化仍可能是进一步扩张之势

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美国经济自 1991 年第二季度以来已持续增长近 9 年，有望成为战后最长增长期。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用“和平演变”等手法，搞垮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垮了与其对峙的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经济、政治、军事集团。这样，美国等于打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在资金、技术、商品原材料市场、人才智力资源诸方面所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收益是无可估量的。除此外，一是美对计算机和信息时代其他高新技术最早大量投资，因而率先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信

① 《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1998 年 10 月 25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 页。

息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优势效应更为突出。美国企业 1997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 1/3 以上是用于“信息处理和与之有关的设备”的。从 1991 年到 1997 年的增长总额中有将近 2/3 是与计算机有关的。^① 因特网在全球是刚刚起步，市场还大得很。1998 年全球因电子商务的应用而节约的成本有 170 亿美元，而预计 2002 年将上升到 1.25 万亿美元，美国公司将获取这些长期利润的一半。^② 二是美国金融业实行改革和重组，由此带来股市繁荣，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和投资。美国股市从 1992 年 1 月的 2000 点飙升到 1999 年 6 月的 1.1 万点，上涨 5.5 倍。仅股市上涨便获红利 10 多万亿美元。三是由于苏联和华约的解体，近 10 年来，美国共节省军费约 1 万亿美元。四是其政府采取了符合美国经济实际的一系列新举措。美国是西方全球化的心脏和发动机。其潜在的生产力还尚未全部释放。在近年来，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上与美国相比，仍无人望其项背。西方其它发达国家与美国当然有着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但它们在对付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上，又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既有争夺，又有合作，但是，一般来说，它们的根本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合作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西方全球化的势头在近年来仍将会是发展扩张之势。

（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全球化浪潮制衡和牵制力也有限

第三世界愈加贫穷的总趋势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尤其是近些年来第三世界各国间协调一致行动、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凝

① 《问题和答案：美国为什么如此繁荣》，1999 年 3 月 17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② 《因特网经济：世界发展的新引擎》，1999 年 10 月 4 日美国《商业周刊》。

聚力已经并将继续下降。这本来应是制衡和牵制西方全球化的最根本的力量。这种状况反证了西方全球化势头在短时期内难以受到有力的遏制。

（三）西方全球化有可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长达数十年

在全球极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西方全球化的根本目标之一。20 世纪初，最大的事件便是社会主义从思想、运动变为制度。此后，帝国主义多次联合对其武力围剿，结果却失败了。后来改为实施以“和平演变”为主的战略。20 世纪末，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是苏联东欧的剧变。苏东剧变不仅给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而且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社会主义国家是抵御西方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1997 年 1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期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仍相信，从长期以来，同中国接触，极有可能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像柏林墙倒塌一样。”^①克林顿主张对中国要接触为主，通过接触这一桥梁，达到遏制与和平颠覆之目的。但是，由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立场坚定，策略灵活，坚持以两手对两手，使美国近年对我国“接触加遏制”及其和平演变战略收效甚微。因此，美国对华产生了“久攻不下”的急躁心态。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无论谁上台，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战略还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是因为，一是新中国建立 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谁也不敢对中国轻易动手。二是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尚未最终破灭。如果中共这样

^① 《克林顿强调与中国接触对美有利且可影响中国》，新华社华盛顿 1997 年 1 月 28 日英文电。

的大党、中国这样的大国今后几代乃至数代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始终像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样，巍巍然顶住八面来风，通过改革更加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那么，西方全球化便会碰到一个啃不动、嚼不烂的硬钉子，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便十分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在今后几十年内在全球的复兴。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资本主义在较长时期内仍然具有强劲的自我调节能力，倘若中国党的今后几代乃至数代打不破西方和平颠覆的图谋，那便极有可能像苏联东欧剧变一样，又一次给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可能跌入真正的谷底。那么，西方全球化的势头不仅在近些年内方兴未艾，而且其企图建立的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所谓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便有可能在今后数十年内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西方强国最为期待的一种前景。当然，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秩序”是永久的和凝固不变的。这样看问题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不是的。封建主义社会曾延续了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尚且只有数百年。无庸讳言，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后几十年内，从经济、政治到科技、军事等诸方面都可能会处于优势；多极化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中兴，都可能会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因此，在西方强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和第三世界中兴的时间问题上，在第三世界中兴过程中的困难程度上，宁肯估计得长些、重些，不要估计短了、轻了。

（四）西方全球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前景，那就是在其洋洋得意的行进中产生间歇性的中断

西方全球化能否一路凯歌行进，主要看美国。美国经济有其潜在的严重危机的一面。一是1999年中期，其股市价格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0%，泡沫经济成份显而易见。1929年经济危机的前夜，其股市价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若美国股市下跌

10%，即要“缩水”1.4万亿美元，这对其经济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二是美国现在有近6万亿美元的内外债，其债权债务相抵，净外债多达1.5万亿美元。三是美元是国际货币，其总量的2/3在其境外流通和储备。四是1994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8年已达到2540亿美元，1999年预计有近3000亿。五是消费者掀起借贷热潮。1998年的个人储蓄几乎跌到只占收入的0.5%，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最低点。而1997年是2.1%。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借贷炒股。^①若净资产与债务相抵，有近20%的家庭没有净资产甚至是负资产。美国家庭现在的全部债务几乎占了全部可供支配的收入的98%。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美国人，现在正是拼命工作，肆意消费的时候，这一代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退休，其后劳动者相对于不劳动者的比例将迅速下降。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民间退休收入保障制度还都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这对美国的经济也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像条肥硕的蚂蝗一样，是依靠吮吸别国和透支子孙后代的血液维持其现在的生命的。正因为如此，美国乃至世界各国近一年来，纷纷在谈论着美国近一、二十年的前景。美国对冲基金掌门人乔治·索罗斯说：“美国经济正呈现80年代后期类似日本的资产泡沫。”^②麻省理工学院一教授说，嗅到了30年代大萧条时的味道。^③英国一家1999年10月28日出版的周刊甚至预言美国今后数月“有可能发生股市大崩

① 《美国在制造债务炸弹吗？》，1999年11月1日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② 《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沫”问题——索罗斯就世界金融问题答记者问》，1999年1月22日《日本经济新闻》。

③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又回来了》，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1~2月号。

溃”，“随其后的是长达 10 年的全球经济衰退”。^① 美国经济的大衰落是极有可能的。只是不知其确切的时间。10 年内会不会？10 年不会，15 至 20 年呢？30 年呢？曾控制全球 1/4 的地方，贸易和制造业产值占全球 1/4，对外投资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太阳落下了，谁能保证现在的美国永远是如日中天呢？美国经济若发生大问题，不仅是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球都会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难。其强度极可能超过 30 年代的大萧条。第三世界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时，应把这一严重征兆考虑进去。当然，美国经济若遇到大的灾难，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上的重新崛起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的复兴。

（五）西方全球化可能引发并加剧局部战争

应该看到，从当前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制止世界大战的根本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整个世界日益联结为有机的整体，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强国都已是世界经济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各个强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还因为，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强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在近些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并不对立。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强国主要靠所谓“文明”的贸易、投资、资本自由流动等“巧取”的方式达到目的。但暴力这种流血的政治，仍然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若需要暴力出面，采取“豪夺”战略来掠夺具体财富时，这些强国就会毫不犹豫地唤来战争。从

^① 《1999 年会发生股市大崩溃吗？》，1999 年 10 月 28 日英国《外事报道》周刊。

一定意义上讲，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如为了维持和扩张对国际垄断资本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和战略资源产地的控制权，海湾战争是一个实证。如为了对其主要敌手进行“预防性遏制”，对南联盟的入侵是一个实证。如对受压迫、受剥削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反抗，在采用其他手段无效的情况下，西方强国也会施以战争。另外，西方全球化的自由竞争必然带来西方强国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上的新的不平衡。为了求得按照实力重新分配在全球的利益，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有可能运用局部战争的手段去加以解决。1999年8月24日，美国《华盛顿时报》披露，美国“白宫为下个世纪拟定了一项新的全球战略，为美国在一系列麻烦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依据”。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假若在今后10年、20年左右，美国经济遭受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世界将极不平静，将会孕育和触发各种各样的局部战争，甚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不一定是世界大战）的战争。

（六）有西方的全球化，便会有反西方的全球化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头等大事。它作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舞台。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和生力军。近些年来，尽管这一力量有所减弱，但是，广大第三世界决不甘心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任意摆布，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斗争。西方全球化已经并必将继续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可以断言，即使西方全球化的一时成功，全球范围内巨大的财富和资本必然进一步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西方全球化的畅通无阻也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少数强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贫富不均的两极化，全球绝大多数人民和民族的生活境遇有可能更加悲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劳动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必然会更加尖锐。西方全球化的过

程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体肤不断遭受煎熬和心灵不断觉醒的过程，他们在觉醒中必然反抗，并进一步联合和斗争。这就会在全世界历史范围内，不仅为新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相当的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条件，而且促进了民族的阶级的充分觉醒和充分准备。因此，新一轮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必然蓬勃兴起，新的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就必然在全球到处突破狭窄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新一轮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即东方全球化运动，必然得到新的蓬勃的发展。21世纪中叶前后，极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中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中叶左右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兴之后，也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曲折和挫折，但是，历史问题是在螺旋式的曲折中上升和前进的。彻底的民族民主运动，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靠输出，但社会主义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必然的内在要求和共同归宿。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从根本上说，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拯救第三世界。西方全球化的对立物当然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这正如古巴卡斯特罗主席1998年7月3日在哈瓦那举行的98经济年会上所说的“惟一可以代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同样不是任何时代和任何阶级的思想家的臆造和杜撰，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最终归宿。这同样是不以任何人、集团、任何阶级、任何国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高新科技全球化的发展将永葆其无限美妙之青春，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即西方全球化绝不会万古长青。西方全球化彻底死

亡了，共产主义全球化才能万岁。当然，我们十分清醒，这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尽管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和异常艰辛，但是，我们的先辈已给我们作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并成功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我们会决意一步步坚定有力地走下去。我们还十分清楚的是，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还不具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任务，决不是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而首要和根本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四、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第三世界

（一）要参与

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发展的突出表现。它对第三世界是一种灾难，但也是全球生产力的一种进步和飞跃。这种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对此，我们除了正视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样的全球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种种的弊端和可能的风险，而企图置身之外。我们既应看到西方全球化对我们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更应看到其中给我们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积极主动参与，制定相应对策，善于趋利避害。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吸纳外资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和资源的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和管理现代化上的超越；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高新科技知识和优秀文化，培养各方面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二）要斗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引导和推动的，现在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

西方强国制定的。其中有相当多的歧视、欺负、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条款。比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了所谓的乌拉圭回合协议框架下的关贸配额。又如农产品是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最多的产品，而西方强国却对它课以很高的关税。西方强国向最贫困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比它们之间的关税还重，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关税甚至重两倍。再如，西方制定了将生产过程纳入所谓国际“公平贸易标准”，认为第三世界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不是标准生产并拒绝进口，那么，请问西方强国用高科技手段生产的产品是不是标准生产呢？1999年11月27日，英国一家报纸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在公众眼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起码仍然是西方机构”，但世贸组织“也许是这三个机构中最具有包容性的；它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来作出决定的。乌拉圭回合虽然也偏向于西方，但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推进自己的利益”。^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曾在联合国舞台上叱咤风云，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捍卫自己利益的活剧。世贸组织是当今世界上的经济联合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若能在世贸组织内和国际上适当的时候及场合，敢于和善于对现存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有秩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积极参与各项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规则的制定，积极呼吁不公正、不合理规则的修改，逐步建立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利益的真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就可以更好地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面对西方强国的封锁、欺侮和干涉，不信邪、不怕鬼、不弯腰、不示弱的民族精神就愈加显得重要。只有敢于和善于斗争，才能在逆水行舟中，非但不被西方全球化

^① 《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1999年11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

“化”过去，而且会保持自己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政治和主权上的独立性，并日益强大起来。新中国 50 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在任何国际压力面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伸张正义，逐步成长壮大的，并赢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欢迎和尊敬。在卡斯特罗总统的领导下，古巴人民决不屈服、勇往直前的精神，不仅为第三世界所高度赞誉，而且连西方的有识之士和媒体也经常称赞。1999 年 8 月 4 日，英国《独立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赞扬：“古巴革命 40 年后，古巴试验依然存在，而且在政治、体育、音乐和文化方面一派生机勃勃”；“古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无论从经济上说，还是从精神上说，也要比美国及其公司强加给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好得多”；“古巴岛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来说仍然是希望的灯塔”。^①

（三）要联合

既然资本的流动和统治日益具有全球性，那么，反对资本的剥削和统治也同样日益具有全球性。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前，有着受奴役、受压迫的共同命运，独立后又面临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面对西方全球化的复兴，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难和问题。第三世界无论就其拥有的国家、人口、地域面积，还是拥有的战略交通线、陆地海洋资源等，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第三世界有着团结合作、互相支援的优良传统，至今仍有“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这两个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进行斗争的工具，只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进一步认清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坚持相互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相合作，求同存异，就一

^① 《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和最出色的独裁者致意》，1999 年 8 月 4 日英国《独立报》。

定能够妥善解决各项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联合起来，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就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15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至今仍具有震聋发聩的意义。今天，我们仍十分需要疾呼：“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第三世界四分五裂，是西方强国十分愿意看到并希望永远保持的情景，也是它们竭尽所能地想要达到的结果。

（四）要探讨

庸庸讳言，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第三世界的发展运动现在已步入低潮。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要有力遏制西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要使第三世界发展运动步入自为的运动，就必须加强对西方全球化动态的认识、预测和应对，就必须对全球化及其发展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原理至今未变，但是西方全球化的日益加速，使第三世界的发展面临着许许多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符合第三世界发展实际的正确理论，决不会产生在诺贝尔奖金的证书上和西方议会的讲坛上，而是需要第三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艰辛实践和成功创造，需要有良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总结与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极需对西方首脑和媒体大肆宣传的“新干涉主义”、“新国际主义”、“民主国家国际组织”、“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走向消亡”、“人权高于主权”等一系列理论观点进行剖析、反驳和批判。另外，对第三世界相当一部分人宗教般地虔诚相信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只有“完全依赖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只有“以两极分化为代价”才能富起来的糊涂认识，也极需解疑释惑。哈瓦那“第一届研究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经济学家国际研讨会”对有关重大的理论问题成功地作了探讨。相信哈瓦那第二届同样的研讨会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理论之果。

（五）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形势，对西方全球化的进程和第三世界的处境与发展一直十分关注

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大理论，而且还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①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庄严宣布，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 1977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的改良^①

众所周知，“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确有其特定的内涵。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一些主要国家的中左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它们大多以“第三条道路”来昭示彼此一致或相近的政治纲领和策略。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当然应当首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我们也早已注意到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较早地从政治、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民社会、民族、经济、福利国家、全球秩序等7个方面对第三条道路所作的较为全面的阐发。

我们认为，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界及学术界的很大兴趣和关注。

新“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两种模式。前一阶段西欧各国主要是以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建设福利国家，后一阶段英美等国保守党政府改弦更张，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但矫枉过正，在激活市场、提高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又牺牲了社会公正，造成了社会分裂，加剧了资本主义

① 本文为作者在2000年4月“21世纪的挑战与第三条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致的开幕词。

方发达国家的对抗，会不会最终危及西方发达国家自己的生存？当然，对于这些国家的对抗可以采用“新干涉主义”，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起决定性作用，但暴力无法维持永久。这就是我在研究“第三条道路”时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困惑。

能不能说，“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体系仍在探索和发展之中？我们各方的认识也同样在不断探讨和深化之中？正因如此，除了“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内涵和其在 21 世纪的前景外，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相互切磋。如“实现现代社会民主的复兴与成功”的丰富而本质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有没有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西方强国为什么强调“第三条道路”的重点不是所有制，而是竞争与规则？“人权高于主权”是不是“第三条道路”对外政策中“全球治理”和“新干涉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石？“人权高于主权”是不是原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的表述方式？“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践和把“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战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运动，这会对不同的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将会对全球经济、政治的秩序带来哪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布莱尔先生、克林顿先生、若斯潘先生、施罗德先生所讲的第三条道路有没有异同？若有，其异同之处在哪里？为什么？“第三条道路”这几年在西方各强国的实践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第三条道路”强调“社会正义”，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怎样才是普遍的正义？如何实现普遍的正义？我以为这是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根本问题之一。关于正义，在我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中，都可以找到一致或相通的思想本源。西方圣哲说，正义就在于归还、遗留或给予他人属于他的一切，正义就是创造和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幸福。在这里，

我们能不能引伸为全球和全人类的幸福？“第三条道路”所强调的“社会正义”，仅仅是在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集团，至多包括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所谓“公正”，而不是全球一切国家和民族间的公正，不是全人类之间的公正。中国先贤则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今天普遍的正义是不是应该体现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

存在疑义是正常现象，疑义恰恰是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和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前提。我相信，通过研讨，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各方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和辨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共同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未来。

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 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

战略指导思想是战略指导者对军事斗争全局指导规律的总结和理论概括。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而战略指导思想则是主观指导能力的主要体现。武器装备总体技术水平愈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军队，就愈加需要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杰出的军事家可以依据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凭借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坚持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主要内容之一。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对于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大力推进我军质量建设，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实现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依据

（一）这一思想符合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新特点和我国周边环境的新形势

从国际环境看，两极格局解体之后，美国虽是当今世界唯一

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已相对下降；世界正向多极化格局发展，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各大战略力量相互制约，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上升。以科技进步为基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力争在 21 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目标。所以，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减小，世界和平可以在较长时期得到维护。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看，这几年，我提升了中俄关系的战略层次，稳定了中美关系，维持了与日本的友好，改善了中越、中印关系，增进了与东盟各国的联系，因此，我无全面战争之虞。这为我们进一步遏制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但是，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军事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并把我国作为主要的潜在对手，近几年来不断加强在我周边地区进行战略部署和军事活动；军国主义国家有灰烬复燃之势；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东盟一些国家也加紧了对我国南海资源的掠夺，并企图长期占据我国领土；“藏独”、“东突独”特别是“台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及其背后的国际势力加紧破坏活动，这些都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海洋权益，将面临着繁重的任务。我虽无全面大战之虞，但有局部战争之忧。因此，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我们把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在战略层次上统一起来是完全正确的。

（二）这一思想是由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所决定的

国家战略是从总体上对国家各个领域的活动进行运筹和谋划的方略，军事战略是从全局上对军事斗争领域的活动进行筹划和指导的方略。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军事战略方针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与其它领域的战略相互协调，以共同实现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江泽民同志 1997 年 5 月 29 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抓住大仗较长时间打不起来的有利时机，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我们的军事战略不仅要服从，而且要服务于这一大局。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不仅突发性强，而且费用高，破坏性大，对国家安全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海湾战争仅 42 天，美国及其盟国就耗费了 611 亿美元，伊拉克损失更大。因此，我们首先要千方百计地遏制战争。当战争无法遏制之时，则必须确保打赢战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国家发展战略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这一思想是我国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质量建设的内在需求

80 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的革命性变化。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形成了以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特别是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定后，我国军事斗争准备和我军的质量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受经济、科技水平和财力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军事斗争准备和我军武器装备、情报侦察等诸多方面仍与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不仅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军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与台湾军队和一些周边邻国军队相比也不完全占优势。虽然我国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质量建设与所承担的繁重任务不相适应，但我们仍然要千方百计地遏制战争的发生。因为遏制战争的同时既可为我国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质量建设赢得时间，提高遏制战争的能力，又可为进一步打赢无法遏制的战争创造有利的条件。

（四）这一思想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的相对平时时期，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都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髓。井冈山时期的“敌进我退”就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作战，遏制不利于我的战争（战斗）发生的雏形；“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则是在有利条件下打赢战争（战斗）的体现。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把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一方面不顾安危，深入虎穴，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千方百计地遏制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充分揭露蒋介石集团玩弄的政治欺骗阴谋，做好了应付内战的充分准备，从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国后，我们进一步形成和深化了遏制战争和打赢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一方面，我们以非武力方式的军事斗争为后盾，采取政治、外交等多领域斗争密切配合，努力遏制各种不安定因素的增长，使其不向导致战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充分准备，敢于斗争，坚决打赢不可避免的局部战争，如刚刚建国之时的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74年捍卫祖国领海的西沙自卫作战，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适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两个转变”，更加明确了遏制和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正是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两个转变”不仅为打赢战争指明了方向，而且为遏制战争指明了根本途径。这是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二、必须正确把握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

和平与战争是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它们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为保卫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而积极开展的各种军事斗争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它们互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

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区别主要有：①主要手段不同。遏制各种局部战争爆发的军事斗争，是以非武力方式的军事斗争为主，配合以必要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法等综合手段，遏制各种不安定因素增长，使其不向导致战争的方向发展；打赢战争，则是以武力方式的军事斗争为主，配合以必要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法等综合手段，以坚决果断的行动，对霸权主义和其它敌对势力强加的战争所作出的自卫反击。②在一定范畴内的理论层次上不同。遏制战争是在战略指导基本着眼点的理论层次上展开的；打赢战争则是在战略作战的理论层次上展开的。③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同。遏制战争是军事斗争准备的着眼点，是努力争取的最好结果，是和平时期战略的最佳选择；打赢战争则是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是对遏制战争无效后战争状态降临的充分准备，是对重新争得和平必备的筹划运作。

但是，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①二者共同需要一定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实力和基础越强大、越雄厚，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愈有保证。②二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又相互作用和促进。遏制战争能为确保打赢战争夺得充分准备的时间和条件；打赢战争则可以用武力进一步增强可信的威力，有利于遏制下一次或更大规模战争的产生，二者能量的互相作用成正比。遏制战争的能量愈强大，打赢战争的能量聚结的愈充分，打赢战争的成果愈辉煌，对下一次战争的遏制力就愈强大。建国初期抗美援朝一仗，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从而有力地遏制了后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战争，赢得了直到今天的相对和平的大好局面。相对和平局面的出现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无疑又为打赢今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战争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③二者作为不同的军事战略手段，在实现军事战略的目的、任务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更宏观的理论层次上又统一起来，二者都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完整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维护国家统一和尊严，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始终处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之中，共同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并确保其完满实现。

三、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更好地坚持遏制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思想

在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过程中，贯彻好遏制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必须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不同对手、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既要坚决斗争，又要留有余地，做到软硬兼施，刚柔相济；既要积极参加国际事务，显示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要避免把不必要的矛盾引到自己身上。

（一）首先着眼遏制

遏制战争是平时时期军事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和重要功能，不战而胜，是遏制战略的最终目的。要达到遏制的目的，就要以强大的实战能力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形式，示形造势，积极显示我打赢战争的强大实力和坚强意志，使任何敌人都充分认识到，与我作战必将付出巨大代价，得不偿失并惨遭失败，从而迫其放弃发动战争的企图。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发展水平的限制等诸多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从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着眼点上讲，从所要争取的最好结果上讲，我们不仅要努力遏制战争的发生，当对战争的遏制无法奏效时，

则要努力创造条件使战争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并坚决打赢。

（二）做好充分准备

要想遏制战争的爆发，从精神到物质，从战法到装备，从编成到训练等诸方面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但准备的基点，则根据国力的可能，必须立足于应付复杂困难的局面。一是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准备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同强敌作战；三是准备与联合对手作战；四是准备几个方向同时出事。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能量与战争爆发的概率成反比，准备得愈充分，制胜能力愈强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便愈小。如果对战争的危险失去警觉而放弃必要的准备，则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降临得便愈早。世界上近几年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是衡量战斗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落到实处，除了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军外，还应用高科技知识武装全军，适应形势需要，发展军事理论，千方百计把发展武器装备搞上去，科学地确立编制体制，改革教育训练，加速人才培养。

（三）审慎使用武力

核心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在使用武力前和使用武力中，要充分运用强大的宣传手段，讲清战争的正义性，对内激发全体人民爱国热忱，全力支援战争；对外争取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同情支持。有利，就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能持重待机决不随意从事；能创造充分条件后再战决不仓促上阵；能小战决不大战；能低烈度决不高强度；能速决决不持久；能一面作战决不多面用兵。有节，就是服从政治、外交大局，打、停、进、撤，完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指挥，一旦达成战略目的，果断迅速收兵。

（四）奇策多谋善战

要巧妙运筹，多谋善断，利用矛盾，灵活用兵。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我们深入研究敌战略、战术、技术的系统的弱点，认清敌我优劣短长，确立正确战法，选好战机，果敢起战，就能将敌调动起来，扬我之长，击敌之短。

（五）力求速战速决

速决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制胜的关键之一，我可把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与战役、战斗上的先机制人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战略上的主动权和战争的突然性，集中优势力量，使用精兵利器，实行前伸作战，连续高强度地击敌要害，尽量缩短作战时间，趋利避害，减少风险。

（六）多种手段并用

无论是遏制战争还是打赢战争，在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都要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法等一切有效手段加以配合，并辅助以其它各种有效手段，军事手段便显得愈加有力、有效。*

* 本文发表于《教学研究资料》，国防大学训练部，1997年第18期。

党的绝对领导是新时期 我军质量建设的灵魂

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曲折艰辛而又辉煌壮丽的 70 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军在七十年光辉历程中，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发展壮大，最根本的是靠党的坚强领导。”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结论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70 年的建军史，就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战斗，前赴后继，克服千难万险，不断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获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伟大胜利的威武雄壮的史诗，同时也是一部记录党指挥枪的光辉篇章的历史。在人民解放军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和一整套优良传统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灵魂和根本，是我军从无到有、成长壮大，顺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和源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我军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体现着我军无产阶级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基本职能的内在统一，是我军建设一切原则、方针和方法的总纲。它不仅由此标明了我们这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与其它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相区别的根本特色，也是确保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最根本的保证。

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个最基本的建军原则。而在理论上把这一领导作用提到“绝对领导”高度，并在实践中始终不渝、一以贯之坚持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加强我军质量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之点。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就提出了党独立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思想。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已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并通过了在军队中健全党的组织和确立一系列党的领导制度，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在红军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总结了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经验，提出了“共产党（对军队）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①，“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②“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③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并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方式和规章制度，从而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精髓，成为我军优良传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指导全军建设和改革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首先，他明确提出的“我们的军队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④的论断，从理论上深化了对新时期我军职能的认识，为我军建设与发展规定了总的方向；其次，他强调军队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4页。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①再者，他强调按政治合格第一的标准选拔和培养领导干部，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听党的话的人的手里，从而在组织上为保证我们军队“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②江泽民同志在担负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任后，反复告诫全党全军，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一定要讲政治，军队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97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又强调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是从我军所处的重要地位、担负的历史使命、还是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来讲，都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党的观念，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③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在深入学习和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纪念我军建军70周年之时，面对世界风云的变幻和高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面对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面对我军建设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重温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有关论述，总结我军风雨征程几十载的基本经验，更加深深地感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4页。

③ 1997年3月5日《解放军报》。

针，大力推进我军质量建设，顺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神圣使命，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这对于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形势，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要求

世界冷战格局刚要结束之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并十分敏锐地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①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暴力工具，“兵不顿而利可全”。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就必然同时加紧对军队进行渗透和瓦解。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和与我军人员接触增多的机会，利用占有高新科技的优势和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各种非法宗教势力和各种名义的所谓的“基金会”等组织，散布资产阶级治军之道，对我军进行思想渗透，特别是用“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所谓现代军队质量建设的“趋同论”来蛊惑瓦解军心。

“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建党学说和建军学说，是我们廓清军队与政治、军队与政党和军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4 页。

队与国家之间关系上各种错误思潮迷雾的有力武器。

首先，古今中外的任何军队，都是在争夺和确立国家政权的一定阶级、政党、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中诞生的。被誉为“兵学大师”、西方的“兵圣”的克劳塞维茨通过大量的研究认识到，战争的根本属性在于对政治的从属性。他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这一观点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进一步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矛盾两方面研究战争，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军队、战争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和本质。早在1857年，恩格斯就指出：“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 1870年，恩格斯又指出：“军队仍然是对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②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③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军队是为战争而建立的，而战争则是政治的继续，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进行政治斗争的特殊手段，是流血的政治，军队则是用战争形式完成阶级的政治任务的特殊组织，是一个阶级镇压一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它从阶级斗争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胎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有的是在反对封建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内战争中创立的，如英法等国；有的是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内战争中创立的，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342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197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美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军队，性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虽然不同，但它同样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在推翻国内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权、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双重斗争的需要中产生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均是如此。因此，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的纯国家的军队是绝对没有的。

其次，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都是由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代表本阶级掌握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的。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坚持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人民军队即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政治领导权和军队指挥权，并把它作为军队与党、军队与国家政权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这就是说，我们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但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军队决不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除了政治上的白痴和别有用心的人主动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外，包括一些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文官治军”，都是由执政党及其代理人集团牢牢地掌握着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它们成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制度，已经保证了执政党及其首脑的资产阶级性质，不论什么党、什么人执政，都是从根本上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的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但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本质上仍然是被

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着，为其资产阶级政府的内外政策服务的。任何个人包括高级将领，一旦与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图不一致，就会马上被撤职。如美国的麦克阿瑟在侵朝战争期间因不执行总统的战略决策意图，即被杜鲁门总统撤职。“文官治军”同样没有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政党，使军队成为所谓的纯国家的军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外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不需要各自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①毛泽东看得最透。东西方国家在阶级、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的形式上，虽有某些差别，但实质都是坚持统治阶级及其执政党对国家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非党化、非政治化的纯国家军队是根本不存在的。

再次，在巩固自己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任何军队从来都是站在领导自己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一边的，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激烈化，直至发生公开对抗和冲突时，任何军队从来没有“中立”过。列宁曾明确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不要让军队参与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②美国“武装部队与社会问题大学校际研讨会”首届会议主席、著名社会学教授贾诺威茨，在其著作《军人的政治教育》序言中也曾客观地指出：美国军队一向不愿意公开承认在部队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一向声称“不介入党派政治”，保持军队的“非党派性”，然而一旦国家赋予军队以军事行动，就不能不使军队了解军事行动的政治目的，“军队指挥官和社会科学家考虑的实质问题是：一旦政治领导人作出了实质性的决定，应该如何发挥政治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

② 《列宁军事文集》，第76～77页，战士出版社，1981。

识形态的作用？”^① 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曾几十次动用美军对付国内手无寸铁的有色人种甚至白色人种的和平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1969年，美国政府派兵镇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示威。当法国的一位记者问该州州长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时，这位州长直言不讳地说，有可靠情报证明学生幕后有共产党操纵，我是镇压左派。这种造谣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只要有可能危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动用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就在1992年5月初，洛杉矶等大城市，因为司法不公而被激怒的黑人和部分白人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布什总统立即命令联邦军队、州自卫队和警察大批出动镇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军队，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统一，为保护人民的和平劳动与安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要毫不例外地介入国内的阶级和政治斗争中去。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据宪法赋予的对内职能，在党的领导下，1959年平定西藏上层奴隶主的武装暴乱，1989年平息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

因此，阶级性、政治性、政党性是军队的本质特征。军队的性质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和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军队的行动受一定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军队的建军原则和道德规范与一定阶级、政党的政治要求相一致。任何军队都与一定阶级及其党派的政治利益、政治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执行一定阶级及其党派政治的武装集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现代国家军队的政治本质和一定政党的从属性等问题上决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

^① 《军人的政治教育》，第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著名论断。1871年9月，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武装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便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①和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的论断。列宁则进一步指出：“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残余的军事力量所必需的”^②？“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使用武器，拥有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③列宁还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指出：军队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是由丰富的共产党员这支先进队伍领导着的。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和建党、建军实践来看，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无论是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是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巩固和壮大无产阶级的政权，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领导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人民军队领导的核心力量。我们人民军队，无论是在夺取还是巩固国家的政权中，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工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民军队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才能保证自己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西方敌对势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是对我国实现“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目的无非是想要我们这支人民的军队改变无产阶级性质，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放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政权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第362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② 《列宁军事文集》，第40~41页，战士出版社，1981。

③ 《列宁军事文集》，第294页，战士出版社，1981。

根本任务，进而复辟资本主义。“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谬论曾像洪水猛兽般地闯入前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中，吞噬着军队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机构，使党组织在军队中撤出、涣散和消失，从而使军队中失去了党的组织基础和精神支柱，使无产阶级军队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中失去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决定性的职能作用，最终也使军队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属性。昔日不曾被希特勒的百万铁骑所征服而称雄世界的苏联红军，却被西方敌对势力所演变瓦解，由此可见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资产阶级治军之道对无产阶级军队影响之大，危害之烈。这种令人震惊的结局很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不仅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实践上是完全必需的，而且在我国根本大法《宪法》以及《国防法》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 1982 年宪法及 1993 年宪法修正案的序言中，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国家及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明确了各级政权组织，包括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的工作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毫无疑问，这也进一步明确了党对人民民主专政主要柱石的武装力量——人民军队的领导地位。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十四大还在党章中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它武装力量的领导。”这就是说，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绝对的，不仅是政治、思想上的，而且是有法律规定的组织领导做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 1982 年的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负责。设立国家中央军委，以法制的形式把军队的领导体制纳入国家领导体制，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矛盾，并且是完全一致的。第一，宪法的序言中已经明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第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经我党与民主党派协商经人大通过后，又成为国家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这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中共中央军委作为党在军队中的最高组织，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绝对领导；国家中央军委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对全国人大负责，这就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完善了国家体制。第三，设立国家中央军委后，党领导军队的各项制度包括各项具体工作制度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与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旨在取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所谓的“军队国家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此，设立国家军事委员会，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没有丝毫的改变。相反，却便于我军在非常时期迅速转入战时领导体制，胜利完成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对外职能；便于对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依法协助完成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对内职能；也便于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样也更能体现我军是党的军队，同时又是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完全一致性。

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应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这样一句警言：“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来看，放弃共产党对国家军队的绝对领导，搞什么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6 页。

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则必然给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党对军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是反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永不改变的根本要求。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永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高宗旨的根本特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我军全体指战员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是我军区别于所有旧式军队的根本特征。这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军指战员自觉接受党对军队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作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大业的不断深化，给全党全国人民包括我们人民军队带来许多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的观念，给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带来许多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必然给军队思想建设带来一些新的情况，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第一，市场经济的自身弱点有可能给我军官兵思想带来消极的影响。我国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打上市场经济的烙印。市场经济机制客观上要求以经济为核心，把追求各自物质利益、获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作为自身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此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竞争性和交换性等。这种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和实际运行，必然产生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等价交换、注重实利、优胜劣汰等思想价值观念。这些行为和观念，在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领域中，无疑是正当的。但它一旦逾越经济活动领域，甚至毫无节制地扩大到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社会精神活动领域，必将使人们的价

值取向发生变化甚至产生扭曲。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军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以及引发的社会消极面，如市场经济的趋利原则所诱发的“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所滋长的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所引发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也都会反映到部队的精神生活中来，对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程度不同的冲击。第二，随着我国进一步开放，随着我军与外军交往的进一步增多，西方国家各种腐朽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军官兵产生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特别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更是一派繁荣景象。党中央坚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人民群众也保持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但是，西方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不可避免地会侵入到我国的文化和生活等领域，一些地方少数人追求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现象也相继出现，并给我军官兵带来一定的腐蚀和影响。江泽民同志曾在一份重要批示中深刻指出，对沿海地区“酒绿灯红”要十分警惕，防微杜渐，千万不可麻痹大意。改革开放后，军队中特别是驻沿海和特区部队中极少数人被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腐蚀，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实告诉我们，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批示，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本色、巩固和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一个重大课题。第三，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遗留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我们军队中来。第四，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等物质利益的反差也会给我军官兵带来新的影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

步伐，这对进一步坚定我军官兵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这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军队官兵的亲属；国家财力有限，军人的工资待遇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一些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生活困难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军人家属随军工作难以落实，军人对转业退伍后工作安置有所忧虑；加上社会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利益分配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可能更快地富裕起来的反差，也会使少数官兵产生“当兵吃亏”、“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亏”从而淡化我党我军宗旨的思想。

要解决上述新问题，没有什么别的法宝，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对军队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我们这支革命军队，具有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和人民军队本色的光荣传统。早在我党建军初期，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十分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部队，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强调人民军队要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也十分强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十分重视，先后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如多次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军；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艰苦奋斗 4 个方面的教育，打牢部队的思想基础；把我军办成一个培养人、教育人的大学校、大熔炉；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走在全社会的前列；结合新的实践，丰富、

发展和光大我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等。这些重要指示和论述，是江泽民同志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宏伟蓝图的全面规划，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按照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和论述，切实加强党对军队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就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和革命化建设第一位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坚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军的优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来是我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的源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历来是我军团结奋进、无悔无怨高尚情操的原动力。面对和平环境、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决不能重蹈林彪、“四人帮”搞“突出政治”的老路，但也要十分注意防止轻视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强调物质利益，甚至想把资产阶级军队中一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把地方搞经济管理的一套手段和做法，机械地照搬到军队中来的倾向。对社会各种错误思想和思潮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冲击，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部队，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地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才能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不改变，才能确保官兵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如果听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甚至泛滥，军队建设和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最终则必然背离我军的宗旨。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战争观的一项基本原理。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因此，

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观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依然没有过时。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依然熠熠生辉。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能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军队，使我军获得最深厚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的支持。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平时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危险关头和战时，为了人民利益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也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我们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伟力才有最深厚的根源。战争为了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战争的胜利成果归于人民，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实现得道多助，赢得战争的胜利才会有根本的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与我军的宗旨、职能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础上结合起来，构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特殊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我军共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固然，在新的世界军事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等要发生重大的发展和变化，现代高技术条件和战争形态的变化，向传统的人民战争的具体作法提出了挑战。我们要明确人民战争主要是指一种指导思想而并非只限于某些作战模式，因此需要我们在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确立新观念，解决新问题。以往开展人民战争中那种举国迎敌、全民参战的局面已难以出现。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我人民群众直接参战的机会虽然减少了，但其作用将更加突出。如凝聚着人民群众力量的综合国力对战争的支持和后盾的作用；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科技实践活动对战争的支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高质量

后备兵员，特别是高技术战争所急需的有关技术人才对战争的支援；及时向军队提供足够数量的精良武器装备；参加各种军事运输、救治伤员等各种后勤保障活动。如果敌人胆敢踏上我国土，人民群众既可以袭扰疲惫打击敌人，广泛搜集战场情报，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又可保卫地方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了人民战争思想依然是我军质量建设和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根本法宝。因此，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对于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也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的根本保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无条件性和直接性。中国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既不是雇佣关系，更不是对等关系。军队必须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主张为主张，无条件服从党的指挥，任何时候都不能打自己的旗帜，向党闹独立性，更不允许向党争兵权。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领导着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但党对政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不同，党对各级政权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政府的领导方式是：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并通过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具体组织实施，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体现和实现的。而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绝对的直接的无条件的垂直领导，其间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军队中的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领导和指挥所属部队。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先，在组织上就是要把军队的

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未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授权，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其次，坚持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如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团以上部队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再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至高无上的，它具有唯一的权威性和绝对的排它性，因此，严令禁止除共产党和共青团以外的其它任何党派和团体在军内发展组织和进行活动；未经相应政治机关批准，军队成员不得擅自参加地方群众团体，不得成立军队条令条例规定之外的任何团体和组织；也决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和社会势力组织任何形式的武装力量和准武装力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军建设的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官兵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但也使军队党的建设遇到了不少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随着由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高度计划经济向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的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职能由过去的直接管理变为宏观指导，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这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的同志却简单地把军队工作与地方经济工作进行类比，错误地认为部队统得太多，部队工作也应像地方工作那样进一步放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有所削弱。由于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原则，以及对地方经济改革中“敢闯”、“敢试”精神的片面理解，有的同志淡化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意识，导致了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倾向。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松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也就无法谈起，就势必影响我军的质量建设。

我军是担负着特殊使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必须有严格的铁的纪律作根本保证。铁的纪律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战斗力，是内部团结的强大凝聚力，是完成各项艰巨任务的巨大推动力。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都十分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毛泽东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说：“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①江泽民同志把“纪律严明”作为“五句话”总要求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我军的建设和改革中，我们固然要研究和借鉴地方经济改革的有益经验，以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部队军事训练的生机和活力，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益，使我军的质量建设更加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但这种研究和借鉴，绝对不能简单、盲目地照抄照搬地方经济改革中的具体措施和作法。研究和借鉴地方经济改革有益经验，应着眼于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改革越深入，开放越扩大，经济越发展，我们军队的纪律就越加强。纪律尤其是我军铁的纪律，不仅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和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具有很严格的强制性。绝对不能把国家经济活动中生产经营单位的商品交换原则和自主权原则引入军队建设和部队生活中，从而降低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涣散部队的组织纪律，消蚀部队战斗力。军队执行纪律是决不能讲价钱和打折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听招呼，各行其是的现象决不允许发生。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在跨世纪的重要发展时期，并且迈出了实现社会经济改革的决定性的步伐。纵观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1页。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举措。要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令必行，禁必止。我们只有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党的组织纪律和军队特有的军事纪律，才能确保政令、军令畅通，我军才能无往而不胜。

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正确履行军队职责，胜利完成我军历史使命的根本途径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进一步走向缓和和向多极化发展，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世界决不太平。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一些军事集团在扩大，军事同盟在加强；超级大国仍千方百计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它国家的命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军事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在两极格局时期被掩盖的诸多矛盾不断凸现出来；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有增多的趋势。我国周边也存在不稳定因素。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竭力挑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保持在我周边地区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活动；并始终未放弃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战略，以各种借口和方式，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台湾的分裂势力。台湾当局继续坚持“弹性务实外交”、拼命“拓展”所谓的“国际活动空间”，岛内“台独”、“独台”势力活动十分猖獗，气焰日渐嚣张，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危险动向，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我国与周边一些邻国存在着较大面积的陆海疆争端，那些在非法侵占行动中获取既得利益的国家正在谋求其侵占行为固定化、合法化，同时纷纷扩充军备，并力图使双边性质的争端“国际化”，形成联手对我局面，使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斗争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我周边邻国包括某些强邻未来政治、军事的发展动向值得注意，对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日本军国主义灰烬的复燃有加剧趋势，并与美国加强军事同盟关系，这已引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尝侵

略和奴役苦难的亚洲许多国家的警惕；朝鲜半岛潜伏着矛盾和危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蔓延和渗透，可能影响我西北地区的安全。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要履行好我军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的神圣职能和历史使命，仍然任重而道远。

做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任何时候都具有对外抵御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对内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职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我军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对内职能。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①我军之所以要担负巩固人民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职能，是因为，第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还占有强大的优势，国际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渗透，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手段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第二，我国的剥削阶级虽已消亡，但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的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并未停息。第三，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会进行民族分裂和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第四，台湾问题仍未解决。总结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与国际上的敌对势力遥相呼应，他们总是伺机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而蠢蠢欲动，以借助外部势力进行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破坏祖国统一的各种罪恶活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顺利完成我军捍卫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神圣使命。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在能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长治久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对我军寄予重托与厚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针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路线政策对头，300万军队忠于党。江泽民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讲，只要300万军队听党指挥，我们就能顶天立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我军所担负的对内对外的繁重新任务，对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不辜负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殷殷教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划清重大的理论是非界限，不断增强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地听从党的指挥，才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探索我军质量建设道路，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特色

当前高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正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着军队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在未来的战争中，敌我双方都将尽可能地使用各自拥有的高新技术手段，在陆、海、空、天及电磁战场展开空前激烈的对抗。信息化、多能化、一体化的武器装备，创新的军事学说，和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的编制体制，给我军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加上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在较长时期内与发达国家之间还会有较大的差距，我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在一

个较长时期内还将处于相对落后的劣势状况，使我军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自觉贯彻邓小平“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既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全党全国的中心，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从而为改善我军装备奠定更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又能充分振奋有所准备，有所发展的精神，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大力推进我军质量建设的道路上，应该防止两种倾向。

一方面，防止片面认为“以劣胜优”是我军的传统和法宝，忽视对高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忽视对先进技术和武器的研制和掌握，忽视对变化了的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形态、作战样式的研究，忽视对新的战法和变革编制体制的研究。毛泽东早就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技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①抱着过时的传统观念和战法不放，拒绝研究新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战法，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根据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形势，适时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在军队建设上实行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才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把高科技战争吹得神乎其神，错误地认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59～360页。

为现代技术条件下是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时代，忽视人的因素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泽东作出的这一论断，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中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邓小平在 1977 年就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一切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① 江泽民同志在 1993 年也说：在研究战略方针的时候，我们总是再三强调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论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或是在抗击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同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军在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的较量中，我军武器装备始终处于劣势，甚至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我军都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劣胜优，百战不殆，是我军具有为祖国民族而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直至贡献生命的理想信念；具有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种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革命精神，是我军政治质量和战斗力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连许多有见地的资产阶级军事家都承认并重视研究的。还是那个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贾诺威茨在反思美军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失败时说得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战争精神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政治训练成了战略上的财富，成了“人的因素重于武器”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就是用这种战略打败了国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77 页。

党和日本军队，打败了她的一切强大对手。

资产阶级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强调人的因素，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性质和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局限，决定了他们所讲的人的因素与我们讲的人的因素有本质的根本不同。我军的质量建设既包含着一定的军事质量，也包含着一定的政治质量。我党、我军十分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正确的理想信念，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和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军武器装备与可能面临的强敌相比，仍将处于劣势。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进一步坚定用现有武器装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信念和决心。应正确认识人与武器的关系，坚信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先进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决不能代替人的创造性思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靠人探讨和发现，高技术战争仍然靠人来指挥，现代武器装备靠人掌握和使用，技术越复杂，对人的素质要求就越高，战场上的机智勇敢的精神靠人去发扬和体现，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更需要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我党我军所强调的有着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彻底的革命牺牲精神的人的因素是我军固有的独特的政治优势，是我军区别于现代西方国家军队的最根本的特色。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也是敌人所最为惧怕的。当我们在十分重视和强调军事高技术和先进武器装备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中的作用的同时，决不能忽视我军特有的克敌制胜的最根本的精神力量。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指标的竞争新态势。我军的质量建设与西方强国质量建设有许多相同之处，毫无疑问，我们要引进、借鉴他们的新技术、新经验和新战法，以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中，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

动下，注重质量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发展的共同趋势，但这决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军队质量建设发展道路是“趋同”的。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本质上信奉的是“唯武器论”，是“技术决定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国家积极防御战争的正义性质和战略方针，决定了我军质量建设的最本质特色，就是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的因素第一，就是按照江泽民同志要求的，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和高科技知识同时武装全军。两个武装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和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它既反映了当今世界军事革命发展的普遍性，又体现了我军质量建设的特殊本色。它既反映了新的形势和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对我军质量建设的客观要求，又揭示了高技术条件下我军质量建设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军队党的建设，通过军队各级党组织艰苦细致的工作，认真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和要求，使全军指战员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牢固坚定地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以劣胜优”思想，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立足现有装备，客观、全面、准确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长劣短，确立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法，改革编制体制，学习高科技知识，熟练掌握和运用手中武器，全面提高军政素质，不断把我军质量建设推向前进。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昂士气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懂得现代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过硬的优秀指战员不断涌现，有中国特色的质量建军就必然成绩斐然。

在确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过程中，我们还应科学地分析敌优我劣。我们所讲的敌优我劣，是指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而言的，但也不能把此绝对化。敌并不是一优俱优，我一劣俱劣，我们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总体上，我们武器装备不如敌

人，但具体到每一个战役、战争上，我则可运用先进战法，相对集中优于敌人的火力，在一定的时机和地点拥有压倒的优势。高技术武器装备也有其弱点，我完全可以以己之长击敌之弱。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心理、文化、外交等诸方面因素的全面抗争，战争胜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仅要看到军事因素，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作用，还应看到我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看到我军强大的政治优势；有人民战争的法宝、优越的地理条件等深厚的战争潜力等。而霸权主义者如果胆敢以武力干涉我国内政，分裂我国领土，将有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根本性的难题。只要我们切实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扎扎实实做好军队的各项工作，我们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以劣胜优，将是历史的必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军队是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从事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永远是党的驯服工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任重道远，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就任重道远。再过两年多，我们将庆贺悠悠千年才能出现的盛事——又一新年，又一新世纪，又一个新的千年的同时莅临。让我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去迎接宏伟壮丽的崭新的 21 世纪。*

* 本文发表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军队质量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年征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年 8 月。

论“四快一慢”战术的实效性问题

“四快一慢”战术是林彪在 1947 年夏抛出的。什么叫“四快一慢”呢？林彪的解释是“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大战果要快，追击要快”，“总攻开始时间要慢”。林彪又说：“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一切为了慢”，并说什么，“各级指挥员都要了解四快一慢”，它“是各级指挥员共同的原则”。林彪既然如此重视“四快一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林彪所谓的“四快一慢战术”究竟实效性如何。

头脑制造的“快”“慢”

毛主席指出，要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我军的种种战术，“有时机、地点、部队 3 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得其时，做到攻击时机的适当呢？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它在不停地运动、发展和变化，参加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所以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

不相同的。“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概然性’。”向敌前进、扩大战果、追击等是快还是慢，总攻击开始的时间是早还是晚，这里都有个时机问题。军事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正确的攻击时机只能从战争实践中来，要善择时机，得其时，就必须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客观情况，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之间的关系着眼，审时度势，灵活地掌握正确的攻击时机。“快”或“慢”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必要和周到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必要的侦察，反复思索等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绝不是凭主观想象，机械地规定它一、二、三、四条所能奏效的。

林彪以“慢”字为中心的所谓“四快一慢战术”，根本不看战争的具体情况，不看战争的发展变化，而把战争看成是僵死的东西，主观臆断地机械地规定这个快，那个慢，这就完全抽掉了正确战术原则的客观现实基础，否定了战术原则来源于战争实践这一基本原理，因而也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比如，“向敌前进要快”，这也要看情况。平津战役时，为了稳住华北敌军，毛主席指示正在顺利发展的淮海战场上作战的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在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如果淮海战场不管全国战场之需要，搞什么“扩大战果要快”，急于歼灭敌人，就有可能把平津之敌吓跑。再如“追击要快”，这和林彪“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中，对退却的敌人，就要打莽撞战是一样的货色。敌人退却有多种情况：不否认有被我无情打击下，狼狈逃窜的；但也有以退却为诱饵引我上钩的等等。就是敌在溃退中，遇到新的情况，还会起变化，如援敌突然来临，退敌就会重新防御，甚至变退为攻。这怎么能不

管三七二十一快追就是了？“总攻开始的时间要慢”的说法更是荒唐，“四快一慢”的要害正是在这个“慢”字上。林彪说：“攻击准备时间必须超过战斗经过时间。”攻击未开始，战斗未打响，不知这次战斗要打多长时间，那么，准备多长时间才算超过了战斗时间？林彪又说：“一个战斗至少要有4个钟头的准备时间。”由于各个战斗的情况不同，有的准备需要时间长些，4个小时可能不够；有的则需短些，准备时间用不了4个小时。准备时间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定，这怎么能用一个具体数字来限制呢？攻击开始的时间决定于战争或战斗的客观实际，要看战争全局的需要。关键在于快要快得合理，慢要慢得正确，打早了或打晚了都是错误的。林彪不顾时间地点、敌情我情等情况变化条件，呆板地规定这个“快”，那个“慢”，正是把战术原则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正是他“从主观到客观”，“用主观想象来对付客观条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所决定的，“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林彪在其笔记中曾写道：“战术，不求彻底，但求能应付当时局面，即是骗过一时。”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四快一慢战术”在内的“六个战术原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

包打败战的“战术”

林彪在贩卖“四快一慢”这一黑货时，曾大言不惭地说：“只要记住四快一慢，包打胜战。”果真如此吗？否！我们说，“四快一慢”是包打败战的战术。

恩格斯指出：“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正如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

毛主席也指出，“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战机不是僵死的，它在不停地运动、发展和变化，它依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可能存在，又依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可能消失。我军基本的作战方针就是歼灭战。全歼和速决是密切联系着的。战机成熟了，就要“兵贵神速莫迟缓”，就要不失时机地向敌人发起突然而猛烈的进攻，只有乘敌之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才能打敌于措手不及，置敌于死地，达到全歼敌人之目的。如果战机到了，还在慢慢腾腾、懒懒散散地做什么攻击准备，不去发起猛烈的进攻，在这之中，敌人一经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就会采取一切手段，力争改变其不利地位。因此，我们的任何迟缓都会失去全歼速决的有利战机。林彪强调什么“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一切为了慢”，这就完全违背了我军作战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放弃有利战机，使本来好打之敌，变成难打之敌；使有把握之仗，变成无把握之仗；使原来能打胜的仗，变为失利的仗。林彪还说什么为了慢，就不要怕“敌人工事加强了”，“敌人增援”，“敌人跑了”，只要准备好了，照样能歼灭敌人。谁都知道，敌工事加强，敌增援，敌跑了，都会给我军攻击或歼敌增加困难，甚至导致战斗的失败。林彪所说完全是欺人之谈，这种说法是林彪用来为自己消极避战制造理论根据的。

毛主席指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这是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而得出来的一条基本作战原则。我们要求每战力求有准备和有把握，是以积极歼敌为指导思想的；而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却是以消极避战为出发点的。达到歼灭敌人“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我们所说的有准备，和不

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等是辩证的统一的；而林彪却把准备与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等条件对立起来，把准备充足这个条件绝对化，当成取得胜利的唯—条件。我们主张的准备和把握的统一，最终要适时发起攻击并歼灭敌人；而林彪所说的“准备”却是以“慢”作为战机的标准，公开宣扬军事保守主义，放弃战机，失去了有把握的条件。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与毛主席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让我们再来看看林彪要在“四快一慢战术”的“慢”字下干什么，就可以进一步看清林彪“四快一慢”战术是包打败战的战术。林彪说：“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林彪拚命鼓吹“四快一慢战术”，是为了“包”其推行“一点两面”黑货的。大家知道，“一点两面”是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核心，他鼓吹“一点两面”，是主张分散兵力，反对集中兵力；贩卖一面平推，反对四面包围。其实质是主张打消耗战、击溃战，反对我军打歼灭战这一基本方针的。林彪提出“四快一慢战术”，就是使其有充分时间推行“一点两面”，按照“一点两面”部署兵力，“包”把敌人赶走或放走。可见，林彪的“四快一慢战术”决不是包打胜仗的战术，而是包打败仗的战术。

反对党的领导的险恶“主意”

既然“四快一慢战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行不通，那么林彪为什么还死死抱着这条“老主意”不放呢？这里有着他的险恶用心。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指挥员，都必须懂得在战争问题上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

要这个道理。局部服从全局，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党我军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把我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可靠措施，也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局部和全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战争中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有时全局需要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而有的局部却还没有准备好。为了全局，没有准备好的局部，也必须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投入战斗。反之，全局不需要，即使局部准备的再充分，也不能发起进攻。而林彪却别有用心地说：“当下级的要掌握四快一慢的原则”，“上级是上级的事”，“没准备好不执行命令，不打是对的”，“反正我要准备好才打”。这就完全暴露了林彪公然反对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的丑恶嘴脸。如果按照林彪的“四快一慢”，不照顾我方、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需要发起进攻的时候，迟迟不发起进攻，甚至玩弄阳奉阴违的花招，“用第二梯队的一部分兵力来佯攻”，欺骗上级，对抗上级的命令，这就必然打乱全局的作战部署，破坏协同一致的作战行动，增加我军伤亡。林彪的这些东西，完全是剥削阶级军队的一套恶劣作风。1947年7、8、9三个月，全国各个战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战略反攻，而林彪却不顾战争全局，擅自决定主力部队大休整，不配合全国的战略进攻。林彪的行动对自己的“四快一慢”作了最好的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散布“四快一慢”的时候，正是我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一批大中城市，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攻坚能力大为提高。我军与蒋介石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毛主席、党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适时地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号召我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为了保证战略总反攻的顺利进行，又进一步强调加强党

的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就在这种情势下，林彪抛出“四快一慢战术”，并一再强调“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这不是明目张胆对抗毛主席战略进攻的伟大战略部署又是什么？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战场指挥又是什么？毛主席、党中央多次指示林彪必须迅速南下北宁线，迅速攻克锦州，封闭蒋军在东北境内，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各个加以歼灭，林彪一面惊呼“东北敌人战斗力强，难打”，一方面借口没有“雨具”“粮食”，并借口“准备”这些东西，迟迟不肯南下。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断然拒绝南下北宁线作战。就在第二天，他在哈尔滨的军事会议上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上面对下面的一贯传统是‘催’”，“最怕催命鬼”，“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没准备好就不打”。什么“老主意”？林彪的“老主意”就是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战略反攻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为了反对毛主席、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战场指挥，就是为了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分裂我党我军，在东北搞军阀割据。由此可见，林彪的“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的“老主意”，完全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是同我党从根本上推翻蒋家王朝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林彪想用“四快一慢战术”“应付当时局面”“骗过一时”，但所得的结果和自己的愿望相反，“四快一慢战术”却成了我们学习的反面教材，成了批判林彪反动军事路线的绝妙靶子。*

* 本文发表于1975年2月28日《新疆日报》。

第二编

小 圃 集

i 第一部分 i

哲学社会科学散论

新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①

我们即将叩响新的一年、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大门。在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时刻，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资源、政治和军事诸条件，也取决于各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正确与否。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则是制定正确政策和决策的最深厚的基础。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是迫切需要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认真而深入的探讨，并作出正确回答的时代，因而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代。

一、面向 21 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的和总的任务，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整个事业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我们必

① 本文为作者在 1999 年 11 月“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讲话摘要。

须在实践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但是实践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新的实践总会产生新的理论，新的实践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因此，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从中提炼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既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又是庄严的使命。改革开放到现在 20 年时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组成已经 10 年。因此，要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必须认真总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历史性实践。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决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口号，也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或拘泥于个别的结论，而是要完整、全面、准确地理解，更要善于着眼于运用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敏锐地发现、科学地回答、妥善地解决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

二、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

20 世纪末突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侵略科索沃的战争，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21 世纪将既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大发展的世纪，也是大变革、大动荡、充满各种挑战、危机和不稳定因素的世纪。21 世纪的世界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这种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必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为像中国这样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都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这一角度看，21 世纪也必将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大展宏图和大发展的世纪。

①就世界范围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同时仍将是 21 世纪存在的两大问题。首先是和平问题。我们现在是处

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现在的世界格局有没有发生变化？21 世纪初直到 21 世纪前二三十年，世界的走向将会是什么样的？当今世界制约战争的最有利因素是什么？我们如何张扬有利条件，消弥不利条件，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以继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的学者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那么人类有史以来，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共 10 年外，是不是都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呢？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还是别的什么？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呢？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新干涉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还有新的发展，世界的和平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是，新的世界大战在近期内可能打不起来，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也决不能反应过度。再说发展问题，由于真正公平、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没有建立，南北问题没有解决，世界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其国家内部，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材料，当今世界上人类总数 1/5 的最富的人口消费了世界上全部商品和服务的 86%。而占人类总数 1/5 的最贫穷居民只消费世界财富的 1.3%，几乎只有 30 年前的 2.3% 的一半。就连美国，虽然它的整个经济得到相当的发展，但是，与前些年相比，有相当一部分人仍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这一问题在 21 世纪将如何发展、能否得以有效解决以及如何解决，这是世界性的另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同志强调，当前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都与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有极大的关系。

我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研究和平与发展问题，就必须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交流、合作与团结。

②对新帝国主义的新霸权主义理论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套用一下毛泽东同志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说法，那么可以说，凡是要侵略一个国家，总要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入侵南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有限国家主权论、合法的人道主义干预论不仅是美国鼓吹，英国、法国鼓吹，连我们的一些朋友也相信这种宣传，几乎要形成全球性的所谓“共识”。戳穿这些理论的荒谬性、欺骗性和侵略性，对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和进攻进行有力的反击，无疑是我们神圣而又重大的任务。

③国际问题研究与我国国际战略问题和周边安全环境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十分重视其国际战略研究，出版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著作如《大战略》、《大趋势》、《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大失败》，另外还有《历史的终结》等一本接一本。其中对我接触——进行和平颠覆，对我遏制——进行打压的战略目的和策略手段都是直言不讳的。任何正直的有良知的中国学者特别是党员学者，对此决不能无动于衷。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世纪，整个世界有可能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因此，我们在研究制定国际战略时，是否应同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严峻情况这一面？我们预先有所准备，就能恰当应对。即使有惊有险，也能化险为夷。

④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知识创新大发展和经济全球大发展的世纪。而这种大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跨国公司和以资本自由流动为核心的金融全球化的大发展，相对于不同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如何科学地分析和评价这种大发展对于不同类型国家的利与弊，我国应采取的战略和具体对策？还有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联系和区别、知识与农业、工业经济的联系和区别，我们所讲的知识经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讲的知识经济的异同等问题。附带说一下，对知识经济提法本身，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提信息经济更为妥当。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除了一些学者所讲的理由外，是否还有：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都包括了知识的成份；如果提知识经济，一千年、一万年以后又该提什么经济？说现在知识和高新技术占的比例大，与一千年后相比，现在的这些知识和技术还不是小儿科？究竟什么提法更科学，应该是可以讨论的。

⑤21 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既存在着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的合作与竞争，又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根源于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必然性，因而，“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旧制度的竞赛和较量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必将最终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越发展、越发达，其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离社会主义制度越近。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对诸如这种斗争的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如何发展和完善，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等，也是新世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们还应加强对文明冲突论、第三条道路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研究，写出我们自己的力作。我们不仅要破，更要立，更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对 21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出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大任务

在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较长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产业结构、生产社会化、经营管理、企业制度、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未获根本解决，而且变得更加深刻了。世界经济中的南北差距的扩大，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发展差距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不断出现的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和新贫困化现象等等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表现。另外，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深化的表现，并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一切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是非常深刻和透彻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作的结论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现象。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现象、新特点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结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体系，有许多方面需要研究，例如：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因素，能否说资本家的利润主要是由科学技术带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真的过时了吗？怎样看待由高科技产业发展而

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良性循环”？马克思在工业经济时代作出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分析还有没有效？如何看待由资本主义产业结构重大变化带来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马克思的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是否已经过时？怎样看待生产社会化发展带来的“资本不再是个别资本，而是社会资本，全球资本”和由股权高度分散化而出现的所谓“公众公司”？怎样看待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而出现的“经理资本家”阶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将对世界社会主义发生怎样的影响等等。还有，就是如何认识美国的潜伏的经济、特别是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从1993年3月复苏以来，已持续了八年半。其主要原因是否是：①重视更新技术；②股市红利，从1992年1月的2000点上涨到1998年6月的1.1万点，上涨了5.5倍；③和平红利，苏联和华约解体后，从1990年以来美国军费少开支1万亿美元。因此，美国预算赤字1992年为2900亿美元，而到了1998年则有了700亿美元的盈余。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美国现在的股价与国民生产总值比达180%（1929年大萧条前仅为82%），内外债近6万亿美元。1994年以来，美国的外贸逆差逐年升高，1998年达2540亿美元。美国股市崩溃的可能性加大，若下挫10%，即为1.4万亿美元。我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已有多方面的联系。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很值得我们关注。

四、苏联东欧剧变经验教训的总结，对这些国家发展道路、成效、前景的跟踪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又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①本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它的剧变、解体。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及执政党指导实践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在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上

的经验教训，是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起步，并取得初步的成果，但由于历史事件还刚刚过去不久，大批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还没有披露和发掘，研究工作还需进一步深入，需要全方位、全过程地来总结、揭示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

②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不灵了，失败了？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斩钉截铁地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英国 BBC 电台最近在因特网上调查“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马克思名列榜首，远远高于爱因斯坦等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比拟的生机勃勃的伟大生命力。

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不会消失。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从苏东剧变的悲剧中开始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新的探索。1998 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死亡，今后将会继续证明它的正确性。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应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③私有化的道路能否走得通？俄罗斯按照西方理论家全面私有化模式的药方进行改革，改革 7 年不仅没有促使经济恢复和国家振兴，相反，却使经济面临全面的衰退。国内总产值累计下降 55%，工农业总产值累计下降 70% 和 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约 90%；内外债猛增到 1998 年的 2250 亿美元；人均寿命从 90 年代初的 64 岁减少到 1998 年的 59 岁；居民收入下降了 2/3，月平均才 40 美元。就连美国的报纸也承认，西方的私有化的馊主意，直接

导致了俄国普通老百姓的真正的灾难。

④西方所谓的民主化道路能否走得通？1995 年全俄共有 43 个党派参加国家杜马的角逐，1998 年全俄罗斯登记的政党、组织共 249 个；财团拥有大量的舆论工具，而普通老百姓没有舆论工具，又很少有代言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自 1992 年以来的 7 年内，俄国六易政府总理，七换总统办公厅主任，还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就是俄罗斯的所谓民主化的实践。

加强对苏联东欧的跟踪研究，第一，可以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第二，可以汲取教训，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五、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①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更大贡献。20 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突破性成果，对指导改革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深入，改革与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出现，难度不断增大。例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它的微观基础结构和运行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既促进微观创新，提高效率，又保持宏观上的社会公平？对当前的国有经济如何进行改造与调整，才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与效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怎样建立完善要素市场，并使包括证券、股票、期货等在内的金融市场尽可能的与国际市场既积极又稳妥地接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血液和关键，如何真正有效地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关系到我们整个经济的兴衰成败。另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什么样

的宏观调控体系？体制转型过程要经过哪些阶段，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和正确解决都需要综合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自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短缺经济结束了，防止通货紧缩，刺激内需，促进增长的任务取代了一直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核心地位之一的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这是建国以来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市场经济新问题，也是需要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加紧研究的问题。还有，加入WTO之后，我国所面临的很好发展机遇和十分严峻的挑战的应对。显然，上述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界都是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都需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大胆开拓创新。

②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已经到了攻关阶段，需要社会科学界从经济、社会、法律、政治等多方面进行联合攻关。我国国有经济（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在过去，国有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都作出了重要的和难以替代的贡献。近些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复杂原因，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效率很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而创新动力不足，没有市场竞争力。由于国有企业大多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建和长期运行的，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触及旧体制的根源，改革越深入难度越大。十几年来实践证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取得突破。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对国有企业数千万职工的利益结构进行调整，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下降，也会使得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脱离原来的轨道；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进一步的改革要考虑到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和承受能力。因此，深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社会科学工作

者进行不懈的努力，探讨出一条既能加速改革又能保持社会稳定的道路。

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重道远，社会科学界要将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基本方略。它的基本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各项活动都依法进行，即立法机关依法立法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各行各业和公民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是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由于中国封建主义制度延续的时间长，“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我们的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失误，致使法制建设十分薄弱，严重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大力加强法制，全面开始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发展；健全国家领导体制，推进机构改革；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发展基层直接民主；改

革立法体制，加强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切实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完善民事商事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加强司法机关建设，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法制宣传向纵深发展，全民法制观念和意识显著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和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同法律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在贯彻执行依法治国的方针上，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加以研究，比如：如何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如何防止和克服司法腐败问题；如何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如何使社会主义法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等等。

④依靠科教兴国，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需要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为了加速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总结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吸收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时期重大发展战略。

本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知识创新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日益高涨。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已经不再是人口、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而是科学技术实力和将现代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这一切又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能力高低的基础。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加快，人口迅速增长，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能源）的储存量日益下降，水资源日益短缺，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结

构和消费模式，使得世界走上了不可持续增长轨道。当代人的物质享受不仅对后代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而且破坏了当代人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全面探讨人类发展的价值和模式，并提出了多种新发展理论。作为“人口超级大国”的我国，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大多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改革开放 20 年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但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开采成本上升，经济增长的代价越来越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科技的快速进步和广泛高效应用，也就是说，科教兴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的实践一再证明，科教兴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突破。我们的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硬件技术的差距。因此，经济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是加速技术创新、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无论是哪方面的改革，都需要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支持。发达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 2~3%，而我国 1986 年为 1%，到 90 年代中期更下降到了 0.5%，且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科技投入，如何加速提高全民族素质，激励全民族的创新精神，提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如何处理好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关系，如何建立风险投融资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等等，都需要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进行紧密合作研究。我们即将进入 21 世纪，如何加快我国科教发展，全面地提高国民素质，加强全民应用科技和知识的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摆在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

科教兴国当然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在科教兴国战略中，

自然科学、教育领域的战略已有规划，并正在落实。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还不甚明确，也没有成熟的实施方案。这是否会较为严重地影响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面向 21 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发展问题。过去我们在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时，对其在道德、文化、思想、理论等基础性方面的作用比较重视，但对其在经济建设诸方面的重大现实作用注意不够。从实践来看，社会科学当中也有不少领域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收效大的特点。比如对加入 WTO 的决策分析及今后的跟踪研究，国企改革的研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研究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投入不太大，只要组织得好，拿出高质量的成果，对我国的发展和稳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目前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些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科学都非常重视，欧美日本等国投入很多，不少发展中国家投入也高于我国。乌克兰经济比较困难，1998 年其科学院国拨经费约占 GDP 的 0.6%，其中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部分的政府拨款约占 GDP 的 0.13%；1998 年匈牙利科学院国拨经费占 GDP 的 0.7~0.8%，其中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占 GDP 的 0.14~0.16%，而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拨款仅占我国当年 GDP 的 0.0026%。因此，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不仅研究确立科教队伍的规模、投入占整个社会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而且应研究确立社科研究人员与整个社会人口、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合理比例，确立社科研究事业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以确保社科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

⑤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端正党风，有效防止和遏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及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是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认

真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现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已引起广大人民群众의 深恶痛绝。腐败不消除，人民群众便会最终对我们失去信任，甚至将我们抛弃。要消除腐败，就要首先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搞好党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这一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着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

⑥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需要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正确的回答。诸如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宣传唯物论、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问题，如何有效解决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收入不合理扩大，解决农村负担过重，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问题，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

总之，在走向 21 世纪的时刻，国际国内需要我们研究的重大课题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然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随时都会觉得有无形的鞭子在抽赶自己前行，去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有关问题的思考

一

历史一再表明，是否重视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个执政党和统治阶级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

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延安时期走向成熟的，这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最大最高的成果。

建国 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重视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应该说，20 世纪最后 20 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最大最高的成果，就是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三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大致分布在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文科、党和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党校、军队等五大

系统，专职研究人员在 35000 人以上，而参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的教学人员达 26 万人以上。这一宏大力量，都直接或间接地为繁
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特殊
的重要贡献。

四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从民族振
兴、国家富强的角度作出的战略性决策。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这
一决策的重大意义，全国党政各级领导和全社会都要重视繁荣和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五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塑造人类自身的
强大思想武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先导，是塑造
民族性格、铸就民族灵魂、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重要手段。

哲学社会科学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社会发展规
律为己任，它应当以其高水平的优秀成果，在引导人们坚持正确
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发挥理论导向作用；它应当敢于探
索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难点、热点和疑点问题，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为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方
法依据。

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所说的“科学”当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旦形成新的理论，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实践产生巨大的作用。

自然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有赖于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的指导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自然科学技术要转化为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参与和运用。

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首先得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卷进的两个历史车轮，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倚重或者偏废一方，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应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七

大变革的时代，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时代，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因而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全党全民族的事业，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一事业中承担着特殊的责任。

面向 21 世纪，为全党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更大的贡献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雄心，立壮志，力争形成和光

大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反映时代精神的、能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抗衡的、在国际学术文化界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学派。

八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不可动摇的思想原则。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又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方针。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并不矛盾。在科学研究中坚持“双百”方针，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怎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是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①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和抵御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侵蚀，保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只有这样，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和发展。对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坚持，而决不能“淡化”。当然，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是要我们去照抄照搬，或仅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作抽象的推论，或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去代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具体的科学研究。

我们坚持“双百”方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和真理发现与发展的规律，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家成派的重大理论和学说都经过激烈的，甚至是长期的反复讨论、辩论和争论。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在学术界要提倡学术研究的自由，不要横加干涉。小平同志也说过：不搞争论。但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不争论”是有特指含义的，主要是指已经看准的，已经定下的，马上要付诸实施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作法。已经定下了，马上要做了，你还要争来争去，岂不是贻误时机？！对学术观点、科学探讨的分歧，小平同志历来主张自由讨论。因此，权力决不是真理的裁判。真理的裁判只能是实践。没有争鸣，惧怕争鸣，我们就不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也不可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也不可能克服谬误，战胜邪恶。学术研究和真理也会僵化、停滞和枯竭。

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科学研究单位的各级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应努力探索开启广大科学研究工作者创造精神、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和体制环境。

九

国家社会科学院当然要搞一点必要的应对性研究。但这决不是国家社会科学院的重心。国家社会科学院应当为党和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大战略、大思路、大对策和前瞻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院理所当然应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思想库和决策咨询库，理所当然应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

十

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不重视战略思维，就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导致生存危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长于战略思维，先后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战略科学遗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把中华民族的战略思想推进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思维的高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繁荣和富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随着 21 世纪的来临，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确立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四位一体的正确的大战略观念。

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谋求其经济、政治霸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规则”，并强行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如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为普遍价值而战”、“合法的人道主义干预”、“北约新概念”等等。这些国家的战略家们也积极配合，推出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各种新霸权主义理论，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提供战略和理论支持。尼克松写的《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写的《大失败》、《大失控与大混乱》、《大棋局》，基辛格写的《大外交》，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奈斯比特写的《大趋势》，托夫勒写的《未来的战争》，等等，都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国际战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美国在炫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大打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之战。美国的政客们和战

略家们把美国的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硬武器”，即指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另一种是所谓的“软武器”，即指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们把“软武器”的运用，即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作为其霸权主义的重要战略手段。经济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四位一体，相互呼应，相互支持，是其霸权主义的整体思维和战略。而其中，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先行，则是美国更为巧妙、更为根本、更为长远，也是最为险恶的一种战略。对此，我们必须绝对清醒。

最近，台湾的李登辉抛出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哲学。在这本书中，他除了鼓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具有“国家的主体性”外，还公然叫嚣什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國大陸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将大陆划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七个区域，实行分权分治”，即所谓的“七块论”。

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也都先后有人鼓吹中国要搞“十二块”、几十块等谬论。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七块论”的后台老板极有可能是美国。弱化、西化、分化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的战略图谋。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认真对待。

任何政治斗争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哲学观点之间的较量和斗争，战争无非是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视运用“软武器”，即其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为其战略图谋和根本利益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进行舆论欺骗和舆论引导。

因此，国际斗争和祖国统一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同时形势也表明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责任的确很重大。我希望也相信，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能够贡献出为捍卫我们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服务的国际战略理论的力作。*

* 本文写作于 1998 年 10 月。

积极发展新时期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①

1998 年 12 月初，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庆祝该院建立 40 周年之际主办，于广州召开了 1998 年度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这次会议除上海、江苏、辽宁等少数省市外，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负责同志出席。

这次联席会议，恰逢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家畅谈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巨大变化，一致认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这 20 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最快、学术气氛最活跃、队伍壮大最迅速、研究成果最丰硕和社会效益最显著的 20 年。

会上，各地社科院以“迈向 21 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主题，围绕社科院战略定位、机构设置和学科调整、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拓宽经费渠道以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等问题，畅所欲言，热烈讨论，交流经验，磋商设想，很有教益和启发。

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更加认识到：哲学社会

① 本文为作者参加 1998 年度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综述报告。

科学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在全面提高人类自身素质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家还谈到，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世界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国内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进入关键性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曲折的发展中也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大的发展。江泽民同志站在世纪之交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在党的十五大上发出的“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召唤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大家还就如何积极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全国社科界的联系、交流、协作和合作，加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规划

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现已形成五大系统：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二是高等院校文科系统，三是实际工作部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四是党校系统，五是军队中的社科研究机构。以上五大系统研究机构达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以上，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达27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一批直接面向社会市场需求的民办社科咨询机构及市场调查咨询公司。这五大系统在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宣部的直接指导下，相互协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一些容易出成果，出经济效益的热点问题存在重复立项，重复研究，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现象，而对一些周期长见效慢的难点问题，一些很少直接经济效益却有很大社会效益和事关全局的基础性研究却相对薄弱。这种状况与前些年经济建设加工工业中严重重复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不足的现象相似。近几年，国家大声疾呼并采取有力措施对经济建设加强宏观调控，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似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调

控，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得到健康发展。

二、社科研究事业必须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必须保留一支适度规模，吃国家“俸禄”的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若再继续高度计划经济条件下办社科研究的思路必然走入死胡同。因此，社科研究系统要改革，队伍要精干、高效，要注意面向社会，多方面开拓经费渠道。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尊重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注意保留一支规模适度的科研队伍。我国古代也讲究“养士”。一般地说，人们往往对马上用得上的眼前的对策应用研究相对重视，因此在政府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中，尤其应重视对以从事基础研究和中长期对策应用研究的社科院系统的保留。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确立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比重，确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整个社会人口，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合理比例，确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事业队伍的规模。这支队伍散去容易，聚拢培养却很难。

三、坚持遵守政治纪律、宣传纪律与贯彻“双百”方针相统一，进一步加强对重大实际问题前瞻性、预测性研究，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真正起到参谋助手作用

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必须严格遵守政治、宣传纪律，应十分注意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此同时，广大专家学者应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研究工作中，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内部讨论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互相切磋。坚持“双百”方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苏东剧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类重大事件，如果我

国社科界专家学者能够及时作出预报，给予科学的深入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重大问题前瞻性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四、要发挥社科研究机构和广大专家学者在党的宣传和对外宣传工作中的作用

最近，中央、地方新闻媒体中，社科专家学者经常露面，宣传党的各项大政方针，收效较好。另外，在外交斗争中，如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日本的军国主义等，在国内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等，都可以以研究机构或著名专家学者的名义发表谈话或文章。有时用这些名义的效果可能会比用政府名义或新华社、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更好一些。

五、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更好地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列宁曾说过，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江泽民同志也说过：“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姻，不仅符合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且有利于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出的综合性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可以多办一些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课程设置交叉的综合大学；鼓励研究人员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学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领导互相兼职，人员有计划交流；兴办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科研机构；国家重大课题立项、建设项目论证可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者专家共同参加等。

试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素质培养^①

作为一名立志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学，要做好为这一事业毕生奋斗的准备，注重培养和加强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综合研究素质。

第一，是要毕生热爱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这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社会功能有关，也就是说与它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关。社会上只有两门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一般思维规律的科学。所以我们既应该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作用，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创立、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中，在制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全面发展人类自身方面都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在世纪之交，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形势更加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比如说，苏东剧变以后，国际形势（或者叫世界格局）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学者认为，尽管发生了科索沃事件，但世界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现在依然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①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9 ~ 2000 学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有些学者认为，随着苏联华约的解体，世界格局开始或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21 世纪初，整个世界的走向究竟是什么？现在究竟是多极化发展趋向，还是多极化发生了一些逆转，单极趋向更明显？还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还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问题，还有知识经济的问题。知识经济究竟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是什么关系？还有世界大国的走向问题……。比如美国，它的经济走向和军事大国的走向，世界的经济形势里面的三大货币经济圈，美元、欧元、日元，将来是个什么发展趋势？21 世纪初甚至上半个世纪，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它的主体走向可能是什么情况？在我们国内，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企改革确实是个大难题，但是又是必须要解决的大难题，如何改革？如何走出困境？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问题等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所以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21 世纪，我们的党、国家、民族呼唤和需要的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深厚理论功底的、能够结合中国当代实际的、有创造性地回答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大学者。人生往往只能干一件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个大领域，需要我们穷其毕生的精力来完成这件大事业。

第二，要刻苦学习。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素质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又是关键，而提高政治素质首要的就是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们既然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理应学得多一点，钻得深一些。通过与各种学说、各种体系、各种思想和各种理论的比较，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最科学最严谨，最能说服

人最能掌握人，所以我们应多读原著。毛主席读《共产党宣言》一共读了150遍，《资治通鉴》读了17遍，这需要何等的热爱和刻苦！讲学习是讲政治讲正气的基础，只有通过讲学习才能讲政治讲正气，我们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才能有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其次是学习、钻研本学科的前沿知识，本学科的前沿有哪些新的进展，要始终盯住它；再次是学习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同时要注意学习近代中国百年历史，这百年历史很需要我们去认真学习；然后是党史的学习，对我们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要认真学习；最后是要适当地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学习是件很苦的事，但如果正确对待的话，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第三，要深入实际。书籍里记载的东西跟客观现实相比，那真是九牛一毛。现实的太阳最明亮，真正丰富的是生动活泼的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能真正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最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情绪，向他们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陕西省商洛县有一个扶贫点，在重庆、贵州、山西长治都有这样的点，为我们深入实际、了解国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如果不了解中国国情，就搞不好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当然，钻到书斋里面也可以做学问，但是这个学问与我们火热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往往相去甚远，得不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不到党和政府的更多的认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书斋学问我们也需要，但如果大家只做这种学问，中华民族没有多少希望，更多的还是要解决现实理论问题。

第四，要有严谨的学风。哲学社会科学如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个探求未知的领域。这既是一

桩追求真理的神圣事业，更是一件创造性的艰辛工作。它不仅需要一定的才智和天赋，更需要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钻研精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小平同志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受束缚，要敢于创新，勇于追求真理。在学术上要有自己大胆的追求，不要患得患失，不要畏首畏尾，与此同时，我们要切实研究，执著治学，千万不可浅尝辄止。要勇于探索，决不浮躁，更不要急功近利。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不要轻言创新和突破。恩格斯说过：仅仅是在一个简单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第五，要认真改造主观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党的理论干部，是人民的理论家，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每天都在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以自己的文章和观点来教育和影响别人。现在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深恶痛绝，那么精神的伪劣产品有没有？我们都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我们应该有什么责任？要生产好精神产品，就应该首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可能生产出好的精神产品。从血管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不可能流出血来，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所以无论是从个人不要犯错误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来看，都需要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要淡化个人功利，要看重我们的事业，要提倡奉献精神。当然，作为组织，作为领导，应该关心大家物质生活的改善，这个很需要。但是作为个人来说，需要我们在清贫寂寞的岗位上默默奋斗，默默贡献。我个人不赞成说社会科学就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科学只能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它需要通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来转化。如果说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它就有自己的市场了，不需要吃国家的皇粮，就跟中科院的一些研究所一样了。当然经济学科的某些分支学科也是直接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古学者皆清贫、皆寂寞，我们应该看淡一点物质生活。宋朝的辛弃疾曾经讲过“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能插几双勺”？还有人讲“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寐八尺”。个人的必要的物质财富、生活保障没有不行，但决不可刻意追求，孜孜以求物质财富，决搞不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其实，社会科学有最富有的精神财富。当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多少钱？列宁有多少钱？毛泽东、邓小平有多少钱？但是他们有巨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整个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马克思的财富，十月革命不是列宁的财富？我们富强的中国不是毛泽东、邓小平的物质财富吗？如果没有他们的精神财富，这些物质财富就可能没有了。通过主观世界的改造，要确立一个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财富。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处在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所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民族的希望。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相信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会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

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法轮功”现象引发的思考

李洪志及其控制的“法轮功”组织，利用一套歪理邪说欺骗群众，扰乱人心，犯下了一系列反社会、反科学、反人民、反政府的罪行。它同我们的斗争，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斗争，而且已经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由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果断的处置，广大群众对李洪志那一套歪理邪说进行了有力的揭发批判，才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也认清了“法轮大法”的危害，并同它划清界线，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事实证明，我国政治稳定大好局面的巩固发展、改革开放正确决策的贯彻实现，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有一个健康、团结、积极向上的思想环境。而“倡导科学、反对迷信”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性的环节。

一、大力倡导科学，弘扬科学精神

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法轮功”现象赖以生存的土壤，防止类似现象的再度发生，或将其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正如大家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的，首先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科学，包括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在内，总体上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指出，

科学活动的特征是“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而其根本方向和目的，则在于“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从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科学之于人类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不断地提供着我们所需要的关于世界各个领域的丰富知识和真理，更在于它代表和倡导着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类精神——“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全部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核心与实质。科学的这一本质必然要求人们，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反对唯心主义；坚持用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的无神论，反对在世界之外寻找原因的有神论；坚持尊重事实、尊重规律、从实际出发，反对无视客观存在、从意愿出发的主观臆造；坚持实践的唯一检验标准和理性的批判态度，反对任何迷信、武断和盲从。正因为如此，科学历来是反对各种迷信欺诈和精神奴役的最有力武器。而自从有了科学以来，反科学和伪科学则成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迷信、实行欺诈和精神奴役的最主要工具。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关系着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前途。因此，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的氛围，不能不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长期的和坚定不移的任务。

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是从两个方面对科学的挑战：一方面，他利用一些人科学知识的贫乏，肆意胡编乱造，用一大套伪科学、有神论的东西来进行欺诈。所谓“法轮大法”的整套胡言乱语中，涉及了宇宙天体、自然演化、生命起源、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乃至人体健康和心理卫生等五花八门的具体知识领域，尽管他毫无根据地信口雌黄，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唬住一些缺少科学常识的群众。这一教训说明了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善良的大多数人越是具备了相应的科学知识，才越能够揭穿和抵制伪科学的骗人把戏。

另一方面更具欺骗性的是，他常常借口科学上有某些似乎尚

未涉及、尚未解决的问题和领域（尤其是和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精神领域），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的地位，动摇人们对科学的信念，否认、排斥科学精神，为其宣扬迷信开道。我们知道，由于人类的科学知识和成果总是有限的，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总结的：人类得到的“已知”越多、越广泛，那么就会发现在它们之外、我们面对的“未知”也越多。因此人类将永远会有不能仅靠现有知识来回答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原则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发展，本质上是无限的。我们完全应该、并能够用科学的精神和手段去面对未知世界，探索未知世界，不断扩展和深化科学知识体系。科学上的“未知”领域，不是也决不应该是迷信邪说的领地。而一些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人也曾受到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欺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坚定自觉的科学精神，忘记了科学的理性批判和检验原则。因此当他们面对自己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问题时，“有知”也成了“无知”的俘虏。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在我们的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中，一定要把鼓励人们“信仰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学、依靠科学、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作一个完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基础。法轮功现象的发生更加深了我们对这项任务艰巨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科学文化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传授和灌输知识。掌握科学的方法、培育科学的精神、确立健全的理性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任务。毋庸讳言，科学理性不足的问题，迄今仍然是我国国民素质一个带普遍性的现实。这一点既和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如缺少科学和逻辑理性）有关，也和近些年来科学教育、特别是全民科普教育投入的不足有关。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当前国际上一股否定科学技术思潮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

该简单地追随西方认为“科学主义太多了，需要东方式的人文精神”之类的结论，也不应该无批判地加入“后现代”之类思潮，而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定地倡导科学和理性精神。

总之，要大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一方面要努力普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就是要培育科学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科学和理性的风气，并使之落实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措施。这样做不仅有助于铲除迷信欺诈的反科学、伪科学根基，而且有助于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提高我们社会生活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质量。

二、深化“三观”建设，确立科学信仰

“法轮功”现象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其说是知识层面的，不如说更是信念、信仰层面的。针对“法轮功”迷信邪说的危害，应该引起我们对信念、信仰（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现象的重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法轮功”之类的迷信邪说，代之以健康向上的、科学可靠的人生信念和信仰，移风易俗，改善和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无疑也是这场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很多材料表明，在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的真正面目充分自我暴露并被揭露和批判以前，一些善良的受骗上当者不仅不能意识到他那一套歪理邪说的本质，甚至也没有基本的警觉。他们很容易就轻信了，以至深受其害。绝大多数受骗者之所以轻信从而被利用，有一些特殊的主观原因，如知识上的空缺，情感中的压力和困惑，避害趋利的欲望，对人生命运的恐惧和侥幸心理等等。个别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也误以为法轮功讲的东西，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真理“没有讲”、“管不到”的，或者是讲到了也彼此“不矛盾”、并不排斥的，因而被李洪志的某些表面词句所迷惑。更多的人是在未经严格检验的情况下，就轻信了练法轮功能“健身祛病”、“心理安宁”等传言。这种轻信除了因为缺少

相应的科学知识以外，还因为他们自身有着某种迫切的需要，如为了自己健身，或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生活的环境、心灵的寄托等。后几种情况都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问题，而是属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和信仰层次。李洪志及其同伙则正是利用了近年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人们信念、信仰上的困惑和动摇，采用了种种欺骗手法笼络人心，争夺地盘，占领阵地，才能够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信念信仰领域的问题要用信念信仰的方式解决。从哲学上看，迷信是和科学健康的信念信仰发生在同一个领域中的对立物。人们对世界、对人生都要有一定的信念、信仰或理想，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有的形式，是人们永远都需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信念、信仰和理想这些精神形式，构成了人头脑中价值观念的基础和主干。至于每个人具体信念、信仰的对象和内容如何（相信什么、期待什么、追求什么），是否与宗教有关，是否先进和合理，是否堕落成为迷信，则因人们自己的地位和条件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迷信是愚昧落后生活方式的产物，而科学健康的信念和信仰，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人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包括人们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等），固然离不开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状况，但也不是完全由知识水平决定的（很多有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人也受骗，并且国外的不少大科学家也往往需要寻找一定的信仰，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是更多地联系着人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感受、现实的需要和能力（包括精神生活的需要和能力）、思想理论的指导等等。就像宗教信仰不等于宗教学知识一样，表现为信念、信仰和理想的价值观念，也有其不同于认识、知识和科学的特殊表现及其规律。充分掌握了这类现象的特性和规律，才能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和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保持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性、深刻性。

新形势下发生的这场严重斗争，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要从世界观、人生观、特别是价值观的高度入手，重视对日常信念、信仰、理想形式的研究和建设。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加强“三观”理论建设，提高宣传教育的系统化、科学化水平。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即唯物的、辩证的、人民群众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武器，是我们应有的科学历史观和先进人生观的指导，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价值观的依据。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价值观，凝聚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华，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是一套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它作为我们党的宗旨，本身包含了“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等深刻内涵，因此也是全体人民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结合国内外的社会实践和广大群众的切身体验，将上述“三观”的基本精神具体化为大家切实的共同体验、共同信念和信仰的内容，变为生动活泼的日常精神生活形式，并用以抵制一切腐朽思想观念和迷信邪说，这个问题再一次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面前。“法轮功”现象的发生，使我们深刻地感到要深化“三观”的建设和宣传，必须要有新的高度和更大的力度。尤其需要防止“三观”研究和宣传中笼统化、简单化的倾向，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内容与科学文化新知之间，社会价值取向与大众日常兴趣之间，“主旋律”导向与文化市场机制之间的有机结合；增加新鲜活泼、贴近人心的内容，减少脱离实际的形式；还要切实掌握好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信仰与迷信之间的界限，切实掌握好科学、科学探索（包括勇于创新）过程中的曲折、失误与伪科学的界限，等等。把握好这些

界限和分寸，才能避免简单化和表面化，使唯物论、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与科学自身的不断创新发展，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更好地联系结合在一起，提高效果，让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我国的大地上更普遍地扎根、开花、结果。

三、适应新形势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无论是倡导科学精神还是确立先进的价值观念，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这不仅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本身也包括在大的“科学”范畴之内，它们也无可置疑地体现着人类的科学精神，更因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担负着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人”的崇高使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思想文化的转型，业已成为 20 世纪末一个世界性的议题。未来各国发展的竞争，将以知识经济为手段，而以文化发展为导向，说到底首先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战略头脑的竞争。而我国当前正值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都首先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肩上。在这个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新成果，往往要比一项科学技术发明、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有更巨大、更深远、更持久的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日常的思想理论建设、精神文化的潜移默化和不断积累中，更体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换脑筋”和观念更新的导向作用中。江泽民同志曾以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为例，明确指出在社会变动时期，人们的思想最容易出现混乱。本世纪 20 年代前后，是俄国社会经历最剧烈变动的时期。当时思想界的情况空前混乱，各种唯心主义思潮纷纷登台亮相，一些人公开宣称“以信仰宗教的态度对待生活”，号召“要使宗教征服社会主义”等。历史证明，对这一类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处

理是否科学和彻底，必然影响到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面对我国当前的伟大社会变革，哲学社会科学无疑应该对现实开展深入的研究，科学地说明生活中发生的大量新现象，提出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及时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因此，变革时期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

法轮功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较大危害，说明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在我国，法轮功及各种伪科学、封建迷信近年来有所泛滥，除了科学传统欠缺和科学普及不足以外，还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糟粕，与转型时期社会思想道德领域里出现的失范和混乱等有关。人们思想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震荡并不奇怪，但是若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跟上，及时提供科学合理的思想观念，以保证正确地引导和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就必然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留下深远的隐患。

例如，无须讳言，这些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负面现象和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怎样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和社会进步观能够告诉人们，我们目前遇到的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是通过我们党和各族人民的努力可以解决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科学认识和正确信念，而是以悲观消极的心态去看待困难和问题，不切实际地将其夸大，就会被李洪志的“末世论”歪理引入歧途。李洪志正是蓄意夸大社会问题，把现实说得一片漆黑，似乎人类在道德上整体下滑，已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只有他那一套才能把人“往高层次带”，只有他能够超度和拯救人类，云云。这样的奇谈怪论，并不能迷惑有科学头脑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但却能使在新形势下陷入道德困惑和心理脆弱的人上当，误以为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是教人“做好人”的，从而在精神上受其控制。没有科学的人文社会理论引导，人们的信仰信念领域最容易出问题，今天识破了

一个李洪志，明天还可能受骗于张洪志、王洪志。

再如，在受李洪志的歪理所害的人中，高龄（离退休）人群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为什么？其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点是：如今我国人民不仅物质生活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业余时间也增加了；特别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离退休的老龄人口也大大增长，等等，这些都使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比重加大，人们的个人精神需求和投入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是一个发展中的新情况，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进程的巨大思想文化领域。在这个阵地上，由谁、用什么去占领，怎样才能够让先进的人生价值观（包括生命观、幸福观、事业观、道德观、家庭观乃至生活观等在内）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旋律，就不能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实际上包含了需要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门学科参与的研究课题。而当严肃的、神圣的科学精神未能占领这个阵地，或者未能真正满足人们的迫切需要时，李洪志之类的歪理邪说、歪门邪道便可能乘虚而入。这就是说，即使是作为我们改革和建设成果的东西，如果不以科学的方式加以进一步的发展研究和建设，也可能走向反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流是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它做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哲学社会科学与实践相一致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成就和局面。在同法轮功的这场斗争中，我院包括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一批专家学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高质量的批判文章，甚至出版了专著，就是由于曾有较长时间的研究，有了相应的思想理论准备，

从而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存在着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情况。许多现实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上的科技革命而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尚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应有的理解和重视，并且，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使重视了，也未必都能开展充分的研究。因此社科界为国家社会的发展、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还不能够充分地满足需要，在世界社科界也还没有发出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声音。

这一切都表明，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意义，掌握并尊重其繁荣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下大决心，加大投入，采取有力的步骤来改善现状，创造条件充分地调动和发挥这支队伍的积极性，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 本文发表于《瞭望》周刊，1999 年第 34 期。

国内市场的保护开放和振兴壮大

——兼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995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中国将从 1996 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 30%。”另据报道，明年 1996 年我国将有 4000 种货物降低进口关税。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国际、国内对此沸沸扬扬，反响巨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也再度成为热点。

国内人士有喜有忧。在喜者的眼帘里，已经映出货台上一批新摆放的质高款新价廉的进口商品，甚至有的消费者以期来年方去购买称心合算的大件进口货。在忧者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洋货进占我国内市场，民族工业衰退，失业队伍“壮大”的不美妙的前景。

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此给予赞扬，反映良好，但一些国家赞扬中颇有微词。如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从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返回后即说：“我们对（中国）向前迈出的这一步表示欢迎。但这显然没有解决有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问题。此外，我们对同中国的双边问题有许多关注之处。”“我们关注的这些问题包括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向美国农产品、保险和金融服务业以及电信服务业开放。”

地发展。”^① 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变化发展和无穷无尽的，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人类社会分工也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商品经济中的市场的变化发展也是无穷无尽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我们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市场必将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

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市场又总是有限的。这是由市场的要素——商品的总数量来决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总购买力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便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我国实行双休日后，有人企望第三产业能增加产值和利税，其结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社会总购买力也就是市场有限性的规律在起作用。

正因为市场决定利润，并在一定历史阶段市场总是有限的，所以整部市场经济史本质上就是市场争夺史。无论是老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历史，还是关税战、货币战、商业战，或是本世纪内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全部热战、冷战和高科技战等等，概莫能外，最终都是围绕争夺和反争夺市场而展开。只要商品生产存在，争夺和反争夺市场的烽烟就不会止息。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市场资源。世界上众多强国对此莫不垂涎三尺，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强行轰开我国的市场。新中国诞生后，由于帝国主义的联合封锁，加上我国国民经济尚处在恢复阶段，我国的关税政策的总原则则是保护国内市场，保护国内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一段时间过分消极强调国内市场的保护，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和先进技术的交流合作，从而阻碍了国内市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81页。

场的培育和发展，也就阻碍了民族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封闭半封闭状态，提高了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对加快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①这里所说的“提高”和“加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如使我国的钢铁、汽车、机械、飞机制造、仪器仪表、电讯设备等行业，跨越了与发达国家原来存在的二三十年的差距。二是带动国内产品升级换代，调节和繁荣了国内市场，进一步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要，并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并使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995年的700亿美元。三是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使一些投资数额很大单纯依靠我国经济力量目前难以上马的大型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高速公路、平朔露天煤矿等，得以很快开工或投资。四是吸收、消化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了我国老企业改造的步伐。五是培养了一批通晓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人才。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②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也充分证明只有在对外开放中积极保护和培育国内市场，民族经济才得以走上振兴和发展之路。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同时要看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472页，人民出版社，1997。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到，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① 存在着哪些问题呢，恐怕其中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大量洋货特别是生活消费品对国内市场不正常的冲击。对此，有人曾这样进行描绘和调侃：“清晨，雷达表把我从日本的席梦思上叫醒，到南韩产的浴缸内用力士香皂冲了一个澡，而后拿美国吉列的感应剃刀修面，高露洁牙膏、牙刷刷牙，用松下电热壶烧开水，喝上一杯雀巢咖啡，穿上皮尔卡丹的西装，开上美国的福特，来到中国和土耳其合资的写字楼……”，其一天接触和消费的 30 多种物品全是洋货，以至有人提议唱《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在对外开放中积极保护和培育国内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国内市场也有开放得还不够的问题，国外的先进技术还不愿进来，但是也确有对国内市场积极保护和培育不够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惊慌失措，甚至回到盲目排外、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置若罔闻。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为依据，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把对外开放工作做得更好。”^②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外商究竟是用哪些手段把大量的洋货和半洋货（合资企业产品）摆放到我们的货台上，来冲击我国的国内市场呢？我们也有国内市场，也有开放得还不够，国外的先进技术还不愿进来用先进技术换市场，当然也有一个换取市场份额大小的问题，从总体说，这是我们乐而为之之事，勿庸多言。问题在于他们利用我国法律和政策的疏漏和工作的失误，甚至采取许多非法的手段，挤占我国国内市场。主要的形式有：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 1472 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 1472 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第一，不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过滥的合资。我们鼓励外商的合资领域主要是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项目和高新技术，但由于受“两免三减”等优惠政策的“引诱”，国内许多生产日用消费品的企业十分乐于和外商合资。这样，有许多非属我国目前急需项目的产品，如形形色色的食品、饮料、化妆品等充斥我国市场，甚至有着浓郁民族特点的消费品如醋、豆腐、中药等也变成合资产品，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的千家万户。

第二，拼命压低返销率。有的三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在合同内规定内销比例高达 90%。

第三，千方百计不履行产品返销合同。如一家合资的灯饰有限公司，原规定外方必须外销 90%，但不履行合同，致使一年亏损几百万元。当地政府为树立合资成功的样板，引进更多的外资，又允许其大部分内销，方扭亏为赢。据辽宁有关部门对全省 104 家合资企业调查，按合同规定产品返销率平均为 68.4%，但 1991 年平均只有 29.79%，1992 年又降为 26.4%。

第四，挤占我国出口配额。凭借我国给予的减免税政策和设备新等优势，与我外贸出口产品争市场，有的甚至挤占出口配额，挤占我国民族工业已经占领的国际市场。同时，由于一些国家实行原产地出口证管理，使把这些企业出口产品计为我国外贸出口，造成虚假顺差，影响我扩大出口，使我国市场经常出现出口转内销的产品。

第五，瞄准效益好的国产名牌进行合资，或使名牌消失或利用名牌获取高额利润。1991 年，有着 80 年历史、在广东乃至全国都享有声誉而且效益很好的广州岭南饼干厂与外商合资，改名为积士佳仪器有限公司，从老市区迁到市郊，中方的商标、商誉、专有技术、销售渠道等全部出让，仅厂房、设备折价 2000 万人民币，产权仅占 40%，外方出资 3000 万元，却占产权 60%。消费

者从未听闻的“积士佳”，就凭着“岭南”原经营者的信誉和销售渠道，顺利地进入市场。仅过数月，外方以 1.03 亿港元价格，将其产权转让给另一个外商。生产“五羊”雪糕的广州人民仪器厂与外商合资时，双方要求各提供一个商标给合资企业使用，但外商提供的商标在国内无人知晓，而“五羊”却为广州市民十分熟悉，合资企业使用“五羊”，最后广州人民仪器厂的独家市场，现在却与外方共同拥有。

第六，挤占国产名牌。我国洗涤用品行业龙头企业湖北省沙市活力 28 集团，10 年中企业效益一直稳步上升，其主要产品销量曾占全国同类产品的 64%，1992 年至 1994 年，平均每年实现利税保持 60% 以上的增长幅度，1994 年实现利税突破 5000 万元。但由于美国的“宝洁”、日本的“花王”、德国的“汉高”、英国的“利华”等四大国际民用洗涤公司一个个投巨资与我国上海、广州、北京和天津等国内著名老牌日化厂合资，并采取“近期贴本占市场，远期垄断图大利”的营销战略，合击包围中国市场，活力 28 集团陷入困境，1996 年以来，首次企业效益滑坡，与上年同期比，产值下降 29%，尽管超浓缩洗衣粉质量在市场上仍是首屈一指，但由原占国内同类产品的 $\frac{2}{3}$ 份额，已跌至不足 $\frac{1}{3}$ 。

第七，购买我国企业，占领我国市场。这方面，东欧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有教训可资我们借鉴。截止到 1991 年底，匈牙利发生剧变后的两年半内，共引进外资 30 亿美元，“其中 57% 集中在工业领域，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中，多数都是外国股份，平均占 30~50%，但也有一些企业已全部卖给了外国，在相当多的股份公司中，外国资本占多数，在电冰箱、灯泡、榨油、制糖、水泥、造纸、烟草、筑路、包装材料、化肥等领域外国资本垄断匈牙利工业生产的面正在形成并进一步发展。据报道，外国垄断资本已经成立专门策划和收购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在收购中，

普遍要求控股，即使一下子控不了股，在合资经营后，也设法把投资规模搞大，使中方很难在规定时间内筹集大笔资金，从而相应降低中方所持股份，取得控股权。据有关部门统计，外商目前已在我国对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医药等行业收购了不同地区的骨干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局面。所有权方面的垄断必然带来产品和市场的垄断。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第八，走私渠道大量涌入，严重冲击我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许多走私品种进入国内市场的消费品所占份额超过国家外贸进口。如猖獗的香烟走私，近些年，每年从境外走私流入我国的数量均在 300 万箱以上，其偷漏关税总计为 128 亿元之多。仅北京市区就有 3 万余个烟摊卖洋烟，大大小小的商城、商厦、商店都在卖，但从 1995 年 1 月份到 1996 年上半年，正常进口渠道——中国烟草进出口总公司却没有进口过一支香烟。再如照相机，1995 年在海关报关进口的仅 1.6 万架，而市场上却多达 660 万架，而其中大部是三资企业假出口为名，又内外勾结，走私入境。仅此一项，我国就流失税款 23 亿元。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一位权威人士透露：最保守的估计，1992 年走私进口的汽车超过 10 万辆，1992 年底至 1993 年 4 月份，短短 5 个月，仅从韩国销往中国的汽车就有 21 万辆，但同一时间在中方海关报关的只有 200 多辆，两个数字相差几乎 100 倍。如果一年仅按走私进口 10 万辆汽车计，国家一年流失的外汇就高达几十亿美元，减少税收不下 300 亿人民币。另外还有走私钢材、空调机、摄录像机、彩卷等。这不仅减少税收，而且严重地冲击着我国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我国生产照相机的国有企业原有 30 多家，现在不足 10 家，而且大都经营困难，濒临绝境，于是有人惊呼，我国照相机工业几乎全军覆没。

另有一个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外商在采取上述合法

或非法的举措中，有的还往往伴之以行贿等非法手段，用来腐蚀我们的领导干部、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从中攫取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利益。

国内一些市场本来就受到不应有的洋货的冲击，明年又要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甚至可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会不会使我国的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雪上加霜？

首先，我们决不应惊慌失措，甚至主张回到过去那种盲目排外、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筑起高高的贸易壁垒，国内市场全然归我，先进技术和设备便不会进来，整个民族工业的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便会放慢，我们的产品也无法跻身国际市场，也无法赚取外汇来培育我们的民族工业。消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的作法，只能是逐渐萎缩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甚至认为现在是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就应国门彻底洞开，引“狼”入室，逼“鹿”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态度同样是错误的。现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正彻底的所谓贸易自由化，这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争夺更多的世界贸易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为保卫民族利益对外资采取措施进行指责的旗帜。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真正彻底的自由贸易。一方面西方跨国公司操纵国际市场，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使其不断下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展，如设置歧视性关税限制进口或设立非关税壁垒，制订各种限制进口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在 70 年代为 850 多种，到 80 年代后半期，已增加到 1000 多种，其中美国增加一倍多。就是发达国家之间，也从来没有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这些年来，美日、美韩以及美国与欧共

体之间围绕市场销售额发生的各种磨擦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注意在放开国内部分市场的同时，按照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适应我国的特点，对我国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进行精心地保护和扶持，就会把我国民族工业置于死地而无法后生。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是为了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开放则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不同的手段。因此，我们的正确态度应是，对国内市场该保护的部分保护之，该开放的部分开放之，在保护和开放的过程中，使国内市场得到培育，使民族产业真正自主发展壮大，积极参预国际竞争，重振民族雄风。

这次我国宣布一次性降低进口关税 30%，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作出重大承诺，正是我国政府正确分析国内市场的开放培育和民族经济自立振兴发展壮大的关系，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审时度势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必将对我国的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重大决策，一是把我国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推上世界市场，造成压力和动力，有的甚至形成背水一战之势，推动民族工业走集约化之路，并实现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调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长期面对受到高关税和各种非关税限制措施保护的国内市场，造成我国的不少企业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降低关税后，国内不少产品将被迫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将由此推动各个企业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使产业规模逐步趋于大型化、集约化、并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到国际市场上角逐竞争，从而实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和战略转变，促进民族经济的自立、发展和壮大。

二是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我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主要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原材料、半成品的关税，有利于这些企业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使其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三是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去我们实行的区域、外资进口优惠的政策，这是造成区域差距扩大和国有企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在进口税率面前各个地区、各种所有制差距缩小，相对公平，便为国内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也就为振兴民族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是有利于遏制走私浪潮。如我们现在汽车的统一关税是 110% 到 150%。正因为利润很高，国内外不法者才“冒死吃河豚”，大量走私，使我国每年仅此一项便损失税收 300 多亿元。如果能适当降低此项关税，走私便能相应减少，而税收也能相应增加。五是有利于促进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为早日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条件。入关后，我国便可以享受长期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从而为我国的产品提供良好的环境，还可以根据非歧视原则，引进过去无法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享受的优惠待遇，如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幼稚工业，为国际收支目的实行进口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进行出口补贴等，以使我们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既保护培育国内市场，又发展壮大民族工业；可以参预制定有关国际贸易法规，大大增强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并及时获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信息。

希望与经验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大幅度降低关税，特别是正式复关后，首先遇到考验和挑战的是我们的产品。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产品，尤其是起步较晚、生产规模还不小，与发达国家相比，价格要高得多的，如汽车、摩托车、计算机、复

印机、录相机、彩电、数控机床、精密加工机械等 50 多种机电产品，价格要高出一至几倍。而发达国家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大都超过国货一个甚至几个数量级。在这些质高价廉的洋货潮的冲击下，我们的国货要经受的考验是何等的严峻。其次是站立在产品之后的企业。我们企业约有 39% 的设备超期服役，整体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在工业劳动者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约占 78%，文化素质较低；资金短缺，甚至有相当多的企业亏损和严重亏损，无法引进、消化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长期国家进口高关税和严格数量限制的双重保护下生存和发展，只管生产，不考虑经营，相当多的企业缺乏国际市场竞争观念和经验，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再次是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的行业产业。前些年分灶吃饭、逐级包干的体制和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的观念影响，各地纷纷争引进、争项目、重复盲目引进和建设现象十分严重，地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同，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要或原材料供应能力，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生产规模大都偏小，经济效益不高，严重缺乏竞争力。如我国现有彩电装配生产线 166 条，拥有年生产能力 2156 万台，而国内年需求量仅有 700 ~ 800 万台左右，现在每年实产仅在 1000 万台上下，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闲置。彩电整机生产企业中，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量 30 ~ 40 万台的仅有 10 家。而日本松下年产 470 万台，韩国的三星、金星年产各 300 万台，就是我国效益很好的彩电企业成本，也比发达国家高出 70 ~ 80%。我国的机械工业、汽车工业、医疗化工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也均存在类似和一些特殊的困难。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后，大批舶来品如过江之鲫，成群绵绵拥来，势必对国内生产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些重复严重的行业和一些生产落后、产品低劣的企业必将受到无情竞争的

严厉惩罚，势必有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甚至破产倒闭，失业人员也必将有所增多。如不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我国尚处在萌芽阶段的未成熟工业也可能半途夭折，民族经济将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有的同志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开放市场而遭受灭顶之灾，相反，它们无不因为市场的开放而多方面获益。这是误解。举两个例子。一是 19 世纪初，英国对工业品给予补贴出口欧洲各国，法国的消费者在几年中以较低的价格欣然领受所需品的消费品，似乎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几百万失业工人乞讨流浪。再一便是 1994 年末到 1995 年初墨西哥的金融危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墨西哥国内市场开放过度。墨西哥自 1986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降低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完成了从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转换，但缺乏贸易自我保护，进口速度大大超过出口。除了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进口外，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大幅度猛增，贸易逆差迅猛扩大，由 1991 年的 110 亿美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230 亿美元，1994 年又达到 280 亿美元。这场危机，不仅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且波及全球。这充分说明，开放国内市场决不会自然而然带来多方利益，而关键在于所在国的当局和企业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如果驾驭得当，便会获利良多；如果驾驭不当或任其开放，便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复关谈判从 1986 年算起，至今已第九个年头。9 年中，由于牵涉到诸多政治上的因素，有几次是欲复又止。不管能否或什么时候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心和方针不会变，我国逐步建立适应国际市场经济贸易规则的大型外贸运行体制的决心和方针不会变，我国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断迈进的决心和方针不会变，这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所

决定的。这就是说，抓住机遇，寻找对策，迎接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势在必行。

第一，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宏观上严格控制外资投向。我们是一个有着 10 多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完全有条件也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强大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局面，而不能像世界上一些中小国家那样经济上畸形发展。从这一根本目标出发来考虑我国的产业结构，制定产业倾斜政策，从而把外资投向引导到我国经济急需发展的领域：如比较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基础设施等工业项目；国内没有的高科技项目；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进步，促使产品更新换代的项目；能利用我国较为丰富的原材料，并能深加工、精加工的绝大部分产品出口的项目；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两头在外有利于充分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项目。而对那些国内已开发生产或已引进先进技术，生产能力已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项目；产品大部分不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项目；纯属盈利，没有提供先进技术或单纯引进装配生产线，产品内销的项目等不宜放开投资，否则，吸引外资越多，则越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第二，正确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首先应用市场换取通过其它渠道难以引进或要价太高无法引进的真正的先进技术。二是确定合适的返销比例，也就是让出适当的国内市场。三是外商必须信守外销率。四是对符合进口替代并能满足国内需要的产品，一般不再进口。

第三，统筹协调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对所有引进的技术项目进行严格考核，确保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特别是价格昂贵的同类先进技术和设备，适当引进即可，严禁进口。在谈判、引进的同时，让国内有关科研机构、研究技术人员介入，及时做

好消化、吸收、创新和推广工作。

第四，进一步改进进口管理工作。由于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远远不能适应，结果形成现在的保护过度与保护无力并存的局面。进口管理应更多地利用汇率、关税、利率等经济杠杆，如对国内正在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像电子、化工、医药等行业的产品关税应少减甚至不减，实行保护；对于国内已拥有相当技术水平、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和产品，像纺织、服装、轻工、玩具等关税减少幅度可大一些。

第五，逐步建立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行业和企业。过去，我们以进口替代为主，今后，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企业 and 产品走出国门，努力参与国际分工，拓宽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区域。有了基础，便不怕大进。我国现在一些产品的质量、价格和款式，一时不能大批打入欧美市场，可以先瞄准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与我们有很大的互补性，我们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比较适销对路。我们只有敢于和善于在国际市场上赢得利润，我们的国内市场才能得到培育，民族工业才能腾飞。

第六，鼓励和引导民族工业联合改组。实现规模经济要按照经济规律，在公平竞争中下决心淘汰一批既无资源优势、又无长远发展的行业和企业，以名特优新产品为龙头，以优势企业为核心，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发展联合和兼并，下功夫组建一批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从而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七，保护和多创民族名牌产品。现有的国内比较著名的销售很好的名牌产品和企业对外合资要十分慎重。特别是国际市场上十分需要或很有开发潜力的有我们民族经济特色的名牌，政策上要给予优惠，使其尽快走向世界。

第八，国家要采取综合措施，严厉地打击走私。要组织公安、

工商、海关、税务等重点部门，统一政策，统一行动，不仅狠狠打击走私集团和走私分子，而且在参与走私的地方部门和团体进行严厉打击，决不能仅仅课以重罚，可以把走私所得非法利润视作贪污盗窃数额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第九，大力提倡以用国货为荣的思想，并把用国货作为爱国主义的新内容进行宣扬。从 1990 年到 1994 年，韩国平均每年进口汽车 2000 余辆，而其保有量却达 740 万辆。“韩国人不坐进口车”，访韩归来的人大都作如此称赞，并把这归之为国民的爱国情结。韩国人不坐进口车，当然有其它缘由，但肯定有爱国情结在起作用。韩国人爱韩国，难道我们中国人不爱中国？降低关税后，洋货蜂涌而来，我们多用国货，就能保护和培育我们的国内市场，从而为发展壮大我们的民族工业创造条件。

第十，积极做好复关的各项准备。我国究竟何时能复关，显得波诡云谲，变幻不定。当然，关内关外两由之，各有自由乐趣，各有利弊得失。但是，应该说复关是早晚的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早做准备则更主动。这里有舆论的、心理的、法律的、政策的、人才的乃至行业的、企业的、产品的等各种准备。如果我们准备充分、措施得当，真正复关后，便可能较为顺利地通过严酷的“冲击关”，并较快地过渡到“适应期”，从而实现与国际经济的平稳接轨。*

* 本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6 年第 2 期。

中西部地区要充分注意 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随着 21 世纪脚步的临近，逐步缩小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成为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关系到国家现代化长远发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一个大的现实课题。199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立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方针，表明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充分重视。

具体到中西部地区自身而言，优化经济结构的前提是必须认清本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信心，扬长避短，为制定正确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优化自己的区域经济结构提供思路，在充分认清自身优势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发展特色经济，避免走上与东部或其它区域经济结构雷同的老路。

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其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

我国的中西部远离沿海，绝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自然条件差。除此以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工业基础落后。据统计，1949 年，东部沿海 7 省（辽、冀、鲁、苏、浙、闽、粤）和京、津、沪 3 市，其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30% 以下，却集中了全国工业产值的 75% 以上。其主要缘由是沿海地区

易受外来力量控制且对外贸易方便。这种畸形的工业分布具有极鲜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各种明显的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便是资源优势。仅西部地区土地就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55%，草原面积占全国的 71% 以上，宜林面积占 38.5%，宜农荒地占 40%，水力资源及锂、镍、铂族金属、石棉储量占 80%，天然气占 40%。这就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富集区的布局迥然不同。解放后，国家力图改变这样的布局，但收效不大。因此，长期以来，中西部加工生产能力较弱，只能把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输出到加工工业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进行深、精加工。但由于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深、精加工产品价格较高，有的相差高达近 10 倍，东部便一方面获得了西部向东部输出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因价格不合理而转移的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又高价向西部返回制成品进而又获得西部在发展能源、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工业中得到的部分利润。中西部地区为使这“双重利润”减少外流，就必须大胆解放思想，围绕自己的资源优势，利用各种渠道筹资、融资，积极引进相应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或与东部或国外合资，积极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和产业，或以含高附加值的产品直接销售东部地区和打入国际市场，或以开掘出的更多的能源、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支援我国东部建设。这不仅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 21 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所在。如广西、贵州、云南等西南诸省，可加速开发红水河、乌江、金沙江及支流的阶梯水电，不仅满足本区，而且可以直输广东，与华南、东南地区联网；建设有关铁路，大力开发广西及贵州铝矿、云南兰坪铅铁矿以及其它的锡、铜等金属和稀有金属，还可以大规模开采贵州、云南的磷矿，并利用水电加工成高级磷肥，解决我国华北、东北等地缺乏的磷素。此外，云、贵两省还有丰富的煤炭资

源，而广东、广西稀缺。如山西围绕丰富的煤炭资源，可逐步变输煤为输电，加强炼焦及焦化产品、煤化工系列产品工业。如新疆则可围绕丰富的农畜牧业和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大做文章，开发创汇农业，搞精油深加工。如果置自己的优势资源而不顾，不切实际地急于发展非自己区域所长的机电、汽车、电子甚至生物、信息工程等高新产业，则会与高新技术占优势的东部经济结构趋于雷同。由于东部起步早，产品新，质量好，成本低，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产业和产品，往往会在劣势竞争中败下阵来。

二、发挥三线工业建设的优势，围绕此优势发展壮大有关产业和产品，以点带面，拉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逐步进入紧张对峙状态。1964年以后，我国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加紧进行大小三线建设。三线及其他军工企业当时的固定资产达3000多亿元，占当时全国工业固定资产8000多亿元的1/3还强。由于几十年的三线建设和各地多次进行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炭、小水泥“五小”工业建设，条件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广大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具有相当工业基础的区域和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地区的落后是相对的，落后中有优势，有先进。中西部地区中有的科研力量、科研水平、加工技术和水平甚至远远领先于较为发达的大部分的东部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实力很强的军工三线建设的大型企业林立。如果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发展与壮大相关产业与产品，或与本地拥有的丰富矿产、原材料、能源资源相结合，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加大产品的附加值，就会如虎添翼。以工业相对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和区域为点，各自侧重发挥自己拥有的能力和优势，就能逐步辐射和带动更大的区域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便是成功的范例。长虹是一家有40多年历史的军工企业。改革开放后，他们凭借军工企业的

优势，及时开发“长虹”牌彩电，质量逐年提高，成本逐年降低，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产品覆盖全国城乡。产业净资产从 0.41 亿元剧增至 32 亿元，年销售收入由 0.72 亿元上升到 80 亿元，年实现利税由 0.12 亿元增加到 16 亿元，不仅领先于东部地区相关企业，而且敢于与世界电视机行业的强手一决高下，有力地带动了周围区域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发挥沿边优势，与周边国家实行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我国沿边地区与周边 15 个国家接壤，是世界上陆地边境线最长，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除去东北三省外，中西部地区有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 7 个省区与 10 多个国家接壤。陕西、青海、四川、贵州等省区尽管不直接与其他国家接壤，但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与中亚、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地缘临近。改革开放后，截止 1994 年底，我国沿边各省区已向周边国家开放边界大小口岸 216 个，欧亚大陆桥也顺利贯通。建国 4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加工能力、科学技术水平等，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产品的花色、品种、质量、价格在周边国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周边国家具有的丰富资源，使双边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我国沿边地区多系少数民族生活聚集区，有 30 多个民族与周边国家跨境居住，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到生活习惯等，与周边国家居民有很大的相同性，这又具有人文的优势。因此，中西部特别是沿边省区与周边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利用人文优势和边贸口岸，积极发展资源产业和产品互补贸易，把边贸、地方贸易、转口贸易以及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经济技术合作甚至对外投资搞得红红火火，当好我国东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的“二传手”。沿边省区应抓住机遇，更加开放。

四、发挥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与广阔市场的优势，吸引东部和国外的更多投资

我国有 12 亿人口，中西部地区约占 7.4 亿。由于中西部经济相对发展缓慢，劳务价格仅相当于沿海发达地区的 1/5 左右。再加上廉价的资源和土地因素，以及 7.4 亿人口的广阔的消费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回报率，会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如果中西部省区及时制定出相应的妥当的优惠政策，这些年来形成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的局面便会得到重大改变，而资金、技术流向中西部，“人往高处走”的景观有望很快实现。中西部劳务价格低廉，在一段时间内，仍可大力发展投资少，技术含量低，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脱贫致富，再逐步发展需要大投入的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 本文写作于 1996 年 10 月。

澳门回归后的经济政治前景展望^①

澳门特区政府推委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和廉洁的原则选举出何厚铨先生为澳门第一届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人选，这是澳门历史上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喜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澳门兼有“天时”之优，“地利”之便与“人和”之长，具备了成大业的条件，澳门“人和”，澳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非常可贵的因素，是新世纪的澳门更加稳定繁荣之最重要精神动力和人力资源。除此以外，澳门在新世纪的稳定繁荣，有着充分的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厚基础。我们对澳门回归后的前景充满信心。

一、基本法是澳门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保障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我国政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这既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又是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又有利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现实利益；既有利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又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稳定繁荣。因此，它决不是某一时期或某位领导人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我国按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已成功解决了香港问题，

① 本文为作者在1999年4月澳门举办的“澳门回归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开幕致辞。

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香港回归后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承诺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同胞利益的保障都得到了落实。香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不仅表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香港基本法是符合香港实际，符合港人利益的，因而是科学的正确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充分尊重香港人的意愿，维护和保护香港同胞利益的。这一点举世公认，勿需赘述。

澳门将是紧接香港之后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回归祖国怀抱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澳门虽小，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中央对澳门的重视，主要体现于在处理澳门问题时充分考虑了澳门的特点。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使澳门在今天面临政权交接的历史性时期仍能在总体上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完全可以相信，在中央和全体澳门居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澳门一定会得到圆满的实现。

今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地位写进了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思想，也就具有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威和尊严。

澳门基本法反映了国家在澳门贯彻“一国两制”的真诚决心和对澳门居民的充分信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高度自治权，是世界上包括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在内的地方自治区域所有的自治权力所无法比拟的。

代表 40 多万澳门居民的澳门特区政府推委会依据澳门基本法，将选举产生以何厚铨先生为首的特区政府，必将是一个管治有方和高效率的政府。有这样的政府治理澳门，一定会开辟澳门

历史的新阶段。

首先，以何厚铨先生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班子，将由澳门居民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按照“三公一民一廉”原则选举产生，充分体现全体澳人的意愿。这样就使首届特区政府班子的施政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取得全体澳门居民的信赖和支持。

其二，以何厚铨先生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班子将由永久性澳门居民组成，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澳门，了解澳门，热爱澳门；他们有经验、有热情，一定会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

其三，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实现澳人治澳，结束了400多年来外国管治澳门的历史，澳门人自己当家作主，一定会扬眉吐气，其压抑已久的智慧、力量和热情毫无疑问会喷发出来。他们必定会以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管理好澳门。

目前澳门存在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管治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澳门回归后，定会使目前这种管治无方、效率低下的现象成为澳门历史的陈迹而一去不返。基本法对澳门居民利益的根本保障，特区政府班子的坚强有力领导，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祖国人民的协助配合，澳门的长期稳定发展就有了可靠的法律和政治保证。

二、独特的经济优势是澳门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

近6年来，澳门经济一直处于调整期，低迷不前。对此，人们忧虑重重：澳门经济能否走出低谷？何时才能走出低谷？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但是，在困难面前，我们决不能悲观失望。中国的先哲有言：“否极泰来”、“反者道之动”，这简明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我们坚信，只要澳门同胞把握澳门新时代的机遇，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充分利用澳门多方面的独特优势，释放出澳门经济的潜力和活力，

澳门经济一定会摆脱困境，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我们说澳门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是指：

其一，澳门经济是一个较为成熟和发达的自由经济体系。

澳门具有自由港优势。澳门的外汇、资金可自由调入调出，结算快捷；澳门币币值稳定，资金充裕，项目融资比较方便；对进出口产品免征关税；税制简单，税率较低；基本生产要素价格也较低。

其二，澳门有自己良好的对外经济交往管道和市场环境。

澳门作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在市场准入、补贴和反倾销政策、信息技术产品、动植物检疫措施、纺织品、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专业人士服务、版权、企业产权等方面，已与世界贸易组织的 118 个成员国家和地区达成各种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有关国家和地区对澳门本地产品实行减免关税和纺织品配额等优惠政策；澳门与欧盟有着良好的关系，是欧盟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重要的联系纽带；澳门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具有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粮农组织等在澳门都设有机构。

其三，澳门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通讯信息发达，交通便利。

其四，澳门有较好的区位优势，特别是与祖国内地经济合作大有潜力可挖。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澳门回归后，港澳的沟通合作无疑会更加方便。

澳门与台湾实现直航后，大大方便了台湾与澳门、台湾与祖国内地的人员往来。目前，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到澳门或经澳门到内地旅游、访亲或从事商贸活动。可以相信，澳门在海峡两岸的交流中将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澳门回归之后，内地将成为澳门的直接的大

后方，这对澳门经济会起到更大的稳定和推动作用。澳门地处珠江口西岸，与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毗邻，对澳门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澳门回归后，内地与澳门的优势互补和合作更加方便。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的前提下，把澳门的与国际市场接轨、信息灵通、税率优惠、融资方便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的科技力量雄厚、产品开发快捷等优势结合起来，发展具有良好市场前景、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用工少、污染少、占地少等特点的项目和行业，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会增强澳门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发挥澳门作为内地通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其五，澳门有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熟悉国际市场运作、善于管理的企业家，也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工人和技术人才。这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基础。

其六，澳门经济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旅游业的发展必将为澳门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近6年来，澳门经济经历了坎坷之路，作出了适应性调整，社会承受能力进一步增强。随着回归脚步的临近，随着回归前后澳门社会治安的必然的根本好转，随着国际社会对澳门关注的增多和祖国内地放宽来澳旅游，可以相信，来澳的客人可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并将较迅速地带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复苏和发展。

当然，上述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是发展澳门经济的潜在因素，要将这些优势和条件转化为现实，有赖于澳人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去挖掘它们、转化它们、激活它们。

我们注意到，澳门的有识之士对如何振兴澳门经济已作了许多有益可行的探讨。诸如，提出澳门工业必须走高技术、高增值的发展之路，要与祖国内地展开全面的合作，引进内地的科技资源，加快澳门工业转型的速度；在盘活澳门房地产市场上，提出

在适当调节土地的供应量和楼宇的兴建速度的同时，检讨物业转移税制，适当调整税率，创造消费需求，进一步完善、实施和落实《投资居留法》，有计划、分阶段地引进外地人口来澳置业或定居，吸收外地的公司企业来澳设置后勤或分支机构；在人口政策上，提出引入澳门缺乏的高素质的专业和技术人员，以配合澳门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向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建设；在旅游业上，提出通过大力重整治安，改善服务质量，增加观光设施，凸显澳门作为一个多元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沟通与合作，争取更多的游客来澳门观光旅游；在对外交往上，通过加强与祖国内地、港台、欧盟等之间的合作关系，重新制订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简化外来投资手续，加快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优化投资的政策环境，使投资者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我们认为，这些策略是立足澳门实际的，是切实可行的，只要切实履行这些策略思路，澳门经济摆脱困境，再显勃勃生机和繁荣局面必指日可待。

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澳门长期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

澳门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数百年来，澳门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其一，澳门文化有鲜明的中华性。

400 多年来，澳门虽然逐渐沦为葡萄牙管治地，但澳门一直没有失去其文化之根——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澳门文化的主体。澳门人口中 95% 以上是华人，他们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正是炎黄子孙的血脉和这种中华文化之根，才使澳门同胞在 400 多年间对祖国一直有强大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事实上，澳门发展成现时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国际知名的国际性城市，也完全是澳门同胞秉承中华文化精

神、勤劳创造的结果。中华民族文化有许多优良的传统。正像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所概括的：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以及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压迫的大无畏精神，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等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毫无疑问，这些优良传统必将深刻影响和激励澳门同胞为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二，澳门文化有明显的融汇中西文化的兼容性。

澳门在葡萄牙管治下的 400 多年间，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特殊的历史给澳门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澳门土生葡人群体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所结下的最生动的标本；澳门随处可见带有葡国特色的各种建筑和文物遗产；葡语现在以及在“九九”以后仍将作为官方语文在政府机构中运作；特区政府成立后仍将保留一所葡文学校。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澳门文化具有不同于周边地区的独特性和特色，因而也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资源，对于其形成独特的城市形象和旅游资源，具有十分重要而积极的价值。

其三，澳门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澳门是一个自由港，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除了中华文化、葡国文化的存在外，尚有多种文化在此交汇。由于澳门经济的开放性及对国际市场能作出迅速的反应，世界最新文化思潮、文化作品以及新产品很快能在澳门有所反映。澳门与周边地区和世界各国经常有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体育的等多方面的交流。澳门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活跃。正是这种开放与交流，日益使澳门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澳门、走进澳门、喜欢澳门。在澳门生活，能感受到澳门人很宽容仁厚，这正是澳门有可能尽快吸纳其它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精华，不致封闭保守落后的重要原因。

澳门文化在多元性和开放性生态中不失其主体性，而这种主

体性又不排斥其多元性和开放性，正是这些特点，是澳门发展充满活力的源泉。

总之，澳门是一个有特色的城市，有活力的城市，有魅力的城市。澳门同胞是勤劳智慧的，他们善于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敢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明之优秀成果；他们传统而不泥古，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时代意识。400 多年来，澳门同胞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尚且凭藉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自己今天美好的生活，完全可以相信，回归祖国后的澳门，有澳门基本法的根本保障，有特区政府的科学领导和全体澳门同胞的勤劳努力，有中央政府的坚强支持和祖国人民的强大依托，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安居乐业的澳门一定会在南中国海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澳门是幸运的，它与历史有一种机缘的契合：澳门将随着新世纪的钟声，揭开历史的新篇章。

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列宁新经济政策浅析^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没收地主土地、把大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的同时，列宁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全部生产置于国家管理和控制之下，建立全民的计划和监督，由国家掌握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的作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后来称之为“直接过渡”的思想。同时，列宁的头脑中也意识到在经济不发达的苏维埃俄国不能马上实行直接过渡，明确提出解决经济方面的任务不能用军事的冲击办法，要采取审慎的经济政策和渐进的过渡措施。后来，列宁回顾说：在1917年革命胜利后，对革命的发展曾作过两种估计，可能是通过比较短的道路，也可能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可能这种推断并不总是公开表达的）但始终是默然意会的。”

1918年，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入侵苏维埃俄国，国内白匪军叛乱。在险恶的形势下，为了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解决物资、粮食严重匮乏及富农投机倒把猖獗等问题，列宁不得不提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农村实行余

① 本文为作者学习列宁1921~1922年几篇主要著作的体会，写作于1997年5月。

新经济政策允许小生产者之间的自由贸易，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当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所担心的问题。列宁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有企业的前提下，可以监督这种关系，使其在“适当的限度内有益”地发展，并将这种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心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得出的充满辩证法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论点。

新经济政策的第三项内容提出商品和货币交换。列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21年春季，虽然规定了粮食税和自由交换，但商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地位问题并未解决。当时对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交换是允许在指定的地方范围内进行。列宁说，商品交换预定的方针是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这实际上是“产品交换”，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当时，工业刚刚恢复，工业品品种、质量不合农民的意愿，供应又不及时，农民宁愿同私商作买卖，而不愿与国家交换，在实际生活中，国家规定的交换往往被自由贸易代替。列宁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规定的商品交换“失败了”，必须在政策上“再退却”、“再向后退”，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等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他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经商”、“学会了解商业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他要求无产阶级国家要成立“精明的批发商”。1921年，列宁明确指出：“商业是千百万工农与大工业间惟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并写出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页。

《按商业化原则办事》的论文提纲，提倡经济部门按商业化原则办事，而经济核算就是商业化原则的重要内容。至此，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很快见到成效：稳定了卢布，发挥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极具科学精神，遵循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但列宁从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他尊重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在实践中探索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勇于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适合本国情况的个别结论，勇于否定自己曾经作出的结论，果断地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新经济政策也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采取灵活的、迂回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它初步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以说，不仅是苏维埃俄国，后来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行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证明了这是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功之路。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社会主义模式，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类型。列宁病逝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组织结构和形式，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通常，人们把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主义体制称作“斯大林模式”。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客观分析其历史功绩和局限性，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形成的，它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为主要特征。经济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由联盟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统一调拨技术装备，统一销售产品，统一规定价格。在运行机制上采取直接计划调节的方式，否定市场调节。生产资料所有制几乎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长期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核心，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是围绕这一总体战略设立和运转的。这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是十分必要的，但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利用集中的体制对重工业给予过多的投资，占用了对轻工业、农业的投资份额，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在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行干部委任制与终身制，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得不到发

展。与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相适应，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是高度的整齐划一，缺乏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不允许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一大前提下，不同政治观点和文化艺术上的争论，失去了自由辩论的机制。

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与二三十年代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关，也同人们对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相联系。首先，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把集中领导提到了首位。20 年代，西方国家不断挑起反苏运动，1927 年英国与苏联断交，苏联驻华沙全权代表被刺等事件的发生，表明苏联在国际上承受着严重的挑战。特别是 1929 ~ 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民主体制的危机”，德日法西斯上台，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使苏联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苏联的首要战略任务。这种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感、紧迫感使苏维埃政权难以按常规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必须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增强国防力量。二三十年代的备战环境给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同时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建立了适合当时苏联情况的体制。另外，沙俄落后的经济、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也有一定的影响。

综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度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是空的，需要有载体，要通过具体的体制结构、组织形式体现出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最终确定下来，是时代的产物，是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体制。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发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在严峻的斗争中，保证了社会主义方向、维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和政局的稳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和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条件。这种模式是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创造。

第二，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期内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增强了综合国力。苏联用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 年 10 月～1932 年底提前完成），苏联就建成了 1500 多个新的大工业企业，建立了原先没有的钢铁工业、航空工业、机器制造业、现代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原来最落后的电力、煤炭和石油制品生产也一跃而名列前茅了。到 1950 年，工业产值比 1913 年增强 12 倍，国民收入增长 12.67 倍，同期美国、英国、法国国民收入分别增加 2.03 倍、0.71 倍、0.54 倍。

第三，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苏联在短期内扫除了文盲，普及了 10 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苏联于 1954 年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后获得了很大发展，直到 80 年代末，核电站的热中子堆动力机组、快中子堆动力机组和核供热机组的单容量均占世界第一位。航天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1957 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了西方。到 1986 年上半年，苏联先后进行了 60 次载人航天发射，有 124 人次宇航员被送

入太空轨道并安全返回地面，累计在太空生活的时间为 96400 小时，相当于 11 年，这在当时是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

第四，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希特勒把社会主义苏联看作征服欧洲、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1941 年 6 月，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苏联，希特勒狂称 3 个月内征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集中权力，领导全国的军事斗争和经济生活。这种集中的体制以极高的效率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援前线，以极快的速度转移工业企业和居民。民用工业企业立即转产生坦克、大炮、军用飞机。苏德战争期间，生产 49 万门大炮、10.2 万多辆坦克、13.9 万架飞机，大量的军事物资源不断运往前线，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没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很难想象在遭受突然袭击、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条件下，能迅速实现如此规模的战略大转移，并很快扭转战争局面。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能够在 4 年内消灭德国法西斯、拯救人类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总之，高度的社会主义体制是苏联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历史的合理性、优越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体制是不完善的，在经历了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对社会前进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第一，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对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阻滞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传统模式的缺陷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最主要的是在指令性计划上面统得太多，管得太死，企业经营内部缺乏活力，外部没有压力，经济效益较差。一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惜以降低农业、轻工业发展速度为代价，造成产业结构

不合理，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 1953 年，苏联粮食产量还未达到 1913 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政治上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充分保障，国家机构逐渐官僚化、长官意志盛行，社会矛盾有扩大的趋势。学术文化领域教条主义和注释风严重，曾一度滋长繁衍伪科学。

第二，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减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既对立，又共处、竞赛。高度集中的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新科技革命中，缺乏强大的竞争力。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最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各国人民很自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这个样子，将二者视为等同。他们用自己所见所闻的苏联历史和现状来认识和思考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民主两个主要问题上的失误及其后果，使一些人迷惑，甚至感到失望。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兴趣减低。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降了格，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威望。

第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损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必然向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这些国家在引进苏联体制时，不加分析，将其缺陷也照搬过来，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本国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首，斯大林把带有战争和战备烙印的苏联体制普遍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超越时空去推行，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去仿效，不允许别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

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创建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和形式有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不可动摇和更改，对这些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的抛弃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但社会主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实现形式则随着各国不同的具体国情而不同。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适应的，具有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有其必然性，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应该把适合苏联早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固定化，而应根据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开拓，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本文写作于1996年5月。

i 第二部分 i

党 建 研 究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成为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

时隔一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又再次郑重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认为，这不仅对于顺利实现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一跨世纪的宏伟纲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

党的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的性质、执政党的地位、作用和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的必然要求。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顺利带入 21 世纪，而且，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第一，从高级干部在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看。我们党是有着 5000 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党的高级干部分布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身居要职，肩负重任，他们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直接参与者，高级干部政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决定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提高。其次，他们又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邓小平同志说：“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不赞成党的路线的人来执行，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②。如果高级干部懂政治、讲政治、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理解得正确，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便能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真正落到实处。再次，他们还是本地区、本部门新的工作局面的开创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还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做大量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高级干部往往独当一面，需要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政治水平高，工作中有很强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我们党的各项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四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党的鲜明突出的旗帜。在群众的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7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6 页。

眼里，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就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只有为党为公，无私奉献，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五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担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他们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等重大问题上的带头示范作用，对全党乃至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性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必须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我们党有了一批批优秀的政治家，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便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二，从我们党高级干部的构成现状看。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于1993年全部达到离休年龄，就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干部，若按18岁参加工作算，到1996年也六十有四。除少数担任正部正省级职务的以外，也均超过退休年龄。现在担任党政高级领导职务的，大都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参加工作的同志，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但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锻炼和考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丧权辱国的苦难也体会不深。一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功底不深，加上各自的业务工作不胜繁忙，有些同志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这同高级干部肩负的艰巨而又光荣的特殊使命不相适应。历史的重托呼唤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第三，从我们党面临的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形势看。我们的党政高级干部，掌握着人民给予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会采用各种手段对党政干部其中包括高级干部进行腐蚀。金钱、美女、夜总会、豪华盛宴……诱人的东西比比皆是。革命前辈当年打江山，冒的是“枪弹”；我们现在建国家，冒的是“糖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党打招呼，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王

宝森、陈希同案件暴露出的问题更令人震惊，发人深思。有人说，腐败是任何社会肌体上都会出现的毒瘤。但是，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将最终战而胜之，也必须战而胜之。过着清廉生活的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必然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以艰苦奋斗为己任。我们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市场经济大潮，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从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和指导反腐败斗争，来带头解决廉洁自律问题，否则，我们讲了多年的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目标将永远无法达到，我们将无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第四，从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来看。所谓“西化”、“分化”，就是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原总统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原总统布什所说的“无硝烟的战争”。从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时起，西方资产阶级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种种手段妄图消灭共产党，双方此消彼长，互有胜负。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他们乘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机，愈来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化”、“分化”即“和平演变”上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连连得手，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此欢欣若狂。社会主义中国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其手段包括由淡化进而改变共产党人的信念、瓦解党的组织和纪律、诱之以金钱美女，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面对这一图谋、我们的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清醒、坚定和远见卓识观察处理问题。这既是自身抵御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需要，同时又是带领广大群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顺利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早在 1956 年党的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十分中肯地指出，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一批在不同革命时期的经过考验的干部，如果有这么一批人，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① 因此可见，高级干部能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是关系到能否成功防止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在中国重演，我们党和国家改不改颜色的重大问题。

党的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也是革命领袖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申明这一点，是与列宁强调的培养“职业革命家”、^② 毛泽东同志强调的“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③ 造就“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要实现干部队伍“四化”，首先是革命化的本质精神是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反映了我们党对于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雄才大略和必胜信心。

二

怎样才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时明确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2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77 页。

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①

1964年，鉴于国际上的风谲云谲，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个条件。

邓小平同志对选拔党的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标准有过多
次多方面的论述。早在1977年，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样的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用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②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具有开阔的眼界，具有宽阔的胸襟，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具有优良的作风。这些要求是全面的，既有思想作风的要求，又有工作作风的要求，还有领导能力的要求等，核心是政治水平的要求。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体现在政治水平上，主要是指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等。

政治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要经过若干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在各个历史阶段我们的具体任务和策略会有所不同，但自从共产党诞生以来，我们在不同情况下所采取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具体而又实际的步骤。我们坚持“三步走”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72页。

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在任何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在完成任何具体任务和采取任何具体策略时，我们都不应模糊这一根本的政治方向。只有牢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一往情深，忠贞不渝，无论是步履坦途还是身处逆境，才能永禀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才能“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政治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惟一宗旨，是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分水岭、试金石，也是我们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制定任何政策计划，采取各项办法措施，都要为绝大多数人打主意，而不能为极少数人打主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问题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事关政治立场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国家、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 and 行为面前，我们必须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表明提倡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对正确的东西，理直气壮地坚持和支持；对错误的东西，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决不能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对正确和错误的东西均采取骑墙中庸、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能仅申明支持好的，对假恶丑不敢反对和鞭挞；更不容许反其道而行之，压制正确的东西，支持、纵容错误的东西。任何沉默和暧昧，都会使正气得不到鼓励和张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邪气却乘机滋长和蔓延，在根本上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诚地和人民大众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惜，为着人民，代表人民，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们也才能拥有永不枯竭的力量的源泉。

政治观点，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列宁说过：“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①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应该看到，许多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决不单单是经济问题。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领域中有许多问题与政治密不可分，而且直接包含着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至少高达5000亿元，如何有效地防止这一严重流失现象？这就需要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的高度上，对这些经济中的政治问题给予回答和解决。不问政治，甚至迷失政治方向、丧失政治原则，经济建设最终也无法搞上去。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不仅是懂经济的专家，干实事的实干家，而且是善于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的思想家。

政治纪律，是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保证，也是保证党高度集中、团结统一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基础。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对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置若罔闻，甚至各行其是搞宗派，便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党的组织纪律，同时又是政治纪律，主要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

全党服从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党中央是全党的领导中枢，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以手中的权力向中央闹独立性。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是历史赋予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使命，是全党的最高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前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中央的政令其中包括经济工作各项重大举措的畅通无阻和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至为重要。因此，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已经确定的经济工作中的大政方针，是能否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全局在胸，在谋求地方和部门合理利益与要求的同时，更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决不能对中央的决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在这一点上要有高度的自觉。

政治鉴别力，就是政治上识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并不是“泾水清清渭水浑”，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而是“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特别是一些错误思潮往往披着时髦而华丽的外衣，而一些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则还有种种缺陷。这尤其需要党的高级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从政治的高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地加以识别。如果只埋头日常具体事务，不注意社会思想政治动态，长此以往，便会眼障云翳，黑白不明；嗅觉迟钝，香臭不分，甚至滑到是非颠倒、美丑混淆的地步。

政治敏锐性，就是政治上要有见微知著的眼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事物都有征兆可寻，都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党的高级干部应当目光犀利，在错误思潮“起于青萍之末”时，便

敏锐地识别并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做到防微杜渐；在新事物处于一豆之实时，便护之扶之，使其竦秀凌霄。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之“风”，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我们一些同志仍然浑然不觉，麻木不仁，这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敏锐性还要求在形势大好时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在面临困难时，看到成绩，看到光明，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因素，充满必胜的信心去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

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统一体。我们常说，要做一个坚定而又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方面，而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清醒性方面。坚定性和清醒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的干部，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信念等政治坚定性方面问题不大，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政治经验不丰富，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则差，在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甚至在涉及重大方向等问题上是非曲直不分，茫然不知所措。也有的干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可谓高矣，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但是一事当前，置党的事业和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顾，先替自己打算，在重大的是非面前不敢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总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违心地附和错误的东西，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十分注重全面锻炼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三

党的高级干部怎样才能使自己尽快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家？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993年10月6日下午4点，自1924年以来，一直守卫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入口处的卫兵突然被撤走。西方媒介立即宣布：“这象征俄罗斯完全告别了共产主义。”就在此24天前，即1993年9月12日，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并明确表示“未来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与苏共领导人完全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有着本质的联系；它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何等地重要。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决不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所能自发产生的，也决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要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必须加强学习，真正从思想上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规律，从而信心百倍、百折不挠地为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党现在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党的高级干部只要具有专门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便足够了，此论谬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培养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都有一至两门专业知识，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实践证明，这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必要让精通电子专业的高级干部必须同时精通冶金，让精通化工专业的高级干部必须同时精通机械，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所有党的高级干部都必须具备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迷失方向，而且可以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经济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

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① 邓小平同志 1986 年视察天津时说：“任何时候都得讲政治。”就连古希腊三大思想家之一的柏拉图也明确说过：“政治学就是这么一种学问。因为它是每一个国家必须研究的学问，也是每一个人必须懂得的学问。”^② 党的高级干部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的高度上，对经济建设中的出现的政治问题予以回答和解决。埋头生产，埋头经济，不问政治，甚至迷失政治方向，丧失政治原则，经济建设最终也无法搞上去。1983 年尼克松去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尼克松据此预言，这些国家的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尼克松的预言在东欧不幸言中。如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只顾埋头经济而不问政治，我们党和国家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啊！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那股“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思潮对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不是一点没有影响。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没有多少学习热情，而对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却津津乐道。这很不正常。马克思主义在很高的层次上揭示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因而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当然，我们不能指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 100 多年前就对我们今天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给出现成的答案，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安然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② 《西方思想宝库》，第 850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答案，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适用于指导政治革命，也适用于指导经济建设，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了。我们不反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但是对此不加批判地照抄照搬，以此来指导自己所负责的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或那个行业的工作，是极端危险的。

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全党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学习”，要“学习学习再学习”。高级干部应减少不必要的出国、开会和应酬，挤出更多的时间，如饥似渴，秉烛夜读，才能真正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在不断地给我们提出许多纷繁复杂的新的课题。

其次是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自己。

我们说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满足于背诵片言只语，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真理，是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这些年来，国际国内都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巨大的有些是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异常丰富的实践中的层出不穷的重大问题等待着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回答。例如，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既学习它们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又有效抵制它们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的企图；如何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十分注意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切实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如何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又逐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防止两极分化，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何切实加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民主监督，使他们像普通党员一样严格遵守党规、党纪，避免以权谋私甚至腐化堕落；如何认识并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正确把握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又坚持自力更生为基础，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把握，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世纪之交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会在严峻的挑战面前遭受挫折乃至失败。

要正确回答和解决上述重大问题，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舍此别无他途。“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条原理任何时候也不会过时。广大群众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直接参加者，他们对于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了解最多，感受最深刻，他们对于需要不断解决的实际问题办法最多，也最管用。一切领导干部，只有反映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制定出好的方针政策，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那个时代的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农村、工厂、军营和学校，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可惜这一好传统、好作风在我们有些干部身上失传了，个别人甚至“上午轮子转，中午盘子转，下午骰子转，晚上裙子转”，整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哪里了解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想什么！离开人民群众这块大地，迟早要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或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那样被敌人所扼杀。历史不正是这样吗？

走下巍峨的高楼，走出深几许的“侯门”多到群众中去，多

到实践中去，多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气，多感受一些生机勃勃的群众的实践，多汲取一些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上的营养，这样才能早日把自己培养锻炼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再次是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任何时候也不要放松世界观的改造。

有人认为党的高级干部是从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一级一级选拔成长起来的优秀分子，根子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懂得多，世界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改造了。这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多，只是为确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并不一定表明正确的世界观的确立，何况有些人懂得并不多。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即使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由于环境的变化，新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断侵蚀，根子正的优秀分子又会面临着新的考验。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名言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党的高级干部如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同样会蜕化变质，其危害程度要比普通的腐化堕落分子大得多。

如何改造世界观？当然要主动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但是，由于高级干部处于领导地位，很难像普通党员那样经常受到别人的批评和帮助，这就更需要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世上最难的事，然而也是最管用最可靠的办法，便是自己管住自己。在什么面前管自己？无非是金钱、美女和权位。1954年仲春，陈毅同志观宇宙之无穷，念人生之须臾，慨然命笔，写下《手莫伸》这首著名诗作。其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

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40 多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诵读陈毅同志这首诗作，更是心潮难平，感慨良多。这是何等崇高的品德，何等伟大的情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光辉典范。金钱和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财富还不能大量涌流，我们还不能用金子构建厕所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利用货币的职能，发展商品经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金钱本身不是罪恶，但对于意志不坚定者来说，它的铜臭味有着极强的腐蚀作用。信奉“金钱拜物教”的人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疯狂和罪恶，权力亦然，运用得好，可以为党的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给人民群众做大量的好事；运用得不好，则害国害民，最终害了自己。封建士大夫尚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矣”，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则更应时时、事事、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经过不断的思想淬火，牢固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就一身浩然正气，虽面临拜金主义的泛滥，面对酒绿灯红的闪烁，凛凛然不为所动，这才是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有的本色。在群众的眼里，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就是党的代表和化身。毛主席穿的是打着 59 块补丁的睡衣，盖的是缀了 79 块补丁的毛巾被；周总理一双皮鞋换过 3 次底，穿了 20 多年；朱老总的一双袜子穿了 3 年多，袜底补来补去，厚度足有半公分。这些美谈教育和激励着多少人去奋不顾身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近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群关系发生问题，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少数领导干部的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堂堂正正地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

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为人民群众做出表率，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才能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了胜利迎接 21 世纪，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能不负历史的重托，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 本文发表于《求是》，1996 年第 2 期。

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①

近几年间，江泽民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和反复论述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1999 年新年伊始，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又一次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殷切希望，并明确指出，“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

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旗帜和象征，领导者在组织中处于的这种至关重要的地位，决定了领导者的内在素质对组织功能的极端重要。而领导者思想理论素质、政治水平、文化知识、领导能力、道德品质、性格气质等诸多内在素质中，思想理论素质则起着基础性的导向的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首先是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理论上清醒，则一了千明；理论上浑噩，则一迷万惑。因此，认真体会江泽民同志关于“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的论断，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进而促进在全党、全国大兴学习之风，同时也有助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的深入开展。

① 本文为学习江泽民同志 1999 年 1 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重要讲话的体会。

一、提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首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理想信念，分清重大政治、理论是非，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的需要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今天已150余年。其间，马克思主义曾几次得到大的发展，几次磅礴于全世界。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曾几次遇到令人痛心的曲折和十分严峻的挑战。苏联、东欧巨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欢欣若狂，宣称马克思主义失败了消失了，而且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在几年内倾覆，并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由于思想理论素质不高，特别是理论功底不深厚，致使少数领导同志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事关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政治问题，特别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问题上产生迷惘、困惑，甚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发生动摇。失去正确的理论信念，各种邪念便会丛生。一些人得过且过、贪图安逸，还有的甚至不择手段为自己准备后路，说到底，都与政治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丧失直接相关。

针对马克思主义失败了、消失了的论调，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①实践的发展完全证明邓小平论断的正确。苏东剧变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排除“左”的或“右”的各种干扰，度过一个个急流险滩，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特别是1998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又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我国仍然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动荡

^① 《十二大以来》，第1865页，人民出版社，1986。

不安的经济、政治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连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其所著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也说：稍早我认为，亚洲危机会引导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目前我担心的是，由金融危机引起的政治局面最后也可能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搞垮。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进一步教育和坚定了人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一定还会遇到这样那样数不清的甚至是更为严峻的困难和风险，还可能经过多次较量和反复。因此，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信念，一条要靠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事实和实践教育人们，另一条就是要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任何人头脑里臆想和杜撰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的产物。邓小平坚信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根本依据，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只有“咬定”马克思主义这座青山不放松，通过理论学习，深刻认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自己的理想信念扎根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块磐石上，才可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才可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被历史长河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进一步去艰苦不懈地奋斗，一代又一代地去把理想信念变为现实。

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绝不是空洞的口号。正确的政治理想信念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治理论观点所组成，并体现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中。当今世界，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成倍加速，各种政治、理论观点和思潮异彩纷呈，你

未唱罢它登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各种政治、理论观点面前，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清醒正确的是非观念。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一次重申，要进一步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7个基本界限。这就要求排除“右”的或“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说，同样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加强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学习。只有这样，也才能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便可能被各种错误思潮甚至谣言牵着鼻子走，当了错误理论思想的传声筒，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是非不辩，美丑不分，甚至闹到是非颠倒、美丑混淆的地步。

二、提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又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辩证思维的能力，增强驾驭全局、处理复杂事务本领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我们所说的思想理论素质，决不是机械地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掌握它的基本原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研究工作中的具体事物，认识和发现他们的规律，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片面性、表面性和机械性，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当然需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正如江泽民所要求的那样，必须把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原理摆在学习的首位，真正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分析、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防止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否则，我们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怪圈。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要么不顾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僵化地固守已被实践证明是过了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反对用新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么错误地认为时代已飞速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应对马克思主义全面更新。在看待形势时，要么仅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看到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整天忧心忡忡，丧失战胜困难的勇气；要么仅看到我们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仅看到所面临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整天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在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时，要么“不折不扣”，照本宣科，机械执行，而不是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符合心愿的便执行，不合心愿的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拒不执行。在报刊宣传工作中，要么党八股腔调十足，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搞得人们望而生厌；要么完全置社会效益而不顾，凶杀、庸俗、猎奇的内容充斥版面，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在思想理论领域，要么片面理解“斗争哲学”，动辄上纲上线大批判，大搞无谓的争论，闹得人人自危；要么片面信奉“和为贵”，对事关党和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理论是非也不管不问。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么政企不分，企业很少有自主权；要么认为一放就灵，或者简单地“一卖了之”，或者不去研究和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使一些厂长（经理）个人说了算，为他们侵吞国有资产洞开方便之门。在对外经贸合作领域，要么视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洪水猛兽，不敢放手

引进和利用；要么不顾我国的产业政策，唯外资是从，拱手相让国内市场，对民族工业造成不应有的冲击……

我们应十分清醒地看到，从国际上说，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肇始于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有很多的变数，世界科技迅猛发展，新一轮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看，我国有12亿多人口，国内经济建设的总规模越来越大，我国的经济、文化等与国际上的联系已大大增强，我们的改革也已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治安、反腐倡廉特别是维护社会稳定等项工作的任务还比较重，也可能还有人想借机闹事。因此，即将迈进21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的各级领导在处理国际国内各项复杂的事务，甚至是一些所谓的纯经济、纯业务的问题时，都需要从大局出发，从政治的高度审慎对待。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每天仅陷于自己的具体业务、事务当中，而忽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和掌握。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要掌握雄厚的理论力量。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越来越快，有了正确的指导，才能如恩格斯所说，“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重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①

三、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还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防止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需要

无疑，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7页。

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有人把我们的干部描绘得漆黑一团，是别有所图，我们应当高度警惕。但是，在一些干部中，确有高高在上、贪图享受，日日深杯，夜夜笙歌；有的趋炎附势，献媚逢迎，跑官要官，买官骗官；有的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独霸一方，欺压百姓；有的挪用资金，转移预算，走私护私，甚至直接侵吞国家巨额资产。现在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59岁现象”，大半辈子清廉自律，“修成正果”指日可待，但自觉有权之日无多，虽然深知法律之完善，之无情，仍甘冒被严厉制裁之风险，伸出了贪婪罪恶的手。这些现象，说到底仍是思想理论素质不高，道德趣味低下，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所致，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有人说，只要法律体系和各项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干部就不会犯错误。现实生活一再表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各项法律和制度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但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放松了思想理论和道德建设，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前任刚刚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处以极刑，后任“前仆后继”贪污受贿又锒铛入狱的例子还少见吗？在法律体制相当完备的发达国家，经济犯罪现象也决不鲜见。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人的素质低，即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①这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变成了“经济人”或人格化了的资本，他在经济活动中就会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这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

① 江泽民同志1995年1月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① 因此，避免领导干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既要靠法律、制度和纪律，也要靠教育。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 世界上各国共产党人都据此确立了自己党的根本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庄严而又神圣地写入了自己的党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可以通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可以认清共产党人在实现共产主义宏伟事业中的历史责任；才能真正懂得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下的；才能志存高远，胸襟广阔，境界高尚，意志如钢；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笑傲刑场屠刀，甘冒炮火硝烟；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遏制私欲，慎独慎行，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淡薄名利，敬业奉献；在酒绿灯红、物欲横流面前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时刻想着人民群众，时刻关心人民群众，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能在血气既衰，逐渐步入老境之时，珍惜清名，戒得不贪，善保天年。封建士大夫尚且提倡“好好而恶恶”，提倡“仰不愧于民，俯不诈于人”，我们共产党人则更应该讲学习，讲正气，否则必然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既平陇，复望蜀，最终坠入私欲难填的万丈深渊。最近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甚至被处以极刑的几名中高级干部在痛哭流涕反省自己堕落的思想根源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很少联系思想实际学习理论，有时学一点词句也是为了教训别人。斯言切中要害，很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思并切切引以为戒。

四、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前进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自己作为静止的封闭的教条，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身。宇宙是浩瀚无尽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事物是随时发展变化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因此认识真理的道路永远也没有完结。正基于此，列宁指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①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物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多领域里的新问题、新课题、新事物如万里长江上滚滚波涛接踵涌来。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我们将会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以贯之。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页。

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不竭的动力。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创新精神，这个民族便会停滞、僵化，直至导致生存的危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创新，同时是指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论思维的创新。在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庄严的历史责任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疑肩负着更光荣的历史使命。

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加强学习并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离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也许可以“造”出些什么来，然而未必是创造。

奔腾汹涌的江水必有涓涓细流的汇集，巍峨浑雄的奇峰必有众多山峦的烘托。广大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全党理论探索、概括和创造成果的大小。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使邓小平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的广大干部的理论素质的高低，说到底，同样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全党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真正提高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会生机勃勃，马克思主义真理长河就会奔腾不竭。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新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就有失去执政的资格，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切不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要切实纠正“学风不浓，玩风太盛”的现象，克服“学好不如干

好”的轻视学习的思想，避免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的做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身作则搞好自身的学习，并努力把勤奋好学的风气推广到全社会，带入 21 世纪。*

* 本文发表于 1999 年 3 月 18 日《人民日报》。

共产党员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这对于切实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顺利实现跨世纪宏伟战略目标和确保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与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艺术、宗教等一样，同属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其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同的道德，随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产生，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演变、发展。共产主义道德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道德基础上丰富、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的优秀成果的继承，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最先进的道德。在现阶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努力做到“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首先，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

有同志说，我们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分配政策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要求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与国家的现行政策是否矛盾？不矛盾。因为，我国现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它对包括党员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都适用。提倡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决不排斥党员正当的个人利益，决不是反对党员和党员干部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归根到底取决于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必须要求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只有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中得以实现，这是由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是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总的状况和全社会思想道德的总体水平制定的，仅仅满足于对党和国家现行政策的贯彻执行，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全民族共同理想，但是，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时，应表现出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标准，如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应带头发扬不计报酬、多做贡献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决不能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在对待商品交换原则时，只能把这一原则限定在经济生活范围内，决不能带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中来；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关系时，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时，应尽可能地把二者统一起来，当两个效益不能

同时实现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贯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时，共产党员应该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带头致富，但不能以权谋私，更不能忘记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决不主张无谓的牺牲，但是必要的自我牺牲应该提倡。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至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同志在 1980 年底就明确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① 其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并在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在全体人民中认真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这既不是什么“超越阶段”，也不是在提些什么根本做不到的“唱高调”的空洞口号，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措施，也是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不这样要求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把共产党员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其后果必然是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标不可能改变。我们要时刻注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不能把党的组织降到群众组织的水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7 页。

把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降到普通群众的水平。

在执行党和国家现行经济政策和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时，一定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决不能认为一提倡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就是要搞林彪、“四人帮”极“左”那一套，否定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进而对按劳分配的原则发生动摇和怀疑；另一方面，也决不能认为，在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今天，只需要讲眼前和个人的物质利益就可以了，勿须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了。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包括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在内的党和国家的各种现行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也要理直气壮地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年来，确有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决议》重新强调这一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认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①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就包括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

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关键在党，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贯重视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这一方针，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过不一贯的情况，但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势。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也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社会精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准，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而必须靠外面去灌输。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全社会无疑是灌输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①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几千万革命烈士用一腔热血献身于民族解放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从而也教育和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之一道英勇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榜样力量同样是无穷的。从五六十年代的雷锋、焦裕禄，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孔繁森、李润五、徐虎等，他们不仅遵纪守法、克己奉公、艰苦奋斗，而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的先进事迹和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的力量感奋着人们，对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导、推动作用。

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方针等重大措施，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而要把《决议》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真正落到实处，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条战线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如果每个同志都能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这无疑是一种最直接、最生动的力量，同时也最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就能影响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精神文明的先进性和广泛性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逐步推广到全体人民中间去，并逐步变为广大群众的行为准则。

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样需要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先进道德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终必然表现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马克思曾经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人的积极性与人的道德风貌密切相关。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是广大共产党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的精神源泉。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既可以促进广大劳动群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提高，激发全体人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热情，又可以协调和加强人们之间相互平等的关系，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团结的局面，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需要我们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也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四有”公民。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对克服一些青年中信奉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根本不相信大公无私先进分子的存在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错误思想，使他们的成长有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次，是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图谋和克服腐朽道德观念影响的需要。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必须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不然，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同样，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没有放松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渗透。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后，这种渗透的机会和条件大大增多，特别是他们在苏联、东欧连连得手之后，更是踌躇满志，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面临着演变与反“演变”的严峻考验。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一些利益主体为了取得丰厚的利润，就可能对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腐蚀拉拢。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社会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改变后，落后腐朽的道德观念并不会立即消失，有时甚至经过几个历史阶段后，还仍然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还可能有所泛滥。这些势力、因素相互交织，把我们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置于腐蚀与反腐败的严峻考验面前。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但也确有一部分人“败走麦城”。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指出：“我国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

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①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有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堕落为腐败分子、犯罪分子。”据统计，1993年至199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37万余件，有33万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干部9800多人，地厅级干部820多人，省部级干部40多人。这些人之所以“马失前蹄”，其根本原因是，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头脑里泛滥。党纪国法无疑是震慑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的利剑，但是，无限膨胀的私欲仍然会使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凭着“冒死吃河豚”的侥幸心理而不顾高悬的利剑去承接含着砒霜的糖弹。因此，只有牢固地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才是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抵御各种落后腐朽思想和道德侵蚀的真正的铁壁铜墙。

“履，德之基也”。^② 任何道德都具有知行统一的鲜明特点，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当然的载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对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力行不倦，模范实践，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就一定能生机勃勃，前程似锦。*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页。

② 《周易·系辞下》。

* 本文发表于1997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落实、落实、再落实

江泽民同志指出，大政方针都已确定，现在的关键是落实、落实、再落实。应该看到，多数地区、部门和单位在讲求实效上下了不少功夫，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实际情况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工作不扎实、不落实，特别是“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的现象当前还普遍存在，在有的单位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决不反对一切会议，一切文件和一切讲话。应该承认，必要的会议、文件和讲话是贯彻中央和上级指示的手段之一。但是，有些领导却把会议、文件和讲话当成了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的全部：有关问题，中央或上级明明召开过会议，并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部署，从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看，也迫切需要贯彻，但由于自己的直接上级没有开会部署，便迟迟不动，非要等层层开会，层层传达布置，层层发文件提要求，才去执行。有的对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不是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去认真学习，反复研究，真正领会精神，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操作性强的落实措施，而是仅起“收发室”、“录音机”的作用，对中央和上级领导人的指示，讲话只限于原原本本传达，正因为层层照抄照转，便出现叠床架屋、诘屈聱牙的《关于执行（关于认真贯彻……的决议的意见的决定）的通知》等文电。有的领导事先既不调查，又不认真想问题，更不亲自动手写讲稿，

口袋里揣着别人写就的讲话、报告，上台便念，有时一个上午要赶两个会，口袋里装着两个稿，甚至闹出用错讲稿，念了一页才发现的笑话。有的把会开成僵化的“套套”，只要开会，就按固定的“模式”去套，不问情况，不看对象，上边开什么会，下边也开什么会，上边怎么开，下边也怎么开，把会议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领导出席的多少作为衡量会议重要程度和领导重视与否的标准。有的对会议过分“重视”，会前到处请名人题词、发贺电，开会时请许多无关的领导和有身份的各界名流陪会，请各家新闻记者录像、拍照和报道，以造声势、壮会威，全然不问会议究竟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有的认为会一开，话一讲，文一发，便算贯彻完毕，大功告成，再也不去深入实际和基层，不去检查督促、个别指导，以解决贯彻落实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使不少会议精神成为一纸空文。有的明知实际工作中问题成堆，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至于会上所说的“坚决贯彻”、“一抓到底”、“决不手软”云云，不过是讲给上级和群众听的“门面话”，而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打算认真去实行。凡此种种，已经到了非痛下决心加以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为了改变“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的状况，必须认识它的危害性。文山会海讲话潮，严重地影响着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严重地影响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顺利推进。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就明确地区别了我们共产党人与其他党派的鲜明不同之处，也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何谓认识世界？就是通过实践，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提出正确的工作部署。从本质上讲，开会、讲话、发文件，对工作做出正确的安排，仍然属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范畴。我们决不否认认识

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但它仅仅是改造世界的前奏。何谓改造世界？就是把具体工作部署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在实际工作中见成效。只有把计划变成了现实，才能达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否则即使你的计划、部署再美好、再完善，那也是纸上谈兵，是不可能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的。广大人民群众歌唱共产党好，歌唱社会主义好，主要的不是从我们的口号上，而是从我们“说得到，做得到”的切切实实的行动中感受到真正是为他们谋幸福的。如果我们说得到、做不到甚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还叫什么共产党，连半点马列主义、半点共产党的味道也没有。清谈是要误国的，力戒清谈，真抓实干，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为了改变“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的状况，必须抓紧世界观的改造。为什么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的决策、部署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不了？究其原因，一是不想落实。抓落实是一个很艰苦、很细致的过程。除了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思想刻苦，工作艰苦以外，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五六十年代，我们共和国的一些老部长，经常一头扎进基层，扎进生产第一线，常常是一扎就是几个月。而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有的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年轻干部，整日热衷于大会报告，宾馆剪彩，迎来送往，电视露面，很少到条件艰苦的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住上几天，对群众的喜怒哀乐毫无所知，又很少开动脑筋，思索问题，这怎么能从实际出发，落实好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如何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了。现在，中央对此基本方针已定。究竟如何从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实际出发，使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确保公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这绝非易事。这就需要各地区、各单位领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去认真学习，反复调研，刻苦思考，而不是浮在上面，开几个研讨会所能奏效的。二是不愿落实。有些事情中央、国务院规定得非常明确，甚至三令五申，但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如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和盲目合资一直无法得到很好解决，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走私浪潮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对黄潮泛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借口是怕影响本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质是怕影响自己所谓的看得见的政绩，直至影响自己的升迁等等。说到底，这是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是灵魂深处的“私”字在作怪。三是不敢落实。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这非常及时，极为重要。环顾某些书报杂志、课堂讲坛，这些年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乃至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几乎无一不受到责难和攻击，我们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也几乎无一不受到否定和嘲弄。虽然这些并不是主流，但我们也应理直气壮、充分说理地进行批评，而有的同志明知不对，却怕伤了和气，怕别人说是“打棍子”而回避矛盾，不去批评。由此可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的决策、部署。

为了改变“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的状况，必须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正确的领导方法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领导者没有具体地直接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些经验去指导其他地方和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

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践的主体是群众，要善于把群众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借以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个别——一般——个别”与“群众——领导——群众”，这是实施正确的领导所必须遵循的公式。把一般号召停留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的“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为了保证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落到实处，除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努力提高现有干部的自身素质外，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考核工作和选拔、任用干部时，要十分注重考核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工作作风，要注意发现、培养和大胆使用那些既善于学习，勤于思索，又不尚空谈，扎实工作的干部。对那些仅满足于夸夸其谈，单纯依靠文山会海讲话造声势、做姿态，却很少扑下身子到群众中去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落实工作的干部，则不能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帮助他们尽快改正。

落实、落实、再落实，现在很需要把这句口号叫响，更需要把这句口号扎扎实实地体现在我们的各项实际工作中。*

* 本文发表于《求是》，1996年第16期。

列宁勤奋学习精神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有一句名言：“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列宁严格地要求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列宁为革命勤奋学习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也是崭新的事业。每一个革命者，要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种种理论问题，彻底摆脱旧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不用相当独立的功夫，去探讨、检验、批判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此，列宁强调在学习上要“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他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列宁刻苦学习的毅力是十分惊人的，他在学习上从来不畏劳苦。

沙皇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给渴望寻求真理的列宁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他 17 岁的时候就进了大学。由于参加了学生运动，很快被反动当局开除。但是，列宁顽强地坚持自学，到 20 岁的时

候，他不仅自修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而且反复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参加革命以后，更是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他坐过牢，受过流放，并且多次被迫流亡国外。可是，列宁威武不屈，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侨居国外，他流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战斗和学习。1895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后，他把监狱当成特种“学府”，每天从早到晚按照严格的计划从事读书和写作。在监禁的14个月里，列宁除了做大量的工作外，还认真阅读和研究了许多关于经济、哲学以及统计方面的书籍，做好了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出狱后，列宁开玩笑地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一点，能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更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1898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终日埋头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并阅读了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由于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列宁夜不成寐，异常消瘦。在失眠的夜里，他就继续学习和工作。被流放的3年中，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关于党的建设的书籍，为指导以后的革命斗争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列宁不仅在政治上遭到阶级敌人的疯狂迫害，而且在经济上受到反动当局的残酷压榨。在国外侨居时，因缺钱，列宁不得不经常翻阅报纸，寻找廉价公寓的广告，它那十分贫困的生活，有时候靠稿费，有时靠克鲁普斯卡娅的微薄工资来维持。在伦敦侨居时，列宁身上出了金钱癣，因为花不起一个“基尼”找英国大夫治病，他只好忍受痛苦用碘酒擦身。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列宁总是忘我地坚持工作和学习。1902年，列宁在伦敦，一段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度过的。伦敦还有许多一间屋子的阅览室，里面甚至连凳子都没有。列宁工作之余，也经常在这样的阅览室里专心致志地学习。1920年，俄共（布）莫斯

科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时，登记表中有这么一项：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哪些著作？列宁填写到：几乎全部。列宁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读书的事迹，对借口“工作忙，没时间读”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育。

学习为了斗争

我们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一再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著名格言来教导我们。列宁说：“离开工作，离开斗争，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列宁一贯注重在斗争中刻苦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第二国际的首领伯恩斯坦、考茨基之辈，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他们用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理论；在政治上，他们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并拼命推行社会沙文主义，竭力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宝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

境地”。列宁挺身而出担负起了“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的光荣任务。

为了彻底抨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列宁先后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指出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揭示了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国际背景，并指出工人贵族阶层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列宁进一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等各个方面对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靠革命暴力实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终于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谬论。

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同时，列宁又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沙文主义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对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列宁同样用了很大的精力，刻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为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彻底粉碎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进攻，列宁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研究了俄国马赫主义的著作，又剖析了他们的祖师爷马赫、阿芬那留斯、休谟、贝克莱及其信徒们的著作，深入考察了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的血缘关系。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列宁不仅重读了《反杜林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哲学著作，而且还阅读了普列汉诺夫、梅林、狄慈根和其他人的著作。由于有几种需要的材料在日内瓦找不到，列宁又特意跑到伦敦，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呆了一个月，先后研究了几百种正反两方面的哲学、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文献资料，终于写出了批判马赫主义的战书，把马赫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从而教育了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群众，提高了全党向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战斗力。

列宁为了战斗而顽强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特别是在当前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中，我们尤其需要为了批修而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批修的武器。

“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列宁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但是他从来不满意，总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严肃地说：“最有害的，就是我们自以为还懂得点什么。”

列宁有很强的记忆力，但是他决不单凭记忆。学习中，他对于重点部分，总是反复阅读，深思熟虑，并细心地作好读书笔记和摘录。例如，《哲学笔记》就是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著作 8000 多页所作的大量札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是列宁研究了几百种基本上是外文版的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以及报刊上文章的统计汇编，包括 148 本书和 49 种期刊上的 232 篇文章所作的笔记。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

从学习外文上，也可以看出革命导师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列宁在学生时代，外语成绩就是相当好的。在坐牢流放期间，他仍然刻苦学习，很快能把很厚的英文书译成俄文。1902 年到伦敦后，他发现自己的英语发音不对。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又热心地学习英文，把各种场合都当成了学英文的好机会。参加集会时，列宁坐到第一排去留心地去注视讲演者的口型；海德公园里有很多讲演者向过路人讲演，列宁就经常到海德公园去学习发音，由于坚持学习，列宁不仅精通英文，而且精通德、法等外文，使

他在写作时能够阅读大量的外文资料。

列宁把人民群众比成是浩瀚的大海，把自己比成是沧海之一粟。他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时，注重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学习，所以他善于审视革命的面貌，善于全面地把握革命，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1894年，列宁在彼得堡给工人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前半一半上课的时间用来讲解，后半一半时间用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他对每个能表明工人生活状况的细小事情都感兴趣，力求根据个别细小特征来了解工人们的全部生活。在伦敦的时候，他总喜欢到工人群众中间去。哪儿有工人，他就到哪儿去。他经常到城外草地和疲倦的工人聊天，到大众食堂和教堂听普通工人的辩论。所以列宁能够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血肉相连，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他力量的源泉。

革命导师就是这样永不满足，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1922年，列宁身患重病，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周围仍然堆满了书报。1923年，当他病体沉重，不能亲自执笔写作时，他还口授了《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对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精辟的论述。

毛主席指出：“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想想革命导师永不满足、谦虚好学的学习精神，我们有什么理由存在自满情绪呢？“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在学习问题上，我们要牢牢记住革命导师的这些亲切教诲，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 本文发表于1973年4月22日《新疆日报》。

i 第三部分i

文艺评论与新闻札记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①

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讲话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不仅对文艺工作，而且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样，江泽民同志在这个讲话中强调了文艺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强调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

① 本文为学习江泽民同志 1996 年 12 月 16 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会上讲话的体会。

一般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趋势，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无论是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是政治和经济的规律，或是思想和文化的规律，都不可能超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范畴。在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再一次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坚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在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应该作出更大的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标志，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错误的文艺路线、文艺方针进行了拨乱反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保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们文艺工作的主流。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文艺工作也受到了错误文艺思潮的干扰。早在 1983 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批评了“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①的错误倾向。时至今日，仍有人在宣扬什么“告别革命”、“躲避政治”、“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公开反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反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8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艺术的艺术，实际是不存在的。”^①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②江泽民同志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也说：“所谓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工作不可能“躲避政治”、“远离政治”；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如此。这是因为，其一，每位文艺工作者既是自然人，同时又是社会人。从观察生活、素材搜集、想象构思、文体选择，直到遣词命笔，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强烈的感情。其二，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必然反映到文艺工作中。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绝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其三，我们还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些也必然要反映到文艺工作中来。其四，政治绝不仅限于阶级斗争，对于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决不能作狭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邓小平同志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③文化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旗帜鲜明地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发进取。自以为是的“躲避政治”、“远离政治”，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和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性质的淡漠，是决不能被接受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865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20页。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20页。

否则，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就会在我国泛滥，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又如，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根据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对如何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作了精辟论述。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则郑重地提出了“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的严肃课题。与各国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把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汲取过来，熔铸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之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保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特色与汲取世界各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绝不矛盾。正如鲁迅所说：“虽是西洋文明，我们能吸收时，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①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各国文化均有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之分，西方强国，一直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它们利用我们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各方面的渗透，而我们有的同志对此却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主张文化上也要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对宣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及腐朽生活方式的文艺作品津津乐道地进行推介。如果照此办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侵蚀就会在我国长驱直入，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受到改变，民族特色就会丧失殆尽，变成西方殖民文化的附庸，我国则最终可能变成西方强国政治、经济上的附庸。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言。对待外来文化，正确的做法只能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

^① 《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关于知识阶段》。

再如，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马克思早在 1842 年就指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应当产生绚烂夺目的文化，每一滴露水在阳光下都会闪烁出无穷无尽的光彩，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的太阳，不能只有一种形式，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千篇一律。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反革命帮派文艺，是我们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逆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针从来认为，在文艺工作中，必须绝对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形式和风格，禁止另一种形式和风格，只会有害于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我们提倡关西大汉执铁板击铜琶高歌“大江东去”，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初谷，如崇山峻崖的阳刚之美，也决不排斥婉约缠绵、缱绻低吟“杨柳岸，晓风残月”，文如日之初升，如清风，如云，如霞的阴柔之美。我们要热情鼓励不同的艺术观点和流派相互了解、相互切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迎来姹紫嫣红的文艺界的春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会有正确和先进的东西，也会有错误和落后的东西，会有真、善、美，也会有假、恶、丑。对于错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防止“左”的错误，决不能重复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而是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有错误的同志，要与人为善，不能以势压人，给他们以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事实和论点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但是，我们坚持的“双百”方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

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了。”^①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②“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③。那种把“双百”方针同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对立起来的思想，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是否定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实质上也否定了“双百”方针的本身。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下“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文艺，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除了上述文艺思想中一些重要的理论是非需要分清之外，文艺工作中还有不少关系，如：继承借鉴与探索创新、歌颂与揭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关系都需要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对这些关系认识和把握的正确与否，都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关系，同样需要文艺工作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

其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深入群众、认识生活，抓住事物本质的需要。

这实质上涉及到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

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这本来是早已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5页。

② 《邓小平论文艺》，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③ 《邓小平论文艺》，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解决的老问题和常识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最大力量决不是其它，只能是人民。人民生活存在着的自然形态的、粗糙的然而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艺尤其是社会主义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国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改革、建设形式，去感受时代心脏的跳动，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战士的喜怒哀乐，才能与改革和建设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所谓的“灵感”才会在喷涌的激情中欢呼活跃起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真正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才能进一步提高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自觉性。

社会生活的现象是复杂纷纭的，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会像恩格斯所说的，连两个简单事实的联系也找不到。而要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样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相结合的学习，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①真正具备了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无疑会提高观察、体验、研究、认识社会生活的能力，提高艺术的表现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才可能做到“天机之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胸中历历著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

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文艺能够

^① 《毛泽东选集》，第858页。

要求生活的，就是自然和真实。文艺繁荣的时代是走向客观的时代，文艺衰微的时代是走向主观的时代。我国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通过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并透过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才能反映出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生活来，也才能按恩格斯所说：“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 创造出血流温暖、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给人民以光明和信心，给人民以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一批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工厂、农村、军营第一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生活，分析生活，创作出一批反映国有企业和农村改革及火热军营生活的好作品、创作出一批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等内容的好作品。这些作品写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们各种观念的演进和撞击，对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把握，无情鞭挞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热情讴歌了善于驾驭商品经济大潮，“手把红旗旗不湿”，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努力发展经济，造福于黎民百姓的弄潮儿，热情讴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赞扬。这也使我们看到，如果脱离生活，脱离群众，满足于在宾馆饭店里，一杯浊酒、云山雾罩侃作品，侃出的作品只能是自我的“复印”和表现，也许从一些方面表明了作者的才华，但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力。有的还专门闭门追求编造离奇荒诞情节、庸俗低级情调，散布享乐颓废、悲观绝望的情绪，这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反对。也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3页。

的地区和部门，为了能推出在上级获奖的大家气象的精品，不去引导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生活去创造，而是开列巨额奖金去悬赏，自以为“重奖之下必有佳作”，其结果所获无几。也有的文艺工作者不畏艰苦，深入生活，收集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生活素材，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把握不了生活的本质，其生活素材也只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部件，无力“组装”出好的作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忘记、忽略或是割断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艺术生命之花就必然枯萎，最终也必然被人民大众所抛弃。

再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改造世界观的需要。

对文艺为什么服务和如何服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从来都是明确的。但一些作家艺术家甚至是党员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对党的“二为”方针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反而对写阴暗的、灰色的、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以及十分庸俗、低级乃至黄色、下流的东西分外热心呢？对轻视实践、远离群众的创作生活洋洋自得呢？

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在作梗。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一定要在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时隔 50 余年，这两段论述是否过时了呢？非但没有，读起来反而倍感亲切和深刻。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立足点就是世界观。文艺工作者只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够谈上真正自觉地贯彻党的“二为”方针。

只有认真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会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才能深入自己的血肉，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也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才能充分发挥文学艺术自身特点，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立场上，自觉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① 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而不是让他们灰心丧气，怀疑党的领导，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

只有认真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下；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堕落；才能不被“一切向钱看”的思想牵着鼻子走，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和乐器，利用自己的歌喉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决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的精神产品仍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作家艺术家的劳动也是一种劳动，在其从事精神劳动的过程中，同样要消耗大量的脑力、体力以及物质材料。因此，精神产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品讲求一定的经济效益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像瘟疫一样侵蚀着我们的文艺界：演艺界的一些所谓“明星”、“大腕”，集体组团上山下乡演出，有人“别来有恙”请病假，接着私下拚凑走穴去猎钱，几支歌、几个镜头便漫天要价数万元，甚至连起码的艺德也不讲，稍不顺意则以罢演相要挟。有的则热衷于为大款的贵妇人或黄口小儿生日唱堂会，每晚客串几场万儿八千块。有的作家置社会效益于不顾，专写凶杀、暴力、色情的东西以求畅销，与非法出版商勾结起来，买卖书号，违法经营，只顾迎合一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以捞钱财。邓小平同志斥责这些人是混迹于文艺界的“唯利是图的商人”。^① 鲁迅说得好：“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② 沾染浑身铜臭的文艺工作者是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们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尖锐批评和强烈鄙视是理所当然的。广大人民群众对那些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争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的作家艺术家深表尊敬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孟子曰：“吾养吾浩然之气”。对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员文艺工作者来说，“浩然之气”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我国的文艺工作必将进入更加绚丽多姿、盎然勃发的灿烂春天。*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1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 本文发表于1997年2月6日《人民日报》。

评一部反映廖承志早期 革命生涯的电视剧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南海影业公司、安徽电视台联合摄制的6集电视连续剧《廖承志在追忆着……》，看过的人，大都说“不错”。也有不少人说“很好”，“看到动人处，让人簌簌流泪，催人奋发向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看完该剧后，即提笔写信给剧中廖承志的扮演者郭凯敏：“这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我所受到的激动、鼓舞和对整个剧情的深深感染之情……不可抑住满眶的泪水，特向剧组同志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廖承志在追忆着……》突破了人物传记片经常采用的编年体的手法，采用散点式的结构，用6个既互相独立又彼此相关的斗争生活片断，生动集中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同志在1925年8月至1942年初长达17年之久的时间跨度里的革命生涯，笔饱墨酣地描绘出廖承志这一坚定、无畏、乐观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热情讴歌了廖承志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临危方始见英雄，入火真金色转鲜。剧情是从坚决主张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倒在国民党右派的乌黑阴森的枪口下开始的。父亲的血迹未干，廖家

又收到“刺廖杀手警告何氏：若不改辕易辙，必将祸及后代”的警告。面对刺杀父亲后尚未收起的乌黑阴森的枪口，正在岭南大学中学部读书的廖承志断然地说：“让他们来吧！我要皱一皱眉头，就不是廖仲恺的儿子！”反动派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仁义道德”，从来只是挂在嘴皮上的。在仲恺农工学校开学典礼时，有人把含毒的饮料递给廖承志，使他险些遭人暗算。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何香凝立即决定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日本。廖承志不干，并振振有词地说：“父亲倒下了，儿子不去拿起战旗，擦干血迹，继续前进，反而要逃离战场，那我要改名字，不叫廖承志叫狗熊！”这夹带稚气的回答里包含着多少“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倔强精神呀！1928年，廖承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自觉地为党的事业竭诚工作。1932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但他慷慨受刑，宁死不屈。这充分展示了廖承志铮铮铁骨和高尚坚贞的革命气节。在何香凝、宋庆龄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多方营救下，廖承志终于被保释，但仍处于国民党鹰犬的严密监视下。廖承志又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机智地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把自己所知道的叛徒名单报告了组织。廖承志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剧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1938年初，廖承志经广东到香港，组织八路军办事处，为新四军、八路军募集抗战物资。他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团结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为我抗日军民筹集了大批款项和物资。1941年底，日军向港九地区推进，党中央命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不惜一切牺牲，竭尽全力，迅速把大量受国民党迫害而聚居香港、九龙的各界著名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安全转移后方。廖承志在与大家商议后，决定把整个营救工作分作两步，第一步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这些人的住址，安排他们立即搬家，就地隐蔽；第二步分批护送离港。在廖承志等周密策划、精心组织下，第一

步顺利实现。此时同志们担心廖承志的安危，一致主张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等第一批撤离。廖承志坚决不肯，始终和同志们一道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将 300 多名各界著名爱国人士，连同其家属 800 多人安全撤离了香港后，他才离港。为了革命，为了同志，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这与一切以我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真是天壤之别。

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廖承志英勇无畏，是英雄；在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时，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险阻面前，廖承志同样是无所畏惧的好汉。1933 年 8 月，廖承志赴川陕苏区，参加红军，并任川陕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长。因他带的中央给张国焘的信中批评了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张国焘便怀疑他是 AB 团分子，要他作深刻检查，并暗中监视起来。在徐向前总指挥的干预下，廖承志的日子才暂时好过一些。川陕苏区取得反六路围剿胜利后，廖承志竟被投入狱中。这是廖承志第六次坐牢。坐敌人的牢房，廖承志一点也不觉得痛苦，反感到光荣。但现在坐自己的牢房，却不能不使他感到万分痛心。但是，廖承志完全经受住了新的考验。川陕根据地丢失后，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漫漫的长征征程。电视剧集中表现了廖承志带着镣铐长征的顽强意志和博大胸襟。长征途中，张国焘曾几次想处决廖承志，但由于同志们的暗中掩护，加上张国焘需要多才多艺的廖承志刻写钢板和画宣传画，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央专电要求保全廖承志的生命，特别是周恩来当面与张国焘机警巧妙的交涉，廖承志才幸免于难。廖承志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戴着手铐，和同志们一道三过草地，四爬雪山，吃树皮、草根，宿露天、住山洞，忍受张国焘开除党籍的巨大痛苦，终于迎来了长征的胜利。

“廖公是个乐天派。”熟悉廖承志的人，都这样称道说。《廖承志在追忆着……》较为准确地表现了廖承志所特有的乐观、潇

洒、机智、幽默的风度和性格。在敌人面前，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上海租界被捕以后，为了及时通知党组织和家人，廖承志假作供认自己的领导人，把外国巡捕和国民党警察引到自己家门口，表示自己的母亲就是自己的领导人，闹得敌人恼怒皆非。当一位同志庆幸廖承志没有倒在雪山草地时，廖承志风趣地回答：“我到阎王那儿报到过几次了，可是阎王爷一查生死簿，我的名字在保卫局名单上呢，得由他们签了字才行！所以我又回来了。”这位同志感慨地说：“还是老脾气，乐天派，苦成这样，还说笑话。”长征即将结束时，廖承志被“解放”，他即向供在桌上的画笔作揖致礼。因为画笔也是自己幸免于难的恩人哩！这一细节的刻划，决非是毫无意义的“噱头”，这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饱尝了各种艰辛之后乐观、豁达、幽默的表现。日军进攻九龙的炮声隆隆，廖承志和同志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把撤退事宜忙完后，有人建议廖主任给大家唱支歌。廖承志爽快地答应了。在日本侵略军正在向九龙、香港逼近的危急关头，廖承志带头并指挥大家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这是何等豪迈、何等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廖承志历尽坎坷，饱受磨难，非但斗志不减，而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他无畏无私、乐观向上的精神来自哪里？《廖承志在追忆着……》明确地告诉我们：来源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无比忠贞。廖承志 16 岁加入国民党，他也曾对伪装革命的蒋介石寄托过幻想。我们从电视剧开头部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惊呆了正在这里留学的廖承志。他痛苦，他迷惘：“光明的火种，眼看又要熄灭……我们的路又在哪里呢？”这时廖承志与姐姐廖梦醒冒着狂风骤雨，相携来到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黄鼎臣住处，向黄鼎臣求教。廖承志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社会科学研究会”，

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在廖承志的眼帘里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世界。踏雪寻梅，廖承志终于找到了怒放的红梅，这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崇高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按理说，凭廖承志名门望族的出身和优裕的家庭条件，他尽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正因为他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坚定地踏上了一条历经艰辛、坎坷不平但又是充满希望和光明宽阔的革命之路。

电视连续剧《廖承志在追忆着……》以大量的生动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成千上万的老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让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无私无畏，英勇奋斗，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斗争中，满怀信心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捍卫、建设好，让社会主义的鲜艳红旗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高高飘扬。*

* 本文发表于 1990 年 1 月 6 日《光明日报》。

应当建立和研究新闻心理学

俄罗斯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曾这样主张：“让心理学与生理学结婚”，建立生理心理学。人们又纷纷给心理学介绍“对象”，建立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艺术心理学、体育心理学、军事心理学等。

新闻和教育、医学、军事等，是同属社会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平起平坐的兄弟姐妹关系，谁也不比谁高一头。既然教育学、军事学等可与心理学“缔结姻缘”，难道唯独新闻学与心理学无缘？

其实，人们在新闻学领域也同样有一些心理活动的规律可供我们探讨。我们在不使新闻学丧失其独立性的原则下，应敢于“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和心理学互相渗透，建立和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心理学。李耐因同志写的《要研究一点读者心理》一文，就是充当“红娘”，试图为新闻学和心理学牵线的文章。

这个“红娘”当得好。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各种缘故，我们无产阶级“尚未系统地、完整地涉及各方面的新闻学”，大河无水小河干，作为新闻学分支的新闻心理学当然也只能是一道干涸的小河床。现在冰河开冻了，我们应该让新闻学及其所统属的新闻心理学等分支都绿波荡漾。

可不能轻看读者心理。为了说明这点，先看两个例子。1980年4月18日傍晚，风裹黄沙遮天蔽日，直逼北京，紧吹了一天两

夜，仍未止息。20 日上午，我顶着风沙到王府井，边走边想：“这鬼风，啥时才息？”来到《人民日报》社门口，只见人们不顾扑面风沙，围在报窗前，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什么。什么消息有这样的魅力？我凑了上去，发现人们的目光都盯在《北方大风明日方能逐渐停止》的消息上。这则短新闻同样吸引了我。被风沙连续禁锢了几十个小时的人们，都盼望着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想来，新华社正是研究揣测了读者这一心理，才及时采编了这样与读者息息相关的新闻的。再看一则例子。解放军报于 1980 年 3 月 14 日登载了《雷锋式的干部——陈宝俊》这一人物通讯，其中有这样的语句：“陈宝俊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珍惜时光，埋头苦干的人。每天夜里全连数他睡得最晚，清晨又总是他起得最早。”不少同志看到这里皱起了眉头：“可能吗？”还有的说：“咳，每——全——最早——最晚，净吹牛，这典型谁信？”陈宝俊是个好同志，但由于我们宣传的不谨慎，说上一、两句绝话，文章中有一、两处败笔，便影响了典型本身原来就具有的说服力。这同影片《大河奔流》未上映前的评价一样，你吹得太高，脱离了实际，违背了人们的心理，效果适得其反。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人的大脑反映和接受外界事物，是受人的一定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规律所制约的。外界事物符合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大脑便乐于接受，否则便不大想买账，甚至加以拒绝。因此，注重对读者心理的研究，是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提高我们宣传效果的需要。特别是进入四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尤其需要通过研究读者心理等手段，切实弄清萦绕广大群众心头的是些什么问题，他们又迫切需要给予哪方面的指导，哪些报道有利于鼓舞大家信心满怀去搞四化，又有哪些报道对达到这一目的无益。我们对读者这些心理状态了如指掌了，才能采用恰当的办法，通过新闻报道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主张，更好地传达给读者，引导

读者同心同德干四化，奔四化，读者也会乐于接受这一传达和引导。从这种意义上讲，主导编辑部的不应是编辑的精神和意愿，而应是读者的精神和意愿；真正办报的不是编辑、记者，而应是读者。你若不倾听读者意见，不懂得读者的心理活动和对新闻需求的规律，仅凭主观意志在那里哇哇乱叫，那只能吓跑我们的读者。久而久之，我们的报纸就会像西方传说中的安泰那样，离开自己得以生身养息的肥壤沃土，被人活活扼死。

另外，我们改革新闻采写也迫切需要懂得一点心理常识。先说采访吧。假若你懂得了一点采访心理学，遇到采访对象害羞或心情紧张时，你便会不急于拿出采访本，而是先和他拉呱唠家常，谈谈题外事，缓和一下气氛，然后进入正题。由于各种缘故，采访对象不大愿意提供你所要了解的情况，你便会通过谈心等方式，先弄清事情的原委，有针对性地解除采访对象的思想顾虑，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扫清障碍。若采访对象有急事或身体不适，你便会体谅对方的实际情况，礼貌地缩短采访时间或取消原定的采访，改日再拜访。总之，你若善于察颜观色，正确地揣度各种不同采访对象，写他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情绪、心理活动，并能相应地采用各种恰当的办法加以应酬，你就能提高采访的效率和质量，掌握写作新闻所需要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说新闻写作。倘若你真正清楚了读者对长而空的新闻是何等的望而生畏、不屑一顾，你便会千方百计地把新闻写得精粹些。又如，你懂得了心理学中人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官认识对事物印象深刻的道理，你就不会干巴巴地去写新闻了，你就会想方设法去加强新闻的现场感：在叙述过程中，不光单纯交待人物或事件的来龙去脉，直接调动人们的视觉去阅读，还会选择人物的语言，描述人物的表情、动作和物体的形状、颜色、气味等，以间接调动人们的听觉、味觉、肤觉等各种感官，使人们在阅读新闻时，

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增强新闻的说服力、感染力和鼓舞力。再如，我们懂得了人在注意中分“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时，我们便会利用人们的“有意注意”去精心办好我们的各种专栏，去搞好有意义事物的连续报道和典型的宣传，借此加深读者的印象，加强宣传的效果。

这些年来，心理学被“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伪科学”等几顶大帽子压得奄奄待毙。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心理学也畏之如虎，不敢问津。现在，虽然为心理学平了反，正了名，但一些新闻工作者却仍然带着镣铐办报，对读者心理不敢研究或不大重视研究。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忙着在那里研究“领导心理”，揣摸着编发什么样的稿子才能印证上级指示精神，免得犯错误，出乱子；在下边奔跑的记者、通讯员在忙着研究“编辑心理”，猜测写什么样的稿子编辑才可能编发，多上稿子，脸上有光。这就完全弄错了心理研究的对象。当然，并不是说采写编发稿子时，不要考虑上级精神和编辑部的需要，但是，上级精神、编辑部的意图归根结底是从群众中来的呀！我们只有深刻研究了读者的心理和需求，才能采写编发出充分体现上级精神、编辑部意图的新闻来。现在，我们报纸版面上，说到广大读者心窝里的真正纯粹的新闻，虽不像“浓绿万枝红一点”那样稀有，但也着实不多，还不能以千以万计。不少空洞说教，简单印证的新闻却有“接天莲叶无穷碧”之嫌，究其原因，忽视对读者心理的研究不能不算一条。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世界上最复杂、最奇妙的现象恐怕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了。你看，身在此地，心却能在千里之外自由驰骋，容量仅 1000 多克的大脑装得下万事万物的偌大世界。人的心理现象是如此地飘忽不定、纷纭复杂，但并非不可捉摸：读者心理活动中，有不少规律性的东西可供我们研究。实际上，我们在采编新闻时，也自觉不

自觉地都在运用着心理学的某些规律和方法，只不过不为我们明确地意识罢了。读者究竟有哪些带规律性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呢？

第一，对新事物的追求。人类通过劳动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集体，时刻都想了解自身以外的新情况、新事物、新变化、新经验，以便认识世界，并从社会集体关系的角度来决定自己活动的方向和内容。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是心理上一种本能的欲望，有如要喝水吃饭的“食欲”一样，许多人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一天不读心里就痒痒，其原因就是想通过阅读新闻，来满足自己追求新事物的欲望，与社会形成接触的状态。我们应当尊重读者对新事物追求的心理，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力争把更多的重要或有趣的新鲜事物及时地告诉读者。1980年初我军各大单位的人事变动，这对全军广大指战员来说，无疑是件人人关心并急于知道的新鲜事，我们可以像政府人事变动那样，发条消息，向全军公告示事。这和保密并不矛盾，也不必保密。事实上，你还是通过发各大单位的动态新向，把这一人事变动逐步的“泄露”，干脆点，直接发新闻，也免得人们浪费时间从多条消息的夹缝里去搜寻了。

第二，对距离近的或关系贴近的比较关注。除了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和一些趣事外，一般说来，人们的兴趣是由新闻发生的地点起，随着距离的增加递减。人们对发生在本部队、本工厂、本区、本市的新闻较感兴趣，因此，市民往往愿意订阅本市的报纸。人们还都比较注意与自己关系贴近的事，对涉及朋友、邻居或有过一面之交的人的新闻，对物价、调级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们谈家信，大都津津有味，不觉枯燥，也是因为信上报告的都是和自己关系贴近的“新闻”。对国际新闻，人们一般也是对影响本国关系较大的问题感兴趣。所谓‘眼观五洲风云，耳听

“四海波涛”，那是政治家、外交家的事，一般群众并不是对五洲所有风云都有浓烈的兴趣，他也没有那个精力和条件。因此，我们应多采编一些接近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的新闻。

第三，好奇心。人们往往对和自己司空见惯的现象、悬殊很大的事物有着很大的兴趣。当拿到登载百慕大三角的奥秘、神农架林区的“野人”、喜马拉雅山颠的“雪人”、神秘的“飞蝶”、“奇异的耳朵认字和气功之谜”等报道时，人们往往争先传阅。由此想到，我国的科学杂志上曾有我们部队的同志集体目击“飞碟”的记载，若事实确凿，军报发条消息也未尝不可，这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能打开读者的眼界。去年年初，北京掉了架三叉戟，一时争相询问，这也是人们对疑问寻根问底的好奇心。如果发条消息，不仅可以“以正视听”，而且可使读者从中引出教益。另外，人们对战争、比赛、评选等竞争性新闻和体育、音乐、电影等明星和文学家、科学伟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新作品、新成就也都比较关注，我们也应组织好这方面的报道。

第四，自尊心。这种心理，人皆有之。你尊重人们这种心理，像朋友那样和它平起平坐，心平气和地促膝谈心，读者便乐于接受。假若俨然以人师自居，以“指导”面孔出现，向读者指手画脚，吆五喝六，“必须如此”，“一定这样”，读者便容易产生反感，不大想买你的账。特别是通过新闻要批评一种社会现象，引导和改造读者中的不健康心理，则更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忌盲目地抬出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企图武断地吓服读者。那时，读者会说，咳！4分钱买来一个刺鼻梁，一边去！你看，这不更糟。柯岩同志的报告文学史《特邀代表》，讲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工读学校教育挽救失足青年的事儿，这里的校长和教师就是首先从尊重学生的自尊心做起，效果很好。

第五，人的年龄、性别、职业等不同，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

也有不同。这属于个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一般来说，同一版面上，政治教育和训练改革的新闻同载，政工干部首先看政治教育等新闻，而军事干部则首先看训练改革的新闻。“三八妇女节”活动的消息妇女同志看的多，而男同志关心的少。青年同志对理想、恋爱等问题比较敏感，中年人对教儿养女、老年人对如何健身长寿等消息有兴趣。另外，人们的性格、爱好、道德修养和生活境遇的不同，对新闻的心理需求也不同。有的人对国际新闻爱不释手、兴味热烈，而有的人对反映我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的形势、人事变动的新闻却专爱考究；有的人关心着棋类比赛的消息，探听着哪名棋手一马当先，独占高枝；有的人却翘首球类比赛的揭晓，观注着哪个队哪名队员披荆斩棘、奋勇夺魁。除了共同的心理和情趣外，人们还有如此大相径庭的个性心理需求和爱好。因此，我们既要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共同心理，也应考虑部分读者的各种不同需要。有人把正确处理这种关系比作办酒席，既要有大多数人爱吃的主菜，又要有少量的油泼辣子、大蒜葱酱之类的地方小菜。这样比喻不无恰当。解放军报编发的《未婚妻嫌贫爱富不足惜，白班长正确处理品德高》，便是为失恋的青年人特意制作的这类“小菜”。^①

第六，不同的时代，人们有着不同的心理。人们的心理活动，决定于社会的存在，如资本主义国家是一小撮寡头垄断的政治，一般群众不可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因此，许多读者对政治性新闻毫无兴趣。有人介绍，美国读者较多注意的是广告、娱乐和怎样做家务等，而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直接参与政治，因此，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党的全会的公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对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党的政策原则和政策界

^① 见 1980 年 4 月 18 日《解放军报》。

限的新闻都极为重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读者心理也在相应地变化着，如，刚粉碎“四人帮”时，人们对“四人帮”罪行的披露，深入开展揭批运动的经验等报道感到“解渴”，工作重点转移的今天，人们则对脚踏实地搞四化的新人新事新经验有所求。如我们军报对合成训练的宣传、对政治工作专门家——指导员薛晓明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对年仅23岁、以优异成绩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任仓海的报道等都很受读者欢迎。我们需要不断研究和适应读者变化着的心理，根据读者变化着的心理不断改进我们的宣传。

第七，病态心理。心理学中有一门病态心理学，它是专门研究精神失常和脑受损伤的患者的心理活动的，是研究人们生理上的病态心理的。有的读者，在政治思想的心灵上也有一种病态，如资本主义国家和读者对“软性”新闻的嗜好和追求。林彪、“四人帮”黄袍加身的10年间，对我国广大群众从物质到精神都是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也给不少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的病态心理处处可见：如林彪、“四人帮”大搞其反革命政治，败坏了政治工作的声誉，现在我们一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搞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有的同志便认为又是空洞说教，十分反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和所谓“反潮流”的影响，我们现在一强调组织纪律性，有些同志便认为是压制民主。林彪、“四人帮”把我国国民经济闹到了崩溃的边缘，致使一些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发生了怀疑。因此，弄清读者这些病态心理或叫做变态心理的病情病因，并采用恰当的宣传内容和方法加以消除，我们的报纸就能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舆论向导的作用。

读者带规律性的心理可能不止这些，上述的7条可能也很不科学。

人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心理活动的规律是多样的，研究读者心理也有种种办法。

通信法。列宁强调报纸要直接和广大群众通信，以了解群众所关心的东西、群众的情绪和群众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编辑、记者如能和 10 多个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人员，尤其是基层各类群众保持经常的通信、电话的联系，那么，他对读者心理就能经常有个八九不离十的了解。

观察法。传闻日本一个服装实业家访华，他不懂京剧，却买了一张靠近“入口”的剧票。他的眼睛不往戏台上瞅，只是盯住入场退场观众的服装。到公共场合去，人们总是穿上自己喜爱的花色式样的服装，这个日本服装实业家深谙这一点，他到剧场就是用这种观察法来了解掌握中国顾客对服装需求的心理的。有经验的老记者、老编辑，也经常用这种办法，到邮局、办公室甚至饭桌上进行“私访”，看人们订阅的是什么报纸，打开报纸后，他们的目光停留在哪则新闻上，看过报纸后议论的又是哪则消息。这样往往能考察出实情。

填表法。解放军报去年搞过一次，发给并要求读者填写的表上有各种栏目，如“若自费订报，你订哪种？”“你对已发表的新闻哪几则印象最深？”“你希望报上登载什么样的新闻？”这也是研究读者心理的常用的办法。但也要看到，结果有时并不反映实情，因为填表者往往有意无意填写对报刊有利的答复。

看报纸销路。最近，石家庄市国棉五厂一名同志对该市 10 个工厂报纸订阅的情况作了一个调查，很能看出一些问题。这 10 个厂个人订阅的几种主要报纸共 702 份，其中订《中国青年报》的居首，476 份，占个人订阅总数的 68%（还有许多人要订，因限额，不能如愿）。第二位是《石家庄日报》，108 份，占 15% 强。第三位是《人民日报》，76 份，占 10% 强。解放军报是第六位，4

份，占0.6%。从这些数字中，是否可以这么揣摸：一、《中国青年报》办得比较符合广大读者的共同心理。二、人们爱看本地新闻，不爱看和自己关系不太贴切的新闻。所以石家庄报的订额占第二位，军报订额仅有四份。三、人们爱订既实用又经济的报刊。《中国青年报》、《石家庄报》的订额多，除了其它原因外，还因为订这两种报纸破费小。《中国青年报》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每份年价6元；《石家庄日报》是小报，每份年价七元二角；而《人民日报》是八版，每份年价24元。此外，了解读者心理还有各种办法，如开调查会、和个别读者聊天等。资产阶级为了了解读者心理，有时还把连载的特写、新闻通信暂停登载，若收到读者抗议信很多，说明这种东西符合读者的心理需求，反之，则说明不符。我们不能采用这种手法来牺牲有价值的新闻。

前些年，林彪、“四人帮”把读者正当的、健康的心理活动一概斥之为“低级趣味”、“资产阶级思想”，报纸版面上充塞的尽是颠倒是非，蓄意整人的“阴谋文章”、“阴谋新闻”，使人们精神生活一直处于极度贫乏的境遇中。现在，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敢于满足人们心理上多种多样的健康情趣和正当的需要，让符合读者心理的枝枝红杏出墙。

但是，也确要看到，读者中确有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心理需求和变态心理。对读者这种心理是引导还是迎合，可以说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心理学和资产阶级新闻心理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资产阶级看来，“好奇是要求新闻的首要因素”，材料越异乎寻常，越违反人性，就越符合新的要求。因此，他们专门搜罗并制造诲淫诲盗、尔虞我诈、光怪陆离的新闻，迎合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读者的灰色心理，助长资本主义社会卑劣心理的泛滥。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对读者的病态心理决不能迎合迁就，只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引导，使读者的病态心理得到抑制并逐步消除，

使健康的心理和情绪得到陶冶和培养。

美国近代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罗杰斯曾这样说：“我把听众需要什么和愿意接受什么差不多当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作曲家为作好曲子要研究听众的心理，我们新闻工作者为办好报纸同样应该研究读者的心理，并坚持把握好报纸正确的新闻导向，以生产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所欢迎的大量新闻来。*

* 本文发表于《谈谈新闻改革》，解放军报社编印，1980。

脚 + 脑 = 新闻

——关于新闻主题的提炼

没管科学不科学，提笔就在复旦大学寄来的新闻工作者调查表中“你所喜欢的座右铭”的栏目里，写下了“脚 + 脑 = 新闻”的公式。

这个简单公式，是自己吃了不少苦头后才逐步认识的。

刚当记者时，有这样的思想：只要勤耕耘，多播种，总会有收获的。因此，仅满足于辛辛苦苦，到处跑跑颠颠，快写快发，甚至节假日、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无暇坐下来，开动大脑这座“加工厂”，学习思考问题，增强新闻敏感，提炼新闻主题。结果呢，到各部队“采种选种”多，向编辑部“播种”多，从报纸版面上“收获”少。当记者第一次下去采访到伊犁，半个月跑了8个边防站，漫无边际，随口问随手记，一本厚厚的采访本用得没剩一页，很少考虑问记的东西有多大的用场。采访归来，本应对采访素材进行归纳整理，思考消化后再进入写作过程，但见报心切，顾不得了。闭门挥笔，连写4篇。“收成”可想而知，4篇仅有一篇“豆腐块”落实到了报纸版面上。说实在的，那时对编辑有股怨气。接着又找到了聊以自慰的理由：伊犁边防不艰苦，挖不出在全军叫得响的东西——丝毫未从自身找原因。后来又想：喀喇昆仑艰苦，那里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终年风雪弥漫，空气中含氧量仅及平地的一半，边防战士为祖国人民的安全，在那里

含茹着难以想象的艰辛。上喀喇昆仑一趟，随便捡条新闻回来，都会被编辑部当成宝贝。于是在流火的7月，穿着棉衣棉裤，驱车10多天，忍受强烈的高山反应，登上了雪峰林立的喀喇昆仑。由于依然没重视新闻主题的提炼，结果是重蹈伊犁之行的旧辙，发出的3篇稿件，有两条是泥牛入海，其中包括洋洋5000余字的“得意之作”。

采写实践给我敲响了警钟：不能仅仅满足于整日辛辛苦苦，跑跑颠颠，在重视“用脚写新闻”的同时，不能忘记大脑这座“加工厂”的作用。要知道，新闻事实的明珠，淹没在大量的普遍事实的海洋之中，它靠人们思想的光芒去照亮、去发现，靠犀利的新闻敏感去认识，去提取。如果仅满足于跑跑颠颠，不舍用脑，不管珍珠鱼目乱采集，不看天候土壤乱播种，你就是整天奔波不停跑断腿，也很难得到理想的“收成”。

那段时间，急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翻开报纸上其他记者的大作，逐字逐句拜读后，心悦诚服，但往往又后悔，这样的题材自己碰到过，这样的角度自己也考虑过，但为什么自己没有采写呢，看来，仅用脚写不出来好新闻，必须脚脑并用，善于思考，才能发现新闻，写出新闻来。

至此，自己在“用脚写新闻”的同时，注意用脑思考。每次动笔前，都要问问自己：写这篇稿件的针对性在哪里？它对全局的哪项工作有指导性？对读者能不能有所启发？还有没有更好的主题和角度？除一些确认看准的新闻，像打篮球有空档毫不迟疑三大步上篮外，一般情况下，都要在“三秒区”外把新闻素材之“球”多拍几下，瞅准角度切入抛出。我曾为提炼一个新闻主题几易其稿，断断续续反复修改10天之久。我坚信，新闻敏感的火花必然照亮采访得来的新闻素材，只有付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辛劳，才能享受“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和欢乐。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一面注意多深入部队，一面注重学习研究，培养新闻敏感，提炼新闻主题，渐渐尝到一些甜头。1980年，我发稿35篇，被解放军报刊用32篇，其中优质良好稿12篇。1981年，发稿46篇，解放军报刊用44篇，其中优质良好稿17篇。

进入采访或抓回新闻素材后，怎样提炼新闻主题，我有这么几点零碎的体会：

第一，最佳角度。新闻事实是客观的，不能任意变动。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并不是自然主义者，并不是把新闻事实原封不动地搬到稿子中来，而是要在忠于事实的前提下，对新闻事实去提炼剪裁。不少事实证明，同一个新闻素材，写作角度不一，其稿件的思想深度、社会效果也就不同。什么叫最佳角度，我的理解是把新闻素材拿到全党、全军、全国的大局上去推敲，放到全局这架天平上去衡量，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有推动最有益处的角度叫最佳角度。1981年8月，乌鲁木齐部队话剧团话剧《天山深处》在北京舞台演出，观众反响强烈。我打算写篇报道。有的说：“话剧本身打响了，你怎么写都行！”事实并非如此。我采访一大堆素材后，列出3个报道角度：一是《天》剧是出反映80年代军人形象的好戏；二是《天》剧诞生说明，深入生活是文艺工作者的必由之路；三是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辛勤培育了《天》剧。是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月下门好？我反复推敲，觉得当时思想文化战线涣散软弱现象较严重。有的党委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想管；有的怕戴“横加干涉”的帽子，不敢管；有的不懂行，仅靠行政命令去领导，不会管。而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党委辛勤培育《天》剧的过程，正是热心管、敢于管、善于管文艺工作的例证，从党委这个角度写比其它角度更好些。角度选对了，写起来也顺手，

半天便写出初稿。写毕，觉得言尽意未尽，又用半天时间，配写了《党委要领导好文艺工作》的短评。这条消息和短评被登载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第二，深掘甘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新闻记者的重要使命，就是不断发现新问题，介绍新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对党的各项工作及其进展加强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不断挖掘、提炼出对正在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新闻来。1981年9月，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要抓住具体事来干。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积极响应，确定了年底前后要干的17件具体事。但内地各大单位得到精神早，行动快，军报用消息、评论等形式已将这一思想宣传了几次。如何把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这17件具体事报道出去？很显然不能吃别人嚼过的馍。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有的单位也响应号召，定了几件要办的具体事，但做起来却慢慢吞吞，拖拖沓沓。而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在办的过程中，肯动脑子，舍花气力，重点抓的17件具体事很快见了眉目。这属于抓具体事来干的深一步的报道，属于新的问题。我们便采写了《事情定了认真办，计划订了快落实》的消息，并配了《振奋精神出成效》的采访随笔。后来，这篇报道和随笔在军报的较好的位置登载。

第三，只此一家。记者也是读者，当我捧着每天的一摞报纸时，总想寻找“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新闻看。广大读者，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在采写新闻时，也力争献给读者们一些“只此一家”的新闻。1981年3月，参加乌鲁木齐部队的“红旗车驾驶员”代表大会，这个报道如何搞？前思后想，很多主题蹦入脑海。如爱车、节油、完成任务，但这一个个主题都被否了。这些主题，都似曾相识，新意不多。后来想，建设精神文明的口号是刚刚提出的，乌鲁木齐部队汽车兵经常接触新疆各少数民族

群众，反映他们在执勤中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独具边疆特点，某种程度上是“独家新闻”，容易受到读者欢迎。基于这一思想，我们采写了《“珍珠”撒满天山麓——乌鲁木齐部队“红旗车驾驶员”文明行车的事迹》的报道，很快被报纸刊用。我觉得，“只此一家”还应从广义上理解，这就是要不断开拓报道的新领域、新事物。如1980年自己采写的《边陲的笑声》，这类边防趣闻以往报纸上没有，它跃上版面就给读者一点新意。反映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新成就、新人物，如我们报道东疆军区现代条件下游击战训练有声有色和反映女同志当连队司务长的《姑娘“当家”不怕难》，这些报纸上没有报道过的新事物、新人物，就容易抓住读者。要想采写“只此一家”的东西，就一定要坚持每天翻翻报纸，对各类报道的宣传进程、角度等有个大略的掌握，这样就免得采写自以为新，其实是报纸早已宣传过的“同类项”。

第四，调整焦距。有些报道，本来有较好的新闻主题，但因新闻事实本身的缺陷或因其它多方原因不能报道。这时，应莫道“山穷水尽疑无路”，只要注意更换视角，调整景深焦距，重新提炼新闻主题，常常会收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效。1981年4月，我到乌鲁木齐部队某航空兵师采访，大家都反映某场站卫生队药房主任关延蓉学习外单位经验试制“雪莲注射液”，并为全国各地患者寄药的事迹突出、感人。我们想写篇报道。但一谈此意，关主任连连摆手，再三说，不要写我，越宣扬我，我可能越受孤立。怎么办？按往常习惯，对这一线索我会放弃的。但这次没放弃，我反复思考了关主任为什么坚决反对采写她的事迹。联想到一些单位歪风邪气挡道，好人受孤立的现象和前些年典型培养中的问题，心头“哗”的一亮，一个新的主题产生了：搞篇工作研究，探讨一下发现、树立和宣扬典型中存在的问题。当我们和师里领导以及关主任谈了这一想法后，他们都很赞同。我们便采写

了《从她不愿当典型说起》一稿，探讨了要实事求是宣扬典型，引导群众正确对待典型，教育典型正确对待自己等问题。稿件见报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说这个问题抓得好。

第五，按图索骥。提炼新闻主题，不应是消极的、被动的，而应是积极的、主动的。我们应经常认真及时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中央在不同时期发出的文件指示以及报社的宣传思想、宣传计划，吃透了这些精神，结合平日对实际情况的掌握，头脑里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闻题目，然后可按照这些新闻题目之“图”，去寻找发现新闻事实之“骥”。这和单纯的“关起门来想点子，跑到下面找例子”是两码事。1980年10月，各部队都注意用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取得巨大成就教育部队，帮助干部战士加深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好，党在牧区的经济政策怎么样？如果哪个部队组织家在牧区的少数民族战士走访牧区，帮助他们加深对党在牧区经济政策的理解，便可发条消息。根据这一想法，我在某团找到了新闻事实，采写了《党在牧区的经济政策：“亚克西”》的报道，并被评为好稿。记者还应和部队干部战士心心相印，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勇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样不光有利于搞好自己的报道工作，更主要是对部队建设有好处。这和导演、制造新闻同样是两码事。1980年3月，我们采写了新疆铁列克提边防站在特大暴风雪袭来和断煤断菜的18个日日夜夜里，战胜艰难困苦，出色完成战备任务的消息。采访中，我们发现断煤的主要原因是，不管各边防站寒冷时间长短，冬煤都是按统一标准配给。我们当时就给北疆军区后勤部领导建议，应改变冬煤配给“一刀切”的办法，给取暖时间较长的铁列克提站多配给冬煤。下一年冬备时，领导给铁列克提边防站增拨了冬煤。得到这一消息，我们又及时采写了领导为该站增拨冬煤的报道，军报又很快登载。该站干部战士十分感

谢领导上的关怀，也感谢记者的建议。1981年10月，我被邀请参加起草乌鲁木齐部队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当时我想，新疆边防线长，并且十分艰苦，边防部队中先进单位和个人众多，应对这些先进典型进行表彰，以振奋革命精神，进一步搞好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于是，我在这一讲话稿中写入了“部队党委决定，明年元旦春节期间，通报表彰一批风雪边防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内容。部队党委讨论时，认为这一做法可取，便正式作出了决定，并迅速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1982年1月22日，乌鲁木齐部队党委给18个先进单位和16个先进个人分别授予荣誉称号、记功和通报表扬。我们当即采写了报道，第三天便被军报刊用。我想，这种紧密把报道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按图索骥、见机栽花的办法是积极提炼和培养新闻主题的办法，不应指责。

此篇琐记主要是谈采写新闻要开动头脑这座“加工厂”，以提炼新闻主题这个侧面，丝毫没有排斥“用脚写新闻”这个命题的意思。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从这某种意义上讲，“用脚写新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①

^① 本文写作于1982年，为《解放军报社》第二十次全体记者会议参考材料。

边塞无处不飞“花”

借“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诗句，变通成题目，谈谈在边远地区采写新闻的体会。

只道“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1978年，我加入专职新闻工作者的行列，常驻乌鲁木齐部队。新疆的面积占全国的1/6，边防线5390公里，是全国边防线的1/4。新疆境内雪山耸立，戈壁毗邻，大漠接天。有的部队驻守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风雪高原，有的“隐蔽”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深处，给采写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我曾玩笑地对别人说，新疆记者头上压着3座大山：一是部队工作迟缓。由于地处偏远，部队对中央、中央军委重要文件的传达、学习一般比内地部队晚半个月到20天左右。往往是内地部队的一些成套经验见报了，这里才刚刚去试点，你想搞条体现中心工作的稿子，十分困难，而这种报道既占了报纸不少版面，又放在重要位置。二是下去交通不便。到一些野战师、边防团去，大都要坐四五天汽车。就是一个师，居住也十分分散。从师部到团里，都要坐着汽车呜噜一两天。别说人家不给你派专车，就是派，也不忍心坐。两天路程，光来回的汽油就要烧掉百把元。怎么办？等便车，一等就是几天。因此，下去采访，花在路上的时间往往要比采加写的时间还长。三是通

信电话不灵。现在，军报驻各军区记者组中，没有直拨电话的恐怕只剩我们新疆组了。想和报社通话，往往半天接不过来。下到部队更搔头，很难接通编辑部，侥幸接通了，听到对方的声音都像蚊子嗡嗡。航托一篇稿子，六七天才能到报社。即使逮住一条活蹦乱跳的鲜鱼，你干着急吧，送不到编辑手里。

1978年3、4月间，我到伊犁跑了20天，仅在第二版见了两个“豆腐块”。同年7、8月，我到风雪喀喇昆仑跑了1个月零3天，途中就用去19天，苦没少吃，最后只见报一篇。每次记者处把记者来稿的统计表发出来，见自己被用的稿子少得可怜，总要感叹一番。后来，翻阅唐诗，看到李白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的诗句，引起了自己的共鸣：新疆的5月不见花，只怨这儿气候严寒；我的报道上不去，主要因有“三座山”。“三座山”掀不掉，新疆报道搞不好。

原有冰峰独秀雪莲花

军报曾几位老同志来新疆采访，写出了一批好稿件，他们临走时，都对我说：“要抓住新疆特点，注意多采写一些内地部队所没有的，无法同你们竞争的东西！”

我琢磨了一下，是这个理。应把军报比作百花园，你沈阳记者组可以采摘长白山的金达莱，北京组可以采摘妙峰山的玫瑰花，武汉组可以采摘洛阳城的大牡丹，南京组可以采摘苏州、杭州的茉莉花，广州组可以采摘白云山的山茶花，我们新疆组则有天山的雪莲花。雪莲，这一冰峰独秀，属于别一品种，让它开放在绚丽多彩的军报版面上，读者是会欢迎的。

新疆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一是边防。采访中，我始终抓住这一题目。去年9月，报社呼吁要采写真正纯粹的新

闻。20日下午，记者处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发一条，我说：“跑跑看。”放下电话，我便到军区作战部找到一位科长，请他谈情况。谈了一个多小时，没谈出一条纯粹新闻的线索。我突然想到了边防，便顺口问了一句：“这几天边防上有什么新鲜事？”他说：“有呀！”接着，他便道出了直升飞机正在北疆5个边防站试航，待大雪封山以后，由飞机到边防接送病号、传递信件等。我一听有这等喜事，精神为之一振，高兴地像一锄头掘出个金娃娃。尽管吃晚饭的号响了，我仍拦住那位科长不放，采访个“痛快”。当晚，我喊哑了喉咙，往边防打电话，了解背景材料。21日中午3点，直升飞机在阿尔泰的扎马纳什边防站降落，3点45分我就把稿子传回了报社。《直升飞机代替了马拉耙犁》这篇稿子，22日见报，当天受到记者处的通报表扬，后来被评为1979年《解放军报》的10条好新闻之一，后来又得了全国好新闻二等奖。这条新闻这等幸运，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有鲜明的边防特点罢了。1980年上半年，回报社参加新闻改革研究班，在老同志的鼓动下，试写了《边陲的笑声》这一小通讯。这个稿子，通过养野鸭、黄羊、马鹿和狼，反映了战士们丰富多采的风雪边防生活和他们含笑饮苦守边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稿子虽然刊在二版下半部，但熟悉的同志都告诉我，他们注意这篇稿子了，有点意思。有的军区的新闻工作会议说，这是“向乏味新闻告别”，“激起了对祖国美好边疆和边防战士热爱的感情”。记者处也把这篇文章评为优质稿。

二是民族关系。下到一部队，我都要问驻地附近有没有少数民族战士，这方面有没有文章可做。1979年10月，穆斯林过古尔班节，我了解到某部对少数民族战士过节安排得好，便及时采写了《六连各少数民族战士喜庆‘古尔班节’》，一稿。1980年8月，在部队采访，正赶上少数民族连队过“肉孜节”，我盯住这一

题材不放，了解到少数民族连队准备邀请汉族连队一块过节。我想，去年过节，主要是领导关怀，今年这一“邀请”，反映了部队内部各族战士的团结，有新意，写！后来，这篇稿子在军报突出的位置刊载了，并配了插图。另外，我还采写了部队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各族人民支援测绘战士完成任务，一名排长抢救哈萨克少年，“爱民模范”贺昌富的妈妈到哈萨克帐篷作客等消息和通讯。

1979年9月底到1980年10月底，除回报社学习和休假半年外，我在新疆呆了8个月的时间，采写刊用的32篇稿件中，属于边防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有17篇，占一半强。

实践使我认识到，新疆并不是“无花只有寒”，新疆很有特点。题材丰富，报道工作大有可为。

边塞也开牡丹花

一切比喻都是譬脚的，管它妥否，我把赶形势和中心工作的报道比成“花中之王”的牡丹。

新疆的自然界中既长雪莲，也绽牡丹。报道中，除边防和民族外，中心工作的报道难道一点也不能搞吗？

其实，新疆部队的工作并不落后，有一些还走在全军工作的前列。诚然，上级精神的传达，一项新工作的开展，与内地部队相比，是迟缓一些。造舆论和开初阶段的报道，你可以先声夺人，我争不过你，但我可以多琢磨角度，抓深一步的东西，来个后发制人。

在报道实践中，我努力来验证自己这一认识。举个训练改革上的例子。乌鲁木齐部队营建施工任务很重，全训练很少，训练改革上，主要是学习兄弟部队。1980年8月，军区在某师召开加

强步兵营对模拟敌军连的战术对抗训练现场会。这种训练，内地部队一年以前就搞过，军报也做过报道。怎么办？我和与会同志多次座谈，发现这次现场会会风好。一般现场会，是让你去学的，这个现场会，让大家七嘴八舌提意见，来完善试点经验。我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框框，不报道落后了一小步的模拟连，报道有思想性和指导性的会风。由于思想明确，很快采写出了《不要光听赞歌，还要让人挑刺》的消息，编辑说，只花半个多小时就编好了，后来也很快在军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出。我采写的反映中心工作的《文书李跃进为国防现代化贡献才智》、《选择有利“蓝军”地形，逼着“红军”练出高招》等稿件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度，我曾认为，军报用新疆的稿子，主要想用“雪山”、“戈壁”、“奶茶”、“东不拉”等字眼来点缀一下版面，新疆写不出对全军工作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头版头条的新闻来。现在看来，边塞也有“牡丹花”。1980年7月到10月，我被刊用的16篇稿子，其中15篇在头版，5个头版头条。

几点粗浅的感受

如何搞好边疆的新闻报道，我有这么几点感受：

第一，不怕苦。新疆冷，交通不便，各方面条件差，非吃苦不可。下部队没有车，我曾到公路上当招手牌，厚着脸皮拦车坐。冬天，坐在大箱板上，冻得实在够呛。春天，汽车陷在雪水里，只得脱掉棉衣棉裤，下到齐腰深的浮着冰块的扎骨凉的雪水中推车。有的地方不通车，或者没有车，便骑马。本领不高，两胯磨出血来。单身住办公室，有时天黑后从部队赶回，错过了晚饭，乌鲁木齐又没有夜市，干饿一晚上。有时有些怕苦，但想起了风

雪昆仑的边防战士。那里缺氧，战士们高山反映严重时，头疼得裂开一样，便用背包带紧缠头上，不少人还患了高原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但仍然顶风冒雪，为祖国的安全站岗。这样一比，我吃的苦算老几？有人说过，怕吃苦的人是当不好记者的，确实这样，尤其在边疆。

第二，克服个人主义。要立下为党、为人民、为部队建设做好新闻工作的决心。从职务上讲，在部队工作的同志“进步”得快些，并且，当今的“进步”和人们的切身利益又连在一起，对这一问题要正确对待。我们驻新疆的可能是驻外记者中最艰苦的了，自己曾产生过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决心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去克服。

第三，更需要提高业务能力，增强新闻敏感。在乌鲁木齐，还便于和处里、编辑部联系，取得具体指导，一下部队，通电话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独立作战。缺乏新闻敏感，拿回来的东西没啥用，有价值的东西却没碰它，再去一趟，路途遥远，十分不便，其实等于白跑一趟。

第四，建立自己的小通信网。新疆地方太大，几年都跑不过来。因此，更需要和各部队的领导、新闻干事建立经常的电话、通信联系，形成个小通信网，便于及时发现好线索。军区开大型会，各单位都有人，不妨到会上住几天，摸摸线索。你要下的部队，最好事先已掌握那里一个有把握的线索，这样，可以避免空跑。*

* 本文写作于1981年。

科技开发的宣传报道工作^①

科技开发的宣传报道，是营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单位，一个企业要使营销工作上一个台阶，使经济效益上一个台阶，在重视科技开发工作的同时，必须重视科技开发的宣传报道工作，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首先，要重视科技开发宣传报道工作的几个关键要素。

第一是可信。宣传报道是别人夸自己，而不是自己夸自己，这样才能增强宣传可信度。我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是党的喉舌，是政府的行为，可信程度更高，是一种有效的大众媒介，这等于官方认可。目前国内有上百家单位生产白介素 - 2，经卫生部批准的只有 3 家，我们军事医学科学院已获得了正式批准文号，是 3 家之一，可否请卫生部门公布国家认可的 3 家呢？有关部门不愿这么做。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新闻媒介来宣传我们的产品是高质量的，是正宗的，希望大家都用我们的产品。通过这样一宣传可信程度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是醒目。就产品而言，如白介素 - 2 的消息在《光明日报》一版刊登并加方框处理，比较醒目。就是一条很小的消息经过处理也是醒目的，比广告的效果好。广告宣传对于十分注重看广告的那部分人来说可能好些，对广大读者未必有很好的效果。

① 本文为作者 1996 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因为广告太多了，往往被淹没在版面的文字堆里。

第三是经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广告 5 秒钟一年收费是 1000 多万元，不是“大款”，这样的广告就做不起。但新闻报道就不同了。这次对八所白介素 - 2 的宣传，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等十几家新闻单位都用了，效果很好，可谓一本万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发出通讯稿的当晚，他们就接到十几、二十几个电话，询问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哪里，怎样才能买到白介素 - 2，近些天该产品的零售款额就达 10 万余元。当然，主要目的应是在以正视听，争取大的客户。这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多赚钱。

第四是造福社会。六所“解磷注射液”曾挽救了成千上万中毒病人的生命。这种药品确实有效，若进一步搞好宣传，就能进一步造福社会，挽救更多的中毒者的生命，其它药品亦然。

我们的科技开发宣传并不排除商业性的宣传。如四所的营养保健品能拿出一个质量比较好的、市场潜力比较大的产品来，花上 1000 多万元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做一年的广告，很有可能有很大的回报，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当然，还有经营得当不得当等诸多因素，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中间也有一定的风险。

其次，要认识到科技开发宣传报道工作大有可为。

一是各单位都有值得宣传的科技产品。“天涯何处无芳草，春城无处不飞花”。科技之花在我院各单位都有。《解放军报》刊载了一篇一所同志写的反映我院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奋发有为的通讯，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好的反响。这是潜在科技开发的宣传。大家知道了我院有这么一批奋发有为的老中青科研工作者，那么对你的科技成果和产品自然容易认同。一所正在组建的出版社和广告中心也可以宣传报道，以扩大影响，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宣传附

属医院的医德医风和宋三泰同志，同时扩大了附属医院和我院的知名度。附属医院的洁净病房、戒毒中心都可以报道。七所的卫装产品也可以搞宣传。动物中心和仪器厂等单位有的产品宣传都可考虑搞。其他大的所自不待言。

二是选择时机。如果说这个产品是企业的真正拳头产品，质量好，市场潜力大，生产已形成规模，这就需要和值得宣传了。如果质量好，市场潜力也大，但生产还没形成规模，没有能力拿出更多的商品，别人来买没有货，这就不到宣传时机，所以选择时机很重要。如果时机成熟可采取集中宣传，对重点产品或项目可在十几家新闻媒体，如电视台、广播电台、各大报刊，尽可能地一起上，造成一个“旋风”，一个轰动效应，就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三是拓宽范围。现在出版物相当多，有关卫生的、科技的也很多，发布一条消息尽可能地一起上，有的报纸、刊物发行量在几万份以上，无形中读者就多起来。可带着在中央各大报上发表过的我院药品、生物制品的消息及录像带，到各单位推销，你可以跟人家说，中央各大新闻单位都认可了，我的决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还可带新闻稿到各地方的报纸上去发消息，在当地也可以形成一个热潮，这样在当地的销售额就会增加。地方电视台也可上。

四是纵深报道。多变个角度宣传，横看成岭，纵看成峰。要万变不离其宗，换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宣传报道。如我院的白介素-2 就可在研究出成果时开始报道，获得新药证书时又作报道，第三次报道就可以从打假的角度来报道，还可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进行，如果报道成功就会对白介素-2 的推广进一步产生经济效益。通过打假也将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医科院的声誉。在打假问题上请八所和机关同志抓紧，如果能拿到假的实物或画面的话，已经联系过了，中央电视台愿意跟踪采访，现场拍摄。人物事件通讯要求更高，要有动人的情节，同时要求文笔要

漂亮，也要求提倡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对白介素 - 2 研制人员也可作连续深入的通讯报道。

五是注重整体形象的宣传。一是企业的形象，二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形象。让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军事医学科学院，而且是军事医学研究的最高殿堂。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人才经济，龙腾虎跃。如果四环集团组建起来，就得把四环集团的声誉提高。让大家知道四环集团与医科院的派生关系，产品打入市场一看是四环集团生产、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大家就认为这些产品信得过，可信程度很高，就乐意、放心地去买，就像日本的“松下”、“索尼”、“三洋”等一样，这就是名牌效应。整体形象的宣传是多方面的，各所都可以做很多文章。前一段时间我在《解放军报》周末版看到一条介绍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生物制品研究情况的报道。而我们的八所就没有这样一个通讯，如果能介绍出来将会比他们的好。除了宣传我们的企业和产品外，还可宣传我们的老、中、青三代专家的事迹，各所都可以宣传。过去对我院的工作经验宣传可能少了点。工作经验宣传一般说来在报上所占的版面比较突出，这是宣传任务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医科院的各方面的报道在中央各大报刊上经常是铺天盖地的，那就一定能把我们医科院叫响，把我们的四环集团叫响，我们的产品形象也就随之起来了。

再次，要建立一支科技开发宣传报道队伍。

宣传队伍首先要学习新闻知识和有关的科技知识。其次是敢想敢干。我们的优势是在北京，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地利起很大作用。可以拿着稿去直接找到新闻机构，不要画地为牢，不要作茧自缚，不要关在屋子里，认为我们的小产品没有什么可宣传的，上不了中央的报纸。要经常跑跑有关新闻单位，走动走动就熟悉了。三是我们新闻干部要有新闻鼻、新闻眼，“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可以到水面上看一看，这诗的确写出一种自然现象，荷叶刚露那么一丁点，蜻蜓已经在上面落住了，不注意是看不到的。新闻也是一门科学。我们一定要锻炼我们的新闻敏感性，善于抓有价值的新闻，提高新闻的质量。大家可亲身感受到每天早上鸡叫的第一声是清脆悦耳的。第一声鸡叫说明天亮了，天亮后很多鸡都叫了，听起来也就不那么悦耳了。我们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像早晨第一声公鸡啼鸣一样，抓住新鲜的东西，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比如说，世界妇女大会要开了，我院有很多女科研工作者的事迹就可报道，如肖文彬同志就可宣传，搞好这个报道实际上对我院、对企业都是很好的宣传。院里可以统一组织，通过宣传人物来树立我院和我院企业的形象。又如最近召开的中纪委全会，这不仅是纪委的工作，而且是全党的工作，会上江泽民同志讲了三个教育，一是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三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育。比如说四环药厂这样规模的企业，经济效益又那样好，仍然坚持勤俭节约精神，就可以从勤俭节约这个角度来宣传，这样有助于树立四环企业的形象、有助于推动产品的销售。宣传上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各所考虑和筹划。四是新闻干事在自己多动脑、多动腿、多动手的同时，要发动大家，其中包括专家教授写稿。

另外，应制定周密的宣传计划，并注重宣传报道的真实、准确性。

各级单位对宣传工作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要重视拳头产品的宣传推广，造成一种声势来搞宣传的话，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益。各所、各单位要订好计划，认真落实。与此同时，宣传报道的真实、准确性问题务必引起重视。报道不能有假话，要真实准确，这是新闻的生命。一定要按有关法律规定来办，要严格审稿制度。

i 第四部分i

报 告 文 学

王 震 将 军

王震，一个镌刻在伟大历史丰碑上的名字，一个永存人民心中的名字。

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土地革命时期，他揭竿而起，铁血百战，由铁路工人成长为一名红军骁将。

在抗日烽火中，他率部杀得敌寇闻风丧胆，连日本民间都知晓他的名字，甚至他那曾经留过的长长的胡须。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毛泽东麾下作战，保卫延安，转战陕北，驰骋疆场，战功赫赫。他的老上级、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曾作过一次统计，发现国民党军中的近百位中将以上的军官，都曾与他对过垒，但都纷纷落马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他的队伍则被称为“百战百胜的铁军”。

他是支撑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宏伟大厦的一柱坚强栋梁。

他率领数万大军屯垦新疆，于沙漠中开凿绿洲，创建新城，于重山峻岭中修筑黎湛、鹰厦铁路，于漫天风雪中开发北大荒，

于洪荒丘陵中拓展海南胶林。“筚路蓝缕，以拓山林”，新中国的农垦事业、铁路事业，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以暮年余热，发灿烂之光，德高望重，赢得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他是我党、我军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历史上一位极有性格、极有风采，兼具大智大勇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民间，在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对不少神奇的传说，并不需要专门的演绎、加工，因为其中许多确是曾经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历史……

—

惟楚有材。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从湖南这块湘楚文化的发祥地，诞生过一个个熠熠生辉的人物：谭嗣同、梁启超、黄兴、唐才常……在现代革命史上，更是群星灿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王震……

1908年4月11日夜，一个春雷滚动的夜晚，王震诞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马跪桥村一个贫穷的佃户家里。全家十几口人，仅有一头水牛，租佃地主的几十亩夹青泥的薄田，耕作为生。

王震的父亲名王贵财，是一位忠厚勤劳的贫苦农民。王震的母亲董其谱，是一位刚强勤俭，明达善良的农妇，王震的祖父、外祖父，曾参加太平军，反抗过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军。王震6岁时入村塾就读，受教于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塾师李梓轩的门下。

这些父辈和师长，亲自经历或参加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他们以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向幼小的王震传播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讲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们讲述洪秀全的起义、谭嗣同的就义和孙中山的革命，使王震幼小的心灵朦朦胧胧地懂得，这个世道很不公正，外受强敌凌侮，内受腐败势力压榨，必须来它个地覆天翻，大多数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由于家境贫寒，王震不得不几度辍学，在家帮助农作。少年王震为强身御侮，曾刻苦修习武功，随外祖父董香桃学习岳飞始创的大正拳。虽然小小年纪，但一套拳法，打得烂熟。

二

1922年1月，年仅13岁的王震，迎着刺骨的寒风，怀着为救国济世寻求道路的朦胧憧憬，只身来到长沙。他先是投身赵恒惕的陆军测量局当兵，但由于不堪忍受旧军队中的腐败和打骂而退伍流落街头。他挑起与自己身体重量相差无几的菜担，沿街卖菜。这一年8月，经同乡介绍，他来到长沙火车站当了一名杂工。

铁路是当时中国的新兴产业，是催化诞生中国无产阶级的摇篮。在铁路工人的队伍里，王震初次接触到中共的地下党组织。这位穷苦、刚强、无私的青年工人受到党的热情关怀。不久，他被推选为粤汉铁路长沙职工分会执行委员和工人纠察队分队长。

1926年9月，王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在入团宣誓时，发生了一件趣事。当王震发现墙上挂的是两个满脸大胡子的洋人像时，他扭头便走。介绍人莫明其妙，赶忙追出来。王震气愤地说：“是洋人在侵略、欺压我们中国人。咱们站上的英籍工程师泛尔华随便毒打我们的工友，你们却挂洋人的像，信仰

洋人，还说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介绍人告诉王震，这俩洋人是马克思和列宁，他们是帮助天下穷人革命的洋人。党组织说王震有盲目的排外情绪，入团之事便被搁置下来。

党组织更加热心地关怀年轻而又倔强的王震。在工人夜校里，共产党员、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李六如亲自为他讲解《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提高他的理论修养。青年王震就在这个时期树立了对于马列主义的终身信仰。

1926 年 10 月间，党组织交给王震和其他 3 名纠察队员一项任务，用手摇车把一位名叫毛润之的先生，从新河护送到清水塘。在一路上的交谈中，毛润之循循善诱地向他们纵谈天下事，讲述革命的理论。王震从此结识了这位毛先生——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

1927 年 1 月，王震在马克思、列宁像前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继而在武汉、广州等地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屠杀。消息传到长沙，19 岁的王震非但没有丝毫的怯懦，反而更加砥砺和坚定了他的革命斗志。同年 5 月，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这时，反革命阴霾已经翻卷到长沙。5 月 21 日夜，国民党何键的第 35 军第 33 团，在许克祥的带领下，突袭湖南省工会和农会，发动了现代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

在这个事变中，被党组织调到这里担任警戒的王震与工人纠察队员一起，同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突围中，年轻的王震在战场上第一次负伤。

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长沙城，湖南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在随时都有被捕、被杀可能的危险境地中，王震忍着伤病奔波在岳州、汨罗、安源、武汉等地，继续为党作地下交通和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任务。

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湖南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震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王震与其他十多名知识分子党员一道流亡到武汉，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在这段时间中，历经千辛万苦，和党组织的关系几次接上又中断，但他的信念不改初衷。他在街头拉过黄包车、卖过荸荠，到鹦鹉洲头扛过树，在桂系军阀第一师李明瑞的司令部里当过上士传令班长，在湖北大冶铁厂作过工。一年之后，他和同志们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头。遵照党的指示，他带着扩大了的一支20余人的流亡队伍返回家乡，着手从事武装游击斗争。

1929年末，王震与徐沙、张正坤、苏牢等共产党人，组建了中共湘鄂赣边区长（沙）浏（阳）湘（乡）特区委和游击队。王震任特区委书记，并先后兼任游击队长、政治委员、支部书记。其后又担任了湘鄂赣边赤卫军第6师政治委员。他率领民众打击反动团防武装，惩罚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宣传革命道理，开始从事革命军事活动。

四

王震本名王余开，号正林。在从事武装斗争后，经常需要以他的名义出示布告。曾随他一起流亡武昌的几名秀才向他提议：“余开、正林，这名号不尽如人意。用‘王震’这个名字响亮，能镇住敌人，易唤起民众。”震，在汉语中是雷霆、霹雳、雷震的意思。从此，王震这个使人民敬重，令敌人畏惧的新名字诞生了。

王震还有一个著名的绰号——王胡子。这一绰号也是产生在家乡打游击时期。胡子，是湖南人对长者、智者的尊称。“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当时还只有21岁的王震，为了增强自己对人民的号召力，对敌人的威慑力，特意留了一把长须飘胸前。

青年时期的王震有勇有谋，率领游击和湘鄂赣民众把革命游击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不到一年时间，就把区联游击队发展成为拥有150余支枪，200余人的武装。在此基础上又组建成拥有1万余农民的赤卫军第6师。

这支部队不但能对地主武装作战，连国民党正规军也吃过他的苦头。他们还两次配合主力红军攻打长沙。因此这支队伍的领袖“王胡子”的大名，便在湘鄂赣边区大振起来。以至十几年后，王震到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是“王胡子”长，“王胡子”短的。

1930年9月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部队撤回到长沙郊区的郑头市。王震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他率领浏北游击队主力，参加组建主力红军湘东独立师。

三天后，王震率领一百四、五十人的精锐，携带110支钢枪，在边区群众震天锣鼓和鞭炮的欢送中，怀着一片依依不舍的深情，离开了家乡。

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1930年，王震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到1950年国内战争结束，整整戎马20年。这是7000多个交织着铁血与战火的日日夜夜，几乎日日枪林弹雨，夜夜枕戈待旦。

五

自1930年起，王震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团

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1932 年任红 8 军代理军政治委员，湘赣省军区代理司令员。1934 年 8 月，任红 6 军团政治委员，与任弼时、肖克率部西征。同年 10 月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 2 军团会师，参与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又兼任湘鄂川黔军区代理司令员。

1935 年 11 月，王震率部从湖南桑植出发，参加长征，一路斩关夺隘，于 1936 年胜利到达陕北。

在抗日战争中，王震任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纵横驰骋晋西北和晋察冀抗日前线，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 年王震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军政委员会书记、警备区司令员、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所部 359 旅被延安边区政府授予“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和锦旗。

1944 年 11 月，王震率 359 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任司令员，与王首道率部挺进粤边，南下抗日。翌年 9 月奉命北返，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6 年 6 月，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重重围困的形势下，王震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中原突围，返回延安。

解放战争中，王震先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 2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 2 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 1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在毛泽东及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率部保卫延安，转战陕北，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延安保卫战重要战役。此后又参与和组织运城、瓦子街、壶梯山、永丰等战斗，歼灭敌大量有生力量。后又率大军席卷甘肃、青海，挺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喀喇昆仑山和阿尔泰山。

在 20 年的战争岁月中，王震戎马倥偬，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从一名游击队队长，成长为威震中外的一代名将。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六

王震很早就接受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熏陶，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早在湖南家乡闹革命时，他便阅读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油印小册子。

在湘赣苏区时，王震曾两次作为湘赣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会下面对面畅谈，并多次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革命家、军事家研讨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原则。

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召开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之时。在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与王震交谈。毛泽东问王震：“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有人批评说我是三国的战术。我就是主张打埋伏，找敌人的尾巴和腰部打。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堡垒对堡垒，你对得赢吗？我还是主张‘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方针。”

虽然毛泽东当时已实际上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王震回到苏区仍向湘赣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1934年4月，在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肖克、王震指挥的红6军团却在江西永新县里田至沙市间，伏击敌43旅，取得了毙伤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2000余人的战果。这是红军战史上一次重大胜利战役，也是王震部队坚持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沙市战役的胜利纪念碑，纪录了这一光辉战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震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革命军事艺术，领会得更加深刻，也运用得更加自如和灵活。

1948年初，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王震奉命参加组织宜川战役。在选择战役突破口时，王震审时度势后，主张从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禹门口挺进。担任战役指挥的领导同志中，有人表示反对，认为他冒险。

王震说：有的时候，打敌最艰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代价最小。争论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支持王震。王震亲自组织突击队，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2纵2万余人浩浩荡荡，及时赶到宜川战场，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两个整师。

在同一战役中，正当我军准备发起总攻之际，敌第29军一名参谋被俘。王震决定释放这名俘虏，他在自己亲自使用的用红蓝两种铅笔标明的敌我态势图上写道：“呈刘戡司令长官一阅，王震”，然后命那名参谋带回敌司令部。

对此，当时有许多同志表示不解，认为这可能会暴露我军部署的军事机密。王震说，有时候，核心机密公开了比保密的作用还大。果然，刘戡在观看王震送来的作战形势图后，发现自己全军已成瓮中之鳖，挣扎反抗无望，遂自杀身亡。

刘戡一死，敌军心崩溃，全军阵脚大乱。我军乘势进击，大获全胜。宜川大捷，共歼灭胡宗南精锐部队5个旅，1个军部，计3万余人。毛泽东称赞：“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刘戡也是湖南人。此战后彭德怀对王震说：“你这个王震，净干这诡事情！要不是你这个玩笑，我们这位老乡还不至于自杀！”

1948年11月23日，敌76军1万余人全部集中在陕西澄城县狭小的永丰镇中。王震认为，敌人已如惊弓之鸟，龟缩在一起，且立足未稳，地形亦有利于我，宜及早发起总攻。若敌觉醒后展

开，麻烦诸多。但有同志认为，我军历来均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此次我一个军，敌亦一个整军，一比一，不符合我军以十打一、集中优势的作战原则。建议等待兄弟部队赶到后，一起围歼之。

王震说：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是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的精髓。抓住战机，就不可有丝毫犹豫。在兄弟部队配合阻援的情况下，王震率部果断攻击，一战毙敌 4000 余人，俘敌第 76 军军长李日基以下，共 1 万 1 千余人。此战创造了我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以一个军消灭敌一个整军的攻坚战的光辉战例。

七

敢于决战，敢于冲锋，敢于胜利，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地压倒一切敌人，这是共产党人所特有的精神和气概。这种精神和气概，在王震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和鲜明。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这样描述王震说：“他看上去有点象倔犟的牛”，“打仗极为勇猛”，“浑身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湘赣苏区作战时，王震临战总是身先士卒，曾多次与普通战士一起上阵冲锋。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此曾严肃批评过王震。

在长征路上，他作为红 6 军团的政治委员多次冲锋在前。战后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见王震手提一把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误认王震只是一名连长。

在延安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有一次曾批评王震说：“359 旅的干部负伤过多，根子就在你这个旅长喜欢带头冲锋。”王震说：“诚恳接受你的直率批评！”但是王震的老部下说：“他很难改，只要一听到枪炮声，他的脚心手心就会发痒！”

在荔北战役中对敌发起追击时，王震又一次要冲锋在前。绰号叫“二洋马”、个头一米九三的警卫员一下把他按倒在地。王震大骂：“你敢打人，你违反纪律，要是放跑了敌人，我枪毙你！”警卫员用力按着他说：“你别叫，今天是你错。你要枪毙我，也得等打完仗！”

在20年的军旅生涯中，王震曾7次负重伤，还有几次小伤不计在此。

八

1944年南下前，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是，由359旅派出一名团长，带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将3000余名党政干部护送到南方，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王震深知此行艰险，任务重大，便主动向毛泽东请缨。

毛泽东动情地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若抗日战争胜利到来的快，蒋介石便可能挥师围剿你们。你要准备全军覆没，其中包括你自己。”王震刚毅地说：“我全体将士，均抱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决心！”

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的党政军首长全部出动，亲临延安东关机场检阅南下支队，为王震和南下健儿送行。12月，南下支队胜利跨过黄河冰桥，进入中原。

漫漫南征路，确实艰难备至，险象丛生。

在得悉359旅主力南下后，蒋介石曾一夜三电命沿路各部，要不惜一切代价捉住王震。

国民党和日伪军重兵把守，沿途围追堵截，试图趁南下支队孤军深入而一举歼灭这支劲旅。王震避实蹈虚，机动灵活，千里

跃进，深入敌后。

1945年1月，南下支队在湖北大悟山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师。3月，南下支队解放湖南平江，5月进入广东。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后，中央即令王震率部迅速北返。南下支队跳出八面山重围，9月，回师鄂豫边。10月，组成中原军区。中原军区直接威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战略枢纽武汉三镇。国民党便调集20余万人包括西安、武汉空军，准备围而歼灭之。1946年6月下旬，我中原部队奉命行动。王震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对全局关系甚大的中原突围，为解放军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

1946年9月初，王震率部凯旋到达延安。当胡宗南得知王震已经平安抵达陕北以后，暴跳如雷，把桌上的笔筒、茶具摔了满地。

率孤军深入敌心腹重地，远离后方，进行长距离的无依托作战，这在战争史上，历来是兵家大忌，南征归来，王震那一头长发，两腮垂须，消瘦的面庞，褴褛的衣着，全都诉说着这九死一生的历程，一路风尘的艰辛。

在欢迎会上，毛泽东热泪纵横，说：“王震同志，你们走了二万二千里，跨越八个省份（陕、晋、豫、皖、鄂、湘、赣、粤）和全国著名的高山大河，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归来后，王震通过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的录音讲话，向全国人民宣告：“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南方归来后，王震立即斗志昂扬地投入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九

对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王震一向坚持原则，进

行斗争。

1930年11月，湘赣苏区执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兵分数路，试图攻打敌坚兵把守的几个大城市。

这时王震也接到于北路进攻萍乡和安源的命令。但王震没有机械地盲从命令，他不以弱兵力愚蠢地攻坚，却采用诱敌出城、歼其一股的战术，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奉命攻打其他城市的几路部队，则相继受到较严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左的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思潮，逐步在湘赣苏区蔓延开来。许多革命干部被审查、逮捕和遭受打击。

为此，王震与当时积极执行左倾路线的刘士杰、陈洪时（二人后来均成为叛徒）愤怒争吵，以至拍着桌子骂娘：“你们说这些人是AB团，他们的根底我们最清楚。我们一个铺上睡觉，一个锅里吃饭，说他们是反革命，说到天边我也不相信。”在这个时期，王震曾经保护了袁德生、王首道、张启龙、胡耀邦、张平化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

张平化，当时任酃县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却认为他是AB团骨干分子，派王震前去执行处决。

王震没有匆忙执行命令，而是先在群众中调查，知道张平化家有11口人，其中有7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他身为县委书记，却终年没有鞋穿，光着脚打游击，脚上的老茧连小竹尖都扎不进。王震断然否定了保卫部门和省委的结论。

延安整风时，任弼时说：“张平化福显高照，碰上一个大胆、负责、不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能大难不死哟！”

就在此时，张平化才知晓自己险些被处死的事。张平化感慨地说：“不要说派一个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就是派一个胆小怕负责任的人，我张平化也早去见马克思了！王胡子当时改变省委的决定，是要冒很大个人危险的！”

也是在延安的时候，王震才知道自己由于抵制左倾路线，后来也被列入了 AB 团的黑名单。

长征途中，王震率领的红 6 军团先行与红四方面军的前卫部队会师，张国焘派人送来宣扬分裂红军和逃跑主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小册子《干部必读》。王震见后扣住不发，当即下令，全部烧掉。

任弼时知道此事后对王震说：“王胡子呀，你的胡子就是硬！”贺龙也连声说：“烧得好！烧得好！”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广大官兵的共同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十

1941 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封锁，陕北根据地面临抗战以来物质供应最困难的局面。

1941 年 2 月底的一天，位于延安东南方，距延安 90 余里，往昔异常荒僻的南泥湾，忽然来了一行七、八人，他们当夜就借宿在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农民军挖的破窑洞里。这是 359 旅旅长王震，陪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到这里进行考察。

几天之后，王震就带领千军万马开了进来。王震带头冶铁、开荒、纺线。方圆几十里的南泥湾，被一阵阵歌声、笑语、军号声和自制槌头的叮当声，烘得火热，交织成一支雄壮的垦荒曲。一片片熊熊的拓荒篝火，染红了地，映红了天。由此揭开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序幕。

一年后，整个南泥湾出现了田园丰硕、猪羊成群、窑洞满山、市场繁荣的动人景象。

359 旅每人领到一条新毛毯和一套黄军服，为边区捐献了一

万石公粮。毛泽东为 359 旅题词：“生产模范”，为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

在现代中国，延安的南泥湾已经成为一方名胜，359 旅，也成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象征。一曲“花篮的花儿香”的南泥湾歌声，穿越历史，甚至穿越海峡，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支不朽的名曲。

十 一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当时任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王震回答：“夺取政权搞建设！”

毛泽东说：“准确地说，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王震当即表示：“全国解放后，一兵团指战员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

在这次会上，王震向毛泽东请缨要求解放新疆。

后来，中央指示王震准备进军新疆。行前，毛泽东特地邀请王震看京戏《西厢记》。毛泽东说，希望王震到新疆后，当一位红娘，作穿针引线的工作，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向中央军委建议，除保留一个国防师外，其余 8 个师的兵力转为从事生产，其中包括两个井冈山时期建立的红军师。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迅速批复，发布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说：“你们曾经是一支久经战斗考验的战斗队，你们又将成为经济建设的突击队。”

入疆部队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成为开发建设新疆的骨干力量。在王震倡议下，当即从香港引进日、英、

德等国的纺织、冶金、碾米、磨面等一批先进技术设备，兴建起纺织厂、水泥厂、钢铁厂、发电厂等一大批现代化企业。当时采用的转炉氧气顶吹技术，至今仍是世界炼钢行业的先进技术。这些建设项目，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十 二

在抗日战争中，王震率部破袭日寇占领的同蒲铁路。当时王震曾对战士说：“我是铁路工人出身。现在我带着你们破坏铁路，将来赶走日本鬼子，我还要带领你们修铁路。”王震真的言中了。

1953年冬，中央军委任命王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新中国的铁路修建事业。此时，新中国的铁路仅有两万余公里，全国平均每人拥有量不到3寸。

王震走马上任后，先去踏勘了准备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桥址。接着，他深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确定建设伊春森林铁路的路线。随后，翻越秦岭踏勘宝成铁路。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铁路大动脉不断地向前延伸。

十 三

1954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丰堂召见王震。见面时，毛泽东递给他一本孙中山的著作《建国方略》。王震翻看《建国方略》，注意到其中整整一章，讲的都是造铁路。而沟通华南和东南沿海的两大干线——黎湛、鹰厦线，也赫然标明其中。

王震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意。他向毛泽东保证：“我一定全力以赴，抢建黎湛、鹰厦线。为加强对工程的领导，我要把铁道兵总部机关从北京搬到现场。”“好，好，好！”毛泽东一连说了三个

“好”。

此时，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封锁我国的东部沿海，不仅阻挠了我对外贸易、海上交通，而且对我炫耀武力，妄图以炮舰政策对我进行威慑。周恩来说：能否打破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就要看两个“王”了。一个王，是指王炳南大使在华沙同美国的谈判；另一个王，就是指王震将军率领 10 万大军抢修黎湛、鹰厦铁路。

1954 年 9 月 15 日，各路大军云集两广，黎湛铁路全面动工。10 个月，铁路修通。1955 年 7 月 1 日，从广西黎塘始发的第一列火车驶到广东湛江。当欢迎的人群迎向列车的时候，人们发现驾驶着火车的那位满脸煤灰的司机，竟是铁道兵司令员王震。顿时，“火车头——王震！”“王震——火车头！”的欢呼声响彻云天。

黎湛铁路的修通，开辟了由内陆通向华南湛江港的一条新通道，打开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扇重要窗口。

鹰厦铁路起自江西鹰潭，经过武夷山区，到达厦门半岛，全长 700 余公里。其间地形、地质极为复杂艰险。1906 年，清王朝地方当局曾筹资兴建。但历时 4 年之久，仅修通 20 几公里的一段。

在工程设计阶段，有人曾估算，鹰厦路若全程通车，至少需要七、八年时间。但是王震向中央报告，决心在 3 年之内建成通车。

当时施工缺少足够的大机械，只好用机械加人力，共动员铁道兵 10 万官兵加 10 万民工，土石方工程量总计达 74 亿立方，相当于修建康藏公路土石方总量的 3 倍。1956 年 12 月 9 日，鹰厦铁路胜利建成通车。全部工程仅用 22 个月完成，比原计划提前 1 年，比原定财政计划节约 1 亿多元人民币。

其后，王震又率部修建了 190 多公里的从南平到福州的铁路。为永远铭记王震将军率部开通海隅、凿破鸿蒙的建路功勋，

祖籍厦门、50年代担任中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老先生，在自己精心设计的鳌园浮雕上，为王震和铁道兵专门铭刻了一幅《移山填海》图。

1991春，王震将军披戴着满首鹤发，登临俯瞰厦门的制高点，遥遥远眺当年曾呕心沥血修建的鹰厦铁路。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像是在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也是在缅怀那些献身于此的英雄们。

十 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王震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当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他向毛泽东递呈了一份“降衔申请”。在这个申请中，这位将军谈及了王震将军。他说：“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我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与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曾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这个申请，表现了许光达将军谦虚坦荡的胸襟，也从侧面反映出王震有功不居、为人民事业只知奉献的高贵品德。在授予上将军衔后不久，王震又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之职。

十 五

中国的屯垦事业始于西汉，而新中国的屯垦事业，则与王震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4年，中央接受王震的倡议，批准驻新疆部队集体转业，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转业铁道兵也在北大荒开始创办国营农垦企业。

1958年，在王震的动员下，北大荒肥沃的黑土地迎来了10万转业官兵，这支队伍成为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脊梁。接着，新疆的石河子、阿克苏又迎来成千上万名朝气蓬勃的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

自担任农垦部长后，王震常年奔波在新疆、黑龙江、广东、海南岛、云南等地边区的穷乡僻壤。1957年至1966年间的9个春节，他有6个春节在北大荒垦区度过，一个春节于新疆垦区度过。

开春时，王震曾亲手点燃烧荒之火，与农垦职工一道趟着寒冷彻骨的冰水播种。秋收时，他又与农垦职工一道驾着“康拜因”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里奔驰、收获。

他梦寐以求地关注着农垦队伍的壮大和农垦事业的发展。

当年，开垦北大荒的复转军人结婚难。许多官兵到了30余岁，还没有成家。有一年冬季农闲季节，王震发布了一道奇特的命令：每个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有完成任务，不准回来。

有些老兵反映：“我们这把年纪，不好找年轻姑娘。村里的大龄姑娘，多是地富子女，我们不敢娶！”王震说：“怕什么？地富子女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即使有问题，你也可以教育她嘛！地富子女你都改造不过来，还能改造世界？”

开春后，许多老兵们回乡娶来了新媳妇。一、两年后，北大荒就增添了不少军垦战士的第二代。王震回忆此事时曾说：“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个。”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王震率领着农垦职工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在新疆和黑龙江创建了一大批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也

带出了一支队伍，为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和巩固国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已经锤炼成长出一种“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农垦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承继着延安时代的南泥湾精神，形成一种代代传递的传统。它将被一代代的农垦人学习和汲取，化作农垦战士所特有的豪迈性格和精神气质。

30年前的西北、东北、岭南等穷荒之地，今日都已是新兴城镇拔地而起，星罗棋布。广袤无垠的田野上，荡漾着金色的麦浪和大豆香，成为中国商品粮的主要基地。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胶林、蔗林蔚然成片，补充了中国的战略经济资源。

1978、1990、1991年间，年过八旬的老将军又一次来到北大荒，来到新疆，来到海南。当年的许多老农垦战士闻风而来拜望王震将军。他们排成密集的人阵，欢声雷动，热泪成行。有的老战士对将军说：

“当年我们响应您的命令，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艰苦奋斗了大半辈子，献了青春献儿孙。这里的物质条件，相对内地来说，仍比较艰苦。现在您不顾高龄，来看我们，而且吃住在农场，说明您没有忘记我们，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王震将军以颤抖的身姿策杖起身，恭恭敬敬地向老战士们鞠了一个躬，说：“同志们好！我向你们行一个礼！”这时，全场泪光闪动，掌声与抽泣声汇合成悲壮的交响曲。

十 六

王震少年时仅在私塾中念过3年书。但他平生力学不倦，刻苦自修，成为一员嗜书如命的儒将。

无论是孩童时代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务农，作工时在长沙铁

路工人夜校，还是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只要一有可能和机会，王震总是嗜学如渴，勤奋读书。书籍成为这位铁路工人出身的武将平生最好的伴侣。

战争的实践，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在红军时期，每打下一座城镇，他都交代部下要为他收罗书籍报纸。长征途中，为了轻装行军，他抛弃了许多日常用品，但一些必读的书籍却仍带在身边。有一次挑夫老周在清理物品时，丢掉了一些书籍，王震竟扭头步行数里路，亲自将书找回。

在解放战争中，尽管戎马倥偬，军务繁忙，他仍责成新华社驻西北军事分社社长杜鹏程为他收罗书籍，挑选的书籍专门由一匹健硕的白马驮着，与他一起走南闯北。

在战争的间隙，以及在行军途中，王震常常手不释卷。有时正在行军，他边走边看书，入神处竟不自主地停下来，以至忘记了行进，警卫员催促他，他才猛醒。有一次正在骑马行军中，他把马缰绳挽在手腕上，马走马的路，他读他的书。忽然一发炮弹打到附近爆炸，马受惊甩下他跑了，警卫员去追惊马，而被弹浪掀翻在地的王震，连土也不抖一抖，躺在地上继续读书。

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年代，王震读起书来更是孜孜不倦。他所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既有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等政治书籍，又有《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名著。

担任农垦部长后，为胜任业务工作，做到以内行领导内行，他还研修《土壤学》、《植物栽培学》以及有关机械、电力、冶金、城市规划等各门学科的学术专著。科学院一位著名农学家曾与王震长谈，他惊叹说：“王震将军所拥有的农艺专业知识，竟不亚于一个农业大学的教授！”

十 七

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特别是重视和关怀知识分子，这是王震将军闻名遐迩的特点之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王震曾和一些知识分子一道流亡武昌。这时谋生十分艰难。一伙人主要靠王震在武昌街头拉黄包车、到鹦鹉洲码头上扛木料，来挣钱养活大家。

在 359 旅，王震立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任命为连长，初中毕业生则任命为排长。王震的这支部队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出了名。以至胡宗南麾下的一名少校军医，竟也弃暗投明，慕名投奔 359 旅。

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受到批判后，毛泽东指示，把他下放到战斗部队当文化教员。后来转战陕北时形势紧张，基层连队把他作为坏分子处决了。对此草率处理，毛泽东一直是不同意的。他曾不无惋叹地说：“要是把王实味放到王震的部队就好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王震会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还会照顾、安排好他！”

在解放后的若干次政治大风大浪中，只有王震敢于不怕非议，不避嫌疑，在他职权管辖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安排和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著名诗人艾青满怀深情地回忆道：“1957 年我不知道怎么卷进了丁陈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听说中央在讨论如何处理右派斗争时，有个将军报出来要我，我当时就猜到这个将军一定是王震。后来，他派郭小川来找我，我去了王震家里。我一进去，他从台阶上走下来，说：哎呀老艾呀！我是又爱你又恨你……”

艾青夫人高英补充回忆说：“到了王震同志家里，王震就把地

图打开，他说，十万大军转业到北大荒，希望你能去。当时整个的密山县城都驻了军人，住房很有问题。开大会，战士都坐在地下。王震同志开过来一辆大卡车，他站在车上向大家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叫艾青，是个诗人，你们知道不知道，战士们喊：知道！王震说：现在他来了，他要歌颂你们，你们欢迎不欢迎，战士们说：欢迎！当时，艾青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将军，以一身正气，温暖过多少处于逆境的知识分子的心啊！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回忆说：“1958年我受到了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错案的牵连，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黑龙江监督劳动。有一个星期天，王震同志来到我们队前，跟我们大家讲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一开始就这么说：我是到这里来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哇？他向我个人问起丁玲。我说，丁玲在北京等待处理呢。丁玲来信，她也很希望到北大荒来，希望王部长给予支持。王部长很爽快，一口答应说：她要来，我欢迎。这样，我就写信给丁玲。丁玲呢，在她自己后来的回忆里，叫《风雪人间》，谈了她自己当时的心情。丁玲说：‘王震同志对我的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冰天雪地人们的温暖，给人民的光明，令人从一点点微微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就因为你这一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噢！一根划亮的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温热，我一定要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这一年的6月，丁玲来到了北大荒。王震又亲自写信给农垦部副部长兼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细微而周到地安排了她的生活和劳动。”

在新疆主持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学有专长的地质学家王恒升被错打成美国间谍，要被判刑。王震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断然下令给予平反释放。释放后，王震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工作，给

予使用。后来这位专家把身上的光和热充分释放，在新疆勘察出一片片油田，一个个煤矿，为新疆地区的矿业开发作出了贡献。直到1990年，年近90高龄的地质专家王恒升教授来北戴河看望王震时，仍然热泪盈眶。

王震与大数学家华罗庚的真挚友谊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在华罗庚生前，王震与他过从甚密，亲如挚友。华罗庚去世后，王震特以“我的良师和挚友华罗庚”为题撰文，深情回忆了两人的交往，深切悼念了这位好友。其他如钱学森、吴宗华、臧克家、林默涵、姚雪垠、王玉珍、郭兰英等各界贤达学士，与王震都有着深厚的私人情谊。

性格粗犷豪放的王震，却十分善于与知识分子做朋友。因为他平等待人，能够与人推心置腹。当他们在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住房医疗方面遇到困难时，只要找到王震，他总是尽力协助解决。对他们的成绩、成果，他从不吝惜给予奖励、肯定和赞扬，对他们的弱点、缺点，则有时赤诚相见，直率批评，有时又委婉相劝，迂回引导。

所谓，“求才若渴，见贤思齐”，对这8个字的古训，王震将军确实是受之无愧的。

十 八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王震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了这个运动猛烈的冲击。对于群众的批评和误解，王震耐心诚恳地听取。但是，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蓄意攻击和诬陷，王震则怒如雷霆地坚决顶住，必要时即予以反击。

在一次批判会上，造反派把“三反分子”的黑牌挂到了王震

的脖子上。宁折不弯的王震一把将那个牌子扯得粉碎，他正气凛然地说：“我这个三反分子，是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个老三反分子！”

对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王震开始时很不理解。后来经过细心观察和冷静思索，他逐渐看清是有阴谋家、野心家在搞鬼，他们想搅混水，借文化革命之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一旦看清，他就寸步不让。

他看到住所的日历牌上有林彪的像，王震立即命令取下来。对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他多次提出尖锐的批评，在家里骂“四人帮”的娘，他还尽自己可能，在文革最紧张的时候，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和一些干部子女。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刚直不阿的王震一向又恨、又忌、又怕。他们极力罗织他的罪名，企图打倒他。但是无奈毛泽东曾与王震数十年风雨同舟，相知甚深，对王震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不肯相信那些诬陷。1967年冬，他把王震、廖承志等人召到中南海，名曰隔离审查，实则是保护起来。他曾批示要王震“闭门思过”。王震却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什么闭门思过，我要闭门思功！”

1969年国庆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王震的手说：“王震呵，有人呢，想打倒你，我看你是打不倒的！”

1970年，王震下放到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劳动。到农场后，他马上召回已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的“走资派”老场长、老书记们，召回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要他们领导和恢复农业生产。自王震来到这个农场后，这个亏损连年的垦殖场扭亏转赢，总产值和利润大幅度上升。王震关心群众，保护群众利益，为人民谋福利，与这个农场的职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6年，当王震重回红星垦殖场时，这个农场像节日一样轰

动了。职工们簇拥在道路两旁，争相和王震握手、寒暄，说：“欢迎王老回来探亲！”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王震奉召回北京。毛泽东提议他担任相当于副总理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加了“列席”二字，变成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政治形势下，王震协助周恩来、李先念等，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破坏，减小到最低程度。

1972年王震几次转信给毛泽东，对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起了重要作用。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在此期间，他所分管的铁路、交通、邮电、黄金、奶牛等生产，均打开了新局面。

1976年秋季毛泽东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王震为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如焚。这个时期他经常会同叶剑英、李先念一起商讨国事。遵照叶剑英的指示，他作联络员，秘密串联、沟通了一批老革命家，与北京卫戍区部队和一些在军队工作的老部下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共识，为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做了政治和组织准备。

在1977年3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和陈云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在会上，他还主张恢复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呼吁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和恢复一大批老同志的工作。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为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6年至1978年，王震分管国防工业第二、三、四、五、六机械部的工作。1978年3月，王震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他不遗余力地为改善我军装备，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军工生产转民用做了大量工作。

十 九

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王震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的重担，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1988年4月，王震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年逾八旬的王震，积极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仍然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王震说过：革命胜利后，最大的心愿之一是到工农业发达的美国看看，以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毛泽东的这一番话，给王震留下很深的印象。

1972年，中美两国建交后，对外开放的条件日趋成熟。王震坚决支持毛泽东及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提出的，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从国外引进化肥、彩色显像管、大型轧机等成套设备、先进技术的方针。他还积极支持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建设和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方针，王震都衷心拥护，并积极贯彻实施。

1979年，他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志，最早考察深圳蛇口，研究部署设立开发区的各项工作。

1984年他陪同邓小平，此后又多次到深圳、珠海、厦门、海南等地考察，对特区建设的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殷切

勉励各地要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曾满怀激情地回忆：“在特区的创办初期，具体说就是1979年11月，王震同志带领中央几个军工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深圳，一方面帮助深圳规划发展的蓝图，一方面帮深圳办起了一批很重要的骨干企业，带动了深圳经济的发展。1984年1月，在深圳特区建设的关键时刻，王副主席陪同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对特区的建设都做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这10年中王老多次亲临深圳，每当特区建设遇到困难的时候，王老都给我们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对这一点，我们特区人民以及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又一次见到王震将军，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将军说：“我们珠海市委、市政府非常欢迎您的到来，这次是第五次了。您对我们珠海市和经济特区的发展，改革开放，是非常的重视和关怀。经过这几年来，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当时的珠海特区，您跟叶帅来的时候，是一片沙滩，是荒山、秃岭。经过这几年就完全不同了，主要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正确……”

王震积极倡议海南设省，支持海南省洋浦区的开发工作。对于内陆省份的改革开放，王震也十分关心。尽管年事已高，每到一地，他仍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好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王震还多次与水利专家座谈，并到实地考察，积极支持并推动长江三峡工程上马。

王震始终不渝地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既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感到十分痛心，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又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认

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他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住所的客厅的正面墙上，始终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客人来访合影时，他经常嘱咐摄影师要把毛泽东的画像照上。

在1990年9月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他十分动情地对青年作家们说：“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他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我们党的兴旺发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建立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功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重大贡献，我们将愈益看得更加清晰。”

王震始终一贯地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曾深情地说：“《共产党宣言》，我没有读过100遍，也读过80遍。”“完全赞同党中央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1988年7月间，他在湖北考察，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电视系列片《河殇》，他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部政治片中存在一种歪曲民族历史、全盘否定中华文明、鼓吹全盘西化、煽动动乱和偏激情绪的不良倾向，这引起他的高度关注。回到北京后，他即找来录像带和解说词，认真观察和阅读。

1988年9月，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在座谈会上，他尖锐指出：“电视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诬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座谈会后，王震明确指示，他对《河殇》的批评要见诸报端。9月28日《宁夏日报》刊载了这一批评。这是全国第一家报纸公开批评曾被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赞扬过的《河殇》。

但是，吹捧《河殇》的文章，此时仍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港

台一些报刊也趁机造谣诋毁王震。一生饱经风雨的这位老战士，对这些风言风语，看得淡若浮云，而要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平生斗志，却愈是锐不可挡。

在1988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王震霍然拍案而起，他大义凛然地指出：“有部电视片叫《河殇》，它伤了我的心，也伤了中华民族的心……。”

他的话如金石掷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顿时爆发一片热烈的掌声。消息传开，许多老同志、老党员，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向王震同志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和敬意。

王震努力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坚决支持党中央、国务院为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所断然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坚决拥护和全力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1989年9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时值前苏联政局正发生急剧变化。王震指出：“国际风云的变幻，更加证明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比正确。”他勉励新疆各族军民：“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是无比灿烂光明的。”

二 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王震致力于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事业，十分关心民族自治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他曾先后率中央代表团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祝贺这些自治区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今后的工作指出了方向。他十分重视农林牧副渔

各业的发展，多次到农村和垦区考察，十分关心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关心垦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形成。他关注着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他关心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尤为关心教师特别是全国 3000 多万中小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生活待遇的改善。

1986 年，当时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邀请王震担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王震说，“我平生从来没有伸手要过官，这次可要争一争喽！名誉理事长我不当。要当，就要当有职有权的理事长，为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办一点实事！”

王震担任理事长后，为教师们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他还把帅孟奇、章蕴、刘英、林月琴、薛明、郝治平等 10 多位有影响、有声望的老大姐邀到家中座谈，商讨筹集奖励基金等事宜。他努力争取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并且自己带头捐款。

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现在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2 个计划单列市中，500 多个县建立了教师奖励基金会。几年时间，全国县以上基金会已募集基金 8 亿元，会同教育部门奖励优秀教师近百万名。

王震还担任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关心残疾人事业。

王震曾率团赴英、美、日、泰、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国访问。

1983 年他就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此后又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在担任国家副主席后，他多次接待和会见各国政界要人和五大洲的各国友人，为发展中国和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友谊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交往，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他对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德高望重的王震在日本社会和民间享有着崇高威信。

二十一

“宁知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在晚年仍然十分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憧憬着壮丽的共产主义的宏图大业。

王震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70 余载，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但他有功不居，只知奉献。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带头捐给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决定把自己的眼角膜身后捐献给后人。1980 年，他在新疆考察时，嘱托身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天山之颠，永远与新疆各族军民一道为祖国的西北边疆站岗放哨。1983 年 9 月 1 日，王震又留下遗嘱：“余若遇不治之症，则请让安详寿终，勿予抢救，是嘱。寿终后送太平间作病理、生理解剖。凡可作科研标本者，取下作科研用，余下送去火化。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

1993 年 3 月 12 日 15 时 34 分，王震将军在广州病逝。逝世后，将军捐赠角膜的遗愿得到实现。这是国际奥比斯眼科组织与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签订的协议中，第一个实现的承诺者。国际奥比斯组织认为，这是王震将军给人类留下的永恒的光彩。

1993 年 4 月 5 日，中华民族传统的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上午 11 时 30 分，一架银灰色的小型运输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腾空而起。12 时整，一朵朵鲜艳的月季、黄菊、玫瑰，伴着王震将军的骨灰，缓缓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

* 本文为电视片《王震将军》解说词，发表于《中华英才》，1994 年，总第 103 期。

在金色的瑞京^①

—

瑞金东北 15 里的叶坪村，古樟树参天屹立。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奠都瑞金，改称为瑞京。从此时起直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瑞京一直是红色中华的首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一个由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完全崭新的政权诞生了。湘赣苏区代表团党支部书记、湘赣独立师师委书记王震想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外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内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榨的历史，想到自己家祖祖辈辈当牛做马和自己十二三岁被迫离家、外出谋生的坎坷经历，彻底翻身得解放的灿烂希望如一轮朝阳，在他心间喷薄而出。

① 1992 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函请王震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撰写回忆文章。王震同志略略思忖，然后眉毛一挑：“就写 1931 年与 1934 年两次全苏大会期间，我几次拜会毛主席的情况。”十分遗憾，此后王震同志身染重疾，回忆未能成文。这篇《在金色的瑞京》或许能对此漏万补一。王震同志与毛主席在两次全苏大会期间交往的详尽情况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所著《王震将军文学传记系列——纵马湘赣》一书。

可能是全苏大会开幕后的五六天吧，毛泽东派人找到王震，说要和王震聊聊湘赣苏区的情况。

毛泽东住叶坪，不大的两间屋，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办公室兼会客室。王震站在毛泽东住所的门口大声喊：“报告！”

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从屋里响起：“是王震吧！快进来，进来！”

王震“咻”的一个军礼。毛泽东有力地握着王震的手：“前两天就想同你谈一谈啰！可全苏大会上事多，总是忙不赢，一直拖到了今天。”毛泽东亲切地让王震坐下，又给他斟茶。

全苏大会和庆祝大会上人多，又相距较远，现在，王震有机会仔细端详正在给自己斟茶的毛泽东：依旧那么有精神，但好像比一年前在镇头市见面时消瘦了一些；依旧是泛白的红军便服和草鞋，膝盖上还缀了个大补丁。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湘赣苏区的红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及军政、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情况。王震一一作答。毛泽东燃着一支香烟，夹在手间，偶尔抽两口。他的目光很专注地注视着王震，总是启发王震多讲，并不时插上几句，谈出自己的看法。

在王震眼里，毛泽东不仅是他十分敬重的知识渊博的学者、坚定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兄长。

当王震谈到湘赣独立师 1931 年打了几十仗，第一仗吃了甜头，消灭俘虏了敌人，缴获了武器弹药，第二仗便消耗掉时，毛泽东说：“你们打仗打多了，太积极了。假若你们那些消耗战不打的话，你们的胜利就更大了。不过也难怪，有时险恶的环境逼得你非打不可。”毛泽东把抽剩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摞，“非打不可也不打，创造条件，想尽办法躲避，还是那 16 个字：‘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湘赣根据地地形很好。你们

要背靠井冈山，向北向南、向东向西发展。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很有前途的。”

毛泽东问到了湘赣独立师政委谭思聪。

王震说：“原来的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的西路分委闹不团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主义作怪。石青等一些湖南人要保卫湘东，江西籍的西路分委领导要巩固江西的永新，甚至湘东特委的同志还怀疑西路分委的同志是‘AB’团和腐化分子。谭思聪同志没有这样看，而是做两边的团结工作。加上他坚决抵制立三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他在那里受到排挤和打击。”

毛泽东说：“你分析得对，湘东和赣西南的不团结，有一个地方主义的问题。地方主义，也可以叫做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要害死人哩！错杀袁文才、王佐，就有地方主义在作怪。现在井冈山根据地无法全部恢复，被反水的袁、王旧部占着，就是留给我们的反面教员和教训。至于谭思聪同志，我和他共事几年，”毛泽东打着手势说，“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听说你和李天柱、袁德生同志保护了他，这很好！不过，他在那里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准备把他调到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秘书长。”

听到要调走谭思聪，王震急了：“报告主席，谭思聪同志是湘赣独立师的台柱子，千万不能调！”

毛泽东笑了：“拆了根台柱子，湘赣独立师塌不了台，师委书记你一直兼着，师政委可由你来当嘛！不过，李天柱是块当政委的料。谭思聪生病期间，李天柱的师长你当了，你的代政委他当了！”

王震也笑了：“李天柱历代书香门弟，又是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我们给指导员讲课的稿子有不少是他写的！不过，主席，”说到这里，王震收敛了笑容，“有人说李天柱是反革命，和蒋介石有密切联系，上过黄埔军校就和蒋介石

有密切联系，就是反革命？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哟！”接着，他眼睛里闪着欣喜的神采，“恩来同志最近要从上海来瑞京，准备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委员，关于李天柱同志的情况，你可以向恩来同志如实报告。”

这时，王震一点也没想到，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便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指定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书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王明借此加紧推行其各项“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9月1日，王明主持下的党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长达1万2千字的“九月指示信”。指示信不顾事实，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人横加指责。在全苏大会召开前夕的11月初，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以“国际路线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诩，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观点和主张为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从而把毛泽东和朱德等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业绩诬蔑得一无是处。会议还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由项英接替代理，并通过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实际上也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当时已预料到王明“左”倾路线即将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他为谭思聪、李天柱等一批好同志受到排挤和打击忧虑，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忧虑。

王震在回顾当时那次谈话时说：“毛主席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十分高兴，但决没有想到是夺了

他在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并且已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没有给我透露丝毫的怨言和不满。”

过了1932年元旦，离春节不远了。就要返回湘赣根据地了，王震主动要求再拜见一次毛泽东，毛泽东很快预约了时间。

瑞京早晨的田野，空气分外清新，一畦畦碧绿的麦苗一直铺展到远处苍翠的青山。王震边欣赏大自然的美色，边哼着不成曲的小调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有的同志主张调你到鄂豫皖去，我说，王震熟悉湘赣苏区情况，还是回湘赣为好！”毛泽东边握手边说，“哪天离开瑞京呢？”

“阴历正月初一！”王震回答。

“哦？”毛泽东的眉毛一挑。

“我们商量了一下，这段时间，敌人正忙着灯红酒绿过春节，我们上路安全些！”王震解释说。

“你们这些鬼灵精，”毛泽东哈哈笑了起来，又问，“听说你最近训练原26路军起义的要求返回家乡的官兵，他们的情绪怎样？”

“是，主席！我还担任训练部的主任呢！26路军的士兵大都是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十分气愤。来到中央根据地前，由于受国民党所谓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心里还很害怕。来到苏区后，看到我们是工农掌政权，平分土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军队中官兵平等，士兵间亲如兄弟，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不回家了！有个连长叫李达，陕西眉县人，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生，很有指挥、训练才干。他说，打死他他也不走了，非要参加红军不可！我说当红军是要吃苦的。他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

“多少人不愿走呢？”

“我训练 500 多人，有一多半不愿走！”

“这很好呀！你可以带到湘赣苏区去嘛！”毛泽东呷了口茶，接着说，“《孙子兵法·治兵》里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就是说，对于用兵作战来说，教育和训练军队是首要的。在国民党将领中，冯玉祥严格训练军队是有名的。你们带这部分官兵回去，从中可挑些人当基层训练教官，改进和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军事上的战术、技术、单兵动作，没有什么阶级性，不管白军还是红军，都可以用！”

“是呀！我们过去只知打仗，对部队军事训练缺少一套章法。战士们都很勇敢，但个人军事技术跟不上，主席的指示很好，我们一定落实。可是，”王震皱了皱眉头，“26 路军人多是北方人，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在南方生活不习惯，不好带。”

毛泽东笑了：“他们做不好南方饭菜，你们可以派江西老表给当大师傅嘛，设法改善伙食。再说，人的习惯也是可以逐渐改变的。如果还有同志不习惯，到湘赣后又反悔了，想回家也可以，你们湘赣不那么困难，有钱，再发给路费送人家回家就是了！”

王震点了点头，接着问：“主席过去有过命令，抓住开小差的不能体罚，更不能杀，但如果有人拖枪走了怎么办？”

毛泽东当即回答：“网开四面让人家走。宁都暴动，带来了两万多条枪，人家背你几条枪你就舍不得呀，他愿背几条就背几条！”

王震被毛泽东博大的胸怀感染了，眼睛一亮：“报告主席，我全明白了！”

毛泽东又告诉王震：“在紧张的战争间隙，要抓紧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当前，要特别注意搞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动力和任务。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统治

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对农村控制则比较薄弱。加上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而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又集中在农村，所以我们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我们红军现在的力量，与敌人相比，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困难，不断遭到强大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决不能沿袭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的成规，必须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战略战术，开始以游击战为主，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便可以向运动战为主转变。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疲惫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从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认为运动战是‘疲于奔命’，放弃这一作战形式，硬去攻打敌人力量集中的大城市，就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王震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这番议论，实际上是针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而发的。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桌子边踱来踱去：“王震呢！还有个问题十分重要，这就是要十分注意纠正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苏区中央局已经下发了个文件，你回去后就可以看到了。从报告上看，你们湘赣苏区抓了不少人。反革命分子有一点，但决没有那么多。回去以后，凡是关起来又查不清楚的，都要放出来！”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转身从简陋的书架上取下三本书，“把列宁的这三本著作送你们，很值得好好读读！”

王震接过一看，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王震很是高兴：“主席，签个名吧！”

毛泽东接过书，翻开扉页，每本都签上很潇洒的三个字：毛泽东。之后，毛泽东抬头凝思片刻，又在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道：“请湘赣省委、省政府油印、石印，并请袁德生、王首道、王震、

李天柱、谭思聪各同志好生读读这几本书。”

1932年1月中旬的一天，王震来到周恩来住所时，光着头、蓄着长胡须、穿着灰布衣服、束着武装带的周恩来已在门口迎接。这时，周恩来已经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委员的工作。周恩来满面笑容地握着王震的手。

王震直截了当地向周恩来报告说：“有人说李天柱同志与蒋介石有联系，是反革命。我认为李天柱同志是位很好的同志。我给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毛主席说，你给恩来同志报告一下，恩来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

周恩来笑了：“那好，我现在开始问了，你觉得李天柱同志有哪些长处？”

“很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很会讲话，讲得有条有理，干部战士都爱听他讲课！”

“作战指挥怎么样？”

“也很好呀！不过毛主席说，我的代政委他当了，他的师长我当了！”

周恩来大笑起来：“主席说得很对！我也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李天柱是个好同志，你们应该信任李天柱同志！”

1986年5月初的一天早饭后，一缕朝阳从大玻璃窗上射进来，照在王震的一头白发上，当他回忆到这一段时，激动起来：“那时，我还不晓得恩来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分别听了毛主席与周恩来同志的谈话，才知道他们是那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参加全苏大会后，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湘赣代表团团长的袁德生和王震率湘赣代表团在会昌慰问红3军团时，见到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军团长。

彭德怀说：“毛泽东是位伟大人物。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后，我们有了一支革命的军队，但被敌人追得到处跑。他提出

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后，我们站住脚了，还是老毛高明。我是头湖南的犟骡子，让我佩服一个人很不容易，但是我从心眼里佩服毛泽东！”

二

1934年1月22日下午2时，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震耳欲聋的3声土炮响过之后，接着就是鞭炮声。“哦！开幕了！中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大家口中都低低地喊着，同时大家都顺序地向会场走去。

湘赣苏区代表团党支部书记王震和团长谭余保身着崭新的军装，容光焕发。

一阵掌声爆起。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出现在半圆形的讲坛上，他那洪亮的金属般的嗓音振奋人心：“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后，雄壮的军乐奏了起来。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在回顾了上一次全苏大会召开两年多来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后，用沉重而又忧虑的口气说：“现在，我们是处在对第五次‘围剿’的决战中，是处在最紧急的关头。”说到这里，毛泽东的目光离开讲稿，默默地扫视着会场。

王震追逐着毛泽东的目光。终于，俩人的目光在会场上空相遇。王震完全读懂了毛泽东沉重、忧虑的目光。

就在第二次全苏大会闭幕前两天，王震接到通知，会议一结束，中央和中革军委要听王震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的汇报，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

王震用两个晚上，赶写汇报提纲。

中央小会议室。

王震的汇报定在上午8点半开始。靠近墙壁的长条桌上的那架老式座钟，已经明白无误地标出8点40，参加会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其中包括俄文翻译伍修权、王智涛也都到齐，但主持这次湘赣苏区军事汇报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我党中央军事顾问李德仍不见踪影。

周恩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在会议桌的一侧踱来踱去。朱德和王稼祥低声交谈着。王震边翻阅自己的汇报提纲，边想：看来毛主席今天不会参加会了，已被完全排挤出了军事领导岗位。过了一会儿，博古与李德叽哩咕噜地说着俄语，边笑着走了进来。身材高大的李德，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一个职员家庭。他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后为躲避德国警察搜捕，到苏联从事军事问题的研究，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写过《论巷战战术》等军事论文。1932年，根据王明等人的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他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3年10月，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开始，大家对李德十分尊敬。但李德根本不懂中国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完全凭主观臆断指挥作战，并且作风简单粗暴，在博古的支持下，简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

博古首先看了看李德，见李德把眼微微一合，点了点头，使用食指敲了敲会议桌：“开会了！开会了！王震同志，你先汇报。”

王震开门见山，首先汇报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兵力部署：“这次进剿湘赣苏区的约10万人，主力是敌西路第一纵队刘建绪率6个师和1个补充总队。敌王东原第15师配置在宁冈袭市、新城、占城和茶陵的石陇以及郝县地区；敌陈光中第63师进驻莲花及其附近；敌朱耀华等18师在安福、峡江地区担任防务……”

王震正讲着，见李德抓起手旁的铃铛丁当丁当摇了起来，接着李德又讲了一番俄语。原来，李德对湘赣苏区的概况知之甚少，他对王震的汇报无法听懂。

“王震同志，请你先汇报一下湘赣苏区的概况。”博古说。

王震只好甩开提纲，先从“人之初”讲起：

“湘赣苏区，位于江西之西南，湖南之东南，有20多个县，纵横300余里。已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的群众有80万之多，如包括游击区域来说，即有百多万的广大群众……”

汇报这些“老掉牙”的概况，提不起王震多少精神。王震也注意到了，听这些“老掉牙”的概况，与会人已大部心不在焉，只有李德显得兴味盎然。

汇报又转到关于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问题上来。

王震呷了口茶，清了清嗓子，他认为下边所要汇报的是自己提纲中的“画龙点睛”处：“我来参加二次全苏大会前，弼时同志特意召开省委会，讨论了湘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

“这次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达10万之多，而湘赣红军兵力仅有1万多人，敌人兵力强于我10倍。面临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势，我们打算依然贯彻‘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16字方针，充分依靠湘赣苏区军民的力量，诱敌深入，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分散敌人兵力，相对地集中我军兵力，一股股地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有的同志，对运动战和游击战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特别是认为打游击不气魄、不过瘾。”

王震发现，李德、博古等人早就皱起了眉头，他没有理睬。

“我们作战的几套具体方案……”

一阵急促的铃铛声响起，王震抬头一看，李德抓着铃铛拼命地摇着，白皙的脸变成绛紫色，蓝眼珠里射出咄咄逼人的光，嘴里喊叫着：“停下！停下！你们中国的红军指挥员，是一群无知的乡下佬，中国红军的作战办法，典型的农民式的办法！”

王震那时还不知道，李德等人就是用此类语言经常嘲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

王震强压心头的怒火说：“不知道顾问先生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按‘16字方针’的精神打的，‘16字方针’是经过我们作战实践多次证明能够打胜仗的正确的作战方针和原则。”

李德正喝着咖啡，他通过翻译知道王震讲的内容后，哼了一声，然后举起咖啡杯，用轻蔑的口气问：“不知湘赣的这位王先生喝没喝过咖啡？连咖啡都没有喝过的人，怎么配谈作战方针和原则？”

王震不动声色：“我王震这人，没有多少特长，就是好奇心强，我13岁那年，到长沙谋生，路过咖啡馆，总想知道外国人喝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挣了第一个月工钱，我就下了咖啡馆！”

听了王震的回答，与会同志大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么请问王先生，是外国的咖啡好喝，还是中国的茶叶好喝？”李德素来严肃的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笑容。

“外国的咖啡是好喝，不过我是个中国人，”说着，王震举起手中的茶杯，“我自幼喝惯了中国茶，还是中国茶更对我胃口！”

一阵笑声响起，李德一脸尴尬，他恼羞成怒：“笑什么？你们这些山沟里的土包子。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对手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和原则，是请喝咖啡长大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以及意大利、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军事教官制定的，你们的那些游击主义的作战方针和原则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是短促突击的时代，是堡垒对堡垒的时代，是两个拳头打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消灭中国更多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占据一批重要的中心城市，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局势。”

“就在这两天，红6军团主力红17师已奉中革军委命开往宜春、分宜地段，准备北渡袁水，以会合湘鄂赣红16师再向北行动，破坏敌人的基本运输线——南浔铁路，直接威胁南昌，吸引赣东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留在湘赣苏区的红18师，必须迅速构筑堡垒，严防敌人进攻，不能放弃苏区的寸土。”

听到中革军委已命令红17师北上破坏南浔铁路的消息后，王震很是吃惊。红17师与红16师，加起来不过5000余人，而敌军在南浔铁路附近驻有数倍于我的重兵，红17师与红16师是很难完成北上出击任务的。而红17师是湘赣苏区的主力，一旦北上，湘赣苏区防守力量薄弱，面临强大敌人的攻势，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势必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

王震忧心如焚。望着李德盛气凌人的样子，王震在心里暗暗骂道：你一杯中国茶也没有喝过，你懂得个什么！

接着，博古讲话，说李德对湘赣苏区的指示如何重要，必须贯彻执行云云。会议要结束时，博古问王震还有什么话要讲。

王震把肩一耸：“哼，没有想到苏联高鼻子这么厉害，还没汇报一半就直摇铃铛！”

小会议室里哄堂大笑，笑得李德莫名其妙，直瞅着伍修权、王智涛，催促他们把王震回答的内容翻译给他听。这下可急坏了博古，他一方面朝王震瞪眼，一方面赶忙给伍修权、王智涛使眼色。

王智涛十分轻松地给李德翻译着，李德听后，高兴地笑了。离开小会议室时，他还十分友好地朝王震点了点头。这下子轮到王震和大家莫名其妙了。

博古陪着李德离开后，平时不多讲话、性格内向、曾留过苏懂得俄语的王稼祥憋不住笑了。大家逼他讲原因，他强止住笑说：“咱们的王翻译对顾问先生说，王震同志称赞您讲得好，不愧是共

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笑声简直要把会议室的房顶冲开。

中央政府附近小饭馆里，王震正在被闽西苏区二次全苏大会代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人“打土豪”。其他苏区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开会，组织上都发有微薄的路费，路上也大都略有节余。这样，到中央苏区开会的同志便成了被打“土豪”的对象，得请在中央苏区工作的“贫雇农们”嚼一顿。

正在这时，被选送到中央红军大学上学的湘赣红 17 师青年部部长刘道生推门进来：“王政委，毛主席刚刚把那批客人送走，请你去呢！”

王震扭头要走，张鼎丞把他喊住：“咱们可讲好了，我在这里等你，毛主席给你谈话的主要内容一定要给我透点风！”

“汇报的情况怎么样呢？”王震刚坐下，毛泽东便问。

“根本就不让我汇报完，这不，我的汇报提纲，您看看！”

毛泽东接过王震的汇报提纲，手里燃着一支烟，翻看着。

“很好呀！你的汇报提纲很好呀！”毛泽东说，“听了你的汇报后，参加会的领导同志作了哪些指示呢？”

“讲了不少，中心意思是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反对堡垒政策！”

毛泽东轻敛眉峰，沉思了一会儿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们的司令部又摆在哪个堡垒上呢？”

王震说：“是呀，敌人兵多枪多，我们和它兵将相对，怎么也对不过！”

“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

“没有看过，但我和那些大学生流亡武汉时期，听那些大学生讲过，三英战吕布、舌战群儒、出师表、六出祁山等，知道一点！”

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三国演义》中，到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以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是要用那个‘16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的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整块地盘，为红17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处。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很深就是了。我这番话，可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无关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到：“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

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并亲切地问到任弼时的身体、工作情况，“弼时同志对湘鄂赣苏区的工作过问得多吗？”

王震说：“没有听说他过问，不过他是湘赣省委书记，又不是湘鄂赣省委书记。”

毛泽东笑了：“看来你王震还不知，弼时同志是两个省的中央代表嘛！”

王震也笑了：“弼时同志谦虚谨慎，他从来没有给我们亮过他这个牌子。”

毛泽东站起来，给王震续了茶水后，双手叉腰，望着王震说：“原来，中央确定你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已建议滕代远、高自力同志去，你就别去了，正巧，弼时同志又专门来电，催你赶快回去。红17师北上南浔路后，你们湘赣苏区正处

在严重的危急关头，很需要你这样熟悉湘赣苏区的干部。王震者，湘赣人也，你王震还是回到湘赣，去数井冈山的石头吧！”

“二次全苏大会已结束，主席命令我回，我明后天就返湘赣！”王震说。

毛泽东又笑了：“看来你王震是个急性子，说走马上走。过两天，就是‘二七’大罢工11周年，瞿秋白同志要主持召开个纪念大会，你是二次全苏大会代表中唯一的铁路工人出身，秋白同志想请你参加大会后再走！”

临别时，毛泽东紧握王震的手说：“你们湘赣苏区群众基础好，地形也好，预祝你们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新胜利！”

王震望着有些憔悴的毛泽东，十分动情地说：“望主席保重身体！”

毛泽东说：“听说你得了疟疾，还未全好，你也要保重！”

王震向中央政府附近的小饭馆走去，依约去见张鼎丞。他走出很远，回头望去，只见毛泽东仍在寒风中站立，向他挥手告别。王震也翘首向毛泽东招手。蓦地，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在王震心头泛开，几多温暖，又有几多的忧虑和沉重啊！*

* 本文发表于1994年1月15日《文艺报》。

将 军 和 士 兵

—

徐国贤，原湘赣独立师老战士。1986年6月，他从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的一天，兴味盎然地谈了对他的老首长王震在湘赣苏区时期的看法：

“那时，我是个连级干部，行军时经常看到王胡子。他总是跑前跑后，前边紧张前边跑，后边有敌人追击后边跑。正常行军时，王胡子就钻到行军队伍里给大家唠家常，讲故事，搞得气氛很活跃。

“他老先生穿着很随便，有时看上去像个马夫一样，行军时经常光着脚。最可笑的一次，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草鞋，走起路来拐■着。

“他爱吃辣子，一听有辣子，口水就流下来了。他在长沙打工时，学得一手做饭的好手艺。一有时间，他就往连队跑，外衣一脱，衬衣袖一挽，和炊事班一起干开了，饭做好了，他和大家一起吃。一来自己可以吃顿可口饭，二来让战士们尝尝自己的手艺。

“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对大家很随便，大家对他也很随便，当面叫他政委，背后叫他胡子。他特别能吃苦，凡是吃苦、危险的事都有他王胡子。他对同志们要求严，但他对自

己要求更严，个别同志有意见也不好说什么了。

“他的缺点就是脾气急躁一点，有时候骂骂人，厉害时，跳着骂，不过他是有口无心，

骂过人家后，又笑了。他主要骂的是团职这一级，对下边倒是蛮客气，他对他的部下是真心好。大家是又怕他，又爱他。”

二

“班长，这是什么字？”胖乎乎，黑脸膛，看上去像有二十四五岁的战士谭成仔指着前边战士背包上的小黑板问。

“地主的‘地’字！”回答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瘦小的身材，一对机灵的大眼，肩上扛着一支汉阳造，枪托正好垂在小腿肚上，走一步，枪托击一下。

“什么叫地主呀？是不是地里长的什么东西？”谭成仔又问。

行军队伍里一阵哄堂大笑。

十四五岁的小班长止住笑，“地主可不是地里长的什么东西。地主就是家里有很多地，自己不种，雇几个长工或租给穷人种，自己靠长工或收租，好吃好喝的就叫地主！”

“噢，这就叫地主呀！我们安福叫老财。我还以为是我没有吃过的好东西哩！”谭成仔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脑壳。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就你谭成仔嘴馋！”一个响亮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哟！王政委呀！”小班长边走边回过头来，“政委，你推广的边行军边识字的办法很好，走了10多里，老谭就认了10多个字！”

前些天，王震下连队检查工作，谈到战士们学文化的问题时，连队同志们反映说，整天行军打仗，晚上一住下，既要站岗放哨，

还要给老百姓挑水扫地，学文化没得时间。王震请大伙想办法，最后决定一个班分几个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准备一块像背包大小的小黑板，上面写上字，行军时，夹放在背包后面，让后面的同志边走边认。每个学习小组学认的字不同，会认会写后，各学习小组可以交换黑板。

“谭成仔进步不小哩！你认认看！”王震指着谭成仔前面战士背包上的黑板说。

谭成仔一字一句地往外蹦：“我本是工农，千年痛苦都受尽，齐心团结是力量，打倒地主和劣绅！”

“哦嗨！你写信告诉你堂客，就说你快变成秀才了，再问问她，是陪她在家捉泥鳅好，还是在部队好？”王震拍着谭成仔的肩说。

谭成仔更不好意思了，小声地对王震说：“最近，我那位堂客让人给我捎口信说，乡里苏维埃也去人给她做了工作，她想通了，再也不拉我的后腿了，让我在部队好好打白匪。消灭了白匪，打倒了地主和劣绅，才没有人来压迫人，穷人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她还说，还说……谭成仔说着说着，结巴起来。

“还说什么呢？”王震故意绷着脸，噘着嘴。

谭成仔慌了神：“还说，还要问问我，白匪、地主几年才能消灭完，到胜利后再请假回家和她一块生个崽。”

“好你个谭成仔，还是要请假回家呀！王政委给你讲了半天大道理，算是白讲了！”小班长一听着了急。

谭成仔的脸憋得通红：“是她说要我请假回家，我没有说我要请假呀！”

“嗨嗨，她要崽她就生呗，她硬要拉你请假回家干啥哟？！”小班长觉得莫名其妙。

谭成仔的脸憋得更红了：“你、你、你……别看你是班长，政

治上、打仗上你比我懂得多，生崽的事，你一点也不懂，我、我不和你说了！”

笑声山响。

王震把眼泪都笑了出来，他边走边弯腰把嘴凑近小班长的耳朵，“你这小孩家，不懂就别乱说了！”

小班长“嗷嗷”叫了起来，“王政委，你又欺负人，用胡子把俺扎得生疼。上次你就保证过了，不再用胡子扎俺了！”

王震摸着胡子笑着说：“谁让你这小班长仗着不懂事欺负我们谭成仔来着！”

谭成仔也“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王震转向谭成仔说，“你也给你堂客说说，革命可是三年五载，一时胜利不了，再说革命胜利后咱们还要搞建设。你告诉她，只要部队工作允许，就放你几天假，回去看看老人、堂客，也好使你俩生个崽！”

谭成仔咬着下嘴唇，两个嘴角翘起，笑了。

原来，谭成仔入伍没几天，他的堂客找人带信说，她身染重病，要他赶快回家。部队放了谭成仔几天假。谁知，谭成仔回到家，他堂客穿着新衣服，头发梳得油光，在家给他做好吃的等着他呢，谭成仔气得当时就要返回部队，他堂客泪水双流，抱住他不放。第二天，谭成仔要归队，他堂客说：“你从小就爱吃泥鳅，咱们今天到田里捉泥鳅，今天吃顿泥鳅，明天再走！”第三天，谭成仔又要上路，他堂客说：“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再见面，你说啥也要陪我走趟娘家再走！”第四天，堂客又找理由，谭成仔心又软了。这时，村苏维埃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把谭成仔送回了部队。

大家说谭成仔是“逃兵”，要开他的批判会。王震知道了，说谭成仔是请假回家的，不能算逃兵，批判会不能开。

王震找到谭成仔，和他单独谈心：“我们有个侦察兵，和你姓不同，名字一样，叫段成仔，个头比你还高大，弟兄3个，一个比一个壮实。他父母双亲都是50多岁，身子骨都很硬朗，一家人都很勤劳，按理说，家里的生活应该过得很殷实吧？可是不。他家租了地主十几亩挂在山坡上的薄田，长年累月忙，一根肠子填半截。段成仔的大哥刚把媳妇娶进门，狗地主便起了坏心。段成仔气不过，砍了狗地主一刀，跑来参加了咱们的队伍。一次他去侦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抓住。那个挨了一刀的狗地主听说后，跑了数百里赶来参加审讯。狗地主帮助策划，敌人先是把段成仔绑到电线杆上，用鸟枪打烂他的身子，然后剁掉他的四指，用几百斤木炭放上辣椒点着熏，熏得他口渴，敌人便给他灌尿，再问他说不说。段成仔不愧是一名坚强的战士，依然严守我军机密。敌人恼羞成怒，又极残忍地挖了他的眼睛，割了他的耳朵、鼻子，最后五牛分尸……”

听着听着，谭成仔泣不成声。

王震接着说：“谁都想过安稳的小家庭生活。可是，不打倒老财，不消灭白匪，不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万恶制度，我们穷人家谁也别想安生！”

谭成仔主动在全连检查自己，末了发誓说不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万恶制度，决不回家。全连为此还给他鼓了掌。那掌声更加坚定了他的“不胜利，不回家”的决心。

“同志们，樟树镇要到了！大家赶快走呀！”王震高声吆喝着。

一阵激烈的枪声，樟树镇敌保安团全部被歼。

樟树镇，赣江中游清江县县城所在地，商贾云集，十分繁华。这里又是著名的药都。早在东汉时期就名扬四海，至明清时已成了南北川广药材之总汇，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

之美誉。王震此次带部队攻打樟树镇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湘赣红军医院买药品。

红军医院的同志忙着购买药品。王震也顺街走着，边向两面的铺子里东张西望。

他在一家货摊上发现了牙刷、牙膏和牙粉：“先生，劳您驾，给拿来看看，多少钱呀？”

“牙刷一毛钱一个；牙膏一毛二分一支；牙粉五分钱一包！”

“他妈的，奢侈奢侈！”王震边掏钱边自言自语地说。

王震买了一支牙刷，一管牙膏，两包牙粉。不过，没过多久，王震便后悔牙膏买少了。因为牙膏刚用了半管子，滕代远路过湘赣根据地，要王震把自己剩下的半管子牙膏“赠送”给了他。王震在长沙当铁路工人时刷过牙，那时天天刷，一天不刷不自在。回家乡打游击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条件再刷牙。

王震走到街心，举着牙刷、牙膏和牙粉，对正在逛铺子的干部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每人可买一把牙刷子、一包牙粉或者一支牙膏。只要打不死，革命胜利了，大家还都要讨老婆，现在就要把牙齿保护好。”王震知道，干部战士每人每个月5毛钱的菜金，大家用不完，口袋里都有些零用钱。

“王政委呀，我有老婆了，就不用再买牙刷、牙膏保护牙齿了吧？”谭成仔眯着双眼，一脸顽皮相。

“你这个谭成仔也调皮起来喽！你不是还想和你那个堂客生个崽吗？你长年不刷牙，请假回家了，人家嫌你嘴臭，不让你上床，你生个鬼哟！再说，革命胜利了，天天大鱼大肉的，你牙齿不保护好，那福你能享呀？”

“噢，有道理，我也赶快去买去！”谭成仔转身跑去。

三

1932 年暮春的一个清晨，天刚微明。王震翻身下床，刚穿好衣服，嘹亮的起床号便响了，那时，王震还不知道人体内有生物钟，但他知道自己晚上不管睡得再晚，第二天早晨 6 点钟前一定会准时醒来。

昨天，五连刚从白区执行任务归来，王震信步向五连走去，想看看同志们。

王震来到省苏维埃政府门口，只见政府大院里“哗啦啦”开出一支 10 多人的小队伍。最前边的是一个梳着一对小抓髻的 10 岁左右的小姑娘，她手里摇着一个三角旗，三角旗上写着“轻骑队”3 个字。三角旗后面跟的是一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看样子也就是十一二岁，正扛着个虎皮褥子。胖小子后面全是 10 岁上下的孩子。一个头顶上留着根朝天辫的小家伙跑到虎皮褥子跟前，边“哧溜”着清水鼻涕边说：“徐队长，咱们把袁主席的虎皮褥子没收了怎么办？”胖小子把手一挥，“送给红军呀，这是咱们儿童团轻骑队拥军的一个实际行动！”

儿童团，根据地的骄子，就像一个家庭中被大家宠着的黄口小儿，既活泼可爱，又稚气顽皮。不过，儿童团可给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传递情报、回收弹壳、站岗放哨、捉赌禁大烟、管理豪绅地主，儿童团都是主力军。最近，儿童团又成立了个轻骑队，职责是协助维护各机关内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如早晨 6 点一响起床号，必须准时起床出操，谁稍有懈怠被轻骑队查获，当天墙报上的“贪睡迟起者”的栏目里准有谁的尊姓大名。晚上熄灯号一吹，没有要事的，一律灭灯，以节约灯油。一次，王震在省委谈工作，熄灯号响后，依旧燃着两盏灯。轻骑队来了：“为什

么还不熄灯？”“我们还有些工作要谈呢！”“谈工作也不能浪费呀！一盏灯足够了！”“噢，对不起！”王震边说边灭了一盏灯。“以后注意点！”“是！”

儿童团的轻骑队执“法”甚严，铁面无私。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触犯了哪个条文了呢？

王震走上前去，高声叫道：“轻骑队徐队长！”

小胖子“啪”的一个立正，“到！”其他孩子们全部站住，齐声叫道，“王政委早！”只有小胖子不断地眨着眼睛，意思很明白，“王政委怎么知道我的姓呢？”

王震微笑地望着小胖子，问虎皮褥子的来历。

小胖子说：“我们昨天早晨就来省政府检查，起床号吹了5分钟了，袁主席还没有起床，后来他起床后，我们发现床上垫着个虎皮褥子，这怎么能行呀？！我们就给他做宣传工作：‘红军指战员在前方流血牺牲，奋勇作战，我们怎么能在后方摆谱享清福？’袁主席说：‘我有腰疼病，垫着虎皮垫子就舒服些，现在我接受你们批评，今天晚上就不垫了！’可我们今天早晨查他，他还垫着。我们就给他没收了，准备把这胜利品慰问红军去！”小胖子说着说着，搔着脑袋，“咦？王政委，这虎皮褥子您就铺着吧！”

王震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说：“我铺？你们还不抓我个腐化分子哟！”

小胖子笑了：“哪能呢！您带着战士们在前方冲锋陷阵，劳苦功高，本来就应该享受享受呀！”

王震拍着小胖子的后脑勺：“我比起袁主席来，他更是老资格，1923年的老党员，在安源煤矿领导工人闹革命，又黑又深又潮湿的井下，他受尽压榨，落了个腰疼病。他一是老资格，二是又有腰疼病，还是他铺才合适！”

“报告王政委！”小胖于立正敬礼，“您讲得很有道理，我们

现在就把虎皮褥子给袁主席送回去！”

王震微笑着把这支小队伍目送到省苏维埃大院。

王震来到五连。五连休息。有的战士边哼小曲边擦枪，有的洗衣服，有的趴在床铺上在认字，还有的蒙头睡大觉。

王震一进屋，战士们都站了起来。王震示意大家坐下，指着蒙头睡着的战士轻声问，“怎么啦？是不是又病了？”

被问的战士摇着手说：“报告政委，不是生病，是睡懒觉，不需要吃挂面！”

其他战士都笑了起来。笑声惊醒了被窝里的战士。那战士睁眼一看，王震政委站在床头，便急忙穿衣服。王震按住这位战士的肩膀说：“上次假日来，我就发现你这个位置的没起床，今天来，又是你这个位置的没起床，我还以为是又病了昵！没病就好。你们这趟到白区执行任务辛苦，今天又是你们连的休息日，困了就好好解解乏，别忙起床！”

这位战士不好意思地说：“哪敢再睡呢！怕你又交代炊事班给做病号挂面哟。”

王震笑着说：“休息日，去会会周公也可以，但不能在那里一呆就是大半天。还要安排点时间学点文化。下次我再来，若还碰见你在梦周公，那我就不客气了，非请你吃顿挂面卧鸡蛋不可！”

正说着，一阵香味飘来，王震“哧溜”一下鼻子：“嗨，你们中午吃红烧肉呀！”

“哟！王政委，你的鼻子好灵！我们连昨天从白区返回时，打了一家土豪，搞到了两头大肥猪。”

“谁去通知一下你们的连长、指导员，到炊事班去一下，我在那里等他们！”王震转身向炊事班走去。

等连长、指导员赶到炊事班时，只见王震已挽起袖子，挥动

着铲子翻动着，他挑起一小块肉，递给炊事班长：“你尝尝，现在正好吧！肉也不能烧得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就木了。”

炊事班长边尝边夸奖说：“好嫩哩！王政委，没想到你还是一把好手呢！”

王震得意了：“那还用说，我12岁离家到长沙，跟一家饭铺老板学过几手呢！哪天得空了，我把全师炊事班长集合起来，给你们培训培训！”

“好吃，香极了！”连长、指导员品尝后也异口同声地称赞。

“好吃，别光想着你们自个呀！其他连队也让尝点嘛！”

原来，王政委把他们叫来不是让他们尝肉的。风云突变，连长、指导员面面相觑。

“你们二位是不是属鸡的哟，光扒拉着为自己呢！现在敌人对我们搞经济封锁，大家的日子都比较困难，你们倒好意思把两头大肥猪埋伏起来，心也不发虚，脸也不发红？！三大纪律的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我看你们全忘了！当然，这次你们去白区，任务完成得不错，你们也很辛苦，领导上会考虑照顾你们的，现在倒好，你们自己照顾起了自己……”

还是连长灵光，忙怯生生地叫着“政委”说：“完全是我们的本位主义思想在作怪。以后我们一定改正。现在我去通知其他连队来分肉吧！”

肉很快分完了。

“猪内脏全部归五连！”王震宣布。

接着王震一方面吩咐人去找李天柱师长，一方面让人去找来石灰，王震熟练地把两副猪肠剥开，用石灰搓净，洗了几遍，切成丝。他刚刚把猪肚炒辣椒做好，李天柱来了。

“老李，咱们俩今天就打打五连的‘土豪’，在他们这里吃饭了，请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李天柱和全连都夸猪肚炒辣椒好吃。

王震说：“我是王婆卖瓜，不不，王老汉卖瓜自卖自夸。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

李天柱又捧着个棒子骨啃了起来。王震便开始“将”起了李天柱的“军”。

“五连的同志们，咱们的李师长，黄埔军校的高才生，特别擅长学他们的校长蒋介石讲话，他打了咱们五连一顿‘土豪’，咱们也不能让他白打是不是？咱们现在让他学一次蒋介石的讲话好不好？”

“好！”全连百十号人，都扯着嗓子叫起来。

李天柱扔掉棒子骨，双手叉腰间，学着蒋介石那种尖中略带沙哑的嗓音：“本校长……”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四

侯梯云接受改编后任副团长。有人嘀咕说，一个“土匪司令”，一加入革命队伍就给这么高的官位，合适吗？改编后的第二天，即在高城打了一仗，侯梯云一人俘虏 10 多个敌人。侯梯云勇敢，枪法很准，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他瞄准敌人碉堡上的枪眼射击，百发百中，弄得敌人苦不堪言，哭笑不得。曾任过湘赣苏区独立第 3 师政委的袁任远说：“在当时的红军将领中，枪法最好的一个是罗炳辉，另一个就是侯梯云了。”侯梯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提高也很快。王震是侯梯云的入党介绍人。1931 年 11 月初，侯梯云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 3 师师长，不久，又被调到攸县、安仁一带搞地方工作。1932 年春，侯梯云率湘南游击队赴永新会战，王震与侯梯云又见面了，俩人握手、拥抱，相互

给上一拳，亲热得没个够。

“侯老兄，怎么样，还是光棍一条？”

“是，一条光棍。”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好啊！”

“走，我做东，咱们吃上一顿去！”

王震拉着侯梯云来到澧田街上的一家小饭铺前。老远，王震就冲着饭铺叫：“小周，今天有贵客，来几道你最拿手的菜！”

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迎了出来，脆生生地说：“王政委可是稀客呢！”

“这是小周，周雪莲。”王震分别给两人做介绍，“这是我们的侯师长。”

侯梯云不经意地打量了一下周雪莲：小巧的身材，结实匀称；胖胖的圆脸，白里透红；长长的睫毛下，忽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

俩人刚坐定，两杯热茶便沏了上来。功夫茶没喝两杯，清蒸鸡、红烧鱼、竹笋腌腊肉摆上了桌。

“好麻利！”侯梯云不禁暗暗喝彩。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丫头很“刁”，但筷子一伸，不得不由衷地叫道：“好手艺！”

“怎么样？”从饭铺一出来，王震便问侯梯云。

侯梯云故意“顾左右而言它”：“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没想到这样不起眼的小饭铺有这样可口的好饭菜！”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问你人怎么样？”

“说实在的，人长得俊气，饭菜做得精美，就是不知政治上可靠不可靠？要是政治上可靠，我这个出身泥陶窑匠的穷人家，能讨上这样的好媳妇，也就心满意足了！”

“噢？”王震思忖了一下，咂了咂嘴：“唯一的缺陷就是政治

上不开展，听说派她做几双拥军鞋，你猜她说啥？‘我哪有那闲工夫做鞋哟！我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多炒卖几盘菜多赚点钱哩！’”

侯梯云倏地皱起了眉头，一副沮丧样。

王震“扑哧”一声笑了：“政治上不开展，没得多大关系，只要脸蛋漂亮就行！”

“那可不行，这样落后的媳妇讨不得！”

王震“哈哈”大笑起来：“放心吧！我的侯师长。周雪莲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妹子哟！我一直没有舍得给别人介绍，就专等着你老兄哩！”

原来，周雪莲是名能干的游击队员。第三次反“围剿”时，湘赣独立师要撤出永新，几十名伤员一时无法处理，王震便把伤员分留在澄田与禾川镇的几十个贫苦家庭里。王震还指名让周雪莲留下负责。为了掩护其身份，组织上还给周雪莲留了一些钱，让她与她表妹夫妇一起开了一个日用杂货铺面和一个饭铺子。周雪莲边开饭铺，边织袜子，卖钱与群众们一起养活伤员。白匪进占禾川镇与澧田后，周雪莲和群众与敌人虚于周旋，竟不露半点破绽。白匪退了，红军回来，几十名伤病员平安无事。为了应付突然情况，组织决定周雪莲继续用饭铺和杂货铺掩护自己的身份。

侯梯云刚直、豪爽，一腔侠义心肠，听了对周雪莲有勇有谋保护红军伤病员的介绍，一股钦佩、敬服之情油然而生。

“怎么样？同意了吧？”

侯梯云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等等我，我回去给小周说说！”王震转身又向饭铺奔去。

这王震，性子好急。

周雪莲正在洗盘子。

王震单刀直入：“小周呀？我这人嘴馋，总想吃别人的喜糖。我来给你做个大媒怎么样？对象嘛，就是刚才的侯师长。姑娘家，

脸皮薄，摇头不算点头算，同意不？”

周雪莲没点头也没摇头，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对不起，王政委，我已经有老公了！”

“噢？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王震急了：“有了也好呀，我也不想棒打鸳鸯飞。不过，想来你也知道，侯师长对党忠诚，为人刚直厚道，武艺高强，我原想你俩倒是挺般配的！”

“哟，王政委，这么好的人你怎么不早点给我讲一声呢？早点讲一声这不成了，现在我有老公了，那有什么办法，这事只能怪你王政委，可怪不得我小周哩！”

“对不起，请问找的哪一位，让我给参谋参谋。”

“这个……暂时保密。”小周的脸再也绷不住了，“格格格”地笑了起来。

小周这一笑，算是露了馅。王震这才松了一口气：“好你个诡妹子，什么时候学会诓人的，吓了我一跳！”

“我还诓人呢，不让人合起伙来把我卖了就成！”

“你这个小周，倒会转弯抹角批评人。”

小周又笑：“现在不是兴讲男女平等，你们两位大首长驾到，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却把我蒙在鼓里，一点风声不给透，这能算平等吗？”

侯梯云在路上等得有点着急，见王震从饭铺里走来，急忙问：“怎么样？”

“我看是成了！”

“小周怎么回话？”

“说是再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怎么是成了？”

“这个你就外行了。对姑娘家来说，那‘考虑’就是‘同意’的意思；那再考虑呢，就是再一次表示同意的意思，我说侯老兄，

你就准备着哪天结婚就是了，要不，你、我、李天柱，咱们3人同天举行婚礼！”

“哟？你和李天柱也都对上了象？”侯梯云惊喜地问。

“对不起，抢先一步。对象是李贞同志的妹妹，军区医院的护士，名叫李新兰。李贞同志是本人的大媒。”

侯梯云和周雪莲结婚后，夫妻十分恩爱，两人都很感谢王震这个月老。

1933年春，侯梯云率部队在家乡湖南安仁县开展工作，陷入敌人重围。他吼声如雷，与敌人对刺，接连刺倒近10名敌人，最后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周雪莲痛不欲生，几乎整日以泪洗面。

王震、李天柱、肖克、蔡会文、袁任远等不断前来探望，加以劝慰。

周雪莲对王震说：“我要为梯云修座贞节牌坊，一是表示为梯云守节，不再结婚，二是对梯云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表示纪念！”

王震沉默良久后说：“小周呀！你和侯师长夫妻一场，自然会对侯梯云同志可贵的品质、精神感受得更多。我完全赞成你提出的为侯梯云同志修建纪念碑的建议。这样以鞭策我们，激励后人。我想，这个纪念物不要叫贞节牌坊，叫纪念碑好。侯梯云同志是位共产党员，又是个红军师长，你小周又是位共青团员，叫贞节牌坊封建色彩是不是太重了点？另外，这座纪念碑也不要以你个人名义立，要用澧田各界人士的名义立。若以你个人名义立，敌人来了，你就不好站住脚了。你对侯师长的感情极深，想为侯师长守节，大家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还很年轻，今年才21岁，以后的日子还很长，至于再结不结婚，以后再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节哀，不要搞垮自己的身体。”

王震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语，说得周雪莲连连点头：“王政委，你和梯云交情最深，将来的纪念碑上请你写字！”

王震说：“我是大老粗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李天柱的家是世代书香，祖父是翰林出身。李天柱自幼习墨，还是请李天柱同志写！”

没过一个月，澧田街头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据王震回忆，碑中间镌刻的是李天柱书写的遒劲大字：“红军烈士侯梯云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两旁，还有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可在湘赣红军突围西征后，敌人侵占澧田，把这座纪念碑捣毁，但如今仍尚存半截未被毁掉的纪念碑柱子，柱子上“为革命牺牲精神宛犹在”的工整笔迹，清晰可见。

纪念碑修好后，周雪莲悲痛的心情逐渐平复。

王震拉着李新兰一道给周雪莲做工作，动员张启龙、李贞夫妇也去做工作。

第一次，周雪莲仍坚决表示不再婚。第二次，稍有松动。

王震第三次来到周雪莲的饭铺里。

周雪莲对王震说：“我们共产党不是讲婚姻自由吗？我乐意为梯云守节，这有什么不好？”

王震说：“你自愿为梯云同志守节，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也没有多大的好。表面上看你愿意再婚就再婚，不愿意再婚就守节，多自由。其实呢，你乐意守节，实质上是受从一而终的封建阶级思想的束缚，这本质上是一种不自由。我也说过多次了，你还很年轻，守节终身，生活上会遇到不少困难。我们共产党并不主张做‘清心寡欲’的清教徒。梯云同志假若在世，让他安排他自己的身后，恐怕他也决不会同意你这么做。小周呀，你也知道，我和梯云同志是无话不谈，他生前遇事总是找我商量，很尊重我的意见，我希望你像梯云同志那样尊重我的意见！”

秀眉大眼、留着短短剪发的李新兰说：“雪莲呢，我看老王讲得蛮有道理。若有合适人，就再找一个吧。”

周雪莲叹了口气：“王政委，我看你非把我逼上改嫁这条道上才甘心。”

王震惊喜地问：“同意了？”

周雪莲说：“我只好考虑考虑了！”

王震紧抓不放，“咱们还按老规矩来，你说同意考虑，我就当成是同意。那我就为你物色了，这次带到你这饭铺之前，一定会事先给你讲一声，免得你小周利嘴快舌的，再刺我一顿哟！”

其实，王震的心里早就有谱了。王震要给周雪莲介绍的就是当时任独立12师政委的袁任远。袁任远，湖南慈利人，少时读过四书五经，青年时代受过高等教育。“五四”运动时，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出走南洋，又目睹了殖民统治的罪恶，决心回国投身革命，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后来转战到湘赣。袁任远中等个头，外表英俊精干，性格温和宽厚，是湘赣红军有名的儒将。

王震先找到袁任远，袁任远对王震说：“那你就试一试吧！”

王震又找到周雪莲，周雪莲红着脸，小声说：“那得等到过了梯云牺牲一周年之后。”

1934年春，洞房花烛，袁任远与周雪莲在永新举行了婚礼。结婚时，新郎、新娘一定要请王震当证婚人。

结婚后，袁任远与周雪莲互敬互爱。周雪莲乳名叫什么梅，袁任远称周雪莲一直是“梅妹、梅妹”的。两人白头到老，合好百年。

王震当月老的事儿不少，经他撮合成的，既有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有红军的基层干部，还有普通的红军战士。

王震说：“1934年1月，我在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毛主席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包括穿衣、吃饭、

疾病、卫生、婚姻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若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毛主席这一番话，我听起来特别感到亲切，印象很深。婚姻问题，看起来是小事一桩，但对个人来说，不仅是一件大事，而且是终身大事，你帮助大家把这一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无论是打仗，还是工作，劲头更足。所以，我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总是把大家的婚姻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作为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来看。”

这是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 本文发表于《传记文学》，1993年第1期。

将军和故里

人人都爱自己的家乡，我也爱自己的浏阳。

——本文主人公的话

碧绿的禾田接着碧绿的禾田，1965 年早稻大丰收的征兆，在湖南省浏阳县的大地上袒露。禾田里，散落着中耕、施肥的劳动人群。

一个年轻人正边哼小曲，边撒石灰肥。他腰板得绷直，像名正在接受将军检阅的兵士。从畚箕里抓起石灰，顺手一扔，石灰粉随风飘散开去，散落在禾叶上，禾心里。

没料到，倒真有人在检阅这名兵士哩。

一辆小轿车“嗤”的一声，停在公路旁。车上下来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只见这位长者将裤管一挽，鞋袜一甩，趟进水田，朝施撒石灰的年轻人走来：“喂，小伙子，你休息一下，我帮你撒上一会儿。”这位长者从年轻人手里接过畚箕，弓下腰，顺禾垄，将一把石灰粉顺风施入禾苗的根内。

“四月八，冻死鸭。”湖南暮春的稻田水，依旧扎骨地凉。长者端着 30 斤重的畚箕，一直撒完。年轻人看着长者熟练的撒灰动作，心里既喝采更发毛：哎呀，我站着施肥，只晓得舒服了自己的腰，不顾苦了队上的禾。小车里下来的大小都是个官，这顿克冒（没）得跑喽！

“我说伙计，你把石灰撒在禾叶上，那还不把禾苗烫蔫了？我帮你撒这一畚箕，就这样做，晓得了吧？”长者和蔼地望着年轻人。

年轻人满面通红：“晓得，晓得！”小轿车远去了，年轻人还在纳闷：“不晓得哪里跑来这老先生？”

同在田里劳动的有人认得，告诉年轻人：“他是王震将军！”

啊哟，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呀！好普通好平常的人哩！

王震出生在浏阳县北盛区马战村，因家境贫寒，少小离家，外出谋生，在长沙铁路上参加革命。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是流亡武昌，接着南返故里，带领家乡人民举起了反抗的刀枪。1930 年 9 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带领浏北游击队的部分成员离开家乡，赴湘东组建独立师。从此，他转战湘鄂川黔边区，挥师北上抗击日寇，领导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南下北返，保卫延安，挺进新疆。戎马倥偬，战事纷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仅能在枕戈待旦的梦境里与故园相聚。解放后，他历任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政务缠身，日理千机，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而胥衣旰食，几次欲踏归乡路，又几次按捺归乡心。

故乡一直牵动着王震将军的心，直至解放后的一个 2 月间，当时担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偷闲回到阔别近 30 载的家乡。

王震先到了长沙。湖南省委准备安排 3 辆小车前往浏阳，一辆给将军和陪同的省委领导同志坐，另两辆给将军的随行工作人员和省里跟随的保卫人员坐。

这一安排让王震知道了。他找来省委负责接待的肖根如同志：“小肖呀，我这里有几个请求：一是请省委的领导同志忙自己的工作，不要陪同。我是回自己乡里看看，冒（没）得多少正事。二

是请不要派跟保卫人员，不要闹得鸡飞狗咬猫跳墙。三是请你们将3辆小车改派一辆旅行小轿，我和我随行的工作人员坐一辆车！”

“王部长呀，你说的前两条我马上向省委领导同志报告后执行。只是第三条难办，我们冒（没）得旅行小轿哩！”

“冒（没）得？”王震的眉毛一挑。

“冒（没）得！”

“噢，我还不算老吧，眼也不算花吧！”王震盯着肖根如，嘴角漾起一丝狡黠的微笑，“昨天我怎么见院里停了一辆墨绿色的旅行小轿车？”

肖根如笑了：“王部长哩，那是我们接待处用来上街买酱油的。坐不得！”

“怎么坐不得？拉得起酱油菜，就拉得我王震！”

第二天，穿着一套泛了白的旧军装，和农垦部的工作人员一道，乘坐着省委接待处那辆用来购买各种物品的漆皮剥落的旅行小轿车出发了。车子开到马战，司机从轿车尾部拖出一套卧具来。

“哎哟，你格里还藏着秘密呀！带格（这）套新被子做什么？”

“怕您家里缺被盖，领导上让我带了一套来！”

王震摇起了头：“不是怕缺被盖，是怕没得新被子盖吧。要不要，家里有什么盖什么！”

晚上，王震盖着家里自己纺织的蓝底白花土被子，在三弟馥美堂屋左侧的耳房里扯起了香甜的鼾声。

1959年后到现在，王震又数次返回故里，他每次都轻车简从。“王老呀，您这次刚从医院出来，身体不大好，省里也配‘红旗’啦，坐‘红旗’吧！”“坐‘红旗’做什么，我上次坐的旅行小轿车蛮好。”“王老呀，您年纪大了，比不得从前了，这次就去个小车

吧！”“国家能源紧张哩，坐小车得两部呢！”为了不惊动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王震每次总是在临回家前的头天晚上甚至当天出发前，才和省里负责接待的同志讲明，“突然袭击”，使各级领导措手不及，无法从丰迎送和招待。一次，恰好是个星期天，他一早从长沙出发，乘车48公里，赶到家乡北盛时，区公所的大门还没有开哩。当王震要打区干部这帮“懒鬼”的屁股时区里才知道他回到了家乡。

与王震幼时一起发蒙念私塾的一位老人发感慨了：“帝王将相讲究衣锦还乡，可馀开（王震幼时的名字）却是布衣归闾，真是唯大英雄能本色！”

“王老是个热血沸腾、奋斗不息的革命者，实在可敬可爱。”胡耀邦总书记看了王震同志的一个讲话后这样批示。是啊，王老正是这样一个无处不见生命的人。

本来，“少小离家老大回”，在家乡度假的日子里，拜访街邻亲朋，寻觅幼时的足迹，应是一番很好的享受。可他，仍像在工作岗位上一样繁忙。

听说王震回来了，乡亲们都簇拥着前来看望。拄着拐杖的公公婆婆，孩提时代的莫逆挚友，系红领巾的细伢，还有东家的妹子，南院的二嫂，挤得堂屋容不下。咦，一个多么好的调查研究的机会呀！王震索性把乡亲们招呼到院子里，用地道的浏阳土话和大家唠天叨地，道古谈今。谈稻谷的收成，谈土壤的改良，谈荒山育林，谈干部作风，谈村里的教育、医疗，谈社员的生产责任制和家庭副业；大到党和政府的政策，小到家家户户的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边思索，边提问，一唠就是一晌。乡亲们对党的感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对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的赞扬、意见和要求，像绕村的溪水，登南坡，下北田，一边

和乡亲们一道采茶叶、播禾苗、打稻谷，一边和乡亲们继续“打扛”（浏阳俚语，意为闲聊）。

星斗缀夜空，杨梅岭万籁俱寂。“嘭、嘭、嘭”一阵敲门声响起。这么晚了，客从何处来啊？周德根老人翻身下床，趿着鞋向门口走去。难怪老人诧异，杨梅岭距村庄3里远，他只身在这里守山育林，很少有人夜上杨梅岭。来客随周德根老人走进屋里。老人在如豆的灯光下打量着来客。来客不动声色地微笑着。周德根老人眼睛眨巴了许久，苦笑地摇了摇头。“我是馮开呀！您老愣是没认出。”“哎哟，馮开呢！”老人又惊又喜：“我说今天喜鹊为啥冲我直唱哩。”王震和周德根老人开怀畅叙起来。王震的弟弟美老子说：“那天晚上，他到鸡叫头遍才回来。”

在乡亲们眼里，王震可是个大官，但在他自己和心目中，王震却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是马战村在外边做事的一位普通社员，是家乡父老兄弟的一位普通的里邻。有人说，只有平等的人之间，才有真正的心灵的交流。王震真诚地与乡亲们平起平坐，乡亲们把心窝里的话也掏给了他。王震每一趟故乡行，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下情大丰收。”

活泼泼的情况装在将军的胸间，将军像指挥兵士一样让它们列阵：重大的，报告党中央；能够当即解决的，与干部群众一起商讨。

那是第一次回家的第三天，别家都吃过午饭了，还没见他的影子，急得馮美老弟四下打问。

此时，王震正在召集全区各队干部开会：“这两天就要插早秧了，我在田里和几位老人‘打扛’，他们都谈到了密植问题。今天请各位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听这开场白，有人心里擂开了鼓：将军呀将军，你可真会将人军。密植是大跃进的“硕果”，前几天，上级专门下文件，要

求下级推广哩。

面面相觑，没人言语。

王震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会场，鼓励大家。

依旧是沉默。那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年月啊。

王震继续鼓励：“莫怕，我最喜爱听真心话！”

有人壮胆了：“现在要推广的密植是挨挨寸，一点风冒（没）得透！”

“对呀！”王震双手抓起自己的头发抖动着：“插禾哪能像我这头发呢，我这头发是太密了。毛主席的农业8字宪法，是要合理密植哟！”

“我们晓得哩，挨挨寸搞不得。主要是怕上级打我们右倾！”有人小声嘀咕。

“我说同志哟，你怕这怕那，就不怕农民冒（没）得饭吃？我让我的秘书把你们挨挨寸的禾菟拍了照片，我回去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共产党人就是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你们去年挨挨寸的试验田，一亩地担了两担谷的禾，好多产量？嘿嘿，净是些瘪稻壳。”他痛惜地叹了口气，继而又说：“可还硬要吹牛皮，说亩产10万斤，登了浏阳报，今年还要推广！”他把紧握的双拳举过双肩，激烈地舞动着：“这叫大跃进，我看是大跃退！”

王震的凛然正气，使大家弯曲在椅被上的腰猛地一直。会议决定：今年的早晚两季稻，土质水肥条件好的田，株行距四六寸，条件差的六六寸。接着王震空着肚子，直奔百里外的浏阳县城，又和浏阳县委的领导同志商讨起密植问题。

将军呀，你面前摆不得问题，犹如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这一年，北盛区的稻谷产量比上一年增产近一成。

1981年11月间，王震大病初愈，又一次策杖回乡。林彪折戟沉沙和“四人帮”一朝覆倾后，将军也曾像孩童一样兴奋得失眠，

但更多的是心情的沉重和强烈的责任感。他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心地投入党和人民委托他的那部分工作。噢，大江东奔，月落日升，整整10年了，即使视察工作到了长沙，也没顾上回乡探望。好了，深情的家乡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骄子。将军又一次依偎在故里的怀抱。

“我这次是来拾脚印的，在家里要多住几天。”将军这样对馮美弟说。

谁知，住了不到一天，又对馮美弟说：“不行，我得到县委去一趟。”

“我早就知道你闲不得！”馮美老弟的口气里，三分揶揄，七分赞扬。

王震来到浏阳县委。

“不是冤家不聚首，我又来找你们麻烦来了。”王震诙谐的话语惹起一片笑声。王震本人也笑了起来。不过，讲着讲着，他逐渐认真和严肃起来：“浏阳有几种特产你们晓得哦？一是夏布，二是豆食，三是鞭炮，四是菊花碱石，五是雨伞，湘潭木屐浏阳伞嘛，六是竹器，七是……浏阳土特产多了。我如数家珍，主要是不让你们忘了社员的家庭副业。农业以发展粮食为主，但不能丢了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前些年我们就吃了苦头。浏阳山多，要多打山的主意，喝令三山五岳，向我献宝。要绿化荒山，种樟树、松树、槐树、苦楝、蜡树。近些年，你们栽了一些桑树，还可以再多栽点嘛，使养蚕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另外，要栽些苹果、蜜桔等果树，这方面北盛就好一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想吃水果，想增加维生素。发展竹林，竹子可是个好东西，竹笋当菜恰（吃），竹子编饭甑、椅子、畚箕，还能造纸。要发展生产，提倡每家房前屋后都要有个小水塘，养鱼、泥鳅、王八，每年几百斤，除自家吃了外，还可以供给市场。”这时，王震从沙发上站了

起来，边踱步边说：“中国历来有扬农抑商的传统，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成为几千年的寿星佬，与商品经济不发展有直接关系。这种旧观念得变一变喽！只想伺弄庄稼多打粮，还不能算是好农民，同时能搞好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才是真正的好农民哩！这关键要搞好承包。1962年，我主张包产到户，不过挨了顿批。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中央积极提倡以承包为主的多种生产责任制。”王震停止走动，目光向大家扫来，眼睛里闪着灼灼的光：“你们是七品县太爷，是浏阳百万人民的父母官，就看你们能不能甩掉“左”的紧箍咒，放手为农民做好事，让农民尽快富起来，我希望你们能在浏阳县志上留青名！”

有人说，王震讲话，极富吸引力，他那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精辟深刻的见解与思想，敏捷的跳跃式的思维，间或几句形象生动而极富个性的语言，能把听众紧紧攫住。又有人说，王震讲话，极富感染力，他那炽烈的情怀，一往直前的精神和昂扬不衰的斗志，能沸腾听众的一腔热血。不是吗？听王震一番讲话，往往会坐卧不安，怦然心动，甚至自责内疚，血涌脸面，喉咙和手心发痒，想到空旷的原野上，可着嗓子吼叫几声，然后立即动手做些什么，不如此，就无法渲泄胸中迸发的不可遏制的激情。

浏阳县委一班人当时地就处于这样的感情漩涡中。将军委婉的批评，耐心的启迪，热情的鼓励和发自肺腑的叮咛，震撼着浏阳县委一班人的心灵，一股股热血在每个人的胸间激荡、奔突。他们没有辜负将军的期望。今日的浏阳，扛了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红旗。

74岁高龄的王震登上家乡的杨梅岭：高大的板栗树撑张着柄柄巨大的绿伞，葱郁的蜜桔树和鲜嫩的茶林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山脚下淙淙作响的小溪旁，簇拥着茂密的湖桑。昔日茅柴丛生、荆棘遍地的杨梅岭呵，如今像江南水乡的姑娘一样娟秀。将军望

着这绿地、绿山、绿水，用手中漆得油黑发亮的拐杖敲击着板栗树，朗朗地笑了。

王震来到北盛丝绸厂：立缫机、整经机、摇钎机、络丝机在高大的车间里轰鸣，万千尺洁白晶莹的绸缎在女工手中流泻。丝绸厂正式投产3年多，共创利润76万多元，产品销售国际市场，为国家换取外汇70多万美元。听到这喜人的数字，王震又朗朗笑了。

王震笑得那么惬意，那么舒畅。北盛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说，将军的笑是由将军的火气换来的。笑是火气换，多新鲜。

姑娘生来爱唱歌。将军呢？

王震将军的爱好多啦！他行军打仗爱冲头里，爱读苏沃洛夫传记和《三国演义》，爱和人（推心置腹）聊天，爱和小孙子对弈（尽管输的时候居多），爱喝浓茶……

别漏了，他还爱发火。熟悉王震的人还会这样补充。

“你看我凶恶不？”王震曾这样问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哦，他也知道自己爱发火。

这不，他又发上了。时间是1963年冬天，在家乡的一个夜晚。

“你们还像个庄稼人吗？你们还配当队里干部吗？败家仔！败家仔！”将军发起火来好吓人呢！他眼睛瞪着，鼻翼张着，面部肌肉抖动着。

面对王震雷鸣电闪、急风骤雨般的火气，马战生产队的干部和被邀来参加会的区长、区委书记像遭霜打的树叶，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理亏着哩，吭个什么哟！

还是1961年冬，王震第二次返回故里，发现乡亲们的日子更难捱了。原来每人每天配给的五小两粮又减了，人们开始用蕨根、南瓜藤、夏枯草充填肚皮贴着脊梁骨的辘辘饥肠。望着乡亲们浮

肿着的灰黄色的脸庞，王震的心呢，就像战场上看到正在滴着血的伤员一样作疼啊！回到家乡的当晚，他覆去翻来，辗转难眠。31年前，同赴湘赣边区组建湘东独立师的100多人中，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不把家乡建设好，家乡人民和烈士们的父老兄弟过不上富日子，活着愧对烈士们的英灵，将来在九泉下也无颜与他们会逢呀！他苦苦思索着，审慎运筹着。

翌日，王震邀集生产队干部开会，宣布4条：一、北盛多丘陵，多水田，利用山脚脚、渠沟边，植桑养蚕。这不需要整壮劳力，老年人、细伢子就行。这样既可出口换外汇，又能增加社员收入，利国又富民。二、开发杨梅岭，栽植板栗、蜜桔。板栗是木本粮食，这样既绿化了荒山，又能应付不测的荒年，改善社员生活。三、生产队没家底，我王震拿钱，从外地买进湖桑、板栗和蜜桔苗，明年2月底前运到。四、马战生产队带个头，把发展桑蚕和开发杨梅岭的工作做好，以取得经验，将来在北盛区和全县推广。宣布这4条后，王震又逐一询问每个干部：“有冒（没）的意见？”生产队干部回答“冒（没）的意见”时，没有想到这4条实质上是将军和他们签订的合同。更没有料到，不履行合同日后会惹得将军发如此大火气。

王震坚决履行合同：1962年2月28日前，把1000株浙江的湖桑苗，1100株湖北的板栗苗，1000株江西的蜜桔苗如期运到家乡。

马战生产队干部履行合同的情况呢？1000株湖桑苗，牛啃、猪拱、细伢子折，仅活了17棵。1100株板栗和1000株蜜桔，栽到杨梅岭上，因干旱缺水，绝大部分旱死。

将军能不火吗？

将军爱发火，但这不正是他一往无前精神的有机组成和无私无畏攻坚性格的外在表现吗？

那是长征路上的一次突围，一座很难攻的山头，几次都没攻下。山头能否攻占，维系着全军的安危。王震火了，他用手枪对着突击营营长大声吼着：“再攻一次，攻不下来我崩了你！”“其实我是不会崩他的，那时真火了，吓唬吓唬他”。几十年后，追忆此事时，王震这样说着。战士们见王震火了，羞愧地低下了头。“抬起头来，跟着我冲！”王震和那位营长领着战士们像疾风一样朝敌人卷去了，山头被攻占了。

正是王震的光火，唤醒或振奋了战士们的正气、勇气和摧枯拉朽、高呼猛进的拼搏精神，攻占了本以为攻占不了的山头，干成了原以为干不成的事业。

对王震有深知的人都说：“将军发火归发火，发过后他也后悔，‘唉，你看我这火爆脾气急性子’。”

王震见生产队的干部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面部肌肉松弛了，语调也缓和了：“是我太主观，浏阳不适合植桑养蚕？不是吧。不是还成活了17棵湖桑吗？你们养了半张蚕，一年就进了50来块嘛！哎呀，也不晓得你们这船弯在哪儿哟！”

王震沉思了半晌，又说：“这样吧，植桑季节又要到了，明天大家到杨梅岭挖一天山脚，准备重新植桑。冒（没）的意见吧？哟，差一刻下一点，好，睡觉！罗区长、周书记，你俩就别回区上了，就睡我家里，床铺备下了，明天咱们一起挖山！”

真不巧，第二天一早，发北风，屋檐上跌泻着雨的瀑布。“怎么办？”区委书记周名胜问王震的秘书。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回长沙，今天不挖就没时间了。不用问，别说今天下雨，就是下刀子，这山也是挖定了！”

称职的秘书，往往能把握领导的思想脉络。果然，王震把饭碗一放，裤管一挽，雨衣一披，扛着锄头就钻入风雨中。

“王部长，鞋，鞋，换上雨鞋！”

“好大雨，穿雨鞋也冒（没）的用！”风雨声中，送来王震的声音。

通往杨梅岭的田间小路上，印下一行深深的脚印。接着，又印下一行行深深的脚印。

杨梅岭？谁起下这么动听的名字。三、四百亩大的杨梅岭，有几株杨梅？几乎全是丛生的荆棘和茅柴。盘根错节的茅柴根好难挖哟！不过，旧社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我们推倒了，挖掉了，难道能让贫穷落后根子在这华夏大地上茁壮成长？

冒雨挖了一天山。晚上收工时，王震将大伙又召集到家里，原来他事先准备了几桌饭菜。

“各位今天辛苦了，我知道这几年大家胃肠里没进过多少油水，就设备水酒，主要是办些大油大肉。来，我给各位每人敬一大块红烧肉，家乡面貌的改变，父老兄弟的温饱，就拜托各位了！”父老兄弟的温饱，啊，温……饱……社员们艰难的生活像首低沉如诉的曲子在心头萦回。将军的嘱托重如山呢。罗区长，周书记和马战生产队干部举起碗中将军亲手挟给的肉块，互相轻撞了一下碗边，饥肠辘辘，却久久难以下咽。

雨后的朝霞分外明丽。

王震要登程了，乡亲们簇拥在院子里，赶来送行。王震的大妹妹金婆婆来了，她把王震拉到里屋。妹妹要和哥哥讲几句悄悄话呢！

“听说你又开刀了，让我看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

“要看！要不，你走了，我总吊着这颗心！”

“你呀，还是那么犟！好，你看，你看。”王震无可奈何地撩起了上衣。

这时，来催将军上车的区委书记周名胜正好进来，只见将军

的腹部，清晰地嵌印着两条三、四寸长的手术缝合线，偏左的一条暗褐色，而中间的一条是微微隆起的鲜红色。金婆婆摩挲着那条鲜红色的手术缝合线，声音发颤：“要注意哩！”王震轻轻拨开金婆婆的手，放下上衣，呵呵笑着劝妹妹：“哎呀，冒（没）的事，莫哭。不让你看，你非看！”

“闹革命时节，你负了几次伤；大前年就让拉过一次刀……工作，咱要，但也要顾顾身子呀！”金婆婆轻轻地揉搓着昨天开山时粘溅在王震衣服上的泥巴点，不放心地继续叮咛着，泥点被搓掉了，泪滴又落到了上边。

王震长叹了一口气：“看着乡亲们饿肚子，我心里着急呢！”

战争年代，子弹溜层皮，弹片刮一下的不算，王震负过7次伤。解放后，王震积劳成疾，又动了几次手术。将军动过手术，这周名胜清楚，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天顶着风雨，和小伙子们一起开了一天山的将军，竟是又一次动手术后不久。他望着将军清瘦而又微笑的脸庞，也觉得一股酸潮的东西直往眼窝涌动。

三十几岁的周名胜，上学时唱过“花兰的花儿香”、“三五九旅是模范”的歌儿，也听过将军率部开发南泥湾的故事，自觉地懂得了什么叫南泥湾精神。但是，只有今天，在当年光着膀子率三五九旅的英雄指战员们开垦南泥湾的王震将军身上，他才真切地感受了南泥湾精神的深刻含义。北盛区、马战生产队的船儿弯在哪里，恐怕主要是缺乏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周名胜在心里骂开了自己：“周名胜呀周名胜，你还配当一名共产党，还配当一个党的干部？枉竖着这颗脑袋！”

王震离去不久，湖南澧县蚕科所的两名技术员来北盛区报到，说是王震将军派他们来，帮助北盛植桑养蚕。

接着，王震通过火车又托运来了自己掏钱买下的5000株湖桑苗。

随湖桑苗之后到的，是王震的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的 5000 元公债券以及 1500 元现金。王震嘱咐说：“他这一点微薄的积蓄用于开发和建设杨梅岭林场。澧县两名技术人员的工资也从这里出。”

筹建杨梅岭林场的会计曾礼义捧着这 6500 元的公债券和现金，觉着好重，好重……

将军的钱来的容易吗？就像打开水龙头，就有“哗哗”的流水？那次，王震和夫人王季青来杨梅岭察看，曾礼义无意中拾到他们的几句私房语。将军在那里抱怨夫人：“买块香皂还要花八毛五，三、四毛一块的还不照样用。”王季青笑了：“都说老太太爱叨叨，你这老头子也这么爱叨叨。知道了就行了，还唠唠叨叨的，我耳朵快结茧了！”“刚才他们讲，岭上缺水，又冒（没）的钱买抽水机，板栗苗都旱死了！战争年代，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战争，建设时期，就要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建设！”将军捐赠给家乡这几千元，不正是这样几分几毛地节约积蓄的吗？

王震的精神，感召和激励着家乡的干部和群众。马战生产队和北盛区的面貌逐年在变，由旧变新，由穷变富。家乡的父老兄弟舒心地笑了。以人民群众之忧为忧，以人民群众之乐为乐的王震也舒心地笑了。

今日浏阳的农民已不大穿这种服装了，取而代之的是的确良、中长纤维，甚至绸缎、毛料子等。不过在 60 年代，这种服装还是十分得体和时兴的呢！它是用白经纱，灰纬纱织成的一种土布缝就，布面上灰白相间，整齐有序，生生像一只只排队列阵的白蚂蚁、灰蚂蚁。不知是何年何代人给起了个蛮形象的名字：“蚂蚁服”。

王震换下那套泛了白的旧军装，穿上蚂蚁服，独自一人在田间阡陌转游。他来到马战生产队的邻队杉江生产队的田里，来到

一个正在做农活的农民身边：

“喂，老伙计，听说你们这里有个美佬子？”美老子是指馮美老弟。浏阳的习惯，对年纪稍长一点的男子都称什么什么佬子。王震一副过路人随意打问的口气。这位农民压根就没想眼前穿蚂蚁服的是美佬子的老兄王震。他也随口答道：

“我们这里没有美佬子，只有个美先生！”

王震一听，话音不对，急忙追问：“美先生干什么呀？”

“美先生养鸭子，他的鸭子可多了，专恰（吃）队上的谷子！”

“冒（没）得人管？”

“他的老兄在中央做事，谁个敢管。美先生的鸭敢恰（吃）队上的谷，我的鸭也敢恰（吃），队上的谷有不少进了鸭肚子哩！”

好了。王震来到区上，找到当时的区委书记周名胜：“书记同志，请把各大队、各生产队的干部召来，每个生产队再来一名社员代表。”

百多人坐在区公所礼堂。王震走上讲台，凛凛然威视着全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王馮美先生？”

大家知道王震要向他的老弟“发难”了。

台下站起了美老子的知心好友：“王将军呢，解放后，我们农村都互称先生，这算不得什么问题哩！”

“算不得什么问题哩？旧社会，咱们北盛这一带，对周露吾喊先生，因为他是大地主、大恶霸，有权势，人们怕他。对苏汉卿老人喊先生，因为他是老中医，治病祛难，人们感激他。对欧阳巽丞喊先生，因为他是教书人、知识人，人们尊敬他。此外，就是对卜卦的、看风水的喊先生。解放了，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同志式的关系，不用称什么先生。不过，对知识人，对医生，按习惯

称呼先生还可以。”说着，王震指着同他一道回乡的坐在他身子左边的周立波同志说：“周立波，大作家，大学问人，这才是真正的先生哩！王馥美算作哪门子先生呢？有人对我说了，喊美先生，是因为王馥美的老兄在北京做事，不喊他是先生，他的眼皮都不想抬哩！”现在，我宣布：今后，谁对王馥美叫先生，罚谷一斗！这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台下轰然爆发一阵善意的也是赞许的笑声。

“第二个问题，是王馥美的二十几只鸭子恰（吃）队上的谷，一天能恰（吃）不少哩！现在大家商议一商议，看怎么个处理法？”

台下有人说：“赔点谷算了！”又有人说：“现在粮食紧张，他哪里有谷呀！我看赔点钱算了！”

王震把身子转向坐在自己右边的周名胜：“书记同志，你是我的父母官，现在群众提了赔谷、赔钱两个办法，你看怎么办？”

周名胜略略思忖：“依我看，要根本解决问题，就把他的鸭子捉起来交售，扣除他应赔纳的那部分款，并罚他一段时间内不准喂鸭子。”

“我看是个好办法。大家伙同意不同意？”王震高声问台下。

台下卷过一阵掌声。这掌声鼓向周名胜的办法，鼓向王震的发问，更是鼓向对自己家人严格要求的王震本人。

鼓掌的人群中，有正在乡下作民兵工作的县武装部的中尉胡世申。王震早就瞄上了他：

“我说那位中尉同志！”

台下的胡世申“叭”的一个立正：“到”！

“你是中尉，我是上将，上将不退伍，晓得吧？”

“晓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王震命令中尉同志，即去王馥美家里，

把他的20多只鸭子捉住，不准漏网一只，全部交售供销社。”

当中尉前去执行将军这奇特的命令时，鼻尖儿险些撞着美老弟挑着鸭子的扁担梢儿。原来，还有比中尉腿脚快的人，将王震下令捉鸭的消息通报了美老弟。美老弟知道在劫难逃，自己动手把鸭子捉住，到供销社交售了。

王震兄弟之间的这场风波，就这样带着喜剧一样的色彩宣告结束。

一段时间内，王馥美没有养鸭子，后来又养了，但把鸭子看管得好好的，没敢再让吃队上的谷。

其他社员也都把自家的鸭子看管得好好的，队上很少再发生私人的鸭吃公家谷的事。

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时候，人们就更加怀念十年动乱之前的纯正的党风和民风，更加崇敬许多老同志身上的经过几十年锤炼的至今仍熠熠生辉的那种近乎刻板的坚强党性。

这种近乎刻板的坚强党性在王震身上表现得分外鲜明。

王震是家里的老大，同辈人都一把年纪了，没人再要求给工作，转“皇粮”户口了。

寒暑易节，时轮转换，同胞弟妹和亲友的孩子像家乡蕉溪岭上的竹子拨节一样，又一代人成长起来。

大弟弟跟前的长子王井写信来，说是高中快毕业了，因病辍学4个月，可能敲不开大学门，让伯父给安排个好工作。

王震没加思索，当即展笔挥毫，给侄儿回了信。

王井打开伯伯的来信，触目便引起他心灵的颤震：“王井侄儿，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你爷爷牺牲的情景吗？”

记得呀，记得！那情景，像用刻刀深镂在记忆的屏幕上。湘鄂赣边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敌人的几挺机枪，像毒蛇的信子一样在山头喷吐着火焰，压制着我以红旗为先导的进击部队。旗

手一个个倒下了，但红旗却永远迎风而立。红旗到了爷爷王贵财手里，他巧妙利用树丫、巨石，高擎着红旗继续向敌碉堡跃进。直刺青天的旗杆依旧顽强地向敌碉堡挺进。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机枪停止了嘶叫。爷爷长眠于湘鄂赣边区的青山绿水间。

王井是含着泪水听记王震伯伯讲述这段悲壮的情景的。此刻，泪水又盈满他的眼眶。透过咸涩的泪水，他继续阅读：

你爷爷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希望你坚定地继承你爷爷和千千万万个烈士的遗志，做一个党和人民需要的好青年。对你将来的工作，我无权插手过问，更不应插手过问。你的工作，由当地学校和政府安置，而你则应坚决服从。

60年代前期的青年呀，心底纯净地像一汪刚刚涌出地面的山泉，一席情真意切的谈话，一札发自肺腑叮咛的书信，或一幕激动人心的电影，皆能帮助他们抛开一个错误的思想，坚定一个正确的信念。更何况，这番叮咛来自备受崇敬的王震伯伯。王井怀着一切听从党安排的豪情，走向了新的岗位。

二妹子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直接找来了。这次王震略加思索，竟爽快地答应了：“要工作可以，不过得到新疆。”王震见这3个晚辈有点迟疑，唱起了《新疆好》：“新疆可是个好地方，你们没听过《新疆好》这歌儿？那里有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喀什的无花果，全疆各地的大西瓜，都是又香又甜。那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牧场，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等宝藏。那里还有热情好客的各少数民族，他们中间，有我的许多好朋友。他们会和我的老同事、老部下一起照料你们。新疆风大，雪也大。不过，我相信你们建设、保卫边疆的决心也不小。左宗棠曾经作“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句，你们去吧，开发和保卫新疆的行列里，又会增加几个湖南人！”

那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发展的时期，那里正需要人哩！王

震的两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兴冲冲地到新疆的石河子垦区安了家。

不过，近几年，这姐弟仨有点反悔，几次找到舅舅想往家乡调：“新疆离家远，风雪大，冷！”“请别把新疆说得那么骇人好不好，我可是个新疆通，你们还能骗了舅舅我？离家远，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哪天我去见马克思时，我还要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在天上哩！你们就留在新疆吧，将来和舅舅作个伴！再说，你们进疆时，咱们就讲好了的，将来不许反悔！”姐弟仨还有点不通，王震急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我只认得与我同辈的人，下一辈的人我就认不得了！”舅舅给小辈耍赖，装糊涂，真让人哭笑不得。这铁石心肠的舅舅哟！唉，算了，活作新疆人，死作新疆鬼。

要么不理睬，不安排，要么给人塞到大老远的新疆。总结经验教训。对，不直接找你，采用迂回战术，找你的老部下、老同事。好，成了，美老子的二女子王辉的户口迁到了北京。

成了，没有吧。这件事让王震发现了，立即把王辉“遣送”原籍。王辉离开北京时，王震让王辉带给区委书记周名胜一封亲笔信，信上委托周书记要好好教育王辉安心农业生产，并安排王辉到杨梅岭和周德根老人一起吃住，一方面从生活上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向老人学习，为建设杨梅岭林场贡献力量。

“咦，你怎么在这里呀！哟，鬼丫头，你也在呀！”当穿戴着洁白的工作衣帽的侄女王晚元和外孙女孙团圆冷不丁的从人群中钻出来，亭亭站立在眼前，齐声问长辈好时，王震既高兴，又惊奇，继而问：“你们是从后门进来的吧？”俩姑娘掩嘴笑着，顽皮地让长辈猜。

陪同参观的北盛丝绸厂的领导告诉王震：“小王和小孙可是按照选美条件，一级级选上来的，是从大门堂堂正正进来的。”

前几年，北盛区筹办丝绸厂时，曾向王震汇报，王震格外支

持：“仅养蚕不够，同时织成丝绸，才能赚大钱，尽快富起来。”王震还交待：“丝绸厂招工，要严格条件，一个后门不能走，包括我的亲属。”丝绸厂招女工时，定了4个条件：一是政治思想好；二是身体好；三是年纪轻，18至25岁之间；四是牙龄好，牙龄不齐不好咬丝接断头。这个4条件一公布，北盛轰动了，都称之为“选美”。第一批招了210人，王晚元和孙团圆就入选了。

当王震听说自己的侄女、外孙女和其他女工全部是严格按条件招收时，又朗朗的笑了起来，头上翘起的几缕白发随着笑声颤动：“好，好，你们为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出了力。”

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的领导都说：“王震老从不开口为难我们。”

从不开口为难？那好，家乡的事儿要您老帮忙，看您怎样应酬了。

浏阳县新建一座石灰窑，装出窑急需大卡车。怎么办？对，派董维去北京，找她的舅舅王震老。

“你来做什么？”

“想让您批几台汽车。”

“汽车？这是国家统配物资，冒（没）得！”

“我们给钱，又不是要你们白送！”

“董维呀，群众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你晓得不？叫做……叫什么来着？哦，叫做看见别人走后门十分生气，轮上自己走后门十分神气。你是不是格（这）样呀？都骂别人党风不正，自己却仍在那里搞歪门邪道，咱们的党风、社会风气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哟！”

董维着急了：“我要不到汽车，回去怎么给县上交差？连路费都不好意思去报。”

“这好办，路费报不了，舅舅我给报。”

还说什么呢？没啥说的，本来理屈，当然辞穷。不过，汽车还是要想办法买。济南有舅舅的一个老部下在那里管物资。万一济南不行，就奔新疆，那里舅舅的老部下就更多了。不过，舅舅也太“小气”了，国家汽车那么多，听说长春的“一汽”和武汉的“二汽”是几分钟出一辆，还差了浏阳县这几辆？不行，这口气总得出。

董维临走时，气鼓鼓地向舅舅告别：“舅舅，我明天就走了，吃你几天饭，收不收伙食费？”

没想到，舅舅倒一本正经地回答：“那当然得收了。不过是在舅舅这里，钱就免了，粮票还是要交的。”

“交就交，要多少？”

“全部拿过来！”董维把 30 斤全国通用粮票全部递到了舅舅手里。

王震接过粮票，往口袋里一捅，“嘿嘿”笑了：“董维呀，我断了你的粮路，看你还怎么往山东、新疆跑！”

哎呀！这个诡舅舅，什么时候把我的底牌抽去了？曾经运筹帷幄的大将军略使小技，便让年轻气盛的董维遭到“暗算”。董维急得直搓手，想一把上去将粮票夺回来。夺？不敢。她晓得舅舅的脾气。

果然，舅舅的脸色渐渐严肃了：“你回去转告所有亲属，谁也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去办违反规定的事！”

董维只好空手而归。

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沛县可以 3 年不纳税。浏阳县的领导不死心。正巧，没过好久，王震到了长沙。浏阳县委的领导以汇报工作为名，赶到了那里。

“王老呀，您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

“少给我戴高帽吧，有什么事呀？”

“那汽车……”

“家乡是要热爱的，但家乡主义可不能搞。我看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那么，请您给批些化肥吧！”第二方案抛了出来，化肥也是紧俏物资哩！”

“要化肥呀，你们可以给地区和省里反映，我个人意见，你们还是要多养猪哩。猪多，肥多，粮多，城镇居民有肉吃，社员又能增加收入，这多好！”

这就是王震，他可以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无私地用于家乡建设，但你要他动用人民交给他的权力来为你谋上一丁点非份的利益，那就形如登天。

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礼品是武器。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你只要发挥这些武器的效用和威力，就能把法律、规定炸开缝隙，攫得一些非份的东西；或者，办成一、两件本来按制度走正道办不成的事情。

1982年年底的一天，有人给王震送礼来了。

“哎呀，是你这个老朋友呀！”一头雪发的王震，迎候门口，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来客放下双手提着的两个大包：王老呀！这是送给你的一套绸衫，尺寸是按你老弟的身子裁的，不晓得合身不？这是送给你的板栗和蜜桔。来客一一打包，给王震数点。

“好你个田保奇，你也学得了这一套！”王震向来客田保奇吼道。

田保奇，浏阳县北盛区供销社主任，曾为筹建杨梅岭林场和北盛丝绸厂立下汗马功劳。他忠厚老实，作风正派，王震就喜欢他这老实巴脚的劲儿。60年代，他俩就交上了朋友。

听了王震的责难，田保奇脸红的像醉虾，急忙分辩：“你冤枉

死人哩！这绸布是你亲自抓办的家乡丝绸厂织的，这板栗和蜜桔是你资助创办的杨梅岭林场产的。我出差路过北京，区里领导和乡亲们一致决定让我给你带来这点东西，算是向您老报告家乡建设的新成绩，也算是家乡人民对您老的感谢与惦念。这次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对表达真挚情谊的礼品不伸出手去，就会亵渎王震这句话，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过，且慢，将军他还有话呢！

“这礼品我不能不收，但也不能不付款！”

一听这话，田保奇又着急起来：“王老呀，为了发展家乡的养蚕业和开发建设杨梅岭，您又是出钱，又是操劳，费了那么多心血。现在您对这微薄的礼品要作价，我回去如何向乡亲们交待？”

“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我是不能接收礼品的。你和乡亲们好交待了，我如何同党的准则作交待？我这次破例收礼，本来就违反了规定，再不付钱，那还行哟？”王震边说边喊管理员：“小栗，拿钱来！”喊过小栗，转身又问田保奇：“板栗，桔子好多斤？多少钱一斤？”

田保奇没得办法，只好如实作答：“板栗、蜜桔都是一泡（十）斤，板栗每斤二毛五，蜜桔两毛。”

“小栗，北京的板栗、桔子好多价？”王震又问管理员。

管理员回答：“板栗四毛五，桔子四毛！”

“四块五加四块，再加绸衫的二十块，总共是二十八块五！”王震飞快地计算着。

管理员把钱如数付给田保奇。

将军这次收下绸衫，板栗和蜜桔，确实是破例。田保奇不止一次听人讲过给王震送礼碰壁的事。

前些年，当时担任浏阳县县长的龚长富到北京开会，也顺便

给将军带了点腊肉、茶油和轧笋。王震火了：“我们有我们的伙食供应单位，你带这些东西做什么？”龚长富原是359旅的老营长，他狡黠地眨着眼睛问：“老首长呀，你说哩，这东西我带来了还能再带回？”王震没回答，向电话机走去。电话接通了：“我是王震，我格（这）里有点贡品你们要不要？湖南家乡的土特产，上好的东西哩！”王震放下电话，对龚长富说：“我和国务院事务管理局讲好了，你把这些东西统统交到他们那里，由他们处理。”龚长富执行了老首长的命令，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也是按北京市当时的牌价付了款。

这个只知奉献决不索取的倔老头呵。

小巷里又响起了脚步声，田保奇怀着深深的敬意离开了将军的寓所。*

* 本文发表于《一代革命家晚年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战争风云中将军的侠骨柔肠

“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

这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

在那摇晃的黄骡背上，在那随同大队伍返回湘赣苏区的脚步声中，王震反复地咀嚼着列宁的这段话，深深地沉思着。

回到永新，王震、袁德生向省委、省政府和刚成立不久的湘赣省军区的领导汇报了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拜会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况。接着，宣布带回来的将湘赣独立1、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的命令，王震任代理政委，李天柱任代理军长。工作煞是忙。但再忙，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有关论述依然在王震的脑际萦回。

仅念了3年私塾和小学的王震酷爱读书。但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这时他还读得不多，除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等几篇外，就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了。在当时，这本小册子读得也很艰难，什么奥托·鲍威尔和费里德里·阿德勒，陌生拗口的人名一个接一个。但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深刻的思想、精辟的论断，完全把王震攫住了。

明天，就要把列宁的小册子交王首道同志石印了，王震决定

今晚再读一遍。夜，很深了。初春的寒风扑打着窗棂，钻溜到屋里，摇曳着如豆的灯火。王震没有丝毫的倦意，他时而认真阅读，时而倦卷沉思。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放弃对革命，特别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对此，亲身经历过“马日事变”的王震有着切身的感受。1937年，在延安，美国著名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王震，王震曾这样叙述说：“当时，共产党是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支配下。陈独秀一直在批评湖南工人的激进主义。共产党当时不仅忽视建立武装力量，而且实际上不想把它自己武装起来，宁愿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因此，当许克祥等指挥的武装力量对付他们时，群众还无防备。甚至在5月21日以前，当地共产党机关的成员部知道许克祥已变成反动，他们仍不去领导工人进行自卫抵抗。”“5月21日晚上11点钟，在长沙，许克祥的军队袭击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员，我是纠察员之一。”“与此同时……在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都发生了严重的战斗……1000名以上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另有许多人被捕……在战斗中，我膝部受伤。”右倾投降主义给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血的教训。必须避免右倾投降主义的悲剧重演，对于这一点，王震在思想上十分明白和坚定。

有右倾投降主义，还有没有“左倾”冒险主义呢？列宁所批评的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左”倾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是不是也刚刚产生呢？如早已经产生，它又有哪些表现呢？这种“左”倾错误发展下去，将会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王震想到的问题太多了，他一下子很难理出个头绪，很难找出个明晰的答案来。

在欢迎从中央苏区归来的代表团时，李天柱来个西洋式的拥抱，个头不高、体魄健壮的王首道也伸出双手使劲地摇晃，唯独

不见了谭思聪……谭思聪呢？

1932年1月3日，独立1师在永新钱市街附近伏击敌第14师，个别战士击敌心切，过早开枪，使敌迅速展开。为了扭转战局，谭思聪跃出战壕，带头冲锋。一颗流弹飞来，谭思聪扑倒在地……

听到这一消息，王震像被人猛击一掌，怔住了。他眼窝泛潮，咽喉哽塞。

谭思聪思想敏锐，老成持重，对许多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返回湘赣的路上，当王震捧着列宁的小册子细读时，就想到了与谭思聪的秉烛共阅，相互切磋。可是……

最使王震担心的扩大化、简单化了的肃反工作，如今再也不能同谭思聪一道抵制了。

王震还在浏北一支队的1930年7、8月间，当时管辖湘赣边、赣西和赣南地区的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左”倾领导的指示，将春季开始抓AB团的肃反运动为中心工作开展起来。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AB团的组织解体了，个别分子可能散在个别地方，有的也许还进行着反革命活动。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反革命组织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武装力量的逐步发展与壮大，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与深入，从根本上触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触动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命根子。反动阶级采用各种方式向我们进攻，其中包括打入革命队伍内部，与我内部的动摇分子勾结起来，给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此，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时开始的肃反直到1930年

底，基本上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这无疑十分必要。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湘赣省职工联合会纠察队100多人被捉。河西教导队有1/2被捉了。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3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搞得人人自危。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蹊跷：村里有厕所嘛！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他说：“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又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得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被列入怀疑对象进行拷问；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无异。

抓AB团的斗争，逐步由基层向领导机关扩展。

1931年7月底，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来到湘赣，召集湘东南特委、赣西南特委西路分委联系会议，研究落实成立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事宜。

王震是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分委两个委的委员，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休息期间，王首道对王震“咬”耳朵：“中央认为西路分委在工作、组织、作风上存在严重问题。这次随同我们来的谭牛山，从中央苏区带来不少材料，说西路分委领导中绝大多数是AB团骨干分子，中央批示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击。”

王首道是王震的浏阳同乡，大王震两岁，曾在长沙农业专科学校修业3年，1926年，秘密奔赴广州，到毛泽东亲任所长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后又任湘鄂赣特委书记。那时，革命队伍里的中学生不多见，都被大家当做大知识分子尊敬对待。王首道既有学问，又有丰富的领导经验，王震对由他来主持筹备成立湘赣省委工作很是高兴和支持。但一听到中央和王首道对待西路分委领导的态度，王震的焦虑多于吃惊。

王震急忙说：“我和西路分委的同志共事快一年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为党和人民作了大量的工作，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还看不出他们中有AB团分子。赣西南特委常委朱昌偕也这么看。”

听了王震的意见，王首道心里着急起来：“哟，你这个王胡子，思想认识与上级指示的差距可太大了！你是工人出身，政治上坚定，又是湘赣苏区的一员战将，但心直口快、仗义直言，如果在肃反问题上栽了跟头，对湘赣苏区的军事工作可是一大损失呢！”王首道诚挚地劝说王震：“西路分委被AB团把持，这是确信无疑的。朱昌偕袒护他们，也毫不奇怪，经苏区中央保卫局调查，又发现朱昌偕本人就是AB团主要分子。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苏区中共局怕在这次反‘围剿’中，再来一次“富田事变”那样的反革命暴动，因此指示我们要抓紧肃反，昨天还来文催问我们对朱昌偕、左娜、龙贻奎等人的处理情况呢！”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没有料到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

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3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为书记。他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渐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1929年9月，正式组建了有300余人的兵强马壮的永新县侧卫营，在八打吉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AB团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了呢？”

“当然是凭谭牛山从中央苏区保卫局带来的材料！”王首道回答。

“中央苏区保卫局的材料哪来的？”王震问。

“他们说是调查得来的。”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他们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来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团呢？！”

王首道叹了口气说：“胡子，你讲得有点道理。我们不是没有怀疑过中央苏区保卫局的结论。去年底，张启龙同志曾经接触过西路分委的同志，不久张启龙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一位负责同志问到对西路分委的看法，张启龙只说是生活腐化。那位同志说，岂止是生活？！意思是 AB 团反革命。现在，上级作出了决定，要我们执行。开始还蛮坚定，让你这么一说，心里乱了方寸：执行吧，一人就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 AB 团，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再来个‘富田事变’，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你我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大损失呢！”

“这样行不行，”王震建议说，“这次联席会先避开西路分委和朱昌偕是不是 AB 团的问题，会后，你和泗淇、启龙等同志可作点调查，包括找朱昌偕、左娜、龙贻奎本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王首道表示同意。

联席会结束，作为独立师师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藏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逃避不是办法。

朱昌偕个头不高，长得眉清目秀。他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了，回去是自投临时省委的罗网！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的地形，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 30 万

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又命令7个师6万余人，对我湘赣革命根据地‘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更不能干出像‘富田事变’那样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主流是好的。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中央！”

朱昌偕没有作声，捂着脸，蹲到了地上。

王震也蹲了下来，蓦地，他发现朱昌偕的手指缝里，流出一股股泪水。王震也默默无声，热泪涌流。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朱昌偕边用双手擦抹着脸上的泪水边骂：“嗨！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流这咸水子干啥哟！王胡子，你讲的在理，我朱昌偕永远记得你这一劝，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放心去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入地狱，我也绝对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紧紧地握住朱昌偕的手，久久地不愿松开。

王震将自己与朱昌偕谈话的情况报告临时省委后，又急匆匆地奔赴前线。

没过多久，有人从永新来到前线，告诉王震：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干粮全部吃完。唯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怎么能到国民党那里去呢？！人各有志，我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肃反的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像瘟疫一样在湘赣苏区蔓延。如果任其发展，“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一样，同样会导致革命的惨痛失败。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认真纠正肃反工作中

的扩大化、简单化的指示，用最大的努力来尽量减轻“左”倾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当王震在此起彼伏的雄鸡报晓声中合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和自己的笔记本时，他这样想。

“报告！”

“请进！”

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那时的政治保卫处直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领导，具体实施整个湘赣边党、政、军、群的肃反工作。由于肃反工作的扩大化、简单化，提起政治保卫处，不少人不寒而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治保卫处来谈话。”这是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一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谭牛山绷着脸、一副严肃相。不过，他对当年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人纠察队队长、现在湘赣人人知晓的骁将王震，还是相当敬畏的。他本想在脸上补上点笑容，但仅把嘴角牵动了两下，笑肌却没有提得上来。

尽管谭牛山本人在本质上可能还算个好同志，但他参与错判错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王震见到他，心里就蛮不是个滋味。王震冷冷回答说：“是呀！有何见教呢？”

原来，1931年11月初，王震、袁德生率代表团赴中央苏区参加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敌人见湘赣红军独立一师在赣南活动，湘赣边仅有一些地方武装，便乘机调集10个正规师，连同反动地方武装共计8万人，向我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剿”。1932年2月中旬，当王震返回湘赣时，湘赣军民在湘赣省委的领导下，已先后击溃各路之敌，仅剩国民党第77师孤守在侵占的莲花。王震、袁德生与省委书记王首道、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副总指挥李天柱、

政治委员甘泗淇等商量后决定，先彻底粉碎敌人对湘赣边的“围剿”，全部恢复湘赣边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后，再召开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总结湘赣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王震的任务是，率领独立一师到宁冈、碧江洲一带活动，进一步肃清这一带的地主武装，加强对莲花守敌的围困。谭牛山凑近王震身边，眨着眼，极其神秘地说：“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 AB 团骨干分子，省委同意我们的意见，判处死刑，立即就地执行。这次你在酃县一带活动，要顺便完成这项任务。酃县县委的其他人选，省委已物色有人，这次随你前去一同赴任！”又是一个 AB 团骨干分子！当然，王震并不完全了解已被关押、处决的 AB 团骨干分子的情况，但有一些明明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党内外十分优秀的干部哟！张平化果真是一个证据确凿的 AB 团骨干分子吗？王震边整行装边向谭牛山瞟了一眼：“说张平化是 AB 团，都有哪些证据呢？”

“据 3 人以上供认，1928 年上半年，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却说这祠堂烧得太可惜，还说什么‘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1930 年，解除袁文才、王佐部的武装，处决袁、王匪徒，张平化却极为同情。”谭牛山极熟练地历数着张平化的罪状。

“完了？”

“完了！”

“好，我明白了！”王震说，“我到酃县后，再调查一下张平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罪状！”

谭牛山并没有听出王震的潜台词，说：“谁都知道你是坚定的工人阶级出身，所以省委把这一重任委托给你！”

春天来了，井冈山西麓的中共酃县县委所在地——上九部石洲里的群山泛青发绿，地面上拱出茸茸的碧草，落叶木枝头绽出水灵灵的幼芽，几乎干涸了一冬的溪水又叮叮咚咚地流淌起来，一群群小鸟，像一阵风似的，卷来刮去，啁啾嬉戏。

酃县的习惯，开春后，都要修缮房顶，以备阴雨连绵的梅雨季节。高个头、宽脸庞，年近 25 岁的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正在自己办公室，也是自己堂屋的房顶上拾掇房子。这时，见村北边的山头上下来一队人，一色的灰红军服，夹杂着两三名身着便装的人员。渐渐近了，走在前面的是个孩子模样的年轻战士，第二位中等偏高个头，留着个连口胡，看样子，也超不过自己的年纪。

“表哥！表哥！”年轻战士冲着房顶叫了起来。

噢，这不是姑妈家的儿子廖海光吗？他家在六都国螺寨，小时候一起来姥姥家走亲戚，总是赖着不走，要多住几天。去年刚参军，穿上军装，好英俊，好神气。

张平化大声答应着，急忙下了房顶。

“这是刚刚成立的红 8 军代理政委、湘赣独立一师政委王震同志，我现在给王政委当警卫员。”廖海光蛮老练地把连口胡子介绍给了张平化。

张平化把两手的泥巴往衣襟上一蹭，憨厚地笑笑，握住王震的手：“王政委，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听到过您的名字了！”

王震上下打量着张平化黑红的脸膛、沾满泥点的旧衣服和脚后跟周围臃起老茧的赤脚，然后诡秘地一笑说：“我在永新也听说了你张平化的尊姓大名喽！”

当然，张平化没有听出王震话中的弦外音，他把王震一行往客厅里让，兴奋地说：“我们酃县革命根据地离湘赣边区数百里远，中间又都是大山，很难听到上级的声音。王政委这次来我们

这里检查指导工作，我们十分高兴。”

“能经常及时听到上级指示，这很重要。但上级也很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下边的情况呢！这两天，你忙你的工作，我们先到下边摸摸情况，需要时咱们再谈。”

张平化腾出自己家的堂屋、左侧厢房和客厅，安顿了王震一行。王震把背包一放，便由廖海光带着出去了。

一道山洼里几畦水田，水田旁站着一张犁，卧着一头老牯牛。

老牯牛伸着脖子悠闲地舔嚼着身边的茸茸绿草。离老牯牛三步，一位白须飘拂、身材硬朗的长者，席地而坐。这长者对着竹烟袋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微眯着双眼，面朝和煦的春日，缓缓吐出青蓝色的烟缕。长者的背后，一个五六岁的顽童，手持毛毛草，正悄悄向长者的耳廓伸去。

毛毛草刚要触到长者，山洼那边传来脚步声。幼者、长者几乎同时一个激灵，惊散了这副耕田休憩图。

来人是王震和廖海光。小顽童伸着双手，叫着“红军叔叔”奔了过去。

“哟，这不是海光嘛！”长者的眼睛蛮光亮。看来，外公村子里的人对廖海光还真熟识。

“这是凌家的老公公，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廖海光把长者介绍给王震后，便领着顽童捉蚱蜢去了。

王震坐在长者对面，两人聊了起来。

“请问大爷贵庚？”

“山野之人，不敢言贵！”长者极认真地摆过手后说：“六十有五！”

“人们都说，老人是村里的活字典。”

“不敢当，只不过比毛头小伙知道得多一点。”

俩人聊着聊着，聊到了张平化。老人捻着胡须说：“嘿，这可

是位好干部哩！”

张平化祖上是自耕农，到了父辈，便沦落为完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农。家里为有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出人头地，节衣缩食加借债，供张平化上私塾、初小、高小。张平化刻苦、聪明，高小没有毕业，便考上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祖父咬着牙把自己准备买棺材的钱拿出来作学费。在师范上学时候，张平化便多次参加实际上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师范毕业后，张平化受大革命形势的鼓舞，毅然参加北伐军，勇敢作战。大革命失败后，张平化回到了家里，找到了党组织，就在国民党知道谁是共产党就杀谁的头的时候，他加入了党组织，一入党，即任中共酃县第二区委书记。他和区委的同志一道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武装队，并于1928年初组织第一次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由于叛徒告密等原因，酃县县委机关几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28年秋，张平化由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改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后，遵照毛委员提出的“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使酃县革命根据地由大院、东西坑、犁树洲等几个山村逐步发展到整个上十都、上九都、上八都、上七都和上六都。

老人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感慨地说：“平化是穷苦人家出身，吃得了苦。他整天到处跑工作，脚板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连竹尖都扎不进。”

“世界上哪有这样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反革命哟！”尽管王震心里感慨万千，但脸上表情依然平静，因为省委交给的处决张平化的任务只有自己一人知道。

“老人家，谢谢您谈了这么多的情况！”

“嗨嗨，你这位首长呀，太客气……”老人突然不说了，因为他发现“这位首长”已经利索地甩掉鞋子，挽起裤腿，操犁驾牛

准备下水田。老人急得忙上前阻拦。

“你看，刚才你还说是我客气，实际上客气的是你老人家！”王震笑哈哈地下了水田。

三月八，冻死鸭，现在水田的水还扎骨头哩！”老人家也跟下水田，要来夺犁杖。

“老人家，您小瞧人哩！我也是穷苦出身。不是吹大牛，犁、锄、挑、种，从小练得行家里手。再说，您老人家这把年纪了，还要劳动！”说着，王震轻抚犁把，甩了个清脆的鞭梢，老牯牛平稳地走了起来。

“我呢，是不劳动浑身不舒坦，儿子忙苏维埃的事，他要请假来帮我，我没准！”

王震架着犁，老人跟在后边，两人边走边聊了起来。

闲聊中，王震得知，张平化家总共 11 口人，其中有 7 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父张升朝，大革命时期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也是石洲乡党支部的成员，并且参加了游击队。他被敌人捉住后，活活被打死，也没有泄露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一点机密。其祖父张春榜，虽然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坚定地支持党的斗争，也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就刑前慷慨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万岁！”除了其祖父、父亲外，还有其叔父、哥哥、嫂子、堂兄和弟弟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王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极有可能是在此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对朱昌偕等这样的好同志，自己未能保护得了；对张平化这样的好同志，就是自己粉身碎骨，也决不能再让他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也决不能让张平化家里再为革命献出第八条生命。

王震向老人问起了张平化反对烧祠堂和处决袁文才、王佐的事，老人摇着头，说：“不清楚，这你得去问县委和区委原来与平

化一起工作的同志。”

王震又忙乎了一天多，找了各类人员数十人调查，对张平化的结论更加明晰。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湘赣省委宣布对你的新的任命。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百事缠身，很难同时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经研究决定，免去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

接着，王震依次把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甘步衢、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介绍给张平化。

张平化听了这个决定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办完了移交手续，第二天背上背包住到了县赤卫大队。

事后，张平化说：“那时的地方工作很琐碎，赤卫大队的工作单一，又能和敌人面对面地干。我早就有这个私心，专干部队，卸任地方。饥了给你个大馒头，困了给你个枕头睡，你还不高兴？”

张平化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座谈会上，任弼时同志谈到了当年湘赣苏区肃反的扩大化、逼供信，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一些同志差一点被抓、被杀。任弼时说：“张平化有福星高照，碰得上一个大胆、负责，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大难不死哟！”直到此时，张平化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的事儿。

散会后，张平化即找到当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卫戍军区司令员的王震：“王震同志呀，你是不是会相面呢？你怎么敢担保我不是AB团呢？”

王震说：“我可不会相面，但我却会相‘里’。你是不是 AB 团，你那里的群众还能一点不知道呀？我在那里调查了两天，知道你们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条件很苦。你没有草鞋穿，整天光着脚在山上打游击，脚上的老茧厚得连小竹尖也扎不进。你们那里的根据地那么小，敌人随时都可能来袭击，反革命分子是要讲享受的，你要是个反革命能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坚持那么长的时间吗？在那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你们没有丢掉这块小小的红色根据地，反而在坚持斗争的过程中使这块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起来，这样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得得到吗？！至于说你反对大烧大杀，同情袁文才、王佐，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怎么能算是 AB 团骨干分子的证据呢？！”

1986 年 8 月 25 日上午，红二方面军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谈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问题，年近耄耋、曾先后任过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早早到会，他谈起王震保护自己的经历后激动地说：“1942 年，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想王震同志这个人好大胆呀！省委都作了决定，你执行就是了，还怀疑什么，调查什么呢？这说明王胡子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抵制的，工作方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谢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派了这么个不怕鬼的人来抓我，否则，不要说派一个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就是派一个怕负责的人，我张平化也早去见马克思了！王胡子当时改变省委的决定，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搞得“热闹”非凡，“高潮”一个接一个：刚刚平化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紧跟着的是如何处理 600 余名 AB 团可疑分子。

王震、袁德生、李天柱等坚决主张：对押留的 600 余名可疑对象迅速清理，没有确凿证据的，立即释放。

谭牛山把交叉胸前的两手撑在桌边，眼里放出咄咄逼人的光：

“这 600 多人全都是有确凿证据而关押的！”

“全都有证据？！”王震把目光迎了上去，“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青年队的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那些都是些小 AB 团无疑！”谭牛山说得斩钉截铁。

王震提高了声调：“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溜达，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他。远处急忙跑来另一个小鬼：‘哎！首长，你千万别靠近他，他是个小 AB 团，免得打你个大 AB 团！’原来这另一个小鬼是监工看守。我问挑水小鬼名字，他死不肯说，看守小鬼也不知。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 AB 团’。结果，有人说，连他名字都没人知道，审查审查再说，还是被打成了 AB 团。我了解了一下，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的莫须有的罪名。”

谭牛山噤声了几秒，终未出声。

全场静默，不少人为之动情，痛心叹息。

“我同意对关押的 600 余名可疑人员进行清理。”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现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打破了这静默：“我们的肃反工作，确实犯有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这不光表现在红校，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挑选的是政治上可靠、出身很好的战士，可没过多久，基本上都成了 AB 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大部分又被捕捉。”

主管纠察大队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坐不住了。刘士杰，醴陵人、被在萍乡谋事的姐姐带大，没上过几天学，当过几天陶瓷作坊杂工。这几天零杂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整日列宁装不离身，言必称“我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到处飞扬跋扈。

现在张启龙摸了他的屁股，那还了得？！刘士杰的脸色由红逐渐变成酱紫。未等张启龙讲完，他的大喉结往上一耸：“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们无产阶级办事从来是认真严肃的。红校的情况我不十分了解，我的纠察大队捕杀每一个 AB 团分子，可都有 3 人以上口供认走的！”刘士杰边说边挽袖子，“啪”的猛击桌面，尖声高叫：“凭什么诬蔑我工人阶级？！凭什么说我纠察大队乱捕乱杀？！”

“你有理讲理，少在这里摆招牌！”王震冷冷说道。刘士杰见王震接过话茬，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却未出声。

王震是老资格的铁路工人，这一点，刘士杰知道得很清楚。1930 年底，王震任湘东独立师师委书记、独立 3 团政治委员时，刘士杰还在醴陵那家陶瓷手工作坊里，王震带部队路过那里，把刘士杰等人带到了湘赣苏区。再加上这么层关系，刘士杰对别人张牙舞爪，对王震却不敢放肆。

王震继续盯逼着刘士杰：“问题恰恰就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哪来的？！我们到纠察大队调查过，什么惨无人道的酷刑都用了！”说到这里，王震也将桌面重重一击，“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同志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也有办法让你自己供认自己是 AB 团！”

王震威严地逼视着刘士杰，刘士杰像打了个寒颤，直立的腰肢塌落下来。不少人见状发出会心的微笑。

张启龙接着说：“大家知道，我原先对肃反工作抓得很积极。后来抓捕的人多了，我渐渐起怀疑，再说，被抓捕的很多出身很好，参加革命也都好几年了，家里也分了地，为什么还加入 AB 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呢？！”

“我和张启龙同志有同样的感受！”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王道接过了话头。他坦诚地望着大家：“1931 年 7 月下旬，我、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来到湘赣，除了积极组织军民反对敌第三

次‘围剿’外，抓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苏区中央局领导项英等同志指示，积极肃反。一抓人，由于怕被打成 AB 团，都很紧张，一时表面上工作也更加积极。我们也错误地把这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王震同志这次从酃县回来，给我详细谈了张平化同志的情况后，使我受到较大的触动。AB 团或其他反革命分子肯定有，但决没有那么多。假若真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从外地来的仅几人，连警卫员也没带，恐怕早就被他们搞掉了。所以，我同意立即释放所有的没有确凿证据的可疑分子！”

书记表了态，赞成纠正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占压倒多数。

“您好呀，王震同志！”

“您好，弼时同志！”

1933 年 6 月上旬的一天，赣江西岸，在红八军近 3000 人的欢迎队伍里，此时任红 8 军政治部主任兼第 22 师政治委员的王震与新到来的湘赣苏区省委书记任弼时紧握双手，互致问候。

王震打量着任弼时，见他依旧是 1931 年的老样子：宽大的前额，清癯的脸庞，高高的眉骨，深邃热忱的双眼，上唇留着一抹浓浓的胡须。只是岁月的风霜和繁重的工作，使任弼时显得更加衰老。

早在 1925 年，在长沙铁路当工人时，王震就知道任弼时是著名的青年运动的领袖。但第一次与任弼时相见，则是 6 年之后。

1950 年 11 月 2 日，任弼时不幸病逝后的第七天，王震在沉痛悼念任弼时的文章中，以第一人称简略叙述了与任弼时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1931 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任弼时同志是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局的组织部长，我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

记。幸运地第一次和您会面，您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您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化为一个训练班，您替我们拟出的代表团学习计划日程上，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的讲课，其中还有您亲自讲授党的建设。”

如今，自己所崇敬、信赖的弼时同志来湘赣苏区主持工作，王震倍感激动和喜悦。

返回永新的路上，任弼时与王震并辔而行，问到省委、省苏维埃原领导人王首道、袁德生、张启龙等人的情况。

王震说：“王首道、张启龙同志正在接受批判，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前一段我一直带部队在前方打仗，回到永新后就没见到袁德生同志，我问了一下，说是调到中央苏区去了！”

正谈着，原来去中央苏区汇报，这次与任弼时同行返回湘赣并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刘士杰催马赶了上来。

王震谈到了王首道被撤职后，担任湘赣省委代理书记的陈洪时。任弼时瞥了赶上来的刘士杰一眼，马上接过话头说：“对这人我了解，我在苏联学习时，他也在那里。”

刘士杰说：“我与陈洪时同志接触时间不长，但印象很深。他很有水平，很有工作能力。”

王震发现任弼时皱了皱眉头，没有作声。

一进禾川镇，大街小巷的标语扑面而来，有“努力扩红，消灭白匪”，也有“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消灭AB团”……禾川镇街头，气氛紧张。

刚刚走到十字街口，忽然看见几个人押着个五花大绑的穿街而过。任弼时问：“抓的什么人？”王震回答：“可能又是AB团吧！”

在省委门口迎接任弼时的是中等个头、微微发胖的陈洪时和留着大胡子、架着近视镜、穿着列宁装的刚任湘赣保卫局局长的吴德峰。

吴德峰出自豪门望族，但他毅然背叛自己的家庭，投身革命，1924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时，他凭借自己的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执委兼国民党政府武汉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挺身而出，保护了我党的许多重要同志以及一些进步人士。也就是在此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结识了他。

把任弼时刚安顿下，陈洪时、刘士杰抢先给任弼时汇报了湘赣苏区大搞肃反取得的所谓“伟大成绩”及其他各项工作。

任弼时冷静地抽着烟，时而在本子上记点什么，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陈洪时、刘士杰洋洋洒洒汇报了一通以后说：“请弼时书记作重要指示。”

任弼时默默地踱着方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待我再深入了解了解，考虑一下再说。”

送走了陈洪时、刘士杰，任弼时即派人找来王震。任弼时捋着自己唇上浓密的胡须对王震说：“在来永新路上，我们没有机会好好谈谈。现在，我十分希望能和你单独聊聊，特别是肃反方面的情况。”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使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不仅在中央苏区，而且在湘赣苏区得以全面贯彻推行，给湘赣苏区的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危害。王震和同志们一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一错误思潮进行抗争、抵制。但是，“左”倾错误思潮像泛滥的洪水，一浪接一浪涌来，王震忧心如焚，愤懑不解。现在，任弼时问到此事，埋藏在王震心底的千言万语，便如决堤的洪水，一泻而出。

1932年2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会返回，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指示后，湘赣苏区肃反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得到了暂时的纠正。但是，1932年11月间，苏区中央局又带来一些湘赣苏区的AB团活动情况及要犯名单。湘赣苏区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又开始重犯，并逐步走向高潮。

原湘赣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又任刚刚组建不久的新的独立第一师政委陈韶被以AB团要犯抓了起来。听到这一消息，王震着实吃了一惊。陈韶，湖南省茶陵县瑶里人。1926年在长沙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返回茶陵到平水江一带参与组织农民暴动。1927年8月，参与组建茶陵游击队，11月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边界特委委员。陈韶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为人也很随和。陈韶脸上有几颗麻子，有人戏谑地给他起了个“雅号”，他也毫不为怪，有时还爽快地答应。

王震急忙找到省委书记王首道，究其原由。

原来，陈韶的弟弟陈武，在安福县任县苏维埃主席，前不久借口携带金子到白区购买物资，结果一去不回头，投降了敌人。后来，安福县发现了陈武投降敌人前给他哥哥陈韶的一封信，便把这封信报给了省保卫局。

王震听了很是激愤：“陈韶是陈韶，陈武是陈武，陈武叛变了，陈韶照样可以革命，抓陈韶干什么？！”

王首道把双手一推，叹了口气说：“可是省保卫局说，不管陈武与陈韶有没有，也不管陈韶有没有问题，先审查审查再说！”

“什么审查？！完全是借口。不是有不少人借口被审查，后来也没有什么证据，便被砍了脑壳吗？！”

“蔡会文同志从中央苏区出发来湘赣时，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

同志交给他的关于湘赣苏区 AB 团的材料中，就有陈韶的名字。现在恰巧他老弟又叛变了。看来，陈韶同志是很难保住了！”王首道皱着眉头，沉重地说。

“首道同志，说句心里话吧！我们与陈韶这样的同志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他们哪里是什么 AB 团呢？！他们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好干部，是我们湘赣苏区的宝贵财富。他们如果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们为他们自豪，为他们感到无尚的光荣。而现在，他们要死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我，我实在觉得痛心呀！……”王震揉搓着自己的双手，有些哽咽。

王首道沉默了一会儿，舒了口气说：“胡子，你参加一次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使我对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有了一点认识。我们的肃反工作也逐步走向正常。可是最近，中央几次严厉批评我们在肃反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闹得我心里很乱。省保卫局又搞起了肃反高潮，连我的秘书张槐生也被当做 AB 团捉了起来。张槐生是浏阳张坊人，与我是一个区的，从小我对他就很了解，他哪里是 AB 团呢？我亲自考察、提拔的几个县委书记也都被当作 AB 团逮捕了。我很担心，这样闹下去，会闹成什么局面呢？”

“这样闹下去，敌人搞不垮我们，我们自己要搞垮我们自己哟！”王震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一道找省保卫局长谭牛山谈谈，陈韶同志兴许还有救！”

王首道摇了摇头说：“你也知道，现在的省保卫局是独立于省委和省苏维埃领导之外的自成体系的肃反机关，它直接受国家保卫局领导，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意见，它甚至可以不听。别说谭牛山是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积极执行者，就是他有些不同的看法，国家保卫局指名要逮捕陈韶，他也不敢不照办！”

王震说：“我也考虑过，知道没有多大希望。但是，只要有一

线希望，我们就应尽全力去解救！”

王首道被王震的一腔赤诚所感动。

找谭牛山谈了。没起任何作用，陈韶依然被关押着。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没过几天，中央保卫局来电，说谭牛山也是 AB 团首领，应立即逮捕审查。

谭牛山究竟是不是 AB 团，王震实在说不清楚，但他错杀了很多好同志，却是铁的事实。

谭牛山被捉之后，也尝到了被人拷打的滋味，诸如坐“快活”凳，手指尖钉钢针，鼻子里灌辣椒水等。

谭牛山乱招乱供，搞得人人自危。事情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面。

省工会主席刘士杰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连睡梦里也直叫嚷：“我不是 AB 团！我真的不是 AB 团呢！”

不少人分析说，这时刘士杰的心态是：唯恐自己被捉成 AB 团，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积极检举、揭发并坚定地与 AB 团分子作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形象。

一天，刘士杰匆匆来到省委和省保卫局说：“我亲眼看见，袁德生到监狱里探望谭牛山，两人密谋半天，袁德生还把手掌翻了一下，意思很清楚，是要谭牛山翻案！显然，袁德生也是 AB 团头子。”

刘士杰云云的这番事实的本身真伪，恐怕是永远也无法考证了。但是，刘士杰这个被任弼时后来称之为“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的这番检举，却使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党员蒙冤去世。

张启龙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开始，省委不相信袁德生是‘AB 团’，但在那种‘左’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不信。实际上这是刘士杰陷害袁德生。为此事当时在省保卫局开会，省委有几个同志参加，袁德生没有参加，我到安福去了。但要把一个中央苏维

埃政府委员、省苏维埃主席打成‘AB团’，要请示中央。因此，省委几个人决定，派刘士杰去中央报告。事后，首道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有句话，‘现在有的人同床异梦！’谁是‘同床异梦’呀？我想是不是我老婆？不可能。我想不透是怎么回事，也根本没有想到袁德生头上，只好回省苏，回来听首道这么一讲，才知道袁德生是‘AB团’。”

王震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很惊奇、激愤：“说袁德生是‘AB团’，敲了我脑壳我也不相信！大家都了解袁德生同志的经历，出身佃农，幼年读书半年，家里供不起，读书不成，便流落湖南各地，去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就到安源做采煤工，一天在井下十三四个小时，一块三尺长的布，井下缠头擦汗，井上遮羞洗澡。一干就是10余年。袁德生同志脸上的‘墨疹’大家都看的见的，标准的‘炭古佬’。他的身上，也到处是‘墨疹子’。他积极参加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深得工人人们的拥护。他赴广州农讲所学习后，又从事农民运动、参加南昌起义，并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地下交通线路，保护了党的一批重要干部，对支援和配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湘赣苏区的工作表现以及对湘赣苏区建设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

是呀，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机关的同志都知道袁德生的为人。新婚不久的妻子患疟疾，发病时浑身发抖。他妻子想服用西药，袁德生却请人挖来草药熬汤喂她，一边喂，一边耐心劝导：西药是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数量有限，要留给重伤员用。组织上分配给他一匹马，每天行军打仗，他不是让马驮文件箱，便是让给伤病员骑，自己背着武器和背包步行。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AB团、反革命？！上次对陈韶同志，我们未能保护好，现在一提起这事，我的脸还发烧。这次对袁德生，

我们要豁出命来保！”王震挥着拳头说。

王首道、张启龙的心里也热乎乎的。

“首道同志！”王震接着说，“我还要给你提个意见，你们怎么能派刘士杰去给中央汇报工作呢？这人政治品质很坏！”

当时，前方的作战任务很重。说完，王震不得不带着部队匆匆赶赴前线。

又过了几天，王震与省军区政委甘泗淇带部队路过永新桥头，只见王首道、张启龙急匆匆奔来。

“苏区中央局根据刘士杰的报告，认定袁德生是‘AB团’。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签发电报，命令我们逮捕袁德生，”王首道搓着手，张启龙搔着头，“这怎么办好呢？”

王震说：“我还是那句话：豁出命来保护袁德生同志！”

湘赣省委和省保卫局没有执行逮捕袁德生的命令，更引起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央和国家保卫局的警觉，印证了刘士杰关于湘赣省委所谓“严重右倾”动摇的汇报。

1933年2月1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议中指出：“为了保证中央与中央局的路线坚决执行，现在省委必须改组，中央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张子意任宣传，以陈洪时、李瑞娥、张子意、邵德武及省苏工联党团书记八人为常委。”

同年4月，又撤销了张启龙等人的职务，甘泗淇改任省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据说，在中央苏区学习的湘赣省的干部，知道任命刘士杰为省委书记，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士杰品德不好等问题，苏区中央局又改任陈洪时为代理省委书记。4月间，陈洪时与新任的省保卫局局长吴德峰，裁判部部长方维夏一同到达湘赣。陈洪时，这个

当年王明在苏联组织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一到湘赣又是开会，又是作决议，把肃反工作的“左”倾错误推到了顶峰。

处死了陈韶。

陈韶在省保卫局的监狱里，受尽酷刑，但仍很乐观，他在服刑期间还创作了《红军打仗为工农》的歌曲，由看守他的战士周尚文传出并在湘赣苏区流传开来。陈洪时等人到达禾川镇后一星期，便派人给陈韶剃了头，第二天即被押到禾川镇东门左边的小沙洲执刑。陈韶望着滚滚东去的禾川河水，悲怆地长叹了一声。

逮捕了袁德生。

1933年4月底的一天晚上，王震接到到省保卫局吃饭的通知，同时被邀的还有王首道、蔡会文、袁德生、张启龙等。吃过晚饭，便把袁德生留下，捆了起来，对外还谎称把袁德生调到中央苏区去了。

批判王首道、张启龙所谓的肃反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

王首道和张启龙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都说，原来的肃反工作，我们明明犯了“左”倾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可是陈洪时、刘士杰等人却指责我们犯了右的错误，这只能说明他们比我们更“左”。

怀疑王震、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一大批领导与AB团有关系。

谭善和曾这样回忆道：“那时我在红8军一个师里当保卫干部，到省保卫局受训，省保卫局的同志给我们上课时说，湘赣苏区党政军机关有很多AB团分子，比如王震等，现在暂时还不抓就是了！”

当年在湘赣军区无线电队工作过，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的江文回忆说：“1944年，回顾湘赣苏区历史

的工作座谈会上，曾在省保卫局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王震同志那时确实上了黑名单，为什么没有抓他、杀他呢？有3个原因：第一是他作战勇敢，他是红8军的一员战将，巩固和发展湘赣苏区离不开他。第二他是工人出身，那时工人出身是‘金’字招牌。第三他在湘赣红军中威望很高，影响很大。抓他、杀他怕战士们造反。”王震原来一直不知道自己上黑名单的事。1944年，任弼时主持召开湘赣工作座谈会时，王震正率南下支队，挺进湖南、广东。1946年北返延安，王震才知此事。

就在任弼时到达湘赣的前一个星期，王震与陈洪时之间发生了一场“拍桌子骂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如何处理在棠市战斗中背着敌人战斗命令归队、解放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的唐子奇。

陈洪时跷着二郎腿，冷冷地说：“他是个俘虏兵，说不定还是个妄图打入我红军内部的AB团分子呢！毫无疑问，杀掉！”

王震和陈洪时对视着：“陈代书记，不对吧，唐子奇不能算作俘虏兵，更不能算成是AB团分子。唐子奇原来在长江局做交通，失掉了关系。为了接上关系，他才到陈光中63师当兵的。”

没等王震说完，陈洪时便抢过话题：“你怎么知道他原在长江局做交通？”

“张启龙同志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张启龙同志作的证。”

陈洪时鼻子里“哼”了一声：“张启龙？一个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人能作证？谁能保证唐子奇此行不是为了打入我们内部？！”

王震依然逼视着陈洪时，寸步不让：“陈洪时同志，请允许我再叙述一遍给你汇报过了的事实：唐子奇同志失掉关系后，听说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启龙同志在湘赣军区当总指挥，便千方百计到准备来湘赣苏区‘围剿’的敌63师当兵，当上敌连队文书。敌人一同我们接触，他就瞅准机会，背着敌人的作战文书跑到我方

阵地。看了他带的作战命令，我们才知道敌人只有一个前卫营，其他两个营距离尚远，我军快速出击，很快消灭了这个营，为取得棠市战斗的整个胜利打下了基础。若是敌人想让唐子奇打入红军内部，决不会笨到用一个营的兵力做诱饵！”

陈洪时噎住了，张着嘴干呕了两下，没有发出声来。

省委会议的会场上，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什么叫俘虏？背枝枪过来的人我们还叫投诚呢！唐子奇同志背着作战文书过来，比一支枪重要得多！”王震打了一个手势，“我认为唐子奇同志不是俘虏，也不叫投诚，而叫归队。有张启龙同志作证，我同意恢复唐子奇同志的组织关系！”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子意表示同意王震的意见，其他省委委员开始附和。

“啪”的一声，气急败坏的陈洪时一掌下去，击在桌上。显然，桌面比手掌硬，疼得陈洪时抽搐了一下嘴角，接着才吼道：“你们还有没有阶级立场？！已经受到撤职和批判的右倾分子张启龙有什么资格作证？！”

王震毫不示弱，也拍案而起：“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对原省委和原省委的主要领导的看法，我们有着根本的分歧。我认为，1932年春以来，原省委和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贯彻毛主席和中央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纠正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严重错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你陈代书记却认为原省委和原省委主要领导是犯了对反革命分子表示留恋的严重右倾错误。”

这场争论没有具体结果。由于绝大多数反对，唐子奇没有被作为俘虏杀掉。由于陈洪时等少数人的反对，唐子奇的党的组织关系也未被恢复。

大家通过了王震的一个提议：新任省委书记任弼时快到了，唐子奇的问题由任弼时到任后再研究处理。

任弼时来到永新的数周之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约王震谈工作。

任弼时住在省委——清朝的考棚，考秀才的地方，民国初，改为禾川中学。

里外两间办公室，外间处理日常军政事务，里间是他亲自与自己的夫人陈琼英一起从事破译敌军密码的工作间，别人不得进入。

他满面春风地招呼王震坐下：“王震同志，有没有雅兴，先杀它两盘怎么样？”

王震袖子一挽：“杀两盘就杀两盘！”

任弼时转身拿过一副军棋，两人便各自垒阵。

身材瘦小但很清秀的陈琼英从里屋出来，忙着为两人倒水沏茶。

任弼时难得偷闲。他来到湘赣苏区后，即投入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对湘赣苏区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他高兴地对王震说：那天，你对我谈的情况都很重要，你的主要观点我都赞同。看来，刘士杰同志到中央讲了不少假话。”

情况越来越明朗，问题也越来越清楚。经过日夜紧张的忙碌，湘赣苏区的各项工作都有起色，任弼时自然感到欣慰。

“碰！”任弼时也挽着袖子，把碰了的两个军棋凑到眼边一看，分外惊喜：“哈哈，王胡子，我炸了你一个‘军长’！”

王震见任弼时愉快地笑着，也抿着嘴，愉快地笑了。过了一会儿，王震的一个“地雷”被“工兵”挖了，不一会儿，“总司令”又被“炸弹”炸了。

任弼时高兴地叫喊着陈琼英：“快来看，我赢了王胡子一盘！”

陈琼英应着走来：“瞎猫抓住个死耗子，凭你那臭棋还能赢得了王胡子？”

陈琼英是无意把任弼时比做“瞎猫”的，不过，倒也有恰如其分的地方，因为他高度近视，镜片很像是鼓进去的瓶底。

王震的眼睛非常好。事隔 13 年后的 1946 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曾专门描述王震的眼睛，说他“在原野里看得非常远”。

王震和任弼时下了几次军棋，即把红白双方主要棋子背面的木质花纹认记个清清楚楚。日后再下，总是王震的“炸弹”炸任弼时的“军长”、“总司令”，“工兵”刨任弼时的“地雷”，弄得任弼时常常纳闷，继而承认王震是个下军棋的高手，一直缠着要向王震讨几招呢！王震却总不肯泄露天机。

今天，王震见工作劳累、日见削瘦的任弼时玩性甚高，想让他高度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便有意把自己的“军长”、“总司令”往他的“炸弹”跟前送。

赢了一盘，很不容易，任弼时十分高兴。

“再来一盘！”

任弼时又赢了，他开心地笑着。王震也开心地大笑起来。

渐渐地，任弼时发现王震笑得蹊跷，这里边一定有鬼。当他逼着王震交代出其中的奥秘后，俩人又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

“好了，谈正事吧！”任弼时边收着军棋边说，“王震同志，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我是犯‘右的错误’，被撤销了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才调到这里来的？”

王震感到很是意外。

原来，早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对王明主持的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东西已开始有所察觉。会上，中央代表团和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根据王明主持下的党中央的指示，以“国际路线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批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和主张。1932 年 10 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共

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任弼时与一些同志一起，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任弼时逐步认识到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排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王明主持的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贯彻中央的路线不力，犯了“右的错误”，才调他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王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客观存在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

任弼时告诉王震：“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都十分敏锐，见解十分深刻，这是中国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就是有点急躁。虽然现在他遭到排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周恩来同志是会把请出来的。不过，眼下‘左’倾错误路线之风来势这么凶猛，恐怕我们一时难以完全顶住。”

“弼时同志，大家对陈洪时、刘士杰同志都有些反映，特别是对刘士杰反映更大！”王震愤然地说。

改组后的省委常委、省苏维埃副主席李瑞娥从小失去母亲，家里十分贫穷，革命意识十分强烈。她1926年入党，开始在乡里，以后又在澄田区做妇女工作。最近，陈洪时和刘士杰都看上了她。她对陈洪时并不反感，对刘士杰却没有一点好感。于是，刘士杰便四下造李瑞娥的谣，说她私吞了没收地主的金银首饰，作风不正，有AB团嫌疑，并在《红色湘赣》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她。年仅23岁的李瑞娥，不堪受辱，了结了年轻的生命。

讲着讲着，王震激动地敲起了桌子：“他刘士杰欺人太甚！他逼死了李瑞娥，还要说人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什么死有余辜！”

任弼时颤抖着手指划燃火柴，点着一支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地吐出。良久，才望着王震，苦笑道：“可他们的后台却很是欣赏他们哟！最近，苏区中央局根据他们的报告，又几次

来电报，说我们对王首道、张启龙等同志的处理太轻了，催着我们重新处理。如何是好呢？一个就是硬顶，结果是等着派别人再来改组我们，由别人再来对王首道、张启龙等同志从重处理；再一个办法就是明着执行，暗地里打折扣，保护这些同志！”

王震说：“我赞成第二个办法！”

任弼时叹了一口气：“这就难为王首道、张启龙同志他们了。王首道同志被撤职后，被下放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听说那里环境很艰苦，王首道同志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让琮英带些吃的东西和钱，代表我去看他，琮英看到首道同志衰弱的身体，流泪了。首道同志也禁不住热泪纵横。他还特意提起他在去白露、袁州前，你送给他一匹马，他说，他也谢谢你王胡子了！”

王震的眼眶潮湿了。

王震和肖克、蔡会文正在澧田研究湘赣苏区如何贯彻中央军委发布的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纲领，甘泗淇骑着马气喘吁吁地奔来：“刘士杰一伙趁弼时同志上了前方，私自召开省委会议，把张启龙同志关到了保卫局！”

王震的心“格登”一下提了起来，他知道，保卫局是刘士杰、陈洪时控制的单位，张启龙进去是凶多吉少。1933年6月，红8军改为红6军团第16师。此时任16师政治委员的蔡会文思索片刻后说：“看来，只有弼时同志才能降服刘士杰这尊恶神。我看，还是请甘泗淇同志迅速赶到前线，向弼时同志报告。”

“我同意”，王震说，“另外，我还想，蔡会文和我还是改组后的新省委委员，我们与肖克同志一道，即刻赶到永新！”

肖克说：“对，这样可以防备刘士杰一伙先下毒手。”

“我也完全赞成！”甘泗淇说罢，抹抹汗水，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见现任红 17 师政治部主任的王震等人从澄田赶来，刘士杰作贼心虚，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了两声。

王震一脸冷峻的表情：“请问刘副书记，凭什么把张启龙同志抓起来？”

刘士杰又干笑了两声：“王主任，其实您都知道，还不是他包庇 AB 团要犯袁德生，又私放走国民党团长张超，还有攻打分宜没有打下。”

“就这么多？”王震追问道。

刘士杰个头矮，只好仰着脸反问：“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王震直视着刘士杰，两人目光对峙着。终于，刘士杰的眼神露出慌乱，两个眼球往眼角一滚，视线滑落到地上。

王震不善于言辞，但愤怒出雄辩：“我说刘副书记，你判的屈鬼是不是多了点？我不知每天深夜你的脊梁骨发不发凉？你给张启龙同志强加的所谓 3 条罪状都有我的份，并且应负主要责任的是我，不知你刘副书记准备把我王震如何发落？”

“王主任，您是我的老领导，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说。”刘士杰转身给王震沏了一杯茶。

“我是你的老领导？不敢当！你到中央苏区汇报有功，是省委副书记，我不过是个省委委员，说不定还是个 AB 团要犯哩！”王震不软不硬地回敬刘士杰，对递来的茶水装做没看见。

刘士杰尴尬地把茶水放在桌上，“王主任呀，逮捕张启龙，我也没有办法，这是省委开会决定的！”

王震浓眉一挑：“研究决定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专等省委书记弼时同志离开后召集？既然是召开省委会，我和蔡会文同志又都是省委委员，况且我们就在离永新 10 多里的澄田，为什么也不通知我们参加呢？”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刘士杰拿起电话，听筒里传出浓重的湖南口音：“我是任弼时！听甘泗淇同志讲，你们逮捕了张启龙同志，还要判他的死刑，这是错误的。他有缺点错误，那是工作上的问题。你务必告诉省保卫局，决不能判张启龙同志死刑。我马上要赶回去，具体怎么办，等我回到永新后再说！”

刘士杰放下电话，面带愠色，又透着沮丧。

得知任弼时来电话的内容，王震的心虽然放下了一大半，但他仍担心刘士杰会搞出什么新名堂来。

王震怀里揣着两本书，手里拎着两瓶酒，踏着金黄色的满地落叶，向看守所走去。

关于张启龙的风波，暂时有了个结局：在国家保卫局的再三干预下，张启龙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不过，能从死神的恶爪下逃生，总是可喜可庆的事。

“来，干一杯！”王震打开两瓶酒，自己拿一瓶，递给张启龙一瓶。

“干！”

两个玻璃瓶碰撞出动听悦耳的响声。

“再来一口！”张启龙提议。

王震把张启龙举起的酒瓶按住：“不了！你这家伙爱喝酒，整天关在这里没多少事干，还是多留几口陪陪你吧！”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本是《国家与革命》。

张启龙眼睛一亮，激动地把书接过来“我知道，这是你参加第一次全苏大会时，毛委员送给你的几本书的翻印本。原来，只草草读过一遍，这下子可有时间仔细揣摩研读了！”

“我文化不高，但对这几本书可是反复读了好多回。特别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越看越有滋味！启

龙同志，毫无疑问，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不管国民党反动势力目前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也不管“左”倾错误路线是多么气势汹汹，但是，我们必须走十分艰难的路，才能彻底抛弃‘左’倾错误路线而逐步取得胜利！”

50年之后，83岁的张启龙在回顾这一情景时，激动地说：“当时，我的整个思想完全被王震同志深刻的议论迷住了。那时，我望着神情激动的王震同志，曾这样想：这就是仅读过3年私塾的王胡子吗？”

要离开了，王震紧紧拉着张启龙的手，望着原来是一副精壮的身体、现在却是瘦骨嶙峋的张启龙，充满无限深情地说：“最近，我又要带代表团，赴瑞金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去了。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你一定要很好地保重身体，我衷心希望我从瑞金回来，能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红光满面的张启龙！”

张启龙猛的一下，抱住了王震的脖子，哭了起来：“谢谢你，谢谢你，我的王胡子。我也知道在旧省委时期，特别是在肃反问题上，我执行了不少‘左’的东西，害了一些好同志，你对我很有意见，但我听不进去。现在，反过来我又受这条‘左’倾路线的迫害，你不但没有嫌弃我，却给我讲了这么多的公道话……”

王震的眼眶里也闪动着泪花。

两人挥泪告别，互道珍重。

1986年9月的一天，晚饭后，笔者在江西永新调查时，邀约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老左同志，带自己到当年处决所谓AB团分子的一个遗址——沙洲，企望在这里增加一点对当年湘赣苏区肃反的感性认识。

信步走出禾川镇的东门，只见禾水在镇东南几乎打了个直角，急速地弄着漩涡，迤迤北去，消失在朦胧的夜幕里。直冲东门的

是用圆木架起的浮桥，浮桥紧贴水面，浮桥两边是三三两两纳凉的人群。浮桥北面，一片灯火通明，那是正在日夜赶工的修筑钢筋水泥大桥的工地。

“这就是沙洲！”老左指着东门外左侧与禾水之间的地带说。只见一道围墙围起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圆木。

“沙洲现在是县木材公司所在地。春秋发水季，这里的木材顺着禾水，进入赣江，运到南昌，有的继续前行，穿过鄱阳湖，抵入长江，直下九江、南京、上海等地。”老左又补充说道。

修桥工地上不断传来“膨膨”的打桩声，相比之下，那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那人人自危的肃反岁月，显得十分的古老和久远。

眼前的沙洲，当年常常是一队又一队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在这里倒下，黄澄澄的沙碛被染成暗褐色；一入夜，野狗为争夺死尸的撕咬声传得很远。王震所要竭力保护的陈韶就是在这里倒下的。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结果都是有其原因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历史上这幕不应有的悲剧的发生原因何在？

1987年底，在广东珠海环境优美的石景山庄，王震侃侃而谈：湘赣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发生和发展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发生和发展一样，有着它的主客观因素，有着它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首先是共产国际“左”倾思潮对中国党的指导。1927年12月苏共“十五大”后，苏联共产党内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右、“清党”、肃反等运动，这些斗争的情况和所谓经验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迅速波及到中国共产党内。连肃反的方法上也照抄照搬苏联革毕乌（俄语译音，保卫局）那一套，过分强调了政治保卫局与肃反委员会的职能，使其自成体系，大搞神秘化，放弃了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其次，党内路线

斗争的分歧是肃反错误扩大化的根本原因。王明一伙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这样又把党内的不同意见者与反革命分子混淆起来，进行残酷无情的斗争。再次，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是肃反错误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这时湘赣苏区如同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下，革命与反革命的争夺战每时每刻都在激烈地进行，当时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又不那么高，那时既不可能找到像后来延安整党整风那样正确有效的方法，又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所以肃反中唯心主义的“逼、供、信”的方法应运而生。另外，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与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也是肃反错误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肃反错误扩大化的起因十分复杂，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探讨研究。

采访中，无论是当年的红军战士、苏区群众，或是党政军领导同志，都纷纷赞扬王震在肃反中敢于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免遭杀害。他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觉察较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得知这一评价，王震风趣地笑着说：“我可不敢戴这么高的帽子哟！对湘赣情况熟悉，这倒是事实。我是和一些同志一道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作了斗争，替受害的同志讲了公道话。但是，杯水车薪，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湘赣苏区的一批优秀干部、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被打成‘AB团分子’、‘反革命分子’，惨遭痛打和杀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党员，无愧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彭湃培养出来的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袁德生，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害，我也无从知晓！”

说到这里，王震微闭双眼，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不做声。宽大的房屋里阒无声响，落地窗外传来石景山游乐中心游人们的嬉闹声。

突然，王震拍了下扶手：“哎呀，只要一提起袁德生，他那赤脚、黑脸的‘煤黑子’形象常常站到我眼前。一次全苏大会时，我们还相约参加开国大典哩！可是我俩谁也没有参加上。他含冤去世了；开国大典时，我正在进军新疆的路上。”

王震微闭的眼角旁有什么东西在闪亮。*

* 本文发表于《中华英才》，1999年第1期至第5期。

i 第五部分i

散 文

清明时节思井冈

又是一年清明节，思绪又飞井冈山。青翠秀美的井冈山杜鹃花又开了吧？！

这块光荣的红土地，曾经引起我多少庄严肃穆的遐思与情感。1997年金秋的10月，当我终于驻足于它的身旁，目光掠过眼前的苍山白云，翠柏绿水，这景象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在青松环绕的红军伤病员烈士墓前，引导员的解说，把我们国防大学赴井冈山现场教学400余名将校学员带到70年前那“九死一生”的烽火硝烟中。

1931年7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敌人，用500元光洋收买了一无业游民，顺着冬季干涸的小溪突袭到小井，抓住来不及转移的红军医院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严刑拷打，但无一人暴露红军转移的情况。敌人把他们赶到当年的稻田、今日的纪念墓地前，然后在对面小桥上架起机枪扫射，13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解说员的解说，使我想起昨天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忠魂

堂那黑色大理石上嵌刻的 15744 个革命烈士英名录和那块无名烈士纪念碑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70 年前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多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啊！还有不少前辈几乎献出了全家的性命。解放后曾任内务部部长的曾山曾为革命壮烈牺牲 4 位亲人：其父曾昭藻、哥哥曾延生、嫂子蒋竞英、弟弟曾炳生都先后被捕入狱，受尽敌人酷刑，但全都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惨遭杀害。1961 年底 1962 年初，曾山回到故里井冈山脚下的那片红土地，挥笔写下了“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的对联（曾山共有兄弟姐妹 7 人，其中有二男二女因病而幼年夭折）。解放后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一家就在井冈山斗争中献出 6 位亲人。当年在井冈山坚持斗争、解放后曾任军事学院院长、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一家也为革命献出 5 条生命。工农红军第一面军旗的主要设计者、当年在井冈山奉毛泽东之命改造王佐部队、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何长工，为革命献出家人及同族亲人 40 余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极其残忍地剁成肉酱，装到罐子里。

啊！井冈山，鲜血染就的山！无私奉献的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鲜艳的五星红旗上浸染着井冈山革命烈士的鲜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里熔铸有井冈山革命烈士的铮铮铁骨。

我们列队整齐，脱帽向您致敬，为红军烈士默哀！而溪水依旧淙淙流淌，不知名的小鸟在青松间叽喳啁啾。

井冈山无言。

默哀毕后，我发现，不少将军校官和我一样，眼眶里涌闪着晶莹的泪光。

先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到处莺歌燕舞，多了楼台亭阁，不断创新的光辉的新井冈可以告慰先烈。

在井冈山现场教学的日子里，我们参观革命博物馆，凭吊革命烈士纪念馆，登临黄洋界、朱砂冲、双马石、桐木岭红军哨口；瞻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旧居，井冈山的一松一竹、一草一木、一峰一石都在讲述着革命领袖和红军战士不畏牺牲、英勇奋斗的感人故事。这都极大地震撼着每一名将校学员的魂魄，又都引发了我们的深深思考：想当年，白色政权包围着茫茫 500 里井冈，红军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每人每天 5 分钱银洋的伙食费也无法保证，连食盐、药品也奇缺，更何况战事频繁，随时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但 6000 余名红军战士为何如此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大家找到了答案。

当年井冈山的一位红军战士作战十分英勇，屡建战功，1929 年 6 月 29 日，这位红军战士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红军是有主义的军队，有政治训练的军队。我们不仅懂得怎样打仗，特别懂得为什么要打仗”，“我们的生命已经贡献于革命了，我们一点汗、一滴血，都是为着工农而流，所以我们能够一致勇敢与敌人作殊死战。”这封信全文登在当时中央的刊物《红旗》第 27 期上。这刊物虽已陈旧泛黄，但这位红军战士的话语却依旧振聋发聩催人警醒。

1929 年 5 月，井冈山主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江西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被捕。他在敌人刑场上放声大喊：“国民党杀人魔鬼疯狂不了多久，工农红军是一定会打回来的！”敌人凶残地割掉了他的舌头，他使用脚趾蘸着流到身下的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了“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

泪眼朦胧阅读着红军战士的信件和刘仁堪同志壮烈牺牲的事迹展览，深深的思考转化为对革命前辈和先烈们的深深的敬意。

井冈山是忠贞不渝的山！井冈山是理想信念无比坚定的山！当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几经曲折终于势若燎原。

近些年来，国际风云剧变。

风景这边独好的社会主义中国不正像当年“我自岿然不动”的巍巍井冈吗？

悲观主义者从来都是软弱的和没有前途的。凝聚着人类思想精华的美是永存的。

当年井冈山红军战士和革命先烈身上体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的美、无私奉献的美、英勇悲壮的美将与我们同在。

1972年1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接到恢复组织生活的通知，便悄然来到井冈山。在茅坪八角楼毛泽东的旧居，他看了陈列的床、桌子、油灯、砚台等文物后，坐在毛泽东坐过的凳子上说：“当年干革命真艰苦，要好好发扬井冈山精神，传统丢不得！”

“传统丢不得！”这已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1996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江西革命老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住过的土房、阁楼里，目睹着仍按原样摆放着的煤油灯、木板床、斗笠、草鞋……总书记沉思良久。在同当地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老红军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

即将告别井冈山的前一天，我们赴井冈山现场教学总结大会上，6名将校党员代表畅谈体会，个个都说：“传统丢不得！”国防大学政委王茂润随后讲话：“现在，社会上对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确有淡忘的现象。我们400余名将校党员都是我军的中高级干部，有责任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接过来，传下去。到了井冈知井冈，知了井冈学井冈。我们学传统，就要学本质。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这些都是我党我军传统中最本质的东西。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同样离不开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的风景实在美丽。是啊，这里群峰巍峨，万壑争流，林竹蓊郁，云海磅礴。当年，郭沫若游览后，也曾发出“井冈山下后，万岭不思游”的感叹。但是，真正崇高的东西不在自然界，而在人类社会本身。无比美丽的是井冈山的雄、奇、险、峻、秀、幽的自然风光，而无比崇高的却是我党我军在井冈山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

井冈归来，忘不掉井冈山旖旎的自然景色，但更难忘的是我党我军井冈山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

巍巍井冈，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 本文发表于2000年4月3日《解放军报》。

雪山恋歌

记得上小学时，磕磕绊绊地读过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书中讲的是地主家的小长工和小丫鬟，他俩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后来，小长工参加了八路军。几年后，队伍路过家乡，乡亲们告诉小长工，小丫鬟不堪虐待，也外出谋生了。一次大捷后，小长工遇见同乡的战友，得知小丫鬟就在军部医院当护士。小长工赶忙请假，骑着大马，哒哒哒往医院跑。怎么也没料到，小丫鬟为抢救伤员，被炸掉一只脚，流血过多，生命垂危，医生们正在抢救哩！几大管鲜血输进小丫鬟体内，她那苍白的面庞渐渐……。哟，糟糕！以下的书页全被谁扯去了。小丫鬟活了没有？她剩一只脚了，以后可怎么办哩！小长工和小丫鬟终成眷属了吗？这悬念一直牵拽着我那颗单纯而好奇的童心。那时，我曾多次试找这部小说的完本，没如愿，因此发誓：再也不读没头没尾的书了。

上完学，参军，进军队一家报社当记者。没想到，前不久到西北边防采访时，又读到生活中的一本没尾的“雪山恋歌”……

那天，我乘车到冰山脚下的边防团采访。这时节，内地正是百花吐蕊、柳浪闻莺的孟春，但寒冬仍侵袭着祖国的西北边疆：苍白的太阳像盘冷月，悬挂在灰蒙蒙的半空，一簇簇残冰败雪，依然盘踞着沙梁的背阴；枯黄的芨芨草、骆驼刺随着风摇曳，我身着棉衣棉裤，仍凉簌簌的。

“还真叫冷呢！”我搓着发僵的手，对常年含辛茹苦，战斗在

风雪边陲的战士们的敬意油然而生。

司机边应和着，边“嗤、嗤”地点着刹闸。

我抬头一看，面前道旁有人摇着手臂，一名战士要求搭车。

这战士，胖墩墩的身材，圆乎乎的脸盘，微翘的嘴唇上拱出一抹淡淡的胡须，乌亮的眸珠里流溢着稚气、顽皮、聪敏和欢快的光亮。他打开吉普车后门，把揹着的两个鼓鼓囊囊的挎包先塞了进来，然后冲着我莞尔一笑，显出一对浅浅的酒窝，那神情，那模样，就象影片《南征北战》中的小胖子。我万没想到，这小战士会给我翻读生活中这本没尾的书。

司机一踩离合器，吉普车像轻捷的燕子，贴着公路又飞了起来。嗡嗡的马达声中，我侧坐着身子，和小战士交谈起来。

小战士挺逗。我问他多大了，他歪着头让我猜。我言中了，他舌头一伸，笑了。我又问他是在团部还是在边防站，他依然狡黠地显现两个酒窝，让我再猜。这次我没猜中，他乐得格格出声：“咱是名副其实的边防战士，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大鼻子！”他绘声绘色地讲起苏军士兵怎么在老鹅窝（哨楼）上光着膀子逮虱子啦，怎么挨当官的皮带打、皮鞋踢啦，怎么隔着铁丝网向我巡逻人员要香烟抽啦……

我恍然有所悟：“啊，你是红卡山边防站的呀！”

“那当然！”小战士神情颇自豪。

两年前，我在编辑部曾看到一份来稿，讲红卡山边防站的哨楼和苏军的老鹅窝对峙矗立，仅一箭之遥。边防站的营房设在雪峰半腰，环境十分艰苦，那里常刮七、八级大风。一次，哨卡的铁皮房顶“哗啦”一下被大风刮到20多米深的深沟里。那里气候严寒，腊月天，空中小鸟飞着飞着就会“叭嗒”一下掉进雪窝里。那里吃菜要到几百里外的山下运，吃水，冬天靠化冰雪，夏季得翻两道山梁去拉。记得看完这篇稿子，我还特地找到一份军用地

图，查出红卡山边防站的位置，在它面前默立了许久。

“你们可太辛苦了！”我记起离开报社时，编辑部的同志知道我到新疆边防采访，纷纷请我代为转达他们对边防战士的问候和敬意。

也不知由于问候的笨拙，还是别的什么缘故，小战士又吃吃直笑，弄得我不知所措。他笑够了才叫着“记者同志”解释说：“你可不知道，不少人一听俺们守在雪山顶，都说俺们吃苦了，辛苦了，其实，俺们吃的哪门子苦哟！俺们边防站周围，矗满直溜溜的云杉，配上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景致可好啦，让俺们连长给你来张小照，嘿！甭提多美，俺那儿各种宝贝多的是：春天的黄羊羔、马鹿娃任你抓，夏季的雪莲、蘑菇任你采，你到林里去，千万小心，别让鹿角绊跟头。”

嗨！没想到风雪哨卡有如此美景逸趣。我不禁朝横亘在北边天极的影影绰绰的雪山瞥了一眼。

“再说，党和人民对边防的关怀够多的啦，俺们乐还乐不够呢，那个还想到苦？”说着，小战士扳着手指数了起来：“前年给俺们配了洗澡车，去年修了储水池，装备了水罐车，又发了大塑料棚，俺们在背风向阳的山洼洼里，第一次种出了嫩韭菜、青辣子、鲜黄瓜和肥豆角。这些小宝贝刚结出时，挠得全站人心里痒痒的，都想伸手摸摸。那还行？热乎乎的手还不烫蔫了？连长特地宣布了一条纪律：君子动口不动手。去年夏季，俺们每天吃一顿新鲜菜哩！”说完，小战士又“格格格”地笑了起来。那红朴朴的脸庞上绽出的笑容，多像风雪中盛开的红梅使人悦目、振奋呀！

小战士欢乐的笑声叩击着我的心扉。有水吃，有澡洗，夏日里每天有顿新鲜菜，这也值得欢乐和夸耀吗？这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里的人们随时都可以得到和占有的东西吗？假若这也是幸福，

那么，我们生活在正常环境里的人们所拥有的幸福不是太多了吗？我们每个人都该是幸福的百万富翁啦！看来，人们对自己已经占有或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往往并不觉得它的宝贵，而对追求希冀的东西才有一种朦胧的幸福感。望着眼前为有澡洗，有水用，有青菜祭牙而发出纯真欢乐的小战士，我的心颤栗了。同志呵，不要老是那般怨天尤人，抱怨不息，充分珍惜和享受你所占有的欢乐和幸福吧！

小战士见我半天不言语，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眼睛瞪得溜圆：“你以为我在瞎吹是不是？当然，再好的地方也有不美之处。城市好，城市有噪音，空气也不鲜；四季如春的云南好，别说你想滑雪溜冰了，就连见识雪花的机会也摸不上。”小战士为风雪边防的奇特辩解把我给逗乐了。“俺们那儿两个月才能看场电影，歌舞戏剧更没门。一封家信往返两个月，连个恋爱都不好谈。塑料棚里长菜了，但和团部的一样，不结籽。年初，当地维吾尔族群众上山慰问，知道站上缺菜籽，东家一两西家三钱地给我们凑了一些，这不！”战士拍了拍膝盖上的挎包：“春天要来了，又该下种了，站上派俺取了回来。”小战士润了润嘴唇，又接着说：“边防苦还是有那么点，但想想祖国边防平安了，四化建设保证了，俺们比啥都高兴，把苦就忘到脑后了。”

祖国风雪边陲的赤子，有着水晶一样的信念，金子一般的心呵！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参加昨天中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士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那么，常年战斗在风雪边陲的边防战士不同样是当今我们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吗？当我把这一想法说给小战士时，本以为他会粲然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笑窝的，没料到，他眉峰紧蹙，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愣住了，我们的小战士何以愁肠百结，如此心事重重？

“我们只是可敬的人，哪是可爱的人呢？”小战士声音低沉地

缓缓吐出。我问为什么？小战士用焦急的语调说：“我们站上9名干部，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但还有7名恋不上。特别是我们连长，31岁了。不是我在这里替他瞎吹，他可会体贴人啦，谁要找上他呀，瞎……，可是先后结交了三、四个，一听他是新疆雪山上的，就好像我们连长是只吊睛白额老虎，扭身就跑。有的还算有那么点意思，不过说得也不干脆，‘只要你今天转业，明天就结婚。’嗨，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俺们连长，在他的眼里，哨楼和雪山就是他的亭亭玉立的恋人，你想让他离开边防呀，那得羊角长在狗头上。可连长总得有个爱人呀？全站都替他着急。可连长不慌不忙，给你背诵女作家张洁的话来堵你的嘴：‘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呼唤我们的人。’”小战士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背诵着，惹得很少插嘴的司机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小战士没笑，他反提高嗓子：“等，你等到什么时候？到胡子拉碴，满脸核桃皮？”小战士瞪着大眼直问着，好像我们就是他的连长。

小战士不言语了，吉普车内第一次出现了寂静。车外呜呜的风声和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声也乘虚而入。

边防如此艰苦，我们的小战士没有皱眉，没有叹息，他用欢笑去迎接，去征服，可现在他却为连长的婚事……

满载欢乐的一叶扁舟，加载了些许不快。

我同情连长，为那几位姑娘对连长的态度忿忿不平。

小战士扒着我和司机的座背，看我犯愁的样子，扑哧一声又笑了起来：“你呀，还是记者哩，也像我们连长批评的，是个悲观主义者。”小战士挤眉弄眼，将一封信捅到了我的鼻子尖：“你看。”

我接过信，莫名其妙地端详着。只见信封上字迹清秀、工整

地写着：齐大山收。寄信地址仅两字：内详。信封的左下角，一个穿着绯红儿童裙，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高擎着一封信，欢快地朝“齐大山”奔去。那纤秀的字迹，那信封装帧的选择，很像发自一个感情细腻的女同志之手。

“齐大山？”

“就是我们连长呗。”

我还不肯冒昧推断。

“这是我刚从山下邮电所取来的，你再摸摸里面！”战士眉眼都在笑。

信封里厚厚的，信纸恐不下5张。咦，中间有一小硬片，看来是张照片啰。

“怎么？你们连长又结识了一位姑娘？”我也掩饰不住喜悦。

小战士嘿嘿地笑了：“全站信件归我分送，谁的秘密也甭想逃过我这通信员。连长收这样‘内详’地址的来信已是第二次了。那天，我无意中还听到连长在对指导员嘀咕，说是地方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一个姑娘在部长爸爸的鼓动下，‘呼唤’来了！”说着，小战士“叭”地打了个榧子：“嘿，兴许我们连长还真格地等上了。看来，连长剋我剋得有理，对前景勿须悲观。”是呀，勿须悲观。似乎“嚓嚓嚓”的轮胎扒地声也在应和着：勿悲观，勿悲观……。在我们这个有着良好社会风尚的国度里，真善美的文明花朵是永不凋谢的。吉普车内又洋溢着醉人的欢愉。

忽然，小战士神秘地咬住我的耳朵：“记者，你说爱情姓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没等我回话，又说：“让我看呢，至少有这样的涵义，就是勇于为对方分挑重担，甚至作出某些必要的牺牲。正如我们爱祖国，爱边防，就要给祖国，给边防以忠诚，以青春，以生命一样。有些人总把爱情看成聚宝盆，时常想从爱情里捞走什么，却不愿为爱情增添什么，更怕牺牲什么，这种人

呀，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情。”

我着实没想到，这位稚气未脱的小战士竟对爱情发表如此深刻的见解。不平出诗人。可能是小战士为他们连长的婚事不平太甚，所以感慨才如泉涌吧！

我把齐连长的信递还给小战士，顺口说了句：“看来，这姑娘决心为你们连长牺牲些什么啦！”

“嗯，主动打上‘边防恋’，真格需要一番勇气哩。”不过小战士轻叩着信封：“谁知道这姑娘是不是真格地不怕新疆的风雪、分居的寂寞和独立生活担子的沉重呢？”

岔路口到了，我们说送送小战士。他摆摆手说不用了，自个儿欢快地朝雪山奔去。

小战士去了，他提的姑娘是不是真格“不怕”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我的心。蓦地，我想起上小学时读的那本没尾的书。眼下，小战士给我留下的，不也是一部没尾的恋歌吗？

在边防团呆了5天，又有其他采访任务，走一道红卡山的计划自然也就落了空。转眼离开边防团3个月有余，齐连长和那姑娘的关系确立了吗？当年，我多么虔诚地希望小长工和小丫鬟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今天，我又多么热切地希望那姑娘能为热恋着祖国边防的齐连长牺牲些什么呀！多么热切地希望读到“雪山恋歌”的美好的结尾呀！*

* 本文发表于《留下一片绿荫》，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边 陲 的 笑 声

风雪边陲的战斗生活是艰辛的，但又充满了乐趣。读了这组来自新疆边防的趣闻，你仿佛听到了战士们那朗朗的笑声，你会说，他们在含笑守边疆。

班公湖烤鸭店

喀喇昆仑山巅班公湖畔的某边防站节日会餐时，大家都称道味道鲜美的烤野鸭。

野鸭是班公湖的“特产”。湖面解冻、绿水泱泱的五六月，成群的野鸭便在这里产蛋孵卵，每当小鸭用鹅黄色的小嘴啄破蛋壳，边防战士便把这些“小客人”请回哨卡，饲养起来。这些小生灵颇通人性，养上不几天，它们便“嘎嘎”叫着结伴到湖边自个儿寻鱼虾吃。日出而去，日落而归，风雨无阻，再也不用我们的战士来分心照料了。过上三、五个月，只只野鸭就肥得摇摇摆摆，连挪一步都困难。

每年，这个边防站要养野鸭几十乃至近百只。战士们自豪地说：“我们这里开个‘班公湖烤鸭店’，能和北京烤鸭店媲美！”

马鹿黄羊看电影

在某边防团，一位从边防站下来的小战士给我讲了他们养马鹿和黄羊的事儿。这两个小家伙都是在“咩咩”坠地不久，被我们的战士逮来的。它俩不仅和站里原来就喂养着的野鸽、野鸭合群，成了它们的“首领”，而且和我们的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太阳露出山尖尖，战士们“一、二、一”地出操了。马鹿和黄羊也跟在后边，“吧嗒、吧嗒”跑得欢。每次看电影，战士们一集合，马鹿、黄羊也把野鸭“召唤”到银幕前，装模作样地看起电影。战士们看到精彩处，“哗哗”鼓掌时，它们也像通人语似地“嘎嘎嘎”、“咩咩咩”地叫个不休，可逗人啦！

给我讲述这件趣事的小战士粘上了我，一直撵掇着我到他们站上去。我开玩笑地说：“莫不是你在编圈子，想把我诓进去！”那小战士生气了，伸出小姆指说：“谁诓你谁是这个！”

一只狼的动物园

在禾角克边防站，我一杯茶才呷两口，边防站的文书便对我说：“走，看看我们的动物园去！”

文书把我领到营房东南边的小树林里，只见一棵大树上绑着一个铁笼子，里边卧着一只大灰狼。那只狼见我们来了，赶忙立了起来，张着大嘴，伸着舌头，竖着耳朵，摇着尾巴，在笼子里来回转圈，把它后左腿上的铁索和铁笼弄得“当啷当啷”直响，像是在告诉我们，它是多么的烦闷。

文书指着笼子说：“这狼是当羔子时被我们抓来的，那时它像条小狗一样招人喜欢，和我们又打又闹。稍大些，它便龇牙咧嘴直

往人身上扑，我们就关了它的‘禁闭’，现在脾气大着哩！”

我想，对待大灰狼自然不能像对待马鹿、黄羊那样用电影来招待哟。*

* 本文发表于1980年6月3日《解放军报》。

难忘幸会情悠悠

“年长者坐首席。”温文尔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满脸含笑，拱手相请。

华发中泛露缕缕青丝的92岁高龄的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琼英居首，马万祺与夫人罗柏心分坐左右，其次依序而坐的是：王震同志夫人王季青、陶铸同志夫人曾志、谢觉哉同志夫人王定国、李先念同志夫人林佳楣、王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贺龙同志夫人薛明、罗荣桓同志夫人林月琴。

“尊敬的各位老夫人、老大姐！”马先生浓重的广东地方口音中鸣荡着铜质的音响：“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73周年诞辰。我们夫妇能邀请到各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夫人在北京饭店一起庆祝党的生日，感到十分高兴。”马先生语调一转：“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我们国家深受帝国主义欺压，内战连绵不绝。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带领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近些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们国家各方面变化更大。喜逢佳节，饮水思源，我们特向老一辈革命家和各位老大姐表示深深的敬意，恭祝各位老大姐晚年幸福！”

饮水思源，记忆之河悠悠绵长。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朱仲丽大姐边沉思边述说：“我第一次见马老是在王震副主席家里。‘七一’，党的生日聚会，我不禁想起了

王老。他什么地方危险、什么地方艰苦就到什么地方去。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吃了很多苦，做了很大的贡献！”马先生用崇敬的口吻说：“50年代前期，澳门吃水非常困难，为了尽快修好澳门给水工程珠海竹仙洞水库，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让我陪他深入工地。通往工地的路坑洼不平，小车没法开，他就要了台没有篷的大货车，屁股下塞了两张旧报纸，坐在车厢上颠到了水库。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实在可亲可敬！”

记忆的涟漪更加荡漾，曾志大姐对人介绍起了坐在身旁的王季青大姐：“在延安马列学院时，我们俩住一间房，睡一个炕。季青和林枫同志的爱人郭影秋的豆瓣辣酱做得好，一次做一罐，够我们吃一星期！”季青大姐有些耳背，工作人员大声复述后，她含笑点头，说她全记得这件事。王定国大姐说：“那时生活很苦，但每天精神头很足！”

有谁说过，所有欢乐中，最伟大的欢乐在于对真理的沉思之中。各位大姐在沉思中，亦在最伟大的欢乐中。

“曾大姐，你代表大家感谢一下马老夫妇！”佳楣同志的提议打破了沉寂。曾志大姐举起桌前饮料：“咱们一起来感谢！马老的一番话，使我很感动。我们决心按马老的希望，做到人老思想不老，继续为党工作！”众位大姐纷纷以饮料代酒，与马老夫妇碰杯。隔桌相敬，诸多不便，佳楣同志一声时髦的“过电”提议，撩起一片笑声。

朱仲丽大姐用平静的口吻宣布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马先生很早就很进步，早在1947年，他就写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大哥朱慎修也参加了和他的谈话。”

大家都很敬重马先生的为人，但他的这段“红色历史”却是第一次听说。

1919年出生的马万祺，15岁步入商界。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

想的马先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不顾危险，设法打破封锁，把抗战急需的物资运到国内。此后，他又接触不少资深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改造旧中国的真理。他与柯麟一起写了入党申请。1947年的一天，在香港亚洲酒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潘汉年、朱慎修、连贯等一起找他谈话说：“经请示，中央答复说，你俩完全具备党员条件，随时可以入党。但是，现在留在党外，比进党内更有利于替党做工作。究竟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尊重你们的意见。”马万祺服从党的工作的大局，留在党外又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薛明大姐十分感慨地说：“马老的思想是非常布尔什维克的！”朱仲丽大姐补充说：“实质上那时候马老在思想上就入党了！”

这时，马先生的两个孙子手持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90周年的首日封走来，请陈大姐签名。马先生由衷地说：“陈大姐的字写得真好！”陈大姐不好意思了：“你别夸了，写得不好！”佳楣同志说：“陈大姐，你92岁了，写字手不抖，身体这样好，能活150岁！”陈大姐很认真地回答：“到那一天我请你们客！”

主席的欢快情绪感染了附席。工作人员席上，在马先生三儿媳颜婉明的带领下，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爱北京天安门》、《歌唱祖国》等歌曲。附席的歌声反过来又为主席的欢快情绪推波助澜，各位老大姐击节加入合唱，气氛热烈之至。马老夫人指挥三儿媳：“三嫂，领大家唱《南泥湾》。”深情欢快的《南泥湾》又接着飘起。

欢歌笑语中，只有马先生在沉静中握笔疾书。笔者上前窥探，只见一首诗俄尔吟成：

兴隆国运倍欢欣，
正是光荣党诞辰。

巾幗英雄人未老，
優良傳統貫乾坤。”

大家紛紛稱贊馬先生立馬可待，文思敏捷。

歡歌笑語中，林月琴大姐把筆者叫到身邊囑咐：“今晚這些事，很有意義，希望你寫出來，在報上登登。”

遵囑，追記，整理成此文。*

* 本文發表於 1994 年 7 月 25 日《人民日報》。

她从井冈山来

1978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井冈山垦殖场23岁的团委副书记王军，甩着齐肩小辫，迈进灯火通明的场部阅览室。她拿起《解放军报》翻阅。看着看着，一篇《红其拉甫山口的明灯》的通讯紧紧吸引了她：海拔4100多米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交界处，冰峰矗立，风雪弥漫，空军导航战士在严重缺氧的地区边大口喘气，边观云测天……

王军盯着报纸沉思，想起她的一个女友和一位边防军连长“一口吹灯”的事。“你们不是谈了3年了吗？”王军惊讶地问。“我等了3年，他就是不听调遣，不向后转。我才不是傻大头，牺牲舒服的家庭生活去换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哟，你怎么这么想，他们日夜守边防，还不是为了咱们生活得更幸福？”那位女友用右手食指刮了下王军的鼻梁说：“哎呀，我的傻妹妹，现在是什么时代啦！‘一工二干三学生，解放军同志请你等一等’，找个当兵的，两地分居不说，说不定哪天打起仗来……”“噢，叫你说这么说，为祖国人民的安全顶风冒雪站岗的边防战士就该一辈子打光棍？！”……

王军出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她在这美丽的北国边城度过了19个春秋。1973年高中毕业后，她主动放弃留城、留校的机会，毅然来到井冈山插队落户。她从小敬爱解放军。少年时代的日记里，大段大段摘抄着《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闪光文字；上学时，

她多次和同学们一起，到舍身拦惊马救出儿童的刘英俊的墓前，缅怀烈士光辉的一生……为了表示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她把原名王桂芝改成王军。

万里之外的红其拉甫山口导航站的风雪，搅动了王军平静的心田。对，写上一封信，写上井冈山姑娘对边防战士的敬意，写上井冈山姑娘对边防战士的问候，写上……

窗外，星斗满天；灯下，姑娘铺开洁白的信笺。

红其拉甫导航站回信了。信是红其拉甫导航站老站长吕献湘执笔的：

“……一周一次的邮车来了，通讯员把你的来信递给了我……开饭列队时，我激动地将你的来信向全站同志宣读，大家感谢祖国人民对我们这个雪山上的小小导航站的惦念；感谢姑娘你对我们这几十名干部战士的问候和鼓励。你说现在的井冈山正是色彩斑斓的深秋，你猜得很对，我们守卫的红其拉甫，已是风雪嘶鸣的世界了。虽然我们在这里要多吃些苦，但能让祖国人民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欢乐。全站同志委托我向你表示，决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

掷地有声的话语，激荡在姑娘的心胸。她的眼睛潮润了。导航战士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催促着姑娘举手叩击爱情圣殿的大门。

姑娘摊开素笺，刚要下笔，红云浮上双颊，心突突地跳了起来：这，未免有些冒昧和唐突吧！她撂笔凝思，反问自己：能得到高原导航战士的爱情，和意志坚强、心灵纯洁的人结为伴侣不正是自己的终生幸福吗？她那记忆的屏幕上映出了这样的格言：“生活是自己的，爱情道路的开拓需要勇气。”她又平静地拿起钢笔，把自己的简历、家庭的情况和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一古脑儿向老站长倾诉。当然，她没有提及上中学时，连年被评为三好学

生，并担任校团总支副书记；没有提及插队井冈山不久，便被老俵们选为生产队长，光荣出席了江西省先进青年代表大会，报纸、电台、电影纪录片曾先后表扬她把青春献给革命老根据地建设的事迹。在信的结尾，她婉转地委托老站长在风雪高原给自己介绍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书信载着姑娘忐忑不安的心和纯真赤诚的爱，穿过千里平原，飞越万重关山，到了遥远的帕米尔高原。

老站长捧着姑娘的信，犹如捧着姑娘滚烫的心。多好的姑娘啊！老站长从来没有给人介绍过对象，这次决心要扮演一下“月下老人”的角色！他把全站人员扒拉来扒拉去，最后相中了高昌明。他是电台台长，兼站上团支部副书记，1975年从陕西镇安入伍，24岁，是一精明能干的小伙。小高热爱风雪高原，刻苦钻研业务，平时还爱吟诗哼曲，和姑娘倒是挺般配的。

“红娘”热心穿针，鸿雁殷勤往返，沟通着井冈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的信息。好刁的小高要考验考验姑娘。

“同情绝不是爱情……”

“我的爱情字典里没有怜悯成分，而是对对方行为和情操的崇敬，对对方事业和爱好的支持。边防战士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我愿把自己的爱情献给边防战士。”

“你要和边防战士结合，就意味着要失去有人陪着压马路、逛公园、逛商店的许多美好时光，得到的却是两地生活的思念和繁重的家务劳动的艰辛。”

“这些我都细细考虑过，并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决不拖你的后腿，全力支持你在高原战斗……”

“你是工人世家。我家在陕南山区，山寒水瘦。一个老母亲守着七八个粗碗、两间破屋。”

“在我的爱情天平上，金钱、权位、门户是毫无分量的筹码。

成家后，我把你妈接到江西，让她老人家在山清水秀的井冈山度过幸福的晚年。”

.....

还需要再考验什么呢？1979年8月，小高回家探亲了，并且约王军在他的家乡镇安见面。

小小山村的男女老幼簇拥在街头，欢迎井冈山来的姑娘。王军壮着胆子笑容可掬地和街坊邻居打着招呼。姑娘来到高家，劈柴、挑水、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前屋后，样样争着干。把原来怕“城里闺女不好侍候”的高妈妈喜得眉眼都是笑。老人家悄悄对小高说：“闺女话不多，稳重，生活不讲究，也蛮勤快，是个过日子的人，你看着办吧！”

小高哪还有什么意见。倒是王军对小高有点小意见。原来，西街口并非山寒水瘦，而是富得流油；小高家也并非两间破屋，而是两间新瓦房，至于七八个粗瓷碗，更是没有的事。“小高啊，你好刁！”

离开小高家，小高同王军到佳木斯探望小王的双亲。“天呐，怎么到新疆找朋友！”王军的母亲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深为震惊。

父亲急忙找来地图，两位退休老工人戴着老花镜，在地图上找寻红其拉甫山口。“哎哟！在这边边上！”

“太远了！”

姑娘和颜悦色地对父母说：“远不怕，关键是看人品！”

“看人品？井冈山、佳木斯就没有好人啦？”母亲不满地质问。

王军知道老人家一时转不过弯来，请来姨妈、姨父、姐姐、姐夫给老人家做思想工作。还真灵。姑娘返回江西时，父亲对姑娘说：“写信告诉小高，就说我和你妈对你们这事蛮赞成，让他安心工作！”

“王军在新疆对上了象！”消息在垦殖场传开了。不少人夸奖

姑娘有志气，领导上也赞扬姑娘为青年们树立正确恋爱观作出了榜样。自然，也不乏摇头、撇嘴的人。

1982 年春节前夕，小高和王军结婚了。

婚后，小王对小高十分体贴。她探亲路过北京时，特意买来上好的毛线，第一次学织毛衣。赶了 20 多个夜晚，入冬之前使小高穿上了链条花的毛衣和扇形花的毛背心。井冈山春茶刚焙好，她急忙寄去一包让小高和战友们品尝。她动员小高戒烟，特地买了戒烟糖寄去，还为小高买了指导学习和工作的书籍：《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祝你成功》等等。

小王把婆婆当成亲生母亲待，给婆婆寄钱、寄衣料、寄尖脚布鞋、袜子，按月写信问候婆婆……

王军对小高的体贴、鼓励，对婆婆的关心、孝敬，使小高心里像喝了蜜，他工作得更加勤奋了。他所带领的电台，连续被评为先进单位。

1982 年 2 月，王军去红其拉甫导航站探亲，部队首长和战士们都跑来看望王军和小高的“红娘”——当年红其拉甫导航站的老站长，如今乌鲁木齐部队空军某场站的参谋长吕献湘，他半玩笑半当真地问王军：“小王，你来时带绳子没有？”

王军扑闪着乌亮的大眼，不解其意。

“好拴着小高的两条腿往后拉呀！”谜底一抖开，逗得满屋都是笑声。

小高笑着插话了：“参谋长，这你可冤枉人家啦！那边倒有人愿帮忙找个‘后门’，把我调到内地机场去，可小王说：‘那不成，我当初就答应过支持小高在新疆。’她还说，只要边防建设需要，她还要随军来新疆哩！”*

* 本文发表于《时代的报告》，1983 年第 2 期。